血缘与归属

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加拿大] 叶礼庭 著
MICHAEL IGNATIEFF
成起宏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版权信息

书名:血缘与归属

作者:[加]叶礼庭

译者:成起宏

ISBN:9787511733290

本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授权中信联合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导读：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

王前[注]

2014年3月，笔者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参加关于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研讨会。来自欧美的专家在为期两天半的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伯林跟启蒙运动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伯林创建并担任首任院长的学院里，与会学者大多对伯林关于启蒙的研究颇有意见，有的炮火之猛烈让我这个也研究点儿伯林的外来者很是吃惊：如果搞不清状况，你会疑惑被讨论的这位哲学家是否还有讨论的价值。

记得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后一个多小时，我才赶到会场，因不想在别人发言时闯进去打扰，于是就上了二楼，站在走廊跟坐席之间光线很暗的过道上听。没多久，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走了过来，他打开门正要进去。我定睛一看，眼前的不正是伯林传记的作者叶礼庭吗？的确是2012年夏天我在首尔参加伯林的自由主义研讨会时见过的那个人，于是就打了个招呼。简短的寒暄后他进去了，我也就尾随而入，坐在二楼的座位上继续听。这天叶礼庭有主题发言，他反驳了时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德隆（Jeremy Waldron）对伯林的严厉批判。沃尔德隆主要批评伯林忘记了立宪启蒙主义的重要性，具体内容就不在此赘述了。[注]

当时印象很深的是，这位伯林晚辈中唯一曾在政坛居高位、跟加拿大总理宝座擦肩而过的学者真是能言善辩，对当今法哲学重镇执牛耳者沃尔德隆反驳起来毫不客气，似乎成了场内为伯林辩护的最强音。遗憾那天他参加完会议就离开了，我没有机会请教。一晃三年过去，因缘凑泊，这次有机会阅读他的三本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读完惊讶地发现自己

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以前只是仔细读过他那本伯林传记——那是本难得的关于哲学家的传记佳作——其他的除了访谈外基本上没有读过。这次通读三本书有许多新的发现，尤其对他深入兵荒马乱的纷争之地，了解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真相的努力肃然起敬：他是位典型的行动型知识人。

《血缘与归属》《火与烬》和《战士的荣耀》各有特色，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三部曲。《血缘与归属》谈新民族主义，《火与烬》写从政的经历，可以说是一部对他的从政经历的总结，而《战士的荣耀》则是一部谈论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若干当今世界重要问题的评论集。三本合在一起正好反映了叶礼庭这些年来的人生轨迹和他最关心的问题。我想先来谈一下给我很大震撼的《血缘与归属》。

在此书中，作者写了他的六次关于新民族主义的旅程，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开始，经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再到北爱尔兰。通过这些旅程，叶礼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当今新民族主义的灰色甚至是血腥的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世界各地的新民族主义倾向是如何导致冲突，甚至残酷战争的。比如，说到克罗地亚跟塞尔维亚的冲突，我们这些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外国人，除了看报纸电视上的报道，实在搞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何从原来和睦相处的邻居，昼夜之间就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给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概念》又提供了一个绝佳样本。叶礼庭冒着生命的危险，进入冲突的地区进行实际调查，就是想要搞清楚双方冲突的根源。许多时候死亡如影随形，光凭这点就令人对这位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另眼相看。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我们这些遥远的东方人也就渐渐明白冲突的起因和问题的复杂性了，远非一句塞尔维亚人对异族进行种族清洗就可以解释完毕的。

记得我当时是从西方的媒体上得知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后来才知道在他们的记忆中还有其他事件，比如“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民族独立组织乌斯塔沙（Ustashe）加入轴心国阵营，残杀过塞尔维亚人和

犹太人等异族，最后被铁托击溃。作者到底是历史学出身，对事件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做了很细致的调查，所以他能够对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做出比较独立的判断，对当年西方政府几乎一边倒的措施也能提出批评。他还去了铁托故居，去了解这位作为南斯拉夫象征的政治家在民族问题中起到的作用。原来铁托是克罗地亚人，他在建立了南斯拉夫之后，并没有真正处理好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矛盾，而是通过遮蔽和向前看的方法处理这个很敏感的问题。这种方法在铁托那样的铁腕人物在世的时候可以起作用，一旦他去世，原来被掩盖起来的问题就渐渐露出水面，后继者既然没有前任那样的权威，掌控不了局面，再加上立场偏颇，终于酿成一场巨大冲突，使原来和平相处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从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邻居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一些老人甚至说“二战”时候都没有杀得那么凶，这也让我们见识了新民族主义的巨大破坏性和残酷性。作者还采访了当过铁托副总统的一位老政治家，他俩关于历史和现状的对话也极有意思。

作者写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民族矛盾的那一章也很吸引人，因为这里面有他的寻根旅程。叶礼庭的《伯林传》出来后，我读过一些人对作者的访谈。里面他谈到自己的身份。他的曾祖父是沙皇时代的内务大臣，参与过沙皇时代的排犹决策，而他的祖父则是沙皇时代末期的一位教育大臣，“十月革命”后举家流亡，最后定居加拿大。在去乌克兰采访的旅途中，他参拜了曾祖父母的墓地，见到了了解自己家族情况的年长的乌克兰人，虽非叶落归根，但这颇有回乡意味的旅途让作者感慨万千。毕竟他是流亡者的后代，所以他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尖锐民族矛盾有跟纯粹局外人不一样的视角和感受。作者在采访黑海舰队时所了解到的情况真是极好地体现了原属一个大国的若干民族在国家解体后面临的困境：你的忠诚对象究竟是谁？书里面提到住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到俄国去竟然要护照，原先非常平常的国内旅行一变成国际旅行，身份认同也变得尴尬起来了。

叶礼庭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到英国寻求发展，不但为英国广播公司

（BBC）做过不少很精彩的节目，而且为伯林那样在整个西方都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写了颇受称赞的传记，英国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了。但即便他熟知英国，在调查北爱尔兰问题时还是对英国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自己被英国的世界主义给“骗”了——英国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传统的。联想到不久前的脱欧公投，我们也就能理解英国独特的民族主义了：英国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变成世界主义式的，它虽然没有狭隘的岛国根性，但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这些“发现”都是作者的功劳：帮助我们打开视界，改变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对这个世界有了新的认知。

如果说叶礼庭的传记对象伯林是20世纪对民族主义最有见解的思想家之一，那么三本书中最厚的这本《血缘与归属》则给我们提供了新民族主义的各种范例。它们的本质都很相似，只不过是换了时代和环境，上演的剧本没有本质的差异。伯林在谈到民族主义时，既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也分析和批判了其残酷暴力的一面。伯林说19世纪的思想大家们几乎没有一个重视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大多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主义会逐渐式微，所以那些大家几乎都没有预料到民族主义会在20世纪勃然兴起，甚至主导了很多政治运动。不管左翼右翼，如果没有跟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可能无法取得胜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礼庭的这本书几乎是在为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提供了一连串有意思的解释和注脚。

伯林在思考自己的犹太民族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时，虽然并非完全没有萨义德（Edward W.Said）所批评的袒护以色列的一面，但他还是提出了双方应该妥协的建议。巴以冲突里有的特征，你都可以在叶礼庭所记录的六次旅程里找到类似的对应。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处理民族问题的准则呢？通过叶礼庭深入冲突现场的考察，我们虽然被那些鲜血和暴力震撼，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让本来深陷民族冲突的各方和平相处的原则。当然，这绝不是喊几句世界主义的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需要倾听各自的声音，通过理性的对话来寻找一条共生的道路，否则只会是

无止境的、没有意思的冲突罢了。叶礼庭对比了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笔者也倾向于认同公民民族主义，因为既然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都已几乎不可能是由单纯的同一个民族组成的，那么公民民族主义也就是唯一的选择了，这点跟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读完沾有血腥味和戾气的《血缘与归属》之后读《火与烬》，会觉得很有趣味——这样说对在做加拿大自由党党魁时落败的作者来说也许有点失礼。这本书是一位在近耳顺之年投入政坛的人物（即叶礼庭自己）的从政记录，对我们了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有不少帮助。笔者很喜欢看BBC转播的英国下院的论战，原以为欧美的议会大概都是差不多，哪里知道在作者的笔下，加拿大的议会运作并不精彩，有意思的演讲讨论也不多，纳税人也不是很关心自己国家议会的运转情况，跟英联邦的龙头老大西敏寺大本钟下的议员们比起来似乎差远了。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叶礼庭写他如何从政坛菜鸟逐步迅速进入角色，临危受命成为加拿大最大在野党——自由党——的党魁，并进而挑战当时的哈珀总理，却终因是空降政治家和若干失言导致落败的过程。从作者坦诚的叙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英美等国工作30年左右，然后应忧心自由党前途的若干政治家的请求回国从政，这本身就给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在选举中对手始终可以拿这点来攻击他，而事实上加拿大的保守党正是做样做的，这让叶礼庭有口莫辩。毕竟作者大半生都在媒体和学界工作，做的是职业知识人而非职业政治家，要完成从学人到政治家的转身，时间还是太短了。他在选举过程中的失败经历正好说明他是政坛的菜鸟，跟那些年纪轻轻就出来在政坛打滚的职业政治家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不过他从谈政治的学人、战地记者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转到政治家的行业，从书桌上的“空论”到身体力行，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也是这本书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在《火与烬》中，他为我们考察当今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样本。加拿大的政治文化我们一般都不太熟悉，

它的国土那么辽阔却似乎一直生活在南边那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下。通过作者这位前自由党党魁的描述，我们会发觉，不管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特朗普上台，引起这些巨变的要素在加拿大这个民主制度运转基本上算是很成功的大国也存在。比如移民问题，比如政策如何反映民意，等等。在去年美国的大选中，建制派精英饱受攻击，某种民粹主义占了上风，这当然是跟美国国内存在的矛盾分不开的。叶礼庭本人是作为“空降兵”进入加拿大政界的典型精英，当然会遭遇巨大障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跟选民打交道，让他们认识你、接受你，他都在书里有很详细的描述，让你觉得要当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实在不容易。当然，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叶礼庭落选后没几年，自由党又重新执政，当今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正是叶礼庭年轻时助选过的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的儿子，而这位加拿大的官二代从政阅历并不比叶礼庭丰富到哪里去，看来毕竟还是拥有父辈的人脉，加上更“接地气”吧。

《战士的荣耀》作为一本评论集，是叶礼庭对包括新民族主义在内的当今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汇总，里面也有很多令我们读了深思的内容。如果说《血缘与归属》是以报道为主，这本则是他对那些问题较为理论化的探讨。作者在此书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电视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微小的差异如何导致民族冲突、红十字会在现代社会里的使命和局限，以及转型社会和民族冲突地区的和解问题。在讨论为何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样的差异极小的民族会发生激烈冲突时，叶礼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做了梳理，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再有，讨论和解问题的《我们想要从中醒来的噩梦》也写得非常有深度，反映了他所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很多问题一经他的阐述，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的很不简单，远非采用“理中客”的态度就能处理好的。比如这篇文章里讲到和解中如何处理真相问题。我们知道南非有真相委员会，其在南非的国家和解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作用，战后西德对历史的反省做得也颇受称赞，但如果看一看内部情况，其实并不简单，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努力，有时是迫于外界压

力。叶礼庭最后总结道：“和解建立在互相道歉的基础上，承认历史不是命运，承认历史不应受到谴责；也不应谴责文化或传统——历史必须谴责的只是特定个体。和解的最后一个维度（即哀悼死者）在于对和平的热望必须战胜复仇的渴望。除非和解尊重仇恨背后的情感，除非和解让曾陷入战争的共同体学会共同悼念死者的仪式，以之取代包含的对逝者的敬意，否则它不会有消除仇恨的机会。和解必须触及死亡民主的共享遗产，告诉人们所有终结于杀戮的争斗都毫无作用，所有想要报复那些不再存在的人的所有努力都是无止境的徒劳。因为杀戮不会让死者复活，这是最基本的一项确定性。这是一种可以共享的遗产，当它得以共享的时候，一个人从梦中醒来时或许才会获得这种深刻的认知。”这是在观察了新民族主义冲突的现场，对历史上和当代的种族冲突进行深刻思考后得出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对我们思考自己的历史也是有启示的。每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都会有各种复杂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读完这三部著作，笔者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为了写作伯林传记，跟着伯林在伦敦坐巴士的那个40岁左右的俄裔加拿大学人。叶礼庭写作的《伯林传》也是给20世纪留下一个记录，他在自己正值壮年的一段时期跟伯林的人生产生了交集，他所尊敬的这位哲学家思考的很多20世纪最重要的问题自然也给了他不少影响，那些思考也不时出现在这三部著作里。叶礼庭的从政生涯虽然没有结出硕果，但他对政治的思考，对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重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因为他从政失败而失去意义。恰恰相反，这三本书是一位不满足于坐而论道，有付诸行动的勇气的知识人的人生记录和理论反思，在这个价值观有错位的时代里提供了很清醒的判断，对我们理解时代和政治大有裨益。

笔者在写这篇导论的时候，看英国的《卫报》等媒体报道说如今担任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校长的叶礼庭正在进行着一场保卫大学的战斗。作为行动的知识人，他正在捍卫学术自由，在书写他人生的新篇章，而此时他已入古稀之年。我们当然无法说作为政治家的叶礼庭获得了成功，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败选后在电视上用英语和法语发表败选感言

时的落寞眼光。据说西塞罗很喜欢说不应该根据成就来评价一个人，而是应该根据他为了某个目标而做的奋斗来判断，用这句话来评价叶礼庭，也许非常合适。在民粹主义再度沉渣泛起的年代里，叶礼庭的思索会给我们很多启迪。他不可能提供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是会刺激我们思考那些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的“真问题”。我相信各位读者读完他的这些著作后，会有类似的感触。

---

1. 王前，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东亚教养教育创新组织特任副教授，专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在日本出版《中国是如何阅读西方思想的？》、《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合著）、《现代中国与市民社会》（合著）等多本著作，另在《知识分子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思想》等学术类杂志发表若干论文、随笔。
2. 关于叶礼庭具体的发言内容，可参见笔者发表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思想》第二十六期上的文章。

导论：最后的避难所

军阀

这个联合国检查站是一座堆着沙袋的活动房屋，有两个加拿大士兵守卫着克罗地亚中部帕克拉茨（Pakrac）的克族人控制区和塞族人[注]控制区之间的路障。通往检查站的道路蜿蜒曲折，两边的小平房已被夷为平地，车辆翻倒在壕沟里，废弃的花园中杂草齐腰。当我们接近检查站的时候，透过杂草可以看到两个十几岁的克罗地亚人，用望远镜警惕地注视着塞尔维亚人一方。

离开联合国检查站，刚进入塞族人控制区，十五个武装的塞族准军事人员马上围住我们的面包车。他们刚刚在村里的婚礼上喝过酒。醉得最厉害的那个人双眼呆滞、满脸汗珠，强迫我们打开车门，爬上了车。“我们看着你们，”他用双手做出望远镜的样子，“你们告诉那些乌斯塔沙（Ustashe）[注]，”他指着来路上藏在草丛中的克罗地亚人，然后从腰带间掏出手枪，“你们这些该死的间谍。”他用枪口逼迫司机下车，接过方向盘，开始重新发动引擎。他后面座位上的摄影师抱怨说：“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拍下来？”面包车后部一个声音幽幽传来：“因为他会开枪打死你。”

那个塞族人将面包车挂上挡，车子慢慢启动，这时一个联合国士兵猛地拉开车门，抓住钥匙，熄了火。“我们会自己开的。”联合国士兵喘着粗气说，半拉半哄地把塞族人从司机座位上拖下来。另一个全副武装的塞族年轻人挤进面包车里，摇了摇头：“我是警察，你们被捕了，跟我走。”

在我追寻新民族主义的旅途中，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开始理解新世界秩序的真实景象是什么样的：喝多了梅子白兰地的武装分子，种族狂

热，隔着废弃土地互相射击；一个设在他们中间的检查站，高傲地摆在那儿，被称为“国际社会”，但实际上只不过配备了两个焦躁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时不时地担心他们能否活着离开的摄影团队。

“国际社会”的法令只限于联合国检查站两侧150米以内。超出此范围，枪炮就是法律。武装人员把我们带到村里的警察局，局长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相信，因为我们的翻译的祖父出生于克罗地亚的克尔克岛（Krk），所以他一定是个克罗地亚间谍。但随后来了个电话，指示局长释放我们。没有人会说是谁下的命令。看上去，应该是当地的塞族军阀。这是我第一次遭遇军阀的权势，但不是最后一次。

我是“冷战”时代的孩子。我出生于1947年，柏林空运[注]的那一年。关于不顾一切后果的政治，我的第一个记忆是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一天所感受到的极度恐怖。现在回头来看，我发现自己经历了最后一个帝国时代，最后一个世界上各民族国家被划入两大截然对立势力范围的时代，最后一个恐怖制造和平的时代。现在，恐怖似乎只能制造更多的恐怖。

如果21世纪已经开始——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注]——那么它开始于1989年。当柏林墙轰然倒下，当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站在布拉格的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的阳台上，和人群一同欢呼，像许多人一样，我认为自己见证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新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几乎顺从地觉得自己将在“冷战”的恐惧麻痹中终老。突然，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到黑海，从塔林（Tallinn）[注]到柏林，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一个自由民族的新秩序开始成形。1991年8月，当莫斯科人民捍卫俄罗斯议会、对抗坦克时，我们相信，那拖垮了20世纪最后一个帝国的公民的勇气可能强大到足以支持俄罗斯向民主转型。甚至，我们一度相信，东方的民主洪流可能横扫我们西方自身已经疲惫不堪的寡头政治。

很快，我们就发现自己错得有多厉害。因为承继最后一个帝国时代的，是一个暴力的新时代。新世界秩序的关键叙事是民族国家瓦解、陷入种族内战，这个新秩序最重要的建筑师是军阀；我们时代的关键语言是种族民族主义。

伴随无忧无虑的乐观思想，我们认定世界无可避免地前进，超越民族主义，超越部族制，超越我们护照上限定的狭隘的身份，走向一个全球化市场的文化，那将是我们新的家园。但回溯过去，我们不过是在黑暗中吹着口哨，为自己壮胆。被压抑的东西已经回归，它的名字叫民族主义。

---

1. 克族人，即生活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克罗地亚人；塞族人，即生活在此处的塞尔维亚人。1992—1995年的波黑战争即围绕此二族人以及穆斯林的矛盾展开。——编者注（若无特别注明，后文注释均为译者注。）
2. 乌斯塔沙为“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民族独立组织，目标是建立纯粹克罗地亚人的国家。“二战”中乌斯塔沙政权加入轴心国作战，残酷屠杀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吉卜赛人，1945年被铁托击溃。
3. 1948年，苏联封锁美、英、法三国占领的西柏林。为维持西柏林居民和驻军的生存，美英盟军组织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空运，持续一年，直至1949年苏联解除封锁。
4. 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当时还未进入21世纪。
5. 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

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

作为政治信条，民族主义是一种观念：世上之人区分成各民族，其中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决权，或者以已有民族国家中的自治单位而存在，或者有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

作为文化理念，民族主义是一个主张：尽管男人和女人们拥有许多身份，但为人们提供最重要的归属形式的，是民族。

作为道德理念，民族主义是一种伦理：英勇牺牲，为在保卫自己民族、对抗内外敌人中使用暴力提供正当性。

这些主张——政治的、道德的、文化的——互为奥援，认为民族有权以武力或暴力捍卫自身的道德主张，依赖于文化上的主张，即满足安全和归属的需要是唯一重要的。认为所有民族都应当为国家地位而奋斗的政治理念，取决于认为只有民族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主张。文化理念反之也为那种如果没有自决这些需要就不可能满足的政治理念提供佐证。

所有这些主张都颇具争议性，没有哪一个是直观明白的。世界上有许多部族居民和少数民族不把自己看成民族，很多并不寻求建立自己的国家。此外，为什么民族身份应当是比其他任何个人身份都更为重要的因素，并非显而易见；为什么捍卫民族让使用暴力成为正当的，也非一望可知。

但现在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界定了在何种情形下，当人们的自决权受到威胁或者被拒绝承认时，他们起而自卫，武力或暴力能从中获得正当性。在这里，自决可能意味着民主式的自我治理，或是行使文化自主

权，这取决于所讨论的民族团体是相信自己能在一个已有的国家框架中达成目标，还是寻求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

所有形式的民族主义都将政治主权赋予“人民”——事实上“民族”这个词常被看作“人民”的同义词——但并非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能创立民主政体，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族主义在界定其民族构成时都将全体人民纳入进来。

一种“公民民族主义”主张，民族应当包括所有认同民族之政治信条的人，不管其人种、肤色、信念、性别、语言或种族如何划分。这种民族主义被冠以公民之名，因为它将民族视作一个平等的、权利共享的公民共同体，通过依附于一套共享的政治实践和价值之上的爱国主义而实现统一。这种民族主义必然是民主的，因为它将主权赋予全体人民。这一理念的某些要素首先在英国出现。到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是一个由四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英吉利人，维系这个国家的，是“公民身份”——而非“种族”——所界定的归属，亦即人民所共享的某些制度：王室、国会和法治。但直到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直到法兰西和美利坚创建共和国，公民民族主义才开始征服世界。

这样一种理念更容易付诸实践，因为启蒙时代的诸社会在种族上是同质的，或至少在表现上它们像是同质的。那些不属于有政治选举权阶层——有产的男性白人——的人，如劳工、妇女、黑人奴隶、土著居民，发现自己被排除在公民之外，进而被排除在民族之外。在整个19世纪直至20世纪早期，这些群体曾为获得公民身份而战。抗争的结果是，绝大多数西方民族国家现在都根据共同的公民身份而非共同的种族来界定其国家地位。德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

拿破仑1806年对德意志诸公国的入侵和占领，激发了一波德意志的爱国怒潮以及反对法兰西民族国家理念的浪漫主义论战。德国浪漫派认为，不是如启蒙运动所相信的，国家创造了民族，而是民族及其人民创

造了国家。赋予民族统一性、使其成为家园和激情依附之地的，不是权利分享这一冷冰冰的构想物，而是人们早已存在的种族特性：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和传统。“人民”（Volk）意义上的民族早已在欧洲人的思想中开始了其漫长多难的征途。19世纪所有在帝国统治下的欧洲民族，俄罗斯压迫下的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人、土耳其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治下的克罗地亚人，在设想他们的自决权时，都关注着德国的种族民族主义理念。当德意志在1871年达成统一并崛起为世界强国之时，其成就向帝国主义欧洲所有被奴役的民族展示了种族民族主义的成功。

在这两种民族主义中，公民民族主义更符合社会学现实论。绝大多数社会不是单一民族，即使是，共同种族也无法自我消除分歧，因为种族只是要求个体忠诚的众多因素之一。根据公民民族主义的信念，将社会团结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根源，而是法律。通过认同一套民主程序和价值观，个体可以调和他们塑造自己生活的权利与他们归属于某个共同体的需要。反过来，这也表明民族归属可以成为一种理性依附的形式。

与此相反，种族民族主义宣称，个体最深层的依附是遗传的，不是选择的。民族共同体界定了个体，而非个体界定民族共同体。这种归属的心理学可能比公民民族主义的观点深刻得多，但与之相伴随的社会学则离现实甚远。例如，两个塞族人都具有塞尔维亚族身份，这一事实可能使他们团结起来对抗克罗地亚人，但要阻止他们为工作、配偶、稀缺资源等而互相争斗，这起不到任何作用。共同种族自身并不创造社会凝聚力或共同体，当它在这方面失败时——失败是必然的——民族主义政权必然被迫转向以武力而非共识来维系统一。这是民族主义政权更多是威权式而非民主式的原因之一。

本质上，它们是一种以多数派种族的利益为主导的民主形式，这也可以证明其威权性。绝大多数“后冷战”时代的新民族国家都在口头上奉行公民平等社会的理念，并为少数种族的权利提供保护。在现实中，新

的民族国家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罗的海诸国、亚洲各新兴共和国，都实行制度化的多数派种族统治。对于那些之前由得到帝国支持的少数族群俄罗斯族统治的多数民族，如波罗的海各民族和乌克兰人，种族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诱惑。

有人认为，只有在公民民族主义从未得以建立的地方，威权性的种族民族主义才能扎根。按照这种观点，种族民族主义在东欧的兴盛，是因为40年的一党统治有效地摧毁了曾经在这个地区存在过的任何公民的或民主的文化。如果是这样，那么情况应当是，在有广泛民主传统的社会中，种族民族主义不具有深厚根基。然而并非如此。欧洲的种族主义是一种白人种族的民族主义——事实上它是一种对公民民族主义的反叛，反叛的恰恰是基于公民身份而非种族身份的民族理念。在具有丰富的也许程度不同的民主经验的国家，如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这种反叛正在不断发展。

也有大量例子表明，在形式上承认公民民主的国家内部，种族民族主义日益盛行，如北爱尔兰、印度和加拿大这三个地方。在北爱尔兰，1920—1972年间，新教忠诚派的多数族群利用英国的议会制度，保持一种对天主教少数族群广泛的多数派暴政。尽管深受英国民主和法律传统浸润，但北爱尔兰完全无法阻止忠诚派将民主扭曲为民族主义。在印度，45年的公民民主难以遏制种族和宗教民族主义，它们正将这个国家的联邦体制撕得四分五裂。在加拿大，景象要乐观一些，但分析要点是一样的：在联邦民主的框架内实行的完全包容没有能削弱魁北克民族主义的力量。

在所有这些地方，种族民族主义最基本的吸引力在于，作为多数派种族统治的一条基本原则，它让敌人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或者颠覆某种文化附庸的传统。在东欧各民族中，种族民族主义可以提供更多东西。当苏维埃帝国及其卫星国政权崩溃之时，该地区的民族国家结构也随之瓦解，留下数以百计的族群彼此掣肘。因为这些群体都没有哪怕最

低限度的、通过民主讨论来协调争端的经验，暴力或者武力成了他们的裁决者。民族主义的华丽辞藻像野火一样在这个地区蔓延，因为它能够给军阀和武装分子提供一套机会主义的、自证合法性的词汇。在席卷共产主义国家废墟的担忧和惊恐中，人们开始发问：现在，谁能够保护我？面对政治和经济的混乱局势，人们想知道谁可以信赖，谁是自己人。种族民族主义提供了一个直观明白的答案：只相信那些与你血缘相同的人。

归属

但如果民族主义要将其对血缘忠诚以及血缘牺牲的要求合法化，似乎只有诉诸人们更美好的天性而不仅仅是最坏的本能时，它才是有说服力的。杀戮不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行为，必须有某种原因，行凶者才能安之若素。如果暴力要合法化，它必须以人们心中至善的名义，有什么比他们对家园的热爱更美好呢？

民族主义者是高度感性的。“媚俗”（Kitsch）是一个种族“屠杀者”的自然美学。检查站两边的杀手，刚刚还在瞄准敌人射击，转眼间可以没有丝毫转折地哼唱思乡曲，甚或是背诵几行民族史诗。这种感性的潜在目的，是暗示人受到一种爱的控制，它的伟大超过理性、强大胜过意志，是一种与命运和定数紧密相关的爱。这样一种爱使人们相信，是命运而不是悲剧迫使你杀戮。

剥离掉诸如此类的感性，这种归属以及对归属的需求——民族主义似乎颇为成功地迎合了这种需求——还剩下什么？当民族主义宣称民族归属是所有归属身份中最重要的形式时，他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一个民族保护你，其他任何归属形式——你的家庭、职业或者友人——都不会给你安全。这就是为民族利益而牺牲的正当理由之所在。没有民族的保护，个体所看重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归属，是首要的防范暴力的手段。你属于哪里，哪里就是安全的；给你安全的地方，就是你归属的地方。如果民族主义的说服力是因为它为暴力授权，也可以说它的说服力来自为人们提供对暴力的防护。军阀是其民族的保护人，如果他杀戮，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捍卫最高贵的事业：保护无辜的人。

但归属也意味着被认可和被理解。正如以赛亚·伯林在《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中所写的，当我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他们理解我，正如我理解他们；而这种理解在我心目中造成我是世界中的‘一个人’的感觉”[注]。归属就是理解与你共同生活的人们的默契编码，是知道你不用为自己解释就会得到理解。简而言之，人们“说着你的语言”。附带地，这就是为什么保护和捍卫民族语言是如此饱含深情的民族主义事业，因为是语言而不是土地和历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归属形式，即得到理解。当然，一个人可以从不同于其自身的语言和国度中得到理解，甚至能够在流亡中找到归属。但民族主义宣称，那种完全的归属，那种温暖的感觉——人们不只是理解你说出来的，更能理解你的言下之意——只有当你身处祖国、身处自己的人民当中，才有可能得到。

---

1. 译文转引自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

世界主义与特权

如果一个人的父亲生于俄罗斯，母亲生于英格兰，在美国接受教育，职业生涯在加拿大、英国和法国度过，我们很难过多寄望他成为一个种族民族主义者。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世界主义者，那必定就是我。我希望自己能说更多种类的语言，我希望自己在更多的国家居住过，而且我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移居国外并不是流亡：它仅仅是那些选择自己的家园而不是继承家园的人们的归属。

多年来，我相信潮流的涌动会有利于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首先，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人。至少有十几个世界性城市——巨大的多种族的熔炉——为各种各样的移居者、流亡者、移民、短暂停留者提供家园。对这些大城市里的都市职业人群来说，一种后民族的国家意识不过是理所当然的。这些地方的人们不会困扰于一起工作或居住的人的护照问题，不关心所购买商品上的原产地标签是哪里。他们只是认为，可以借用偶然遇到的任何一个民族的风俗，来打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世界主义者为文化借鉴打造了一个正面的伦理结论：在文化上，混血优于同族，杂交胜过地方化。

这种世界主义的伦理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自从1700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全球经济中，世界上许多大城市几百年以来都是全球贸易中心。全球市场一直限制着民族国家运用其主权和自由，至少从1776年亚当·斯密（Adam Smith）首先就此现象建立理论之后一直如此，那时民族主义时代刚刚开始。至少从启蒙时代的文化理想国（republic of letters）[注]以来，全球市场就存在于各种理念和文化形式中。无根的世界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已经在帝国时代的大城市中存在了几百年。

然而，有两个特征将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城市的世界主义与过往已经消逝的那种东西区别开来。首先是它在社会和种族方面的扩展。20世纪的民主体制和战后前所未有的繁荣，将世界主义的特权从一小部分富裕白人男性精英扩展到发达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大量少数群体。突然之间，有很多这样的“我们”出现，而我们想分享后民族主义意识的意愿，因廉价的航空旅行和通信手段而极大地得到了增强。

第二个明显的变化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全球市场不再受一个稳定的帝国体系支配。有两百年的时间，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相继而起的帝国——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二战”后苏联和美国的联合帝国——的领土野心和警察权威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1989年以来，我们第一次进入一个不存在帝国秩序框架的全球化世界主义时代。

20世纪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有三次重大的秩序变化：1918年在凡尔赛，东欧的新国家诞生于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之上；1945年在雅尔塔，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将西欧和东欧的各民族国家划分成两大势力范围；1989年到1991年，苏维埃帝国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崩溃。第三次变化的不同在于，其发生不是经由任何帝国的安排。没有现存条约规定东欧各民族国家的领土统一与其境内各民族的自决权之间的冲突。对于这种冲突的解决，即使以捷克式的文明分手方式，也一直存在许多武装冲突。根本原因一目了然：帝国警察没有了。

美国可能是唯一还存在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人拥有的不是一种帝国权力：他们的威权是用来保护自己的专属国家利益，而不是维持一个全球秩序的帝国体制。因此，非洲、东欧、原苏联的亚洲诸国、拉美和近东的大片区域不再处于明确界定的帝国或超级大国势力范围内。这意味着世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以一种最为残酷的方式赢得了“自决权”：他们仅仅是被扔在那里，必须自己保护自己。毫不惊讶，他们的民族国家像索马里和其他许多非洲国家一样正在崩溃。在世界上从前受到帝国高压

统治的一些重要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各国——人们发现自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申诉的帝国式裁决者。那么毫不奇怪，脱离了强有力的控制之后，他们为了最终的解决——这曾被帝国的存在而长期抑制——而互相攻伐。

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全球主义只让那些有幸生活在富裕西方的世界主义者享有后民族主义的感觉。众多小民族太过弱小，无法建立可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全球主义带来的是混乱和暴力。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可能是最富戏剧性的例子，这个族群徒劳地求助于更强大的邻居来保护他们。萨拉热窝的人民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种族多样性的虔诚信徒，但身处竞争性的各种族之间，他们缺乏可以依赖的帝国保护者或一个自己的国家来确保和平。

在波斯尼亚发生的一切，让任何相信世界主义之美德的人们都必须停下来想一想。非常明显地，世界主义是那些将一个安全的民族国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人们的特权。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帝国时代，但我们还没有进入后民族主义时代，而且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达到这一步。伦敦、洛杉矶、纽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的世界主义秩序，严重依赖于民族国家的规则执行能力。当这种秩序遭到破坏，就像1992年在洛杉矶骚乱中所发生的那样，公民的、世界主义的多种族城市显然跟任何东欧国家一样，极有可能爆发种族战争。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并不超越民族；而一个世界主义的、后民族主义的精神最终将总是依赖于民族国家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单就此而言，我是一个公民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必须、公民也有责捍卫国家提供安全和权利的能力——为了过世界主义的生活，我们都需要的能力。至少，对于人们为赢得民族国家而战斗所体现的残忍，世界主义的蔑视和惊诧是一种错位。毕竟，他们只是为了拥有特权的世界主义者长期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在战斗。

1. 文化理想国，指启蒙时代欧洲主要通过通信方式联结在一起的文人、思想家群体，他们共同分享某些价值理念，打造一个想象中的文化理想国度。

六次旅程

总之，关于民族主义能说的就是这些。它不是一人千面，而是千人千面。民族主义原则在某一个地方可能造成惨痛的后果，在另一个地方造成的可能是无伤大雅的或积极的结果。环境决定一切。我想要尽可能多地看看民族主义的各种面目，但去哪些地方呢？

我选择的路线是个人化的，但我想不是任意的。我选择居住过的地方，所关心的地方，有足够了解、相信它们将展现特定的中心主题的地方。

我从南斯拉夫开始旅程，因为童年的时候，我曾经在那里居住过两年，对铁托（Tito）的全盛时期有足够的了解，那个臭名昭著的词组“种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原本应当是在这里被创造出来。对我而言，铁托35年的统治似乎不仅仅是巴尔干地区无休止的种族战争历史中的短暂和平插曲。在我曾热爱的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比邻而居。那么，是什么将邻居变成了仇敌？民族主义的狂热是如何撕裂了跨种族的包容结构，从而产生了新的分隔秩序和种族同质的国家？

我的下一个旅程是去德国，这个国家曾在浪漫主义时期发明了种族民族主义，后来又在希特勒统治下使其蒙受羞辱，现在正在努力遏制种族民族主义的现代西欧形式：白人种族主义青年党。战后的德国认为自己是公民民主，但它的公民身份法律仍然是依据种族来定义。它是欧洲最挣扎和最彷徨的社会：选择屈服于种族民族主义的过去，还是建设一个公民民族主义的未来？

在苏联的15个后继国家中，乌克兰是最大的[注]：一个核超级大国，第一次获得民族独立的经验，同时又发现要脱离俄罗斯几个世纪的统治是多么困难。对于一趟深入原苏联废墟的旅程，它是当然要选择的目的地。但选择乌克兰有个人原因。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是俄罗斯地主，曾经在乌克兰拥有一块土地。我觉得，相比回到那块土地，去看一个新的国家如何纪念我的先祖，更好的方法是探索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身份是如何在深层次上相互渗透的。

同样的个人原因让我选择了魁北克，在这里，我的俄罗斯祖父母在流亡中走到生命的终点。我最熟悉的、30年来将我的国家加拿大撕裂的民族主义，是魁北克主义。它是一种在现代化、发达的民主社会中的民族主义，一种文化和语言自决的要求，它引发了一个（与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同样有关的）基本问题：如果你已经是一个民族（nation），并且享有高度自治，为什么你还需要一个自己的独立国家（state）？

由于民族主义经常被称为某种形式的部族主义，魁北克也提供了一个观察机会：在克里人（the Cree）——魁北克北部的一个原住民民族——之中，部族和民族意识是如何互动的，他们采用民族自决的口号，对抗魁北克在北部的经济发展计划。那么，魁北克的民族主义者如何应对在自己的内部挑战他们的民族主义呢？

正如一个克里米亚的鞑靼民族主义者在乌克兰所告诉我的，没有母亲的人才知道母亲意味着什么。没有国家的人才知道民族国家意味着什么。在世界上许多没有国家的民族中——从克里米亚鞑靼人（Tartars）到巴勒斯坦人——最大的一个民族是库尔德人。海湾战争中的西方军队在伊拉克北部创立了一个库尔德人的领地，让我可以观察有限独立和自治是如何改变一个从未拥有过自己家园的民族。在库尔德人为家园的奋斗中，他们必须对抗20世纪最致命的四种世俗和宗教民族主义：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ürk）的土耳其、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伊朗、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和哈菲

兹·阿萨德（Hafez　Assad）的叙利亚。他们的民族主义斗争最终能将库尔德人团结到一起吗？换句话问，民族主义能够创造一个民族吗？

最后一次旅行将我带回来，思考收留我的国家——英伦群岛——被压迫得支离破碎的民族身份。观察这种压力之下的身份，还有什么地方比贝尔法斯特（Belfast）的街头更好呢？75年来，那里的忠诚派新教徒族群一直捍卫他们做一个英国人的权利，对抗西欧最为暴力的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共和军。忠诚派到底忠于什么？它是一种英国式的船货崇拜（cargo-cult）[注]，还是一面镜子，让英国人从中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到底是谁的扭曲图像？来到强硬的阿尔斯特[注]英国性（Britishness of Ulster）的家乡，让我可以直面所有地方的尤其是英国的世界主义者所拥有的一种核心自负，它关乎摧毁了“冷战”世界固有标志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每一个他人都是狂热分子；除了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如果像萨缪尔·约翰逊[注]所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那么后民族主义以及相伴随的对他人之民族主义感情的蔑视，可能是世界主义最后的避难所。

---

1. 原文如此，苏联的15个后继国家中，国土面积最大的是俄罗斯，其次是哈萨克斯坦，之后才是乌克兰。——编者注

2. 船货崇拜，指土著社会中对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外国货物的一种崇拜。

3. 阿尔斯特，古爱尔兰省份，现分属爱尔兰共和国的阿尔斯特省和北爱尔兰的六个郡。阿尔斯特是古爱尔兰最后归服英国的地区，但归服之后受当地种植园的吸引，许多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前来定居，导致后来新教徒在阿尔斯特占据多数，成为爱尔兰忠诚派的主要根据地。1921年《英爱条约》签订，阿尔斯特的六个郡组成北爱尔兰。

4. 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文学家、评论家、诗人。

1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图1　亚塞诺瓦茨集中营，“乌斯塔沙”正在一个万人坑旁处决囚犯。1941—1945年间，克族人的“乌斯塔沙”组织在此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和塞族人，塞族和克族在死亡人数上至今仍未达成共识



图2　2015年4月，亚塞诺瓦茨博物馆“大屠杀”纪念碑前。为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欧洲几国领导人聚集在亚塞诺瓦茨，为大屠杀死难者哀悼。而不过在二十多年前的1991年，该馆在波黑战争交战双方间几度易手，双方均对其做出破坏行为



图3　1993年，波黑首都萨拉热窝，一位妇女正从两军交火最严重的“狙击巷”穿行而过



图4　1993年，一位妇女清晨在战争死难者坟场中为一位死去的亲属哀悼，人们常常选择在清晨前往坟场，浓雾能为他们抵挡随时可能出现的扫射



图5　一个克族士兵在萨拉热窝市中心向街对面的塞族士兵开火，以保护周围的平民



图6　年轻时的米诺万·吉拉斯，右二。摄于1942年



图7　阿尔坎（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与他的“猛虎军”。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中，他们在东斯拉沃尼亚一路强奸劫掠，但他当选国会代表，并走私汽油

旧秩序

我记得，早餐时的野草莓是用银杯盛放端上来，然后是加了杏黄酱的热面包卷。餐厅面对着湖，窗户打开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山里的空气拂过水面，拂过白色的亚麻桌布，然后，拂过你的面庞。

宾馆名叫托普利斯（Toplice），位于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Lake Bled）畔。外交使团在这里度过夏天，守候居住在湖对岸的独裁者。我的父亲跟其他外交官一样，来这里收集小道消息和享受温泉。每天早晨，他在宾馆下面的热水池里洗浴。我打网球，吃野草莓，在湖上划船，还暗恋着一个难以接近的12岁瑞典女孩。这些就是我对“旧秩序”[注]的回忆，它们来自共产主义时期的南斯拉夫。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在我们餐厅的底层，听到后来的外交部长柯卡·波波维奇（Koča Popović）温文尔雅地用一个象牙烟嘴抽着烟说他的党的部门如何“清洗切特尼克（Chetniks）”——战争末期曾经站在希特勒一边作战的塞尔维亚人。在此之前，我从未听到过“清洗”这个词如此使用。

连我都能看出，共产党精英之所以赢得权力，显然不只是通过打败外国入侵者，还通过在残酷的内战中取胜。现实显而易见，铁托的国家是个警察国家。我们住在德丁谢（Dedinje），一个傍山的可以俯瞰贝尔格莱德（Belgrade）的郊区，离铁托的住所只有几百米远。无论走在哪里，都有穿着便衣的人在附近游荡，或是小声地用对讲机说话。铁托自己是整个体制的隐形上帝。他有梳饰光滑的头发，长期晒成古铜色的皮肤，闪亮的丝质西装，手指上戴着黑玛瑙戒指，我父亲说他和德国繁华南部的冰箱推销员再相像不过了。

显然他比推销员有想象力得多，邪恶得多。我记得，在亚德里亚海的游船上，我的父母是如何躲着船员隐藏一本书的——锁进行李箱里面，藏在铺位底下。这本书原来是米诺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的《新阶级》（*The New Class*）。吉拉斯，铁托的亲密战友，因为谴责铁托的独裁倾向，当时仍被关在铁托的监狱里。

20世纪50年代末，我们走遍了南斯拉夫的每个地方：穿过波斯尼亚的山村，那里衣衫褴褛的赤脚孩子们围着汽车；去了萨拉热窝（Sarajevo）的大清真寺，我在那里脱了鞋子，跪下来，看老人们前额叩在地毯上诵念祈祷文；去了达尔玛提亚（Dalmatian）群岛和海滩，那时西方的游客还不曾访问那里；去了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塞尔维亚南部的部分地区、波斯尼亚中部和黑塞哥维那的西部是那么的贫穷，我们根本不知道普通人是如何生存的。与此对照，卢布尔雅那（Ljubljana）[注]和萨格勒布（Zagreb）[注]则是整洁、繁荣的奥匈帝国时代的城市，似乎与南斯拉夫中部贫瘠、荒凉的内陆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那个时候，所有经济上的不满和民族主义意识自身都处在铁托的压制之下。不管愿意不愿意，在“兄弟友谊和团结”的旗帜下，社会向前发展。如果将自己首先视为一个克罗地亚人或者塞尔维亚人，其次才是南斯拉夫人，有被作为民族主义者或者沙文主义者抓起来的风险。

我不知道，民族身份和南斯拉夫身份之间的差异到底有多么复杂和模糊。举个例子，我知道我在布莱德的网球教练米托德（Metod）总是称自己首先是一个斯洛文尼亚人。我记得，他痛苦地说自己痛恨在南斯拉夫国防军中服役，因为他和他的兄弟都因为身为斯洛文尼亚人而被塞尔维亚人欺凌过。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地区示意图(注)

那是唯一一次我看到裂缝将变成鸿沟吗？我想是的。在其他任何地方，我记得人们都快乐地告诉我，他们是南斯拉夫人。回想起来，我在那里时是当地最有希望的时候。铁托仍然因为使国家保持在斯大林的帝国之外而受到热捧，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繁荣初现端倪；很快接下来是放开旅行，让数百万南斯拉夫人出国工作，一时使南斯拉夫成为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最自由的。

先暂停我对“旧秩序”的回忆。现在每个人都说向地狱的坠落不可避免。在那时，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的童年时代告诉我，一切并非无可避免：就是这一点，让发生的一切变成悲剧。

---

1. 原文为法文Ancien Régime。

2. 斯洛文尼亚首都。

3. 克罗地亚首都。

4. 本书共6幅地区示意图，均出自原书。——编者注

微小差异的自恋

正如巴尔干民族主义者所说，他们的历史就是他们的命运。例如，克罗地亚人会解释说，巴尔干杀戮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本质上”是天主教，源于欧洲和奥匈帝国，而塞尔维亚人“本质上”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和斯拉夫，附加了一些土耳其人的凶残和怠惰。作为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分界线的萨瓦河和多瑙河，从前也是划分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

如果一再强调这种历史的断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冲突就会被解读为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巴尔干地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过去如何指明现在，而是现在如何操纵过去。

弗洛伊德曾经提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实际差异越小，这种差异必定在他们的想象中显现得越大。他将此称为微小差异的自恋效应（the narcissism of minor difference）。其结果必定是，敌人之间互相需要对方来提醒他们自己实际是谁。因此，一个克罗地亚人就是一个不是塞尔维亚人的人，一个塞尔维亚人就是一个不是克罗地亚人的人。没有对另一方的仇恨，就不能清晰地界定顶礼膜拜的民族自身。

在克罗地亚，弗洛尼奥·图季曼（Franjo Tudjman）的执政党克罗地亚民主联盟党（HDZ，Croatian Democratic Alliance）标榜自己是依照巴伐利亚基督教民主党（Bavarian Christian Democrats）模式建立的一个西方式政治运动。事实上，图季曼的政权与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的塞尔维亚政权的相似程度，远远高于任何一方与西欧议会模式的一切相似之处。它们都是后共产主义的一党国家，民主只不过意味着其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他们操控大众情绪的技巧。

局外人不会震惊于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差异，而是会震惊于他们看上去多么相似。他们说同样的语言，只有几百个词汇的小差异，数百年以来保持相同的乡村生活方式。尽管一个是天主教，一个是东正教，但城市化和工业化已经显著地减少了忏悔形式的差异程度。双方的民族主义政客接受了微小差异的自恋，将其转化成一个魔鬼寓言：自己的一方显然是不应谴责的受害者，另一方则是大屠杀的刽子手。所有的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沙刺客，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成了切特尼克野兽。不用说，这样的意识形态准备，是紧随其后的屠杀的一个基本前提条件。

然而，对于巴尔干的悲剧，真正难以理解的仍然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谎言是如何成功落地生根的。因为一般人都知道它们是谎言：不是所有的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沙，不是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是切特尼克。即使人们使用这些词语，他们也知道不是真的。我们无须一再重复：这些人曾是邻居、朋友、配偶，不是不同种族星球的居民。

双方都有民族主义少数派研究他们相互深度纠结的共同过去，告诉所有人（包括局外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从远古时期就开始相互残杀。历史没有教授这样的课程。实际上，主角们在他们过去的大多数时候，是被分隔在各自的帝国和王国之中的。只是到了1928年，克罗地亚政客在贝尔格莱德议会被刺杀[注]，他们才开始在“二战”中陷入种族战争。尽管现在的冲突当然是1941—1945年内战的延续，但这个解释缺乏说服力，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到，在这之间有几乎50年的种族和平时期。那不仅仅是停战。即使双方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也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为什么和平会被打破。

而且，将这次战争[注]或者1941—1945年的内战视为某种巴尔干特有的邪恶，也是错误的。所有将邻居变成敌人的妄想都是从西欧的源头输入的。现代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可追溯到无可指责的、拜伦式的反抗土耳其人的民族起义。同样，19世纪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思想家安特·斯塔

切维奇（Ante Starčević）间接从德国浪漫主义那里获得纯粹种族的克罗地亚国家理念。巴尔干地区的不幸部分在于一种想成为好欧洲人的悲伤渴望，那就是，输入西方残忍的时髦思想。这些时髦思想在巴尔干被证明是致命的，因为只有通过撕裂巴尔干乡村生活的多元组织——以粗暴的种族纯洁梦想的名义——民族统一才能实现。

同样，甚至巴尔干地区的大屠杀也不是地区特例，而是从宏大的西欧传统进口而来。安特·帕维里奇（Ante Pavelić）在战争时期的乌斯塔沙政权如果没有德国纳粹政权的支持——更不用说高高在上的欧洲权威天主教会的暗中认可——连一天的统治也无法维持，而塞尔维亚人认定它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真实面目。

因此，总而言之，如果我们将巴尔干地区解读为一个顽固狂热的次理性区域，我们就是在为自己辩护。而且，如果我们断定地区性的民族仇恨根植于历史之中，必定会爆发民族暴力，我们将在应当开始追寻答案的时候止步。正相反，这些人必须从邻居转变成敌人。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许会理解南斯拉夫。亲身经历过宗教内战的霍布斯会说，当人们足够恐惧的时候，他们将无所不为。有一种恐惧比其他任何恐惧都更具破坏性的影响，即当一个国家开始崩溃时的系统性恐惧。种族仇恨是合法性权威解体所导致恐惧的结果。

铁托实现南巴尔干地区六个主要民族中每一个民族的统一。他明白联邦国家是满足每一个民族的民族抱负的唯一和平途径，每一个自行统一的共和国都不得不启动强迫性的人口迁移。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有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一直居住在他们的共和国边界之外。铁托创造了一种复杂的种族平衡，例如，减少塞尔维亚人在联邦体系的核心贝尔格莱德的影响力，同时推动塞族人进入克罗地亚的权力高层。

铁托对民族主义的遏制建立在个人独裁的基础之上，因而在他死后不可能延续。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他的社会主义口号“兄弟友谊

和团结”已经被置若罔闻。1974年，他与民族主义妥协，允许各共和国在新宪法下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到他统治末期，用来在各共和国精英之间平衡种族扈从关系的南共联盟自身也按照种族条线分裂了。

这一分裂不可避免地导致铁托未能令以公民为基础而非以种族为基础的多党竞争得以出现。如果铁托在60年代或70年代容许一种公民政治，一个非种族的政治归属原则或许会落地生根。铁托一直坚持他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但最终，他的政权与东欧其他国家没什么区别。由于未能容许一种多元化的政治文化走向成熟，铁托使其政权的垮台变成了整个国家结构的崩溃。在废墟之上，他的后裔和继承者们返回到最原始的政治动员原则以求得生存。

如果南斯拉夫不再保护你，也许你的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或斯洛文尼亚伙伴会。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信念使得普通人变成不情愿的民族主义者。但大多数人都不想这样，大多数人知道，他们冲向自己族群寻求保护时有片刻退缩，他们的正常生活就会加速瓦解。

种族差异本身不对20世纪80年代南斯拉夫出现的民族主义政治负责。只有当幸存下来的政治精英——首先从塞尔维亚开始——开始为掌握权力而操纵民族主义情绪的时候，种族差异意识才转变成民族仇恨。

这值得强调，因为大多数局外人认为，所有的巴尔干民族都根深蒂固地具有民族主义倾向。事实上，许多人痛心地哀悼南斯拉夫的消逝，恰恰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给予他们空间，令他们可以以非民族主义的方式界定自己。在一篇辛酸悲痛的文章《被民族性征服》（*Overcome by Nationhood*）中，克罗地亚作家斯莱文卡·德古丽琪（Slavenka Drakulić）描述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她还总是按照教育、职业、性别和个性界定自己。只是1991年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战争爆发之后，疯狂的气氛才最终将她所有的身份标志都剥离，只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而存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真实本质与乡村居民并无二致。精英的民族主义语言游戏似乎只是为他们的恐惧和自豪发声。事实上，民族主义

最终令巴尔干地区的每个人都陷入“纯粹”种族身份的幻想中。那些拥有多重身份的人们，例如混合婚姻的人，被迫在先天遗传的家族和后天结合的家族中选择，也是在两种已经融入他们自身的因素中选择。

历史地看，民族主义和民主曾形影不离。毕竟，民族主义是一种信条，即一个民族有权治理自己，并且主权只在他们自身。巴尔干地区的悲剧在于，当民主最终可能之时，剩下来唯一能够动员民族参与一个共同社会之规划的语言，是种族差异的花言巧语。与种族对立的公民民主的任何可能性已经被扼杀在摇篮中。

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是第一个打破铁托禁令、以种族意识进行大众动员的南斯拉夫政客。米洛舍维奇将自己描绘成既是对抗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分离主义野心、捍卫南斯拉夫的人，又是为同一个南斯拉夫对塞尔维亚所犯错误复仇的人。

米洛舍维奇的计划首先开始于1986年的塞尔维亚艺术科学院备忘录（Serb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Memorandum）[注]，其后始终如一，即在铁托的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如果其他的共和国不同意由塞尔维亚主宰的新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准备煽动科索沃、克罗地亚以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少数族群叛乱，要求塞尔维亚的保护。这些少数族群充当了米洛舍维奇的“苏台德德意志人”角色，这是他扩张计划的借口和理由。

这些是显而易见的，更复杂的是米洛舍维奇的计划和塞尔维亚舆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将塞尔维亚人妖魔化为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者，认为米洛舍维奇只是对他们的种族狂热做出反应，事情会简单很多。现实远为复杂。尽管仍存在极端民族主义因素，例如像切特尼克们仍沉浸在对铁托反对他们的战时领袖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Draža Mihajlović）之斗争的仇恨之中，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大多数都市塞尔维亚人几乎没有表现出民族主义狂热，他们甚至对远在克宁（Knin）

[注]、帕莱（Pale）[注]、科索沃（Kosovo）或西斯拉沃尼亚（Western Slavonia）的乡村同胞缺乏兴趣。

因此，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绝大多数塞尔维亚普通民众对塞尔维亚问题的冷漠会转变成狂躁的焦虑：流散在外的塞尔维亚人将会被有种族灭绝倾向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消灭。当然米洛舍维奇是利用“塞尔维亚问题”为自己的煽动目的服务。但塞尔维亚问题不是米洛舍维奇的创造，它是随着铁托南斯拉夫的崩溃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旦多种族的国家解体，每一个身处自己共和国境外的民族群体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身临险境的少数民族。随着克罗地亚民族主义的崛起，作为最大的一个此类族群，塞尔维亚人尤其感到脆弱。

尽管克罗地亚像斯洛文尼亚一样，宣称支持一个松散南斯拉夫联邦的出现，但事实上两个共和国都在80年代末期启动独立进程。导致民族自决的动力受到经济仇怨的推动。南斯拉夫在60年代和70年代扩张，随着其代价开始显现，外债增加，最富裕的两个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开始抱怨他们的经济成果被摘走，用于为发展迟缓的波斯尼亚和“巴尔干的”塞尔维亚付账。铁托对1970年克罗地亚之春[注]的压制，以及米洛舍维奇的扩张主义行为——尤其是塞尔维亚吞并科索沃和伏伊伏丁那（Vojvodina）自治省——让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民族主义者确信，他们在南斯拉夫联邦内没有任何前途。地方知识界和共产党精英中出现了强烈的独立诉求：独立会让他们成为小地方的大人物。

克罗地亚人要求民族自决权，他们很快从新近统一的德国得到有力的支持。但德国或者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中没有人充分审慎地考虑克罗地亚的独立对于60万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的含义。

克罗地亚的独立宪法将自己表述为克罗地亚民族的国家，非克罗地亚族为受到保护的少数民族。尽管绝大多数克罗地亚人真诚地相信他们的国家为少数民族塞尔维亚人提供完整的权利，但塞族人并不认为他们

自己是少数民族，而认为自己是受到宪法保护、与克族人平起平坐的民族。当克罗地亚人恢复红白方格盾牌的萨沃尼卡（Šahovnica）旗作为他们的新国旗时，塞族人第一眼看到就相信，乌斯塔沙回来了。萨沃尼卡既是纯正的克罗地亚人传统徽章，也是“二战”时期政权的旗帜，这个政权处死了大批塞尔维亚人，具体数字至今未知。1990年夏秋之际，当塞族人从克罗地亚警察局和法院被遣散时，塞族少数民族断定他们将见证一个拥有大屠杀过去的种族国家的回归。

克罗地亚人一方的辩护者们坚持认为，这些恐惧受到了米洛舍维奇的操控。确实是这样，但身处跨种族的南斯拉夫国家崩溃的大环境下，塞族人有理由感到恐惧。战争是塞尔维亚扩张、克罗地亚独立和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的种族狂热共同交织之旋涡的结果。

战争最终爆发是在1991年夏季，由克罗地亚塞族聚居区试图控制当地武力（即警察局）的关键位置的争斗所引爆。在塞族村庄，比如西斯拉沃尼亚的博罗沃塞洛（Borovo Selo），当克罗地亚国家遣散当地的塞族警察时，他们继续保留武装，开始让自己成为暴徒。克罗地亚人试图恢复自己在塞族区的权力，但遭到枪击，塞族人在村庄入口设置了路障。克罗地亚人无法控制本国的塞族区域，南斯拉夫国防军介入，首先是恢复秩序，然后粉碎克罗地亚的独立。克罗地亚别无选择，只有为生存而战。经过六个月的顽强抵抗，1992年2月停火的时候，克罗地亚发现自己三分之一的国土被所谓塞尔维亚克拉伊纳（Krajina）共和国占领，通往达尔马提亚（Dalmatian）海岸的供给线被克宁的塞族民兵阻断。在散布于克罗地亚所有主要道路网的检查站，有2.5万名联合国部队将两方隔开。克罗地亚的战争平息下来，进入武装停战状态，但塞族和克族的小规模冲突在萨瓦河南岸肆虐，双方交战目的是以牺牲穆斯林为代价分割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

1. 1928年8月8日，一名塞尔维亚激进党成员暗杀了克罗地亚最大党派克罗地亚农民党（HSS，Hrvatska Seljacka Stranka）的领袖，击伤另一名国会成员。这次暗杀后，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党派之间的所有政治关系均中断。塞尔维亚国王于1929年1月6日宣布建立

专制，同时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令，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改名为南斯拉夫。

2. 指1990—1995年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战争。

3. 1986年，塞尔维亚艺术科学院公布一份备忘录，谴责南斯拉夫联邦老一代领导人的民族路线损害了塞尔维亚人的利益，提出全民公决等民族主义性质诉求。备忘录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纲领性文件之一。

4. 克宁（Knin），克罗地亚南部城镇，中世纪克罗地亚国家、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国曾以此为首都。

5. 帕莱（Pale），波黑东部塞族聚居城镇。

6. 1970年开始，克罗地亚出现要求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至1971年11月达到高潮，引发大学生罢课浪潮。铁托对运动强力压制，并对暗中支持运动的克罗地亚领导人进行大清洗。

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

在南斯拉夫开启我童年时代的每个夏季的地方——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之间的公路上，我开始我的旅程。这是我们曾经旅行的道路：坐着华丽的黑色别克车——带有许多尾鳍和镀铬的车——去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湖。它曾被称为“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它的修建是典型铁托式的、真正的民族狂热和社会主义劳动的混合，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两个核心共和国的经济联结在一起。它有300英里[注]的路程与萨瓦河并驾齐驱，穿过斯拉沃尼亚平原，这是欧洲最为平坦、最为富饶的土地之一。

我在斯洛文尼亚边境下了“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首先参观铁托在库姆罗维克（Kumrovec）的出生地，那是在克罗地亚东北部的山区，以其白葡萄酒的辛辣和人民的好辩而著称。

库姆罗维克保持得很像我20世纪50年代在贝尔格莱德看过的社会主义新闻影片。阳光照耀，苹果花在春风中摇曳。农民们坐在干草拖车上驶过村庄。在涂成白色的农舍外面，有一座党的英雄铁托的青铜雕像，穿着大衣，沉思着大步向前。伟大领袖就诞生在这个房子里面，父亲是克罗地亚人，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完美的南斯拉夫出身）。我看到玉米填充的床垫，他也许曾经睡过；他在奥匈帝国一个学校里的成绩单；30年代他当共产国际特工时的照片；他曾在游击战争中使用的假瑞典护照；他的望远镜；他白色的党的豪华制服，缀有红色和金色的肩章；战争年代的作战地图，表明有多少游击战争是在现在波斯尼亚战争肆虐的地方进行的；他在战后作为不结盟运动领袖所做的“和平旅行”，访问过的每一个首都都标有一颗红星。有一些地方，比如开罗和新德里，每个城市有12颗红星，而遥远的地方，像智利的圣地亚哥或者加拿大的渥太

华则只有一颗。

当地学校的老师领着我参观，这是一个矮小、神情黯淡的男人，像个酒徒一样有红红的眼眶和暴突的静脉。我问他的名字，他紧张不安地微微鞠躬。

“伊万·布罗兹（Ivan Broz）。”

“那么你是他的亲戚？”铁托是个化名[注]，他的家族姓氏是布罗兹。

“一个远亲。”伊万面无表情地说。但后来，当给我展示元帅党的制服时，他悄声说：“有一次我们把它从展示柜里拿出来除灰，我试穿过。”他偷偷地看看周围，微笑着露出黄色的牙齿：“完全合身。”

他是否亲眼见过铁托呢？有过一次，他说，当时铁托带尼克松总统来看他在库姆罗维克的卑微起点。伊万那时候是个学生，被选中献花给尼克松夫人，而另外一个女孩被选中献花给美国总统。有好几周的时间，他们接受鞠躬和屈膝礼训练，然后，伟大的时刻到来，一瞬间就完成了。“后来，那个女孩收到了总统送的一套钢笔和一张签名照片。我什么也没得到。这就是生活。”

但铁托呢？

伊万记得铁托的眼睛盯着他。“他是一个政治家，你永远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想知道人们是否还来这里参观。哦，是的，伊万给我肯定的回答。但这个地方空荡荡的。停车场里没有车子，公园里没有家庭在野餐。除了我，没有人对着这些展品沉思。

在一个展示柜中，有一张铁托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照片，他坐在一个写有“南斯拉夫”的小牌子后面。不知道是谁粗暴地用圆珠笔把国家的

名字涂抹掉了。

“为什么？”我问。伊万耸耸肩：“现在这个名字在克罗地亚不受欢迎。”他只敢说到这里。

“你对克罗地亚，是不是一直比对南斯拉夫更有感情？”我问他。“一直是。”铁托这位伤感的亲戚说。

回到“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上，很快我开始了解这是条多么奇怪的公路。首先，所有绿色的目的地指示牌都被涂抹掉了。我在其中一个牌子前面停下来，仔细察看。指示牌显示我正前往利波维奇（Lipovac），但我揭开上面利波维奇的标签时，贝尔格莱德字样出现在下面。公路确实仍然通往塞尔维亚首都，但就克罗地亚而言，那个目的地消失了。因此，正式地说，我是在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路上。

过了萨格勒布大约40多公里，克罗地亚的车流开始驶向出口，把这条公路留给我。很快我就是这条路上唯一的民用车辆了，此外还有联合国的吉普车和卡车从萨格勒布出来驶向沿途的检查站。一条四车道的豪华高速公路全归我所有。我停车，下车，穿过双向车道，再回来。没有一个人。然后我上车，将车子加速到115英里/小时[注]，感到充溢着青春的快意。我呼啸着冲向一个收费站，只见收费站的玻璃都被砸碎了，收费亭里空无一人，而危险警示灯仍在闪烁。我倒车，然后以全速冲过收费站。

除了鹰，我没有其他的同伴。它们在废弃的公路上方盘旋，猎寻在杂草丛生的公路边缘潜行的田鼠和野猫。但时不时地，我可以感觉到望远镜反射的阳光闪过，那是克罗地亚的侦察小组潜伏在高速公路的出口斜坡上。他们一定奇怪一辆民用车为什么用这条被废弃的高速公路延伸段作为赛车车道。

我的车是奥地利车牌。如果用克罗地亚或是塞尔维亚车牌，我无法

通过前方任何一个检查站。我还带有联合国维和部队（UNPROFOR）的通行证，那是我将要进入的联合国保护区的重要证件。车子行李厢里有几罐备用的汽油，帮助我通过塞族区，那儿已处于汽油禁运之下。汽油罐边上还有一件防弹衣。我穿过一次，马上就脱了。它笨重得可笑，而且事实上没什么用。穿上它，你能想到的全是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暴露着。而且，汽油已经漏在防弹衣上，我敢保证如果我穿上它时被击中，我只会变成一团火苗。

在萨格勒布以东大约70公里的地方，我发现了第一个战争的迹象：中央隔离带的护栏被毁坏了，散落在一条车道上。然后我开始看到坦克和装甲运兵车通过之后在路面上留下的痕迹。再向前，路上布满了迫击炮轰击后的碎片和弹坑。在高速公路的一座桥梁上，我发现了第一条横幅标语，在四个角上各有四个斯拉夫大写字母“C”，代表塞尔维亚格言：“只有团结才能拯救塞尔维亚人。”[注]在另一座公路桥上，我看到代表乌斯塔沙的“U”，还有方格旗萨沃尼卡。我的左边有一辆生锈的、燃烧殆尽的巴士，侧翻在出口匝道上，车顶被某种炮火掀掉了。我已经到达了交战区的边缘。

---

1. 约483公里。——编者注
2. 原文为法文nom de guerre。
3. 约185公里/小时。——编者注
4. 塞尔维亚国徽标志中心为带有四个“C”字的十字架，意为塞语“СамослогаСрбинаспасава”（Only unity Saves the Serbs，只有团结才能拯救塞尔维亚人）。

亚塞诺瓦茨

萨格勒布以东70公里，在诺夫斯卡（Novska）的约旦人指挥部，一辆联合国吉普车与我会合，引导着我的车经过一条遍布弹壳的匝道，越过一座浮桥，穿过塞族和克族的检查站，带我到达一座被轰炸过的建筑物残体，这里过去是亚塞诺瓦茨（Jasenovac）博物馆和纪念中心所在地。

1941—1945年间，火车停靠在铁路尽头的站台上，另一边是广阔、低缓的沼泽平原，向下倾斜到萨瓦河边。犹太人和塞族人、吉卜赛人和克罗地亚共产党人从密闭车厢中成群地被赶出来，推下站台，前往铁丝网后成排的营房。他们被送到砖瓦厂工作。当他们被榨取殆尽后，就被埋在砖窑里，或者从脑后被射杀，然后扔入萨瓦河中。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在博物馆后面这片荒芜的旷野——曾经矗立着营房和铁丝网的地方——死去。塞族人和克族人竟然连这也不能达成一致。塞族人坚持认为数字是70万人，在克罗地亚中部，没有一个塞族村庄不曾在这里失去过人命。克族人坚持这个数字不会超过4万。独立研究人员把在亚塞诺瓦茨被处死的人的数字加总，得到的结果是大约25万人，但没有人能予以确定。

两族人甚至对两年前（1991年）战火燃烧到亚塞诺瓦茨时发生的事情都难以达成共识。因为我正走进一个被彻底摧毁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的每一本书都被撕碎了扔在地上，每一个玻璃展柜都被砸碎，每一张图片都被涂过，每一份文件都被从抽屉中抽出来，每一张桌椅都被翻倒，所有的窗帘都被撕成碎条，所有的窗户都被砸碎，所有的墙壁都被粪便和标语弄脏。做这些事情的人被某种奇妙的对过去的仇恨所驱使。通过

摧毁博物馆，他们似乎希望能够摧毁对这里发生的事情的记忆。

1991年10月，数千名克族武装人员曾驻扎在博物馆，可能是他们摧残了这个地方，但墙上也有塞族人留下的涂鸦，他们炮轰了这个中心，从克族人手中将它夺回来。

我费力地穿过各个房间，在被撕碎的书本和图片中跋涉而过，我可以用它们艰难地拼凑出展览曾经的样子。地板上，有一张一群囚犯待在铁丝网后面的图片，边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她梳着辫子，倚在护栏边。再边上有一张高级教士和纳粹党卫军军官握手的照片，压在一堆被撕碎的囚犯档案的最上面。而在这旁边，是被撕成碎片的铁托肖像。南斯拉夫的整个历史似乎都躺在我脚下这堆散乱的玻璃和杂碎中。

我可以想见，孩子们要理解博物馆讲解员告诉他们的东西有多么困难。他们的画散落得到处都是：用明亮的水彩画的铁丝网、营房、警卫，在砖厂里行走的骷髅，这些就是从一个9岁大的孩子眼中去看、试图去理解的东西。

在一堆玻璃和石头的杂碎中，我找到一些胶片的碎片，是从博物馆电影院的放映机里扯出来的。蹲在这堆杂碎旁，我拿着胶片，透过天空穿过破碎窗户的光线看过去。在一卷胶片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老年男子哭泣的一帧接一帧的画面。另一卷上有一个饥饿的妇人在路上蹒跚而行。还有一卷胶片有18帧画面是一个无头的尸体。

光线从演剧院屋顶一个弹洞的缝隙穿过来，在烧焦的座位、电影屏幕、墙板的残渣中，唯一仍然站立的是一个讲台。讲台前面有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的字，意思是：永志不忘。

我走到博物馆后面的原野，那里现在散落着炮弹壳体；走向铁路车厢，它们的通风管道被用铁丝网封住了。我问自己，这样一个地方是如何把空气抽出来，把里面的人毒死的？

1945年以后，铁托将集中营推平，希望塞族人和克族人能够忘却。后来，到60年代，铁托认为伤口已经愈合，开放了纪念中心。但即使有学校参观、演讲、放映电影等一切，南斯拉夫从未对这里发生的事情达成一致。过去仍然未被了解、未被原谅。

如果说1990年5月宣告成立的新的克罗地亚国在通向战争的道路上犯了一个核心错误的话，那就是它错误地公开否认乌斯塔沙国及其在亚塞诺瓦茨所做的一切。自由克罗地亚的总统弗洛尼奥·图季曼年轻时曾经作为游击队员与乌斯塔沙作战，但在独立的狂热中，他试图将所有克罗地亚的苦难过去统一成一个所谓的民族综合体（national synthesis）。所以他从未来过亚塞诺瓦茨。他从未下跪，像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在奥斯维辛所做的那样。[注]如果他这样做了，塞族人和克族人可能已经开启终结过去的进程，而不是一遍一遍地重温过去。因为图季曼没有来这里，克罗地亚的塞族人才会被贝尔格莱德和他们的地方领袖操纵，相信一个新的克罗地亚是法西斯乌斯塔沙的回归。

当说到图季曼应当为亚塞诺瓦茨赎罪的时候，塞族人嗤之以鼻。他们说："你疯了吗？"他的党受到来自国外如多伦多、墨尔本等地的克罗地亚人资助。他们是些什么人？老乌斯塔沙。

但直面过去的问题远比这个深刻得多。战时的乌斯塔沙国是克罗地亚作为独立民族国家的第一次体验。要让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否认一个曾是法西斯的民族国家是不可能的。相反，克罗地亚人集体逃避这个问题，要么将乌斯塔沙的暴行视为塞尔维亚的宣传，要么玩弄统计手法减少在这里死去的人的数量，将暴行淡化成一般罪行。最后，正如所示，一些克族人对付亚塞诺瓦茨的办法是试图摧毁它的遗迹。

人们常说，侵略开始于拒绝，而暴力起源于罪恶。一个不否认其法西斯过去的民族才有可能谴责自己走向法西斯的未来。确实如此。但还有另一个同样的禁闭机制在发挥作用。如果你的敌人们叫你法西斯的次

数够多，你也会管自己叫法西斯，接受你的敌人的侮辱，把它变成一个自豪的徽章。此前几个星期，有多少次我在检查站碰到克罗地亚人说："他们叫我们乌斯塔沙，那好吧，我们就是乌斯塔沙。"塞族人也是这样。"你们叫我们切特尼克，那我们就是切特尼克。"双方在一个向下的旋涡中实现了共谋，互相作用，自我贬低。这个旋涡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太了解了，那是怯懦的最为普通的一种形式——对过去说谎。

但那还不是全部。亚塞诺瓦茨也不是压迫的全部真相。关于战时的克罗地亚，它不是可以提及的全部。如果克罗地亚人不能承受亚塞诺瓦茨，那不仅仅是因为以他们的名义所做过的一切，也是因为所纪念事物的片面性。在亚塞诺瓦茨，铁托的南斯拉夫只将克罗地亚人作为杀人者来记住，从未将其作为受害者。1945年5月，铁托的共产党游击队向克罗地亚东北部和斯洛文尼亚进军之前，克罗地亚人在出逃时有成千上万人被屠杀，铁托从来没有在其中任何一个大屠杀墓地建立过一个纪念中心。亚塞诺瓦茨的罪恶变得不可承受，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沉重，也因为它的不公平。在亚塞诺瓦茨，你开始认清，关于过去的谎言最终摧毁了铁托的南斯拉夫。谎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铁托领导的游击队反抗德国占领的民族起义。事实上，它是南斯拉夫人之间的内战。战后的南斯拉夫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治愈战争的创伤。

亚塞诺瓦茨是一个沉思你所承继的自由主义虔诚的地方。在我童年时代的某些时候，我一定曾被教导说，说谎最终会让你生病。当瓦茨拉夫·哈维尔说人们需要生活在真实中，他也是在说，如果各民族不能就过去达成一个共同的、真实的版本，不要期望他们会凝聚成团。但有些民族的过去很难共享，他们需要几个世纪来忘记曾做过的事情。要寻求真相，寻求共同的真相，可能要求太高了。南斯拉夫可能就是一例。50年的时间不足以忘却。

不管情况如何，当你站在一座被摧残的博物馆中央，很难继续相信

历史真相的治愈力量。某种比真相更强大的黑暗灵魂在这里起作用，它也在你开车离开亚塞诺瓦茨的道路上起作用。去诺夫斯卡，你经过一座又一座塞族人的房子，它们全都被炸毁了，旁边是毫发无损的克族人的房子和花园。当你转向里皮克（Lipik），轮到所有的克族人房子被炸毁或者被燃烧弹烧毁，紧邻着没被触动的塞族邻居。在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路上，种族清洗的致命逻辑展露出来；在一个又一个村里，他们揭开了共同伤口之上的疤痕。

---

1. 原书如此，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在访问波兰期间于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而非在奥斯维辛。——编者注

哭吧，女孩，哭吧

我现在在克罗地亚中部，从前欧洲最复杂的多种族聚居区之一的核心，克罗地亚人为多数民族，塞尔维亚人为少数民族，此外还有几个其他群体：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1991年的战争将这些村庄撕裂，现在它们被区分成克族区和塞族区，中间是联合国的检查站。

从“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通向北部的所有道路上，不管在哪儿，你看到的是连绵不断的毁灭地带。被削去屋顶的房子，小瀑布般倾泻下来的屋瓦和房梁散落在荒芜的、长满杂草的房间里；火烧过的窗户和门框，轮胎大小的弹坑穿透了砖墙。有些房子被那么多的自动武器火力洗劫过，以致灰泥完全脱落了，只剩下布满弹痕的砖，房子外面的树干仿佛穿着闪闪发亮的金属弹头的夹克。壕沟里躺着南斯拉夫的红旗牌（Zastava）小型轿车，上面布满了弹痕，或是被坦克压得弯曲成了生锈的雕塑。

一开始，破坏似乎毫无章法和原因。在一些村庄，剩下的墙壁没有一座不是布满了弹痕，而在其他一些村子里，几乎没有房子被动过。不一会儿，你开始像建筑学家一样工作，细细研究各种痕迹，辨识所发生的事情的模式。看上去有三种典型的破坏模式。最像外科手术式的是炸毁：房子被整齐地摧毁成堆，对于相邻的房子损害最小。家庭成员被他们的邻居或者武装民兵驱赶出来，然后炸掉他们的房子。这些被炸毁的残堆有许多似乎曾是大型的、最近修建的房子；它会让你惊奇男人或女人的生命能有多少年，就像一个德国汽车厂的外籍工人来到这房子，只看到它像一副纸牌一样倒下来。

破坏的第二种模式看上去是由炮兵火力完成的，南斯拉夫国防军的

大炮在克罗地亚的村庄墙壁上轰出了圆形的、轮胎大小的洞。第三种模式的破坏是燃烧弹，所有的窗户都留下了燃烧的痕迹，这必定是双方大肆掠夺的民兵的杰作。

有一些房子被塞族画上了代表乌斯塔沙的“U”字标语，这是把它们作为种族清洗的标志。其他房子标有曾住在里面的人的名字，是潦草地急急忙忙喷涂上去的，仿佛这些房子被抛弃了，它们的居民希望提醒守卫者，他们属于同一阵营。喉咙里满是尘土，脚下有玻璃破碎的声音，我在这些废墟上逗留了几个小时，破解灾难情形的各种线索。

不要认为种族清洗只是失去了控制的种族仇恨，只是巴尔干的疯狂。它有其深层逻辑。在1990年，南斯拉夫的这一部分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这些村子里没有人能够确定谁会保护他们。如果他们是塞族，有人袭击他们，他们去找克罗地亚警察，克族人会保护他们吗？如果他们是克族，生活在塞族的村子里，他们会得到保护、避免遭受塞尔维亚民兵小组（常常由以前的警察带领）的夜间袭击吗？这是种族清洗能产生其逻辑之所在。如果你不能信任自己的邻居，将他们赶走；如果在他们中间你无法居住，就住到自己人那里去。仅此似乎就可以给人们提供安全，仅此就可以缓解像野火一样蔓延到一座座房子的恐惧。

对于取代南斯拉夫的小型国家正在出现的种族清洗趋势，西方必须下定决心。西方没有人想要宽恕种族清洗，但每一天、每个小时，平民们在逃离交战区，或者是被人用枪驱赶进入相对安全的他们自己种族的聚居区。种族隔离可能令人厌恶，但对于两百多万逃离或者被驱赶出自己家园的难民而言，隔离是他们唯一可以信任的安全保障。我们对种族营地的顾虑和苛责，这个地区的平民受害者恰恰并不关心。因为西方未能拯救萨拉热窝，穆斯林、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在这里和平共处了许多世纪。相信普通的人们会逐渐回到他们抛于身后的多种族村子，是在要求不可能之事，仅仅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自由主义原则。

当你穿行在克罗地亚中部被破坏的地区，还会有某种坠入时间之洞

的感觉，向后旋转回到过去。你不是在1993年，而是在1943年。在塞族村子里，老妇人们戴着黑色的围巾，穿着黑色的羊毛裙，警惕地注视你经过；老头子们戴着“二战”时期的军便帽，赶着瘦弱的干草车经过。在他们的后花园里，女人们弯腰挥动锄头。在路上，身着塞尔维亚克拉伊纳（Krajina）红、白、蓝肩章的民兵从路边的防空壕中出来，让车子停下，搜查你。每个人都很警觉。几乎没有人说话。

在一个被毁坏的、之前克罗地亚人居住的农场，我遇到一对塞族老夫妇，住在农场附属建筑物的废墟里。他们80多岁，家住在40公里以北的达鲁瓦尔（Daruvar），克罗地亚人将他们赶了出来。老先生正在锯一截被烧焦的木头，用来烧炉子。老太太正在整理他们小小的房间，里面有床、被破坏的窗户、桌子、两个杯子、两张椅子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地板。他们自己修复了屋顶，靠从邻居和红十字会那里得到的东西维持生计。我们坐在废墟中间的树桩上，玻璃、砖块、烧过的房梁杂乱不堪。我问他们这次战争是否比上次更糟糕，老太太带着辛酸轻蔑地回答，这次比上次糟糕多了。“上一次战争中，我们一起跟德国人打仗。这一次，只有背叛。”邻居反对邻居，朋友反对朋友。你们还会再住在一起吗？他们都摇了摇头，转眼看向远方。

我问他们是如何成功生存下来的，他们突然恢复了精神。“上帝会安排一切。”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快乐地交换了一下眼神，那一瞥一定穿透了50年的婚姻。当我起身离开，老先生抓住我的手，长时间紧紧地握着。他明亮的蓝色眼睛深深地凝视着我的眼睛。“真相和民族权利。那是我们想要的一切。真相和民族权利。”

一英里以外，穿过另一个检查站，这次是在里皮克的一个克罗地亚人村庄，我遇到一个男人正在帮助一个工作小组，小组有六个都穿着蓝色衣服的女人，她们从一座被夷平的房子的乱石堆中找到有用的砖，把它们堆起来。原来他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女人们是一个市政部门派过来修理被毁坏的房子的。

男人的名字叫托米斯雷夫·马勒科维奇（Tomislav Marekovic），朋友们叫他雅普（Yup）。雅普是当地医院的管理人，业余时间在当地的足球队做助理教练。我猜想（但不是很肯定），他也是克罗地亚当政的民主联盟党（HDZ）在当地的一位重要支持者。要不然，为什么他的房子是我在里皮克发现的唯一一栋由市政工作人员来清理的房子？

他带我看他的厨房原来是怎样的，电视机原来在哪儿，他的沙发放在哪儿。现在什么都没留下，只剩下地基和一大堆砖块，女人们把砖块上的灰泥削掉，然后堆叠起来。隔壁的房子毫发无损。为什么？我问道。他说，是塞族，我们一直来往的。他说现在他们在西德。那么再隔壁的房子呢？我父母的，他简洁地说。他突然指着大街上说道："他们就把我父亲扔在那里，大街上，扔在那里三个星期，才有人把他埋了。而我母亲，他们把她带到一个谷仓里，扔到火海里。"

南斯拉夫军队的坦克曾进驻里皮克高处的山上，在当地塞族民兵的指示下炮轰小镇，目标对准克族的房子。当雅普的房子被炮轰的时候，他和妻子跳上汽车，逃往萨格勒布，但他的父母拒绝走，认为他们是安全的。几天以后，他们被塞族民兵——也许来自同一个村子——从房子里拖了出来。他们被射杀，尸体被焚烧。雅普告诉我这一切，微微地叹息，停顿了一会儿，点燃一根香烟，忧郁地凝视着远方。女人们一直默默地在我们周围工作着，堆着砖。

雅普叫她们休息，在他小小的后花园里，我和女人们坐在一张搁板桌边。我想知道为什么工作人员是清一色的女性，她们都大笑起来，眨着眼回答："因为女人是最棒的。"闭口不谈的事实是，那么多的克罗地亚男人都去军队服役了。我告诉她们，我注意到在塞族那一边没有进行重建，他们只是住在废墟上，枪炮对准克罗地亚人，等待着。一个女人淡淡地说："他们没有重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完蛋了。"有几个女人点头，其他人则沉默地低头对着桌子。

雅普说："你们中有三人是塞族人，对不对？"我旁边的三个女人点

头，又转回去看着桌子。在这沉默当中，他们让我去猜想，为什么三个塞族女人会帮助重建一个克族人的房子。只能是因为她们嫁给了克族人，一生都居住在这里，现在发现她们自己被撕裂成两半，就像她们的村子一样。然后，我旁边的一个塞族女人缓缓地开始哭泣，沉寂笼罩了每一个人。桌子对面的克族女人平静地看着她，她将自己缩成一团。“哭吧，女孩，哭吧。”有人说，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

军阀

回到1989年，我们曾相信柏林墙的倒塌开启了将由哲学之王、异见英雄和船厂电工统治的新世界。我们期待一个从衰朽的苏联的控制之下解放出来的新民族国家秩序。我们认定，民族自决必定意味着自由，民族主义必定意味着民族建构。像往常一样，我们错了。我们期待秩序，得到的却是混乱。在民族主义的名义下，数十个潜在的民族国家被无可挽回地粉碎了。在国家建构的名义下，我们令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回归到现代国家出现之前的前政治混乱中。

前南斯拉夫的大部分地区现在被那些中世纪末期以来在欧洲就未曾见过的人物——军阀——统治。民族国家在哪里解体，他们就在哪里出现：在黎巴嫩、索马里、印度北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奥塞梯（Ossetia）[注]、柬埔寨、前南斯拉夫。他们拥有车载电话、传真机、精良的个人武装，看上去挺后现代，但实际上还在纯粹的中世纪早期。

他们选择的车辆是四轮驱动的大切诺基，车顶上有蓝色的警灯闪烁，加速通过检查站。他们佩带手枪，但不会挥舞手枪。他们将粗鲁的威吓留给吉普车后面的保镖，那些人戴墨镜、穿特制牛仔，装备有扎斯塔瓦（Zastava）机关枪。他们自己穿皮夹克，系花式领带，穿紧身的灯芯绒裤子——德国的电视制作人的最爱。离开“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一开始在路上的检查站我遇到的军阀都是矮个儿、粗壮的男人，在以前的生活中是不入流的混混，或者小镇上的警察，或者两者都是。跟他们待上一天，游历他们的世界，你很难发现他们大多数是杀人恶魔。

军阀不仅主宰着交战地区，他们还成功地进入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样一党统治国家的权力核心。

战争罪犯们在巴尔干地区地位显赫。他们在塞尔维亚国会拥有席位。其中一人，沃伊斯拉夫·舍舍利（Vojislav Šešelj），自封为塞尔维亚切特尼克公爵，他自己掌管的政党也是国会的正式成员。另一人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Željko Raznjatović），又称阿尔坎（Arkan），控制着被称为“猛虎”的准军事组织，拥有800名强悍成员，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中，他们在东斯拉沃尼亚一路强奸劫掠。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的一份通缉令证明这个臭名昭著的恶棍是瑞典一桩未遂谋杀案的在逃犯，但他是国会代表，并且经营许多破坏禁运的生意，获利巨大，包括在贝尔格莱德周围的加油站销售走私汽油，换取硬通货。身为曾经的后现代黑暗王子，阿尔坎开始经营自己的声望。在东斯拉沃尼亚的塞族农舍中，圣萨瓦（Saint Sava）[注]画像的边上，你最有可能看到的是一个大大的彩色挂历，一年中的每个月份都有一张不同的阿尔坎照片。

在旅途的末尾，我参加了贝尔格莱德的反米洛舍维奇示威，他本应躲在自己的大切诺基里穿过游行人群，但这个穿小羊皮夹克的杀人犯微笑着、温文尔雅地向左右两边挥手致意，显然陶醉于他对贝尔格莱德和平派之无能的挑衅。

克罗地亚人会告诉你，阿尔坎被允许在塞尔维亚国会中担任代表，这个事实证明塞尔维亚是一个法西斯政权。并非如此。有反对派政党和报纸在发挥作用，而且事实上贝尔格莱德的民主和萨格勒布的一样多。吉拉斯对塞尔维亚政治的概括最完美地描绘了军阀们努力进入体制核心的方式：带有强盗主义味道的民主。

在克罗地亚一方也有军阀——如果在萨格勒布没有，那在前线的城镇如奥西耶克（Osijek）也是由镇议会主席和当地党魁布拉尼米尔·格拉瓦斯（Branimir Glavaš）所掌控。当你坐在格拉瓦斯的吉普车里游览该镇的时候，似乎像是与一个引人注目、颇受欢迎的政客在一个美国的小镇上。他碰到当地的一场婚礼，乐队为他演奏小夜曲。新郎请他亲吻新

娘，参加派对的狂欢者递过酒瓶让他试试味道。很难想象这个人是格拉瓦斯组织的领导人，这个准军事组织不仅要为保卫奥西耶克负责，也要为对塞族村庄的清洗以及杀害试图与塞族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克罗地亚警察承担责任。

在警察检查点，格拉瓦斯出示了一个警察徽章，在前线则是军事通行证。他的权力范围模糊不清，却又无处不在。他将军阀的邪恶魅力转变成和平时期的权力，不过他打了个响指，向你保证，他可以在一夜之间将他的部队重新动员起来。穿过前线，在30公里以外由塞族控制的武科瓦尔（Vukovar），有格拉瓦斯先生的塞族对手科伊奇（Kojić）先生。同样的吉普车，同样的彬彬有礼，同样的枪炮。

军阀是民族主义者，但他们的信念没什么意思。他们是暴力的技术专家，不是理论家。他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明白，种族民族主义已将巴尔干的普通人民传送回前政治的自然状态，在那里，像霍布斯所预测的，生活是险恶、残忍和短暂的。在自然状态中，拥有扎斯塔瓦机关枪和大切诺基的人是王者。因为他能够提供这里的每个人都渴望的两种物品：安全和复仇。

一旦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国家分裂为其各个组成民族的小块地方，关键问题很快就变成：如果我是塞族人，当地的克族警察会保护我吗？如果我的新老板是塞族人或者穆斯林，我还能保住肥皂厂的工作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能。因为不再有国家能够确保旧有的种族间协商。结果，每个人都匆忙地、混乱地转向另一个可以得到保护的来源：军阀。

因为军阀不仅提供保护，他还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告诉他的人民：如果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邻居，就必须将他们从我们当中赶出去。如果我们不能一起住在一个国家，就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纯净国家。种族清洗的逻辑不只是受民族主义仇恨驱使，清洗是军阀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之战争的冷冰冰的理性解决方法。军阀说，清除你的邻居，你就再也不必害怕他们。住在你自己的镇上，你就可以和平生活。有我和我的

小伙子们保护你。

---

1. 中亚高加索的一个地区。
2. 圣萨瓦，11世纪末塞尔维亚开国君主斯蒂芬·奈马尼亚的幼子，主掌宗教事务，赴君士坦丁堡觐见东正教大牧首，设立塞尔维亚总教区，促进塞尔维亚统一，因而被后人尊为民族英雄。贝尔格莱德有纪念他的圣萨瓦大教堂。

武科瓦尔

在武科瓦尔，天黑以后，汽车的灯光所及是道路两边满目疮痍的墙壁、没有房顶的废墟和碎石堆。你没有在被子弹击碎的停车指示牌前停下，因为十字路口没有车辆。一定有人住在这里，因为你偶尔可以看到一束孤独的灯光，在被轰炸过的塔式楼的百叶窗后面隐约闪现。但你看不到人，因为天黑以后，没有人敢出来冒险。老鼠在马路上来回窜过，在垃圾中觅食。远处，你可以偶尔听到有小型武器开火的声音。

这个鬼镇从前是哈布斯堡时期多瑙河大主教的驻地。1991年，它成为克罗地亚的斯大林格勒。在整个秋天，克罗地亚国民警卫队守卫它直到最后一条街道，对抗欧洲自从1945年以来最猛烈的炮火袭击。当塞族民兵和南斯拉夫国防军在1991年11月最后“解放”这个城镇时，付出的代价是9000人的性命，没有任何东西留待解放，只有一座被摧毁的废墟。

自行成立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将其东部的总部设在武科瓦尔。“克拉伊纳”意为军事前线。塞尔维亚在克罗地亚的定居点开始于17世纪，奥匈帝国将其作为他们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缓冲区。作为受命在巴尔干地区保护欧洲文明、对抗土耳其人的捍卫者，塞族人始终保持武装。枪炮文化在这里世代相传。

在小镇的广场上，一条横幅挂在路边，从一座被摧毁的房子伸展到另一座，上面写着：“欢迎来到武科瓦尔，元年。”但进入该镇18个月后，塞族人没做任何事去重建它。它可能应当以这个样子保留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可以把它围起来，宣布它是欧洲文化遗产地。毕竟，还有什么比我们愚蠢的民族主义战争传统更像欧洲的呢？

塞族人摘下克罗地亚的街道指示牌，用西里尔字母写的塞尔维亚语牌子取而代之，但克罗地亚牌子仍旧堆放在镇上被摧毁的博物馆的阁楼上，仿佛在下意识里，塞族人希望克罗地亚的牌子有一天会重新装回去。

也是在博物馆的阁楼上，还有一幕更为离奇的景象：在房屋的主梁下面躺着三尊青铜半身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它们是20世纪80年代被扔在这里的，现在炮火轰炸将屋瓦和隐藏房梁的吊顶掀开，它们才重见天日。这三尊青铜半身像是博物馆中唯一从战火中幸存下来的完好无损的展品。

尽管武科瓦尔的毁灭责任完全在于南斯拉夫国防军的坦克和炮兵部队，他们在这里倾泻了15万发炮弹，但克罗地亚人在撤退的时候似乎也炸毁了它的一部分，因此塞族人的付出什么都没有得到，只有废墟。毁灭武科瓦尔毫无军事意义。我问一位塞族坦克指挥官，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耸耸肩："战争有许多这样的悲剧……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但这些都是带有军事目的的战役。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战争中，军事目标受到一种伤害、羞辱、惩罚的欲望驱使。南斯拉夫国防军（JNA）本可以绕开武科瓦尔，派遣其坦克纵队沿着"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直达萨格勒布。但它反而停在多瑙河的另一边，将武科瓦尔轰成了碎片，似乎在用每一颗飞出去的炮弹说："你们想要独立，是吗？这是你们要付出的代价，最终你们除了废墟什么也得不到。"

当你站在已成碎片的墓地、修道院、教堂和住房之上，很难想象，有谁可以从这所有的毁灭中获得深深的快乐。这些古代的墙壁，这些十字架、教堂钟塔、古石板屋顶，都被那些认为他们是保卫神圣庄严的过去免受亵渎——这种观念一再重复——的人们毁灭了。某种程度上，炮火表达了一种本质上的虚无主义：关于为神圣祖国的命运而战，人们所谓的"说服"比所有民族主义的虔诚更为诚实。

某种相当难以控制的青春期渴望在这里发挥作用。坦克和炮兵指挥

官看不到他们击中了什么。这完全像在电子游戏室玩游戏机一样的抽象和令人满足。甚至，大部分塞族指挥官对一个重大的数字也无动于衷，即被轰炸的人口中可能有多达20%的比例是塞族人。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长眠于城市郊外某一个荒芜无名的十字路口之下、万人坑之中。

塞族人接管了他们自己亲手造就的废墟。对于他们对这个城市所做的一切，一个人本应感到悔恨或羞耻，或者如果做不到这点，也可能有某种道德上的困惑状态。但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有的只是一种难堪的沉默。

正是在武科瓦尔，我开始发现民族主义如何作为自我免责的道德言辞发挥作用。一切都由对方负责。在纯粹民族主义幻觉的道德宇宙中，一切行为都是被迫的，是必需的悲剧。城镇必须被摧毁，是为了解放它们，人质必须被打死，大屠杀必须进行。为什么？因为对方先开始的，因为对方是野兽，不会明白除了暴力和报复之外的任何语言，等等。民族主义战争中的每一个人都说着命运、被迫、放弃道德的词语。没有地方像武科瓦尔那样达到了一个最低点。拿着枪的暴徒，藏身在多瑙河旅馆的废墟里，跳出来威胁要杀死我的翻译，仅仅因为他是个匈牙利人；克拉伊纳情报部长的情报没有一条不是谎言；武科瓦尔市长在武科瓦尔医院里四处走动，把塞尔维亚旗帜交给那些将被截肢的人们。对于由于他们的原因导致自己城市毁灭的无情指控，这些生物中没有一个表达过最轻微的羞耻、悔恨或迷惑。对于他们所有人而言，责任全在克族人。

塞尔维亚克拉伊纳自称国家，但它更像是一个由短命的军阀——称为某某副部长、某某最高指挥官，权力取决于他们能够征募多少汽车、武器和人员——统治的封建王国。你很快会发现，他们的命令通常在下一个检查站就会失效。

科伊奇先生是武科瓦尔镇以及该地区的安全首脑，他向你保证，他已将全镇置于控制之下。但他的帕萨特的防弹挡风玻璃上有三个弹击的密纹，是三天前跟当地匪徒交火留下的。到处都有枪：在骑车去村里检

查站执勤的老人的背上，挂在镇子入口检查你的文件的民兵腰带上，当地酒吧的柜台后面。在克拉伊纳的每一个地方，暴力民主统治一切。

晚上，克拉伊纳的塞族人坐在村子入口的碉堡里，枪口指向空无一人的道路，等待克族人来袭击他们。这是村庄战争，前线经常正好处于两个后花园之间。一个下雨的夜晚，我前往武科瓦尔30公里以外的前线。温科夫齐（Vinkovci）的克族人阵地上的昏暗灯光清晰可见，我急速跑向塞族人的战壕，穿过晾衣服绳索，越过花园栏杆，经过被废弃的脸盆和刚刚开垦的蔬菜园。当我到达塞族碉堡的安全所，我可以听到另一方传来的克罗地亚音乐，混杂着隔壁的“塞族猪”之类的喃喃咒骂。

塞族人从自己的阵地上可以看到他们被迫逃离的家园，他们可以看到处于自己枪口之下的邻居们。有一个叫柯比·切特尼克（Chobi Chetnik）的民兵，战斗服上有一个标牌写着“塞尔维亚：自由或死亡”。凌晨两点，他在民用电台上嘲笑100米远的乌斯塔沙。这是一场曾一起上学、在同一家运输公司一起工作的敌人们之间的战争，现在他们在民用电台上交谈、发笑、嘲弄、讲笑话。然后他们挂断，试图将对方列入自己的枪口范围。

就是这样，一夜一夜，既非和平，又非战争，双方互相较劲、嘲弄、试探，用小型武装交火互相探索阵地，偶尔发射一发迫击炮或者大炮。

塞族人的阵地由前南斯拉夫军官、“爸爸的部队”[注]式的村庄志愿者和野蛮的切特尼克准军事组织守卫。他们知道，如果没有联合国，他们将很快取胜。从他们喝酒的方式，从碉堡里的冒险远去之后他们脸上悄悄呈现的百无聊赖的宿命般神情，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绝望。

我在奥西耶克访问的克族人前线离武科瓦尔30公里远，将两地放在一起看印象更为深刻。他们在一条被炸毁的高速公路后面挖掘战壕，而且他们似乎比塞族人更有纪律、更为好战。他们相信联合国得到许可永

久占领他们国家的三分之一领土，他们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向塞族人一方挥舞扎斯塔瓦自动武器，告诉他们克族的旗帜将很快飘扬在武科瓦尔上空。这也许更多是火线上的虚张声势，但两方留给我的感觉都是，东斯拉沃尼亚的停火悬于一线。

碉堡里的塞族人有一个案例值得一听。在南斯拉夫，他们曾是一个得到宪法保护的民族。在独立的克罗地亚，他们退身为拥有种族屠杀历史的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塞族人一再重复，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面临再次灭绝。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战争，目的就是给他们这样一个国家，通过从塞尔维亚本土开辟一条陆地走廊，将克罗地亚的西部、中部和南部的塞族土地连接起来。没有这样一个走廊，克罗地亚的塞族知道他们将无法生存，除非这样一个走廊得到保障，否则他们将一天天地生活在武装妄想中。在克拉伊纳，有货币，有国旗，但没有国家，只有丛林。他们没有可信的保护人。即使他们全力虚张声势，但他们知道不能指望米洛舍维奇。如果他们自卫的代价变得对塞尔维亚本土来说太高了，克拉伊纳人知道他们将会被出卖。

如果塞族人不那么坚持认为整个世界，尤其是外国记者都反对他们的话，他们的情况会更有说服力。在你的汽车被喝醉了的民兵强行征用，在你身处枪口之下、生命受到威胁之后，对他们事业的某种漠视悄悄地占据了你。

东斯拉沃尼亚的战区，尤其是武科瓦尔，给人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历史倒退印象。从前犹太人、鲁塞尼亚人（Ruthenes）、德意志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被埋在一起的墓地现在受到双方炮火的亵渎。奥匈帝国时代留下来的优雅的主教宫廷和修道院、精致的带拱廊的广场躺在废墟之中。这里的时间向后倒退了500年。欧洲曾经最富有、最文明的地区回到了中世纪末期的野蛮。这里的法律和秩序由军阀来管控。这里没有汽油，所以村庄都退回到汽车之前的时代。每个人都依靠步行四处走动。因为没有取暖用油，上了年纪的农妇在树林里寻找燃料。食品

稀缺，因为人们忙于打仗，无暇照看田地。在被炸毁的高层公寓前面的废弃垃圾中，幸存者用锄头挖掘。每个男人都武装起来。没有人冒险走出村子。没有人相信一生中从未见过的人。20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将欧洲大陆的一部分传送回民族国家之前的时代，回到封建内战末期的混乱之中。

在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度过的一周时间是如此全面地陷入民族主义狂热的一周，当你最终穿过最后一个塞族检查站，打开收音机，听到正在播放的普契尼咏叹调，望向窗外，看到雨中潮湿的田野，你觉得自己像一个被绷紧的弹簧舒展开来，荒谬而惊讶地发现，一个天真美丽的世界依然还在。

---

1. 《爸爸的部队》（Dad’s Army），BBC情景喜剧，反映“二战”时期英国国土自卫队的故事，于1968—1977年期间播出。

贝尔格莱德

在“兄弟友谊和团结公路”上，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实话，来自何方，想去哪里。在克族检查站，你只能说你将去下一个克罗地亚城镇。在塞族检查站，你微笑着，让他们搜查你的行李箱，仔细检查你行李里面的脏内衣裤，给他们万宝路，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他们你将投奔塞尔维亚母亲的怀抱。

在公路上塞族人的第一个收费站，你不必将在萨格勒布入口处拿到的收费卡递给他们。相反，你说你从塞尔维亚克拉伊纳过来，然后你为用德国马克付的过路费讨价还价。这是欧洲独一无二的收费站，你可以带着笑交换香烟，对他们准备收取的费用表示嘲笑怀疑，你可以把过路费的价格压低到一个合理的数目。

到贝尔格莱德大约还有24公里，你看到西方制裁之影响的第一个迹象：小红旗牌、菲亚特、雷诺5s排成的巨型长龙，从加油站沿着道路展开，许多人围聚在空油泵边，期待间或送来的油。他们玩牌、谈论政治、一起吹口琴打发时间，但当你走近去交谈时，他们发现你是一个西方作家，一群愤怒的人们很快就围住你。一个矮小、粗壮的男人，头上戴着猪肉馅饼帽，靴子上泥巴结成了硬壳，一双农夫的手戳到你的胸前，说：“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对那些克族人？站在那里等着他们来割我们的喉咙吗？而你们做了什么？你们给我们禁运！你们管那叫公平？”他们就这样继续下去，主题不断变换，很快他们开始责怪丘吉尔和英国支持铁托而不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所以显然是英国的错，让南斯拉夫搞了50年的共产主义。

如果不是带有某种喜剧效果，他们的愤怒会更有威胁。长队中的人

们说他们不想和一个西方人有任何瓜葛，转过身去，让他们的朋友可以看到，他们做出了多么漂亮的挑衅姿态，然后他们转回来，开始交谈，停顿下来让你记笔记，从你的肩头窥视你是如何写他们的名字，等等。此前几天的经历让我明白，这是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本身的仪式性风格的一部分。这种舞蹈拥有开放的四方格阵势：我们不说话，西方永远不会理解；我们蔑视你，你说的全是谎言；然后，他们开始说话并且滔滔不绝。问任何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得到的是那种讲故事式的回答："你得理解我们的历史……"20分钟以后，你还在听拉扎尔国王（King Lazar）㊟、土耳其人和科索沃战役。这种认为没有人理解他们的深层想法，与热烈地、不可遏制地为他们自己解释和辩护的渴望并驾齐驱，似乎定义了我在贝尔格莱德每一次谈话的风格。

第二天早晨，我访问在一个银行排队的人们的时候，同样的情形又重复了一次。人们粗暴地、激烈地拒绝交谈，只是一开始就滔滔不绝地为塞尔维亚做自我辩护，从他们反抗土耳其人的悠久斗争开始，到波斯尼亚塞族对抗穆斯林极端主义者的自卫结束。沿着这条轨迹，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铁托的反塞尔维亚罪恶全都受到恶言谩骂，用词之污浊多变犹如春季的洪流。

跟加油站的长队一样，银行的长队也是贝尔格莱德生活的一个基本部分。经济处于加速超级通胀状态，每个月上涨200%。在饭店里，菜单上的价格标签隔夜就要更换。唯一可以信赖的抗通胀保值手段是拥有一个硬通货账户。有很多私人银行开业，承诺每月为这样的账户支付10%。他们如何成功做到这一点是个秘密，谣传这些私人银行与地下世界瓜葛很深：走私，从乌克兰非法进口石油，与俄罗斯进行武器贸易以及为西方毒品资金洗钱。有一些这样的银行已经破产，人们担心如果有更多的银行破产，米洛舍维奇政权自身可能在随后的经济混乱中灰飞烟灭。

所以小储户担心他们账户的命运，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夜排起长龙，

以确保能够把他们的硬通货取出来。这些队伍沿着街道延伸数百米长，推挤着的人们许多是受冻的、满怀愁虑的老人，领取养老金者，其中一些人虚弱而疲惫。

你也许认为这些长队中会充满反对米洛舍维奇的怨言。毕竟，贝尔格莱德从未投票选他，并且一直怨恨自己从铁托治下的不结盟运动世界首都，被贬低成一个孤立的、被禁运的巴尔干地方首府。然而再一次，所有本应指向米洛舍维奇的愤怒被导向西方，导向丘吉尔、撒切尔夫人，因为他们支持克族人；导向美国人，因为他们援助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如此等等。

---

1. 拉扎尔国王，即拉扎尔·赫雷别利亚诺维奇（1329—1389），塞尔维亚大公，领导巴尔干诸国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1389年指挥著名的科索沃战役时战死，是塞尔维亚的传奇人物。

吉拉斯

在贝尔格莱德的公寓，他自己来开门。他的头发现在白了，岁月松弛了曾经锐利如鹰的容貌——我在他的《与斯大林对话》（*Conversation with Stalin*）的封皮上见过。他82岁，驼背而虚弱，带我沿着走廊去他的书房。他让我坐一张低矮的绿色天鹅绒扶手椅，问我要茶还是饮料。我谢绝了，他笑起来，回忆起1944年他带领一个南斯拉夫代表团会见斯大林的时候。俄国人给他们提供伏特加，当南斯拉夫人谢绝的时候，俄国人叫了起来："你们是些什么人啊？""我们是党员。"米诺万·吉拉斯带着淡淡的、警惕的微笑说。在他身体里面仍有一种清教徒式的党性。

在整个反抗德国占领者及其塞族和克族同伙的游击战争中，吉拉斯都与铁托在一起。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明白，1993年的互相憎恨完全回退到了1941—1945年间南斯拉夫人之间的屠杀与反屠杀。作为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党的伟大领导人，他是最后一个还记得南斯拉夫梦想的人，而下一代已经将其抛弃。

他跟我讲起1945年的夏天，作为新南斯拉夫的副总统，他坐在美国产的威利斯吉普车里，启程去确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界。"毕竟，我是黑山人，"他微笑着说，"所以人们认为我是中立的。"我问他，他用什么原则来决定哪一个村子归克罗地亚，哪一个归塞尔维亚？"种族原则。"他说。然后他描述在决定哪些归克罗地亚、哪些归塞尔维亚之前，他是怎样沿着边界计算每一个村子的种族构成。这就是战争为之争吵不休的边界，直到今天，塞族民族主义者仍指责吉拉斯出卖塞尔维亚人的利益给可恶的克罗地亚人。

他既是战后南斯拉夫重要的缔造者和版图绘制者，又是东欧第一个共产党的异议者。他与铁托在1953年决裂，指责铁托背叛了党的运动的理想，让新的共产主义国家被一个新的官僚特权阶层所占据。为此，铁托将他下狱9年。正是在监狱里，他学会了他那刻板、口音很重的英语，并使用一本词典把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翻译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我估计他会谴责宿敌铁托未能理解种族民族主义，但他猛力摇头。铁托对民族主义的处置没有错。他给每一个共和国正好足够的自治权以满足民族主义的需要，但不能危及南斯拉夫的统一。他的根本错误是他从未取得民主化的成功。他从未建立让民主发挥作用的机制和国家意识。共产党人开始分裂的那一刻，南斯拉夫本身也开始解体。

我问他，民主和民族主义是否相容。在南斯拉夫的情形下，一个民主体制有无可能将国家维系在一起？是的，他坚持认为，渐进的民主化，渐进地放松一党统治，可能产生一种民主的文化，将会让该地区的各种民族主义一起共享权力。为什么他不及时搞民主化？“因为他既是特权共产主义阶层的主人，又是其奴隶。”吉拉斯说，带有一种活着看到自己原来的异端邪说被事实所证明的意味。

由于未能及时民主化，铁托的所有成就都付诸东流。最终证明，共产党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绝不比奥匈帝国或者土耳其人成功。“我们共产党人，”他说，“是最后的帝国。”

他如何理解将南斯拉夫撕扯得四分五裂的民族主义呢？他的观点是，巴尔干的民族主义是进口的日耳曼意识形态，只是到19世纪70年代才来到这里。它立即产生了致命的影响，将数百年来比邻而居、共同成长的各民族的种族复合体撕裂。他认为，民族主义仍旧不是一个固有的民间情感，而是一种异质病毒，是城市知识分子煽动未受过教育的人民、在悬崖之上成功地推行多种族试验的成果。我在贝尔格莱德几乎没有遇到人相信米洛舍维奇自己怀有任何深度的民族主义信念。他只知

道，当他在台上叫喊“没有人能再次打败塞族人！”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欢呼响彻云霄。

吉拉斯随后说，西方最大的错误，是他们将塞族人“妖魔化”。这一观点令人惊讶，因为它来自一个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宣传中一直被贬低为塞尔维亚利益之叛徒的人。然而吉拉斯对此颇为坚持：在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和1993年的波斯尼亚战争中，西方都对塞族人施加不必要的谴责，从而将塞尔维亚人民拱手交给米洛舍维奇和民族主义者。

迄今为止，巴尔干术士米洛舍维奇将所有酝酿出来的仇恨转向西方，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制裁将整日排长队变成普通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政权似乎比以前更为巩固。尽管在去年秋天的选举中，贝尔格莱德自身投票反对米洛舍维奇，但反政权的街头游行几乎是一开始就遭到失败。反对党们虚弱而分裂，而且甚至比米洛舍维奇更民族主义化。总而言之，这种景象冷酷地证明了吉拉斯的基本观点：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充斥着分裂后的虚无，伴有被导向西方的受迫害狂倾向以及被导向他们的塞族同胞的宏大幻觉。

按照吉拉斯的观点，西方对塞族的“妖魔化”也使得克族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自称是无辜的受害者。考虑到围困萨拉热窝、占领四分之一的克罗地亚以及穆斯林集中营，他承认，对塞尔维亚的制裁不可避免。但这只会让克族人和穆斯林相信，他们对塞族人的报复行为将不会受到国际制裁。

吉拉斯以一个老人的超脱看待这一切，但我们对话时，有一会儿工夫，他的超脱被打破了。“我们必定是欧洲唯一一个，”他带着冷冷的蔑视说，“积极复兴法西斯的合作者的国家。”他是指克罗地亚人的乌斯塔沙，但也包括塞族人合作者、与德国人一起作战的切特尼克。他曾为之战斗的一切都已经崩塌，50年前他奋力反对的一切重新恢复公众荣耀，这种想法让他的脸色一时黯淡下来。他看上去疲倦而沮丧。“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无论如何，在这里没有。”他叹了口气说。

铁托之墓

他喜欢温室，所以给自己建造了一座温室。他过去常在那里休息，置身于一品红和仙人掌之中，像是阳光之下的一只老蜥蜴。现在，他们把他埋在温室里，在他贝尔格莱德的住所前面。那儿有一块很大的白色大理石板，用青铜字刻着“约瑟夫·布罗兹·铁托，1892—1980”。

不再有许多人来参观，这个地方被遗忘了。我参观的那天下着雨，雨水从一扇破裂的天窗滴落到元帅的墓上。无人在意。

1945年他的生日，一群少年发起了一个接力赛，从克拉古耶瓦茨（Kragujevac）到贝尔格莱德，送给他一个接力棒。他统治期间，每一年南斯拉夫的“青年”都重演这个比赛，比赛最后他们将接力棒送给年迈的铁托。他的生日成了“青年节”。两万根接力棒现在保存于墓地旁边的博物馆里。再也没有人去参观这些接力棒。

权力的合法性耗竭得多么迅速！20年前，接力棒还不曾显得荒谬可笑，接力赛对人民意义重大。现在，它似乎属于某种消失的部落仪式。

人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独裁者没有继承人。克里斯玛（Charisma）[注]是最不稳定的一种合法性。这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但是民主呢？这里是否曾经确实有过民主的机会？老蜥蜴自己也许会说：绝不，如果你让他们有民主，他们只会把他们自己撕得粉碎。在那些死去暴君被发配去的地狱里，他也许正审视着在他身后的“地狱”。他也许会说：我告诉过你们的，必须有铁腕统治，我是对的，吉拉斯错了，在我身后来的是滔滔洪水。

然而，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什么能证明独裁者是对的。需要的是更多

的时间——让一个民族忘却的时间，让老人们死去、他们的记忆和耻辱一同死去的时间，让复仇变得荒谬的时间，让仇恨变得愚蠢的时间，让光荣和记忆的政治被利益政治所取代的时间。换而言之，迎来独裁者毕生所反对的、平庸的资产阶级政治的时间。

在一个从未有时间体验资产阶级之平庸政治的文化中，民族主义成为民主得以在南斯拉夫的废墟上生长的土壤。当然，那不是真正的民主，而是受到操控的国民投票民主，用于认可一人的统治。在这种形式的民主中，民族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吸引力，一种持续狂热、永恒亢奋的政治。取代实际政治的平庸，取代直面现实——贫穷、落后、愚顽、不入流的巴尔干地区的日常现实——的政治世界，民族主义将心灵导向更高的事物。它提供关于身份和自我肯定的光荣政治。取代无止境的利益和调和政治，它有内部和外部的敌人要击退，有不朽的事业、过去和当今的殉道者让人们保持信仰。而它当然没能逃避犬儒和罪恶的注意，在这个有组织的、永恒亢奋的国家，如果套上“民族”“人民”“权利”和“自由”这些文质彬彬的词，所有的犬儒主义、犯罪、大大小小的暴行都可以被视为正当。

那么我们又怎么样呢？

远离灾难，我们才能看到，西方未能及时采取行动，是因为某种比疏忽、错误信息、受误导的好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政策背后的原则互相矛盾。在1989年的轻率狂热中，我们宣称支持民族自决的权利，支持现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却没有意识到前一个原则与后一个原则矛盾。我们坚持边境线不可侵犯，却没有明确是否也包括像南斯拉夫这样的联邦国家内部的边境线。

最重要的是，我们听任对帝国时代历史的内疚引着我们逃避自己的责任：界定一个后帝国时代的和平秩序。要谴责一直处于帝国控制之下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后帝国时代的各国感到内疚。当“被奴役的民族”——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地区——要求自由的时候，我们没有停下

来考虑一下后果。在凡尔赛和雅尔塔之后，欧洲最后一个帝国的崩溃第三次给我们提供了机会，界定欧洲的持久和平，创造一种新的民族秩序。我们本可以通过综合性的领土解决为“冷战”画上句号：划定边界、保障少数族群权益和在相冲突的自决权诉求间做出裁决。我们是如此关注于避免充当帝国警察的角色，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繁荣中我们是如此自私，听任每一个当地的后共产主义煽动家利用自决和民族权利的言辞实现自己的目的。前南斯拉夫被种族清洗的各国的恐怖新秩序，是我们的愚蠢的见证，对他们也是如此。

---

1. 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意指神授的能力。是追随者用以形容具有非凡号召力的天才人物的用语。——编者注

老人的皮夹

我正好站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莫斯科宾馆的前面，在一队无精打采、逐渐散去的反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游行队伍当中。整个早晨，这个有几百人的群体一直在那儿，他们慢慢发现人数太少，不可能制造出任何事。人群中间有一个戴切特尼克帽的老人，我走近跟他交谈。他70多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和米哈伊洛维奇站在一起反对铁托。我问他是否有儿子，如果有，他们有没有看到这次战争？

他平静地掏出皮夹，给我看三张护照尺寸的彩照：每一张都是他的儿子，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两个死了，死在克罗地亚战争的前线。第三个在监狱里。为什么？老人带着一种残酷的满足感说，因为，他报了仇。他找到杀死其中一个兄弟的凶手，杀了他。然后老人拿出一小片折叠的新闻剪辑，来自克罗地亚的报纸，那上面有另一个年轻人的头像，护照尺寸的照片。“杀我儿子的杂种。但我们杀了他。我们杀了他。”他说着，熟练地把杀他儿子的凶手的照片叠好，放进皮夹，和他儿子的照片放在一起。

从父亲到儿子，从儿子再到儿子，这种形式的爱，这种在代与代之间保持复仇的信念，永无尽头。在这场村庄战争中，每个人都相互认识，一个老人将杀害儿子的凶手的照片和为他们都报了仇的儿子的照片放在一起。无休无止，当老人死去时，他知道也将会有人为他复仇，这带给他一种残酷的满足。

2　德国


Der
Kampf

图8　柏林墙开放几天后，一位柏林市民在墙上进行抛接杂耍



图9　1989年莱比锡的某次“周一游行”，超过7万人参与



图10　80年代以来起于英国、繁于德国、逐渐遍布西方国家的新纳粹组织——光头

党





图11、图12　伏尔加德意志人（Wolgadeutsche），是生活在苏联伏尔加河流域的德意志人。苏联解体后，统一的德国政府允许原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德裔以“德国人”的身份回国居住，但他们大多居住在难民营

实验

一对双胞胎，在出生时被分开，一个送到富裕、宽容的家庭，另一个则由贫穷、严厉的家庭收养。45年后，富有的兄弟找到贫穷的兄弟，邀请他去参观自己在郊区的家。一开始，他们为相互陪伴、为似乎重新找到失去的另一半而快乐欢欣。然而，过了个把小时，他们发现彼此的陪伴令人烦恼。穷兄弟被富兄弟的喧闹和咄咄逼人的笑声所折磨，富兄弟则为穷兄弟的顺从和充满怨恨的沉默而恼怒。对于父母为什么抛弃他们，当富兄弟诉说他那个版本的故事时，被告知另一个不同故事的穷兄弟生气地予以否认。很快，他们沉默无言地坐着，都在想如果他们从未遇到，也许会更好。除了碰巧拥有同一对粗心大意的父母，他们似乎毫无共同之处。

然后，富兄弟的妻子出现在这个郊区豪宅的草坪上，给她贫穷的小叔子带来饮料。他看到她和自己的妻子一样有红色的头发，有同样的对高跟鞋的偏好——可以展示涂成红色的闪亮的脚趾甲。随后他注意到，尽管自己的花园小很多，但与这儿完全一样，也有喷泉，水流从丘比特的嘴里喷出来，流进贝壳形的盆里。更让人迷惑的是，他注意到他的兄弟躺在一把草地椅上喝着啤酒，稀疏的沙黄色头发分开的方式完全和自己一样，从左耳掠到右边。最后，当富兄弟的儿子出来借车子钥匙时，穷兄弟发现自己和富兄弟给他们的儿子起了同样的名字。

设想一个民族，把它分成两个隔开的国家。确保这两个国家实行对立的哲学和社会组织形式。努力确保这个民族的居民被一再告知，这个实验将是永久性的。在两个国家之间竖立一道墙，尽可能防止他们之间

有任何交流。45年后，移除这道墙。告诉人们实验结束，因而他们又成为一个单一民族。他们还会是一个民族吗？

设计这样一个实验是想回答，是民族塑造国家，还是国家塑造民族？这问题类似于环境和遗传在个人塑造中的相对重要性。应当有可能询问接受实验的人们——就像问出生时就被分开的双胞胎一样——他们是否还能相互认得兄弟？他们应当能够告诉你答案。实验应当得出结论。



原东西德区域示意图

1989年11月，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正在澳大利亚荒漠中一个叫火鸡溪（Turkey Creek）的地方，消息传来，说柏林

墙倒了。一开始他不相信这个消息，随之感到很焦虑，是坦克推倒的吗？他觉得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必须得到一些这事确实发生了的证据。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必须看到照片。

火鸡溪的飞行医生正好有一台传真机，文德斯让柏林的一个朋友把所有在报纸上能够剪下来的照片都发给他。很快，照片开始在传真机上滚印出来，卷曲在电影导演的手里。在如此遥远的澳大利亚腹地，这些照片显得更有意义。它们使他想起了自己一个月前刚刚去世的父亲错失了这样一个似乎让德国两代人和解的时刻。电影导演记得，他落泪了，长久以来未曾有过的。他记得自己当时想：“出错的世界修补（put together）好了，出错的我的内心修补好了。”

所有这些站在墙头的人流泪的面容。它们如此令人难忘。它们似乎比我们的脸更为真实，它们看上去就像40年代或者50年代电影里的脸庞。为什么更为真实？我真的不知道。苦难让人们变得真实。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经历了我们未曾经历的，是这让他们更为真实。

——沃尔克·施隆多夫（Volker Schlöndorff），德国电影导演，1989年

我的成长过程中曾为德国感到羞耻。但这是一个我感觉到可能有些不一样的时刻。简单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德国人为了自由和解放承担某种风险的时候并不多见。

——彼得·施耐德（Peter Schneider），德国作家，1989年

在“冷战”的所有年月里，在其后所有充斥犬儒和苦涩的年月里，只有一个毫无顾忌的欢乐之夜：柏林墙倒下来的时候。人们穿梭往来，不敢相信这一切，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却又发现不是在做梦。在欧洲战后的整个历史上，只有这样一个纯粹欢乐的夜晚。

自那之后，一切都未能如我们所愿，我们开始重写自己的情感历史。我们几乎忘却了那个夜晚，如果它还能重新回到记忆中，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会用甚至只有一个夜晚的幻象来款待自己。为什么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拥有一丝希望？我们是多么愚蠢。

相册

1989年的德国革命以莱比锡（Leipzig）为中心，这个城市有200万人口，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DDR）东南角的萨克森州。那里举行了规模最大的反旧政权游行。游行静默而有序，在晚上开始，每个人都结束工作之后。成千上万的人集合起来，占领了整条整条的街道，向卡尔·马克思广场和歌剧院前进。一开始，在1989年9月末的时候，标语牌上只是要求“媒体自由”和“签证自由”。也有些胆小的标牌上写着“戈比[注]帮助我们”。

9月末，当局用高压水龙、大规模军警队伍、盾牌、警棍和警犬对付游行。游行者被抓起来，双手扭曲着反绑在身后，扔进人民警察（Volks Polizei）卡车的后车厢里。但游行继续，口号开始逐渐超出圣尼古拉教堂[注]的路德派秘密反抗中形成的谨慎要求。到1989年10月中旬，横幅上面写着“我们要改革！”“我们就是人民！”。

由于当局维系生存是通过让人们相信他们是孤立的，这些游行成为集体之自我发现的一种演习。一夜又一夜，人群聚集起来，人们四处张望，看从街道的一边延伸到另一边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人，他们尽可能远地向后、向前看。最后会有领导人准备冒点险：莱比锡歌剧院的导演、一些路德派的牧师、当地表演卡巴莱[注]的喜剧演员。其他城市仿效莱比锡的例子，市民们来到大街上。旧政权哄骗、引诱、咆哮、威吓，但一切似乎都不再管用。服从和逆来顺受神秘地消失了。当局在电视上呼吁保持秩序之后，更多的标语牌出现在人群中，写着“不要演讲！”“不要唧唧哇哇！”“不要粉饰太平！”“该动手术了！”。

10月下着雨，但人们继续在伞下游行。他们举行守夜，要求改革，

把数千支蜡烛放置在教堂的墙上，蜡滴下来汇聚在一起，融入人行道上半透明的池子里。同时，摄影师们注意到警察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变化。他们在巡逻车前面摆出各种姿势拍照，警棍放入腰带里，而且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越来越不清楚是谁在负责。在莱比锡周围的学校，老师告诉学生不要去参加游行，当学生不管不顾去参加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的老师与他们并肩游行。第二天早晨，他们会在课堂上互相挤挤眼。

到10月末，卡尔·马克思广场上的标语牌写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属于人民，不属于党。”然后，当柏林墙在11月9日倒下，示威者们极为惊奇地发现，他们带来了一场革命，没有牺牲一条性命。这场革命的象征非常恰如其分，是我们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人群中也见到的怪异旗帜：锤子和镰刀被剪掉的那个旗帜，就像人们在床单上剪出两个眼洞，给孩子们做一件鬼怪服。

一个国旗上有洞的国家，是一个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的国家。一些人挥舞这个旗帜，真的希望仍然保留红色，其他人仅仅是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旗帜可以挥舞。但有一些人开始挥舞另一个德国的旗帜，柏林墙对面的旗帜。

柏林墙倒掉一个月后，在卡尔·马克思广场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标语，首先是在一个潦草手写的牌子上，然后几十个牌子，然后上千个牌子：“Deutschland，einig Vaterlan.”（德意志，一个祖国。）在六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就是人民！”的呼喊变成了圣歌“我们是一个民族！”。

德意志，一个祖国。现在看，这个标语确实神秘。一个祖国。这到底意味什么？它是一个事实的宣告吗？一种愿望的表达吗？还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在莱比锡老市政厅下面的拱廊，有一个商店，你可以在那里买到一个相册，它记录了从1989年9月到12月那段时间的几乎每一天。在相册中，最令人难忘的面庞是那些在人群中盯着摄像机看的人们。在每一张

照片中，他们的面庞都恐惧而紧张。恐惧使他们的微笑半途凝结，让他们说出的话停留在嘴边，令他们的反抗姿态折断双翼。

恐惧不仅是担忧被捕，不仅是怀疑摄影师正在为警察工作。它是历史性的恐惧，是人们也许曾经在1848年的欧洲兵营中看到的那种恐惧，是一个民族将要抬脚步入未知并且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焦虑。如果所有的革命开始于迈入未知的那神秘一步，你在这些面庞上看到的恐惧会让人奇怪，他们如何敢于迈出那第一步。然而，当你翻动相册，当游行进入第二周、第三周、第四周，你可以看到这种恐惧开始慢慢消失。面庞开始放松，姿态带着轻蔑，笑声变得洪亮。到11月，人们不再担心他们将走向何方。现在他们开始相信历史正与他们一起前进。成千上万莱比锡的人涌上大街，进入卡尔·马克思广场，对着摄像机欢笑挥手。

---

1. 戈比（Gorbi），对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昵称，他在两德统一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 圣尼古拉教堂（Nikolaikirche），莱比锡最著名的教堂，建于1165年，属于路德派教会。1989年，其每周一礼拜仪式后举行的和平游行最终导致两德统一。
3. 卡巴莱（cabaret）是一种流行于欧洲，集喜剧、歌曲、跳舞及话剧等元素于一体的娱乐表演式样，兴起于19世纪末的法国，后传入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度。

卡尔·马克思广场

一辆电车把我放在卡尔·马克思广场。道路清扫车在排水沟上扫过。雨水抽打在空荡荡的喷泉里的青铜马雕像上。我周围只有空无一人的、雨水扫过的人行道。在关于这个广场的旧纪录片中，这儿有更多的喷泉，有煤气灯和一个巨大的带有科林斯式柱廊的歌剧院，柱廊下面可以停靠四轮马车。在纪录片中，戴呢帽、腋下夹着报纸的人们正是在我站的这个电车站上上下下，有一个小姑娘卖紫罗兰，有一个手风琴演奏师，一个大胡子的乞丐向路人伸手乞讨，一个男人站在手推车后面，拿着报纸折成的装满了葵花子的圆筒。你几乎可以听到女人们的长裙拖曳在人行道上发出的沙沙声。那是1913年4月。

莱比锡的书店出售一本书，是莱比锡人在元年——1945年——的照片。盟军已轰炸了整个城市，数英亩的碎石堆在卡尔·马克思广场的每一个角落。照片上，清理广场残渣的“碎石女人”在工作间隙凝视着你，她们把砖块整齐地堆成一排排。她们的围裙是破旧的，头发上有厚厚的灰尘，穿着工作裤和工作靴。她们的耳朵后面夹着烟卷，粗糙的手紧握砖块和锤子。她们凝视着未来，仿佛可以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也许就是在那个时刻——在刚刚开始的零年，工人国家真的像是一个美好的梦想。

现在来看，似乎令人难以相信这儿一度有过梦想，每一个人都一度相信过它。早在1953年，工人国家就派出坦克对付柏林的工人。即使在那个时候，这个国家实际上什么样子，也是显而易见的。但碎石女人和退伍老兵想要信仰点什么，即使他们的领导人不相信，他们仍坚持到底，因为要轻易地怀疑你的整个一生都是在虚无中度过，太过痛苦，太过荒谬。

不相信的人和醒悟过来的人离开这里，去往西方，他们的离去留下的只有沉默，没有回响。大部分留下的人不抱有幻想，他们安慰自己，如果民主德国情况糟糕，波兰会更糟糕，匈牙利会更糟糕，俄国将无比糟糕。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负面比较带来的安慰。

在60年代，民主德国当局重建了广场，用的是粗野的混凝土，非常符合他们的政治风格。它炸毁了广场一角有300年历史的巴洛克式教堂，在废墟上建造了一座30层楼的钢铁摩天大楼。

卡尔·马克思广场仍然作为一个已消失政权心脏地带的公共荒漠保存下来。它是对民主德国加之于公共空间的恐惧和人类自发性的纪念碑：卖香肠的小贩、兜售小册子的人、艺术家、妓女、反叛少年，如果给予半点机会，他们就可能把它推翻。但人们确实在这个荒漠上献出生命。对于未完成的愿望，他们的效率很高：只要扼杀它们即可。在广场一端的现代音乐厅有很好的音乐会，在歌剧院里有相当好的演出，你可以告诉自己，你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不管它的心脏如何冷酷，它确曾鼓舞了某种道德和美学的严肃性。

时间的冰河作用缓慢地创造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当然，有柏林墙，你可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西德的图片。但是到80年代末，如果你还没有离开，你已经把你的孪生兄弟和姐妹的记忆从你的脑海中驱赶出去了。

一种必要的巨型架构——帝国式地划分欧洲——使这种遗忘相当容易。德国的分裂看上去将会永远持续。事实上，在墙的两边有两代人成长起来，他们真的担忧，如果被许可统一，他们的民族将会如何。一个统一德国的梦想不只是被抛弃了，它还受到双方所追求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注]的正式谴责。

所以，当帝国必需的伟大架构开始在他们的头顶颤抖、摇晃，当莱比锡的人们占领街头，他们从未有一刻会想到，他们将最终打倒一个国

家，并且带来一个民族的统一。他们从未想到，如果他们全都一起挤靠被锁上的门，它也许会突然打开，让他们滚入一个陌生的新世界。

1989年之后，卡尔·马克思广场恢复了1914年之前的旧名——奥古斯都广场。梅赛德斯—奔驰冷蓝色的霓虹灯光环飘浮在对面的保险大厦上。甚至有些方案想炸毁这个大楼，按照老照片和平面图纸，用石头一块一块重砌已消失的巴洛克式教堂。但某种不怀好意的幽灵继续使这些方案受到轻视。老莱比锡的其他每个地方都被扔到建筑商的手里，而卡尔·马克思广场仍然顽固地保持不变。在改造这个荒漠的任务面前，历史记忆仿佛退缩了。在通往大学建筑[注]的入口处，一群热烈工人的浮雕中间，卡尔·马克思乱蓬蓬犹如牛头一般的巨大青铜头像继续俯视着广场。某种程度上他仍是这个风掠之地的天才领袖。当游行者们用歌唱和横幅占领这里的时候，他收缩了自己的权威。现在这里又变成了荒漠，好像他的灵魂又收回了这个地方。

---

1. 东方政策，西德前总理维利·勃兰特在60年代提出的对东欧保持正常关系的政策。
2. 指位于广场一侧的莱比锡大学，成立于1409年，仅次于海德堡大学，为德国第二历史悠久的大学。

卡巴莱

“它是伟大的。它是一场革命。有一个月的时间，革命是掌握在莱比锡人的手里。然后它结束了。而现在，制造革命的人民不拥有任何权力。但他们仍旧在那儿：商店售货员、图书馆员、教授。他们仍旧想要我所信仰的东西，”博恩克先生停顿了一下，看上去有点尴尬，厚实的手擦了擦前额，又往下捋了捋下垂的胡子，“谈到你信仰的东西，现在有点令人悲哀。但我说的是一个为了人民的德意志。”

从卡尔·马克思广场出发，沿着一条狭窄的鹅卵石街道，在一个卡巴莱地下室里的酒吧，我找到了冈瑟·博恩克（Gunther Böhnke），他在酒吧后部的一个圆桌喝啤酒。博恩克先生是“学院派”（Academixer）卡巴莱[注]的明星，他跟我讲“冷战”时代东欧地区有板有眼、精确的英语，那种还没有受过本土接触影响的英语，那是完全从磁带里学的语言。白天，他在一家出版公司翻译儿童书籍。晚上，他是一位卡巴莱艺术家。过去，卡巴莱艺术家是威权国家持有执照的小丑。在15米深的地下，在小小的舞台上、褪色的灰丝绒幕布之前，卡巴莱是窃窃私语的地方，是不可说的东西可以说出来的地方。过去，剧院的票会提前10年卖光。一个卡巴莱艺术家可以把他自己分到的票当成钱用：有多少座位，从屠夫手里就可以换多少香肠。现在，票价太贵，当地人承受不起，座位都是被成群的西德人占据，他们来到这里，为那些嘲笑他们自己的笑话发出不自然的笑声。博恩克先生赋予“东德佬”（Ossi）以人性和讽刺性。他个子矮小，秃头，穿一件不合身的花呢夹克，系一条超大的东方式领带（East-bloc tie）。他的肚子凸起，将衬衫纽扣绷得紧紧的，忧郁的脸上交织着顺从和精明。

在舞台上，他的固定套路是关于一个贫穷、呆傻的东德人寻找工

作，一个西德的人事主管面试他。东德佬随口说他从未入过党，认为这是对方想要的，却只听到西德佬回复："你有什么毛病吗？你的积极性在哪里？"他所有的笑话都像这样，辛酸地反映一种本不应存在的分歧：一个人民，一个语言，一个民族，然而经历了45年的不同的国度之后，几乎无法认识彼此。

"他们都是好人，"莱比锡最古老餐馆的西德新店主在晚餐结束、卡巴莱开始之前对我说，"好人。只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工作。我跟你发誓。我必须一切从头开始。教他们准时现身，正确地处理客人的账单，让他们的手不要伸进汤里。我不是在做饭店生意，我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他谈到他的德国同胞时带有的那种深情的傲慢，与英国殖民管理者在谈及坦噶尼喀人（Tanganyikans）时惯于使用的语气如出一辙。

统一不是失散的双胞胎在郊区草坪上惴惴不安的重逢，而是一种殖民占领。当你在莱比锡醒来，听到的声音是老建筑的内脏——机床、石膏、钉子、窗框、木板——被扔进长长的、带回响的塑料斜槽，滚进建筑商的废料桶的声音。建筑物的正面被保留下来——必须能把贝纳通的牌子钉在上面——但城市的内脏已经被去除了。

博恩克先生认为，当一个社会体制崩溃时，我们只能预计到，那些主要是体制受害者的人们会为体制的失败而受到谴责。世界就是这样，事实上拖垮了政权的人们，现在被当作爱发牢骚的乞丐给打发走，是被那些曾经坐在电视机前面为他们的公民勇气鼓掌的西德人打发了。

正如德国作家彼得·施耐德所说，柏林墙是面镜子。西德人问道：镜子，墙上的镜子，谁是所有人里最公正的？镜子一成不变地回答：是你。45年的时间，一个民族分裂成两个国家，双方都必须塑造对方的负面形象。为什么只因墙倒了，这种行为就应该结束呢？为什么只因每个人现在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这种行为就应该结束呢？

但是，在这个镜子的游戏中，有什么东西已经发生了改变。革命之

前，在西德，负面形象是民主德国这个国家自身和其令人憎恶的制度。现在负面形象是民族，是人民自身：他们的抱怨和消极。现在那个国家已经消失，人民自身——那个民族——为国家的曾经存在受到责备。

说来奇怪，这种责备经常来自东德一方。前东德人通过表达自己对从前的兄弟姐妹的憎恶而在西德混得好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前民主德国小说家莫妮卡·马龙（Monica Maron）说："我最不喜欢我的前东德同胞公民的地方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亏欠他们，尤其是亏欠他们尊严。他们似乎忘了，直到三年前，他们还没有真正摸到那种尊严。"东德精神病学家汉斯·约阿希姆·马茨（Hans Joachim Maatz）写了一本书，告诉西德公众，45年的极权主义制造了一种东德的人格结构，特征为"情感被压抑、无安全感、潜在进攻性"。他接着说：

在那个社会中，一个人的基本人权——保持自己、有自己意见、作为个体被理解和接受——毫无保障……在这个体制中能够安全生存的，只有那些调整和牺牲他们的自发活力、他们的诚实、他们的批判能力，过一种迟钝但是相对远离危险的顺从生活的人。

像所有陈腐的心理学形式一样，这对某些人是正确的。那么，那些不安的、神经质的、顺从的个体——像博恩克先生那样的人——是如何找到拖垮整个政权的勇气呢？东德的负面形象当然迎合了西德人的自恋情结，但它使统一的历史变得难以理解。

博恩克先生对于1989年以来国家命运的悲喜剧淡然处之："墙倒了以后，我们的人民去西德，他们带回来难以置信的故事。在那里，你可以在1月买到新鲜的莴苣和西红柿。你能想象吗？现在这里也有超市了，我们也能做到了。只是我们买不起，而且房租已经涨了五倍。"

他耸耸肩，笑了："当我们10月在莱比锡的雨中游行时，我们想要的只是多一点民主，多一点尊重。没人想要统一。"

统一了。

也没人想要卡巴莱消亡，但现在，博恩克先生说，你可以在德国电视上看到一切。那儿的讽刺更为尖锐，时效更为迅速。现在谁还想看卡巴莱呢？博恩克先生曾将他的演出带到西德，但效果并不好。太本地化，太萨克森化，太乡土了。他并不想回到旧时代，但环顾酒吧——他度过一生中最好时光的地方——烟熏过的黑色墙壁，看到从前演出的海报，看到桌子上方的吊灯（老斯塔西过去经常在那儿藏麦克风："鲍里斯，你听得到吗？我的声音够大吗？"），很显然，藏有异议文化的玻璃罐——让他从前的生活产生意义，让他从前可以用卡巴莱票子从屠夫那儿换香肠——所有这一切也被"统一"掉了。

20世纪80年代，事情通常发生在"学院派"。现在，到了90年代，场所转到了U-2，这是附近一座灰色石板办公楼地下室里的迪斯科舞厅。它的音乐来自慕尼黑，啤酒来自慕尼黑，迪斯科DJ来自慕尼黑，弹子机和干冰也是来自慕尼黑。那个地方天花板很低，墙壁随着声音震动，节奏透过脚底传上来，你发现自己陷入一种麻木状态。女孩子们在大喇叭上面跳独舞：甩动、摇摆、推伸、甩动、摇摆、推伸，她们闭着眼睛，在声音的洞穴中独自舞动。男孩子徘徊在弹球机之间，从一个电子游戏逛到另一个电子游戏，眼睛瞅着女孩子们。世界任何地方都有这样的迪斯科舞厅，但这个低矮的地下室过去是秘密警察的审讯室。每个人都知道此事，它不是十分秘密的事。吧台后的女孩子们会讲给你听，甚至指给你看，墙上有原来的囚犯画的壁画。三年前，这个组合难以抗拒：斯塔西的虐待狂魅力遇上慕尼黑迪斯科舞厅的色情狂魅力。引入U-2是以一笔代价打开了两个被禁闭的世界。但被禁的魅力已经完全消失，现在这里就是一个迪斯科舞厅，跟其他的地方没什么两样。酒吧的女孩在我的耳边喊："一切都很酷。"节拍震撼地板，频闪灯将她干净白皙的脸庞变成了一张蝴蝶面具，舞动着，飘浮在空中。

在整个民主德国，斯塔西拥有50万情报人员。从前，放置在像这样的建筑里的档案纸张数以亿计：咖啡馆里的窃窃私语的批评，公共汽车上的道听途说，断章取义的同事言论——这是一个索引细致、收录全社会的恶意和抱怨的图书馆。但单个人能怎么样呢？如果他们不提供恶毒的流言蜚语，会让自己身陷囹圄。告密的圈子变得如此宽泛，以至于任何人能够重新找回公民的勇气都是个奇迹。但确实有些人做到了。那些没有做到的人，现在总是用他们的手做着令人厌倦、自我辩护的同样手势："那是我的世界。那是我知道的一切。"

什么能让人真正明白一个审讯中心变成迪斯科舞厅的事实呢？这儿是不是应该搞个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取而代之？音乐的声音如此喧闹，折磨着你已到中年的内心，充塞着内心每一个空虚的地方：

感觉节拍加速

那是激情之声

你可觉得，它弥漫空中？

放空思绪，加入我们

哦，哦，激情，哦，哦，激情你可觉得，它无处不在？

"与过去妥协"并不意味着对过去的严肃的解决，不是通过一种清晰的、有意识的行动来打破魔咒。毋宁说，它希望翻过这一页，并且，如果可能，从记忆中将其清除。

——T.阿多诺（T.Adorno），《与过去妥协意味着什么？》（1959）

问问你自己，那吧台里正调制鸡尾酒的女孩，或那头发锃亮、穿着贝纳通"世界之色彩"T恤的男孩，他们是否应当了解人们曾经在这里被

殴打、被审讯的事实呢？摆出一副庄严的脸色吗？难道与强烈地渴望忘记所有过去相比，庄严是更为真实的“与过去妥协”？我不能问酒吧里坐我旁边的小两口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脸在频闪灯下犹如一对舞动的唱盘。怎么能期望他们了解我说的东西呢？昂纳克[注]对他们而言已经是久远的历史。当他的政权倒台时，这男孩和女孩13岁，也许更年轻。“那不是我的问题，”我会听到他们说，“那不是我的过去。”

---

1. 学院派俱乐部（Academixer Club），莱比锡一家历史悠久的餐馆和卡巴莱表演场所。
2. 斯塔西（Stasi），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
3. 原文为德文，Alles ist cool。
4. 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1912—1994），前民主德国党和国家领导人。

民族会战的记忆

它像一个巨大的、用烟熏成黑色的花岗岩搭成的条顿式（Teutonic）火葬堆，切割粗糙的石头向天空兀立，它们似乎要把某个强健武士的身躯奉献给火焰，只是在这个纪念碑的最高处、应该放棺木的平台上，什么都没有，没有身躯要奉献给天空，只可以从这儿纵览城市的全景，城市则围绕它而发展成长。它如此巨大，超过欧洲所有其他战争纪念物：一座怒目而视的威廉家族[注]石堆，孑然独立，像家族里最执拗的成员站在莱比锡郊外的一个公园里。就其恶劣的好战趣味，以及僵硬、粗野的纪念碑样式而言，它完全是一种尴尬。雨水如丝，落在它厚重的表面，它似乎在嘲笑：来吧，试试将我焚毁，你会失败的。我太大了，我在这里太久了，我比你们都要长命。

德国从1871年统一后不久，开始纪念1813年的民族会战，当时，100万来自俄罗斯、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和波兰的士兵激战一天，决定了欧洲的命运。拿破仑在那一天最终战败，标志着他的帝国开始没落。那是第一次，来自德意志各公国的人们站在一起作为德意志人而战斗，即使部分德意志人也站在拿破仑一方作战，这个战场仍被宣称为德意志民族的诞生地之一。这个纪念碑正是为此而建，1913年会战100周年纪念典礼上，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为它的落成揭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检阅台旗帜飘扬，帝国羽饰犹如丛林，胸甲闪闪发亮，紧绷的绑腿掖在长筒骑兵靴里，刀剑在腰间叮当作响，冷酷的帝国面庞，脚跟咔嚓并拢致敬，戴头盔的人们互相轻轻点头致意——这些牵线木偶们明白自己处于荣耀的顶峰，那在他们头顶矗立的巨大石堆所象征的荣耀。

装饰纪念碑的雕塑家选择向威廉家族献媚，将他们刻画成条顿武士。在纪念碑底座的雕塑饰带上，有这样一个大师形象，是画成德意志武士的圣米迦勒[注]，头盔环绕面颊，眼睛凝望德意志早已确定的伟大未来。环绕他周围扭动着自然世界的象征：狮子、老虎、龙，全都听从他的意志，还有一条长长的斑点蛇，嘶嘶着、微笑着。这些动物充满了矛盾：它们是内心的恶魔，还是邪恶的力量？似乎都有，因为他的目光既犹疑又果决，既痛苦不堪又坚定不移。在圣米迦勒的左边，有一对挤眉弄眼的死神头颅，像斜眼的猴子一样在嘲笑他庄严的目光。

20世纪30年代有一幅著名的海报，元首装扮成一个日耳曼武士，穿着闪亮的胸甲，佩剑，戴头盔，跨骑在马上，高高举起一面血红的旗帜。我一直认为希特勒和戈培尔（Goebbels）在运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人物和形象中，显示了某种创造性。事实上，我还一直认为，这种艺术的创造性——施佩尔[注]呈现在他的纪念性建筑物中，里芬斯塔尔[注]呈现在她的影片里——有助于解释纳粹在人们心中激发的极端狂热。除了敬畏和恐惧，还有身处全新呈现方式的战栗。

但作为政治艺术家，他们的创造比我曾认为的少。纳粹吸引力的全部色情用品都已经在这儿了，在莱比锡的这个纪念碑：同样的头盔、同样的蛇、同样的条顿式激情、同样滑稽的男性阳刚崇拜，同样对本性充满色情的迷惑：它是创造生命的力量，还是淫荡的怨恨？全都在这儿了。希特勒不是政治艺术家，只是一个熟练的低俗品位鉴赏家。

没有不媚俗的民族主义艺术，没有不扮演真挚情感的爱国主义创造。为什么？也许一切非个人化的艺术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真诚，而民族主义艺术从定义上就不可能是个人化的。也可能，民族主义艺术不可能创新。它固着于可资利用的传统，或者，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则固着于媚俗，在这里是条顿骑士的日耳曼黑森林。

希特勒对日耳曼历史的拿来主义，只限于利用19世纪中期一种庞

杂、狂热的伪善情绪。因此，如阿多诺[注]提出的，原装货和抄袭货都意味着一种连自己也不能完全相信的民族主义形式。这个纪念碑的峭拔巨大是一种怀疑的自白，希特勒的模仿也是。为了让人信服，两者都必须威吓。

这种对媚俗图腾过于夸大的模仿并没有跟着希特勒一起终结。身着领巾和皮短裤的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曾手持火炬向纪念碑进军，并以向德意志帝国（Reich）致敬的仪式作为结束。在图片中，你可以看到火炬在观赏湖面上闪闪发光，烟雾升腾在火红的天空。民主德国坚持它已经和法西斯及资本主义的类似过往彻底决裂。然而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的领巾和短裤叙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而被称为“青年奉献”的青年成年礼——许多声音高呼对新国家的忠诚——甚至复制了旧有的瓦格纳火炬仪式，天空中火红的烟雾怪诞地映照在观赏池中。

“但你还期望其他什么呢？”赫尔穆特·博尔纳（Helmut Börner）说，他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做了个表明自己既绝望又生气的手势。“这是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博尔纳先生是纪念碑隔壁博物馆的馆长。他会觉得民主德国复制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巾奇怪吗？他说不，是我搞错了：“我那个时代，在先锋队的时候，我戴的是蓝色的领巾。我父亲那个时候是黑色的领巾。”

我说：“但是它们还是同样的领巾。”

“啊。”博尔纳先生说着，从我身边溜到玻璃柜后面，那里面有法国胸甲骑兵的制服、一些大炮用的霰弹、老式的火枪和一面鼓。“这是旧瓶装新酒。旧瓶子还很完美。我的父母没有将它们丢掉，他们只是把白酒换成了红酒，”他就此想了一会儿，“是的，也许就是那样。”

“但是新酒不会被旧瓶污染吗？”

他透过厚厚的镜片眯眼看着，捻着自己红色的短髭，退回到博物馆更远处的另一个玻璃柜后面。然后他问我，是否曾经离开自己的家庭，尝试开始一个新的家庭生活。我说没有。“那么，如果你那样做了，你不会把旧的扔掉。你尝试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同的生活，在各个方面都比已经失败的旧婚姻强。”

他指向一个玻璃柜里的一幅小水彩画。它描绘了一群莱比锡妇女在战斗结束后帮助把伤员抬上马车的情形。“他们是法国人还是萨克森人，或是普鲁士人、瑞典人、奥地利人或俄罗斯人，完全不重要。她们一视同仁地照看他们，”他平静地说，“当然，你不能拿今天他们能得到的那种看护来比较。他们成千上万地死亡，死于伤寒、神经和伤口感染，已经开始做截肢手术，那么可怕，我们无法想象。”

如果是在1813年度过他的余生，博尔纳先生会更快乐些。那样会更简单，我会同情他。谁想要解释一个党员如何应对自己的世界的崩溃？

“我比共和国大一个月，”他用自己那种平静、沉思、间接的方式说，“我生于1949年9月，所以我在这个时期、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长大。那是我的世界。”当局让他探查遥远过去的安全性，并认为只有他的展览强调了俄罗斯和德国军队在莱比锡铸就的历史友谊。这很容易做到，因为他们曾站在同一边战斗。有一些苏式制服的展览把这一友谊呈现于现在，但制服占据了太多的空间，他在1988年得到许可，把它们处理掉了。他没有任何理由假装自己不是党的一员。他仍旧希望历史能仁慈地评判民主德国，它比在他自己周围正在形成的社会更为平等。而且民主德国生存在和平中。民主德国没有军队参与过战斗。我问，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吗，1968年？没有，没有，他坚持说，也许有后勤支持，但从未有作战部队。

他希望历史能冷静地评判民主德国。但他知道历史不会做出裁判。

根本不会有清算。要发生的已经开始，民主德国政权的每一缕踪迹都被扫进了废物桶，所以10年后新的一代将很少相信它曾经存在过。

我自己在想，应该有一个民主德国的纪念馆，摆满特拉比和沃特伯格(注)汽车、从建筑物的山墙上拆下来的锤子和镰刀、体育英雄的图片、埃里希·昂纳克的呢帽、一些斯塔西的档案、隐形麦克风、重修的审讯室、一座原始大小的度假狩猎小屋。博尔纳先生笑了。他说，博物馆永远是成功者的存档、胜利者的圣殿。但是应当有关于错误的博物馆，我说，尤其是对于摧毁生命的错误。问题是，他说，谁会想参观这样一个博物馆呢？

博尔纳先生知道，这种对民主德国的抹杀，正是德国式的。每隔50年，这个民族的过去就被重新书写，那些生活在其他状态下的生命突然被剥夺了他们所有的感觉。这伴随着博尔纳先生的父亲，纳粹时期的一个学校教师，也将伴随博尔纳先生自己。他说，只有人类如此，因为人们想要压制过去。“在私人生活中可能也是这样，什么事情错了，你非常失望，你想将它关闭，在下面画一道线，再也不想提到它。”确实非常人类化，但人们想知道，各民族是否允许它们自身像个人那样遗忘。

当对党员的清洗——像他这样的党员——波及他在博物馆角落里满是灰尘的办公室时，博尔纳先生被迫辞去工作。在新形势下，他觉得自己会活得更好，像他一直以来做的那样，通过只信任“某人最亲密圈子里的一些人，人们可以依靠这个圈子，在这里人们会感到快乐”。东德人不停地哀叹与资本主义一同到来的生活的私有化（“这些天每个人都在为他们的前门买锁”）。事实是，它只会增强在社会主义之下已经存在的生活私有化。

博尔纳先生也知道，相比发生在他父亲身上的遭遇，在他身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会温和许多。1945年，成千上万名纳粹分子受到苏联战时军事法庭审判和枪毙。他自己的父亲在一个苏联集中营待了四年，认为自

己足够幸运，得以活命。1989年革命以来，对过去的清洗没有牺牲一条性命。这很了不起，博尔纳先生说。我们德国人并不总是重复错误。

令他最困惑的是，为什么他曾让自己相信，为自己考虑的风险远远超过实际的风险？这是他最为后悔的。“我当然可以更勇敢些，因为我们当然会害怕，会有恐惧，今天的结果证明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给自己施加某种形式的自我审查，那是不必要的。”当他谈到这里时，映照在玻璃展柜——那里面有制服、火枪、救护马车、鼓和小水彩画——上的脸庞突然显得悲痛和困惑，仿佛他无意中发现了当局将他轻易握于股掌的秘密，太晚了。

他带我走出博物馆，我们站在斜对面民族会战纪念碑的阴影下面。我问他，纪念碑是否并不代表某种德意志理念。他笑了：“在民主德国，我们不谈论德意志。”德意志是被禁止的话题。身份认同是与国家、与社会主义、与对伟大苏维埃母国的友爱联系在一起的，但与德国[注]、人民、世代相传的记忆无关，这些是反动资本主义的谎言，以沉思的条顿人的圣米迦勒为代表。

然后博尔纳先生微笑起来，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说：“我很高兴民主德国没有建造自己的民族会战纪念物，从未尝试用石头建立它的德意志理念。”

“为什么没有呢？”

“你能想象一下如果有，它会是什么样子吗？”他说，突然进入一种自由思想的明亮光芒中，“它应当是一个混凝土地堡，”他再次大笑，“是的，一个混凝土地堡，那是民主德国留在身后的一切。”

---

1. 德国皇室家族。

2. 圣米迦勒（St Michael），基督教传说中的大天使，上帝身边的首席战士、天使军最高统帅。

3. 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纳粹德国的首席建筑师、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

4. 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1902—2003），纳粹德国时期电影女导演，代表作品《意志的胜利》《奥林匹亚》。

5.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6. 特拉比（Trabi）、沃特伯格（Wartburg），均为前民主德国汽车品牌。

7. 原文为德文，Deutschland。

生活于民主之下

过去，东德人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状况相对较好，给西德人提供了一个德意志自恋的机会。东德是最为成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这个事实似乎证明，德意志的美德甚至胜过计划经济之类的布尔什维克理论。换句话说，民族强于国家。

墙倒下了，西德的实业家们来了。他们参观东德的工厂，仔细察看机器，盘点工厂、建筑物、原材料，记录工人每小时的生产率，等等。他们回到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的总部，面带焦虑。东部是一片灾区。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推倒一切，从头开始。其中也包括工人。他们必须重新学习所有德国人的品质：守时、干净、实干、努力。这个故事的道德意义是什么？国家制造民族；体制可以摧毁一个民族，即使是德国人。

卡拉·辛德勒（Karla Schindler）褐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像男子一样的短发，露出时髦的环形耳环。50岁出头的她记得进入莱比锡棉纺织厂的那天：1953年9月1日。她的母亲在她之前进厂，她的女儿在她之后进厂。40年的工作，她能展示的是两张证书——社会主义管理部门的致谢，证书装饰有民主德国的锤子和镰刀标志，以及最冷冰冰的东西——科学量角器。她还有持续多年的咳嗽顽疾，这是40年来在棉花机器上工作的结果：在棉丝的阴霾里呼吸，阴霾如此浓密，有时她甚至看不到相邻的工人。

她应该痛恨这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19世纪大杂院，这儿挤满了厂房和工棚，然而她围着它忙碌，跟叉车上的男人聊天，与守夜人开玩笑，跟机房的女孩子分享秘密。“我为什么要恨这里？这曾是我的生活。现在还是。”辛德勒夫人是工厂在特罗伊汉德（Treuhand）㊟的代表，这个组织正在将东德的工业部门私有化或者关闭。西德人想关闭工厂。辛德勒夫人正奋力抢救它。“有一位犹太绅士，他的家族从前拥有这个工厂，他对它有兴趣。”她满怀希望地说着，带我进入第一车间。那是一个旧的工业地狱，里面所有的东西——墙壁、宝石蓝机器、塞满了棉花包的笼子，都覆盖着白色棉花丝。空气中是黑褐色的棉丝和灰尘悬浮物，映照在污迹斑斑的窗户中透进来的微弱光线之下。一个老人正把原棉送入一个分离器，它将原棉拉扯成纱。辛德勒夫人把手插进一个棉花包中：“从乌兹别克斯坦来的。苏联，没救了。”那就是工厂存在的秘密：从苏联帝国的亚洲地区送来廉价、低质量的棉花，勤劳的德国人将其变成廉价的棉纱，供应给克拉科夫、布达佩斯或莱比锡的贫穷家庭主妇。这无法继续下去，辛德勒夫人知道这一点。没有优质的原材料和新的机器，这个老家伙将在几个月内失业。

莱比锡纺纱厂是一座对某种劳工乌托邦、某种归属和同志友谊的纪念碑，不管社会主义有多少其他的错误，对于像辛德勒夫人一样的人们，这是真真切切的。她从未完全相信它的一切。这儿曾有一种军事体制，要求各个队伍互相竞争，以完成生产指标。在通往纺纱车间的门口，我们看到一个陈旧的牌子，写着“民族队伍之间的友谊”。当然，意思是俄罗斯和德意志民族之间的永恒的社会主义友谊。“这个怎么样？”我问她，她扬了下眉毛，似乎说，你在开玩笑吗？

纺纱车间里面，有两三个穿浅色、透光连衣裙的女孩子，透出下面白色的内衣。她们在皮带上来回拍打，将已经满了的纱锭扔进齐腰高的红色箱子里，把新的纱锭装上去，重新绕纱。辛德勒夫人凑上去听她们抱怨一种新的亚麻线给她们带来的麻烦。她不必告诉她们，她们的工作就像她们用牙齿咬断的线那样脆弱。这个古老工厂的一间间房、一层层

楼现在都关闭了，机器盖上了塑料布，地板上灰尘堆积。

在楼上的工会办公室里有散乱的盆栽植物、描绘保加利亚海滨游客欢乐的褪色海报。她告诉我，特罗伊汉德将她置于两难抉择的境地。他们告诉她会拯救这个工厂，作为交换，她必须解雇绝大多数员工。

不过，她坚持认为，情况现在正在改善。她可以挣德国马克，可以去西德旅行。“那里很迷人，”她充满渴望地说，仿佛是在谈论塔希提（Tahiti）的岛屿，“那里的空气多么清新。”

我告诉她，从与我交谈的人那里，我一直听到这个奇怪的词语。他们说，过去我们活在法西斯主义之下，然后活在共产主义之下，而现在，他们说，我们是活在民主“之下”。这不是一种怪异的谈论民主的方式么，就好像它只不过是另一个你必须服从的体制？

她微笑着耸耸肩：“从前，主任经常大肆鼓吹社会主义，这个队伍，那个队伍。现在是自由市场经济。他完全转了180度。”但她对此并不感到惊讶或者愤慨：“我们管这叫随波逐流。”

“而现在，”我说，“你正在学习自己游泳。”

“是的，现在我正在学习自己游泳，”她脸红了，“我现在在公开场合讲话。是的，我做到了。”她参加过一个关于行业未来的座谈会，“我听到我们的总理说萨克森呢如何如何，纺织行业这个、纺织行业那个，我对自己说，应当让他知道工厂里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于是在他的演讲之后的间歇，她喝了几杯白兰地，然后，会议恢复进行时，她站起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那是我第一次有足够的勇气演讲，”她看了看我，腼腆地笑了，再次耸耸肩，惊讶于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现在我在每一个地方都讲话，即使是在市集广场上。”至少，辛德勒夫人不是活在民主“之下”，而是第一次活在“其中”。

1. 即托管局。——编者注

做一个好德国人

从前，它叫季米特洛夫注学校，这儿有一座雕像，纪念这位1934年因国会纵火案而受到审判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学校操场上甚至曾经有过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季米特洛夫雕像，但已经被推倒了，这个位置上现在什么都没有。革命以后，它改名为雷克拉姆学校（Reklamschule），以在纳粹和民主德国时期都受到压制的自由思想出版社雷克拉姆（Reklam）命名。

我在地下室的学生房间里，这儿革命后刷新过，一面墙上有用英语写的涂鸦："嘿，老师！别干涉孩子们！"17岁的马丁·莫舍克（Martin Moschek）正在告诉我从前的课程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在数学课上，我们要计算这样的题：古巴被帝国主义者攻击，5个人驻扎在一个防空火箭站。我们得计算导弹的弹道抛物线，它是否能击中帝国主义者。诸如此类，"想到这里，他摇摇他的一头卷发，"那时候，我们没注意到有什么奇怪的。"

马丁的父亲是一名路德教派牧师，所以马丁的成长有一半是处于当局的意识形态玻璃罐之中，一半在其外。回头来看，他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相信他们被教授的东西，抑或是默默地在内心"移民"。对他而言，回头看确实难以相信学生们如此顺从。他高兴地笑了，用他那种平静、正式、带点学究气的方式说："学校没有学生，就不成其为学校，这一点得到更多认可了。"所以一个英国摇滚乐队的智慧被涂鸦在他身后的墙上。注

马丁有一张光滑的、天使般的脸，卷发的轮廓像是在丢勒注的画

中，他柔和、深思熟虑的说话方式带有德国路德派的深沉内敛。我问他，从前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

“我以身为民主德国的公民而自豪，我以我的祖国而自豪。我们总是把祖国和民主德国联系在一起——没有‘德意志’。”

同样的东西，博尔纳先生说得更多。对于在民主德国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德意志”是一个不可置信的幽灵，一个演讲中的形象，只在巴伐利亚啤酒馆中复仇式的怒骂中或民主德国电视台的话语中使用。无论如何，1939年的旧德意志，那个扩展到远至今天的波兰、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已经被英雄般的苏联军队所粉碎。它已经永远消失了，埋葬在盟军和苏联的联合占领之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创建一个只与社会主义自身、工人运动组织及其符号——尖锐、冷漠的科学量角器——相联系的德国。

然而，精英并没有放弃，如果将某些民族象征复活、翻新，对国家的忠诚会更为丰富。20世纪70年代，宣传部组织了对德国传统英雄谨慎、有限的运用。那个反抗德国王公的路德被允许进入万神殿，而那个为德国王公叫嚣、要镇压1525年农民暴动的路德被小心翼翼地从图景中抹去。军纪严明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注)赢得了官方的尊崇，因为当局对军纪比对社会主义更为看重。与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Husák）一样，昂纳克的德国转向民族主义，以掩盖他的政权的衰朽。

太迟了，太迟了。1989年11月，人民做出决定，是他们，而不是国家，才是真正的民族。

那么，一个17岁的东德人如何理解现在的德意志民族概念呢？马丁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静静地说：“如果现在你说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很清楚——至少对于我是这样——你是在说，你为你的国家而骄傲。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在于它并不就此止步。

它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这里有些人说统一尚未完成——波兰的东部领土和苏台德区还在等着。那像是敲响了我体内的警钟。”

他又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全都可以归结为暴力。如果一个人说他为德国自豪，不带暴力地劝说我，那还好。不幸的是，现在在德国这很少见。”

黄昏，马丁和我正穿过架在莱比锡郊区一条运河上的一座狭窄步行桥。我突然注意到在桥上有黑人从我们身边经过，北非人、巴基斯坦人、索马里人，一对一对的，手里拎着塑料购物袋，夹克的领子竖起来抵御寒冷。他们是我在莱比锡见到的第一批非白人面孔。像东欧大部分地方一样，东德是白人占绝对多数。从东德人的角度来看，在统一带来的所有惊奇中，最可让人惊讶的是种族。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国外出生。在每一个人群中，都会有一片这样面孔的海洋。在莱比锡，他们是新奇的、陌生的、异类的。他们在这座桥上，因为这是回家的路，而他们的家是一个提供庇护的旅馆，一群活动房屋，设置在细铁丝栅栏后面的砂石地上，紧邻柏林至莱比锡的高速公路。

我们用法语和一些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交谈。他们走遍了欧洲，寻找工作，他们已经申请在这里避难，正在等待处理。但这是场痛苦的等待。他们说那些活动房屋又冷又透风，晚上他们躺在铺位上，抽雪茄烟，等待纳粹分子的攻击。

马丁点头同意。他们不是在夸大其词。两个星期前光头党（the skins）第一次在桥上出现，向旅馆走去的时候，他和一个学校的朋友正在这里。他们带有刀和棒球球棒。桥的另一边，警察坐在一辆大众的巴士里面，并没有阻止他们。因此马丁和朋友试图阻止这些光头党穿过桥梁。这两个文质彬彬的少年尽了最大努力，他们没有想过带上武器，没有任何想要打架的意思，他们想，只要勇敢地站出来，他们可以把一队

光头党打发走。

马丁悲哀地笑了笑，像是在抚摸一个旧的伤疤：“我们被拳打脚踢，他们试图把我们扔到运河里去。”但警察最终跳下车子，把这些人赶跑了。马丁靠在桥栏杆上，注视着活动房屋。我问他为什么认为自己应当介入。这些人是来真的，他们带有武器，这不是少年的地盘。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他知道——因为父亲告诉过她——20年代魏玛时期，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暴力循环不断升级，直到最终完全失控。然后，他盯着坐在活动房屋开放的门口处抽烟的黑皮肤的人，“看，我只是想显示，在这里仍有一些人支持他们，”他想了想，然后说，“我想要那些光头党知道，如果他们再来袭击这些人，他们必须越过一个德国人。”

---

1.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1882—1949），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因纳粹炮制的“国会纵火案”而受到审判，后被无罪释放。其后长期领导共产国际的工作，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

2. 指上文中的涂鸦：“嘿，老师！别干涉孩子们！”此为英国著名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歌曲《墙上的另一块砖》（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中的歌词。

3. 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德国画家。

4. 指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1740—1786年在位，其间将普鲁士发展为一个强国。

利奥和里希

利奥（Leo）有一个新的伤疤，从他的前额向下穿到右颊，是几天前的夜晚在一个出租车站的打斗中留下的。他还有其他的伤疤，在发梢处和胳膊上，是他在东德的儿童之家和监狱里留下的。在一条前臂上，他有一个英语写的刺青“Skinhead”（光头党），另一条手臂上的刺青是一个铁十字架和一幅1937年的德国地图，地图向波兰扩展了一半。他的汗衫上写着“FAP”，自由工人党[注]。“他们是唯一维护工人的政党，”他说，“其他党都是狗屁。”

利奥并没有失业，如果我说新纳粹主义（neo-Nazism）是东德的失业问题催生的，他会嗤之以鼻。对于利奥而言，新纳粹主义是一种信条、一种生活方式，完全与一个稳定的工作合拍。他说，毕竟德国人最好的地方就是他们知道怎么工作。他是一个好德国人，所以为了保住在西德一家小公司做组合家具平板包装装配工的工作，他让自己的头发长成体面的平头。今天他休息，所以在利奥位于莱比锡北部劳工阶层社区的公寓里，他和同伴，一个16岁、有一双招风耳的中学生里希（Leech），正在喝“煤油”——用几品脱啤酒和樱桃酒混合而成的酒饮。

这儿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个外国作家谈论新纳粹主义——并不新鲜。我给他们提供宣传的机会，他们给我提供鲜明的、并不令人愉快的“拷贝”答案。我问他们标准性的问题，而他们报之以标准的怒斥。奥斯维辛？从未发生过，只是抹黑德国人名誉的谎言。“所有那些用毒气杀人都是屁话。从没发生过。”他们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个，但如果你相信老师告诉你的任何事情，你就是个傻瓜。关于德国，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羞耻的吗？没有。国家发动战争，国家输了战争。那又怎样？对

话结束，我得说，像他那样的人代表了正在侵蚀脆弱的德国民主之心脏的癌症。

这已经足够真实，但还有些可以说的。首先，看看里希的背带，它们装饰有英国国旗。对于像利奥和里希这样的好德国人，要承认他们有多感激英国人，多少是件尴尬事。新纳粹主义也许在英国已经式微，但光头文化（skin culture）——种族主义、发型、音乐——正席卷从旧民主德国的波兰—德国边境到法兰克福的地区。光头文化可能是英国对德国以及新欧洲所做的最为持久的贡献。

听利奥说话的时候，我试图理解，为什么他是我在莱比锡遇到的唯一对国家有强烈自豪感的人。这是他让我警惕的地方，而不是他的伤疤，不是他的铁血言论，不是他放在门边的短棍。如果你从他的视角看这个世界，他来自欧洲唯一不允许对自身有好感的国度。在民主德国，他们告诉他民族主义等于种族主义；在西德，他们说民族必须为其罪恶赎罪，而且他们开始建立一个以德国马克为基础的后民族主义身份。当国家不再以和平的方式为其自身感到自豪时，当民族自豪的宣言被迫转入地下，当爱国主义被罪恶所绑架，也许就会产生像利奥这样的人。

利奥也代表了被压迫者的回归。在西德，大多数人都接受了1945年战败之后加之于它的边界。在东德不是这样。利奥的母亲出生于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那儿曾经是德国的一个省，现在属于波兰。利奥的父亲在上西里西亚拥有一个农场，按他的话说是“一座产业”。利奥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1945年春天俄罗斯人把他们驱赶到莱比锡的时候，家人是如何被俄罗斯人俯冲轰炸，把他们赶进壕沟里逃命。我问利奥是否想回到上西里西亚参观，他说：“不做游客，绝不。必须跟德国国旗一起去。”

但科尔[注]不是签署了条约承认与波兰的边界吗？利奥轻蔑地吸了一口万宝路。没有政客能将德国人忽悠出他们的土地，他说。

如果不是成长时受到一个工人国家的谎言蒙骗，利奥本应是一个好社会主义者。他对身为工人有强烈的自豪，对于从前的日子，他最痛恨的是党的领导人把阶级团结友爱的言辞变成对自己特权令人厌恶的辩护。在昂纳克的政权之下做一个光头党，不仅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反抗标志。它也是真正的德国工人的一种战斗方式，他激动地说。

利奥确实有两年——“我被浪费的两年”——在昂纳克的监狱里度过，原因是试图逃往西方。统一之后，利奥要求作为政治犯获得赔偿。拿1万德国马克作为补偿给一个会兴奋地点燃宪法的光头党，是对德国好心的民主的又一个讽刺。但那样的姿态不可能把利奥争取过来。因为民主对他来说不是一种价值观，只是另一个政权，就像昂纳克的政权，像再之前的希特勒政权。他生活在社会主义“之下”，他将生活在民主“之下”，对哪一个他都毫无敬意。

在社会主义之下，至少有同志关系。“在共产主义之下，莱比锡可能有30到40个光头党，我们会团结在一起，如果其中有人没钱了之类的，没什么，其他人会帮助他，这样我们都有得喝。而现在，我们都在计算每一分钱。太糟糕了。”

我们说利奥是反对一个腐败的工人国家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消极、充满谎言的思想残渣，或反对新的统一带来了比以前更多的无家可归的人，这并不是为他辩护。为利奥解释不是证明他有理。只是当他从破烂公寓的窗户看出去，看着生锈的特拉比车子，看着被废弃的、毁掉的祖国，他想要把谁的脸揍扁。“家，”他痛苦地说，“这里不是家，这里只有不幸。”

如果在洛杉矶或者利物浦，他可能只不过是又一个少年匪帮的头儿。新德国的噩梦在于，它的少年匪帮谈论政治。也许让人安心的是，他们几乎没有创新，他们的用词和政治想象都有其渊源。希特勒的危险在于看上去他是全新的。这些穿着“希特勒：欧洲之旅”T恤的少年人缺乏自己的戈培尔、自己的里芬斯塔尔或施佩尔。没有扎小辫、穿双排扣

西装的中产阶级后现代绅士把自己与这些匪帮绑在一起，为他们的推广和形象而工作。没有推广、没有中产阶级虚无主义者所拿手的迷人魅力，利奥可以受到遏制。可怜的利奥，他是如此地道的工人，以至于鄙视我和所有的中产阶级绅士。如果他更圆滑些，也许会知道如何利用我。如果他更愤世嫉俗，也许会真正危险。

实际上，他已经够危险了。利奥知道，当他和里希向避难者住所投掷火把的时候，他们对德国政治的影响力比议会里的100次演讲还要大。他对这些演讲——呼吁宽容、谴责暴力、鼓吹和解——的轻蔑完全可以理解。他了解他所看到的薄弱之处。

德国民主如何对待利奥呢？除了官方的反种族主义集会、学校里的多元文化主义课程，在整个前东德地区，政府正耗资开展一项公共关系运动。其核心形象是一幅海报，上面是一片红色、金色、黑色——德国国旗颜色——的海洋，标题写着“这是包容和尊重人类尊严的色彩”。德国人的一项任务仍然是：你还得提醒人们，为自己自豪的同时不需要恨其他人。这幅海报奋力在汽车和啤酒的广告中让人们看到。抛开其表面的光彩和复杂，这幅海报意味着一种救命的呼喊。利奥怎么看呢？他轻蔑地微笑，摇了摇头。他知道海报是在说：现在，利奥正走向胜利。

---

1. 原文为德语，Frei Arbeiter Partei。

2. 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930—），1982—1998年担任统一前的西德以及统一后的德国总理。

德国民族主义历史的间歇期

种族民族主义是德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在拿破仑1792—1813年入侵德意志诸公国期间的创造。德国知识分子站出来反对法国启蒙运动将政治社会视为一个平等契约社会的观点，他们将德意志文化提高到普世文化的高度，反对冰冷的、机械的法兰西个人主义。在这过程中，诺瓦利斯[注]、席勒[注]、费希特[注]、穆勒[注]等人自觉地将自己看作民族的真正喉舌。而他们的民族主义信条倾向于捍卫已有的秩序、反对法国人，后来激发出统一和变革的激情，消解了等级制度和德意志诸公国。

对于浪漫派而言，社会权威的新的主体是“人民”，一种德意志民众的高度浪漫、抽象的形象。“人民”是法国“民族”（la nation）理念以种族为决定因素的变种。这个“人民”——简单、干净、纯粹、热忱于公有社会——是一个不快乐的知识界的快乐投影，他们寻求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拒绝的情感归属。

在法国、英国和美国，民族主义是一种现代化了的意识形态。在浪漫派看来，它变成了一种反现代化的信条，表达了他们对在法国出现的世俗民主的嫉妒和憎恨。浪漫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对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的飞跃，倾向于一种个人通过归属于“人民”的强烈体验获得内在自由的社会景象。

德国历史学的传统之一是将希特勒的恶性民族主义追溯到显然无辜的德国浪漫派情感主义，然而，我们如何从赫尔德[注]那里得出希特勒？至少是从那个给出著名评论——“因此从根本而言，所有的比较都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根源于其内在的幸福核心”——的赫尔德？希特勒扩张性、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普遍化的信条。德意志要成为所有一切

的比较标准。这恰恰是赫尔德历史化、相对化的民族意识理念所否认的。

希特勒统治下的大屠杀结果也不应让我们倒过来重写“人民”（Volkishch）民族主义的历史，把从“人民”的定义中排除犹太人视为一种始终不懈的努力。事实上，反犹主义直到1871年之后还未成为德国民族主义的中心，而它成为中心，盎格鲁—撒克逊的反犹主义（奥斯丁·张伯伦[注]）、法国的优生学和美国的新达尔文主义，与德国本土的舆论潮流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而且，犹太人只是德国民族主义可以抓过来定义他者的族群之一。法国大革命之后，是法国人；1871年之后，是斯拉夫人。

德国人始终对他们东部与斯拉夫各民族的边界高度关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德国人大规模迁移到东部临近斯拉夫人的边界，让德国人相信他们自己的种族特殊性。东部的大型德国人社区保留了他们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尽管事实上许多斯拉夫—德意志的民族同化确实发生了，但民族自我认知的决定性因素是并未发生的那种同化。东部的斯拉夫边界地带让德意志的核心地带将自己界定为一个拥有清晰的种族边界的国家，这是法国无法比拟的。

随着斯拉夫人自己从德国人那里了解了种族民族主义，轮到德国人为他们东部边界上包括波兰人、捷克人、匈牙利人的民族统一蓝图而恐惧了。只要两大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注]和哈布斯堡保持对斯拉夫新兴民族的控制，这种对东部的恐惧是可以容忍的。一旦这些帝国在1918年解体，一个新的斯拉夫帝国在列宁及其后的斯大林领导之下，在衰弱的德意志边界崛起，德国人对斯拉夫野蛮的古老恐惧复活了。这些恐惧被希特勒熟练地加以操控，他在多种族的帝国熔炉维也纳长大，早已开始讨厌其浓重的多种族性，视其为对德意志人民天然优越性的冒犯。

即使我们注意到德意志对斯拉夫千年以来的恐惧，以及他们对犹太

人根深蒂固的仇恨，但像最近一些历史学家那样，宣称“德国从德意志民族身份存在一刻起就在准备大屠杀”，不过是某种媚俗的形式。这无异于说，从现代性存在的时刻起，从有铁路和煤气炉开始，大屠杀就准备要发生。

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德意志民族的种族性定义会清除其他所有可能的竞争选择，对此如何解释。因为竞争始终存在。在1848年席卷德意志各公国的革命之后，法兰克福议会走得如此之远，其集会甚至是依据德意志公民身份，不仅仅是那些种族上的德意志人，而是“所有那些在德意志居住的人……即使按出生和语言他们并非德意志人”。战后德国转向这样的传统——即使它们已被扫地出门——试图为自己界定一个可以接受的形象。

除了明确的自由派和公民传统，还有一种也许可以称为“国家民族主义”。这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为拿破仑战败之后普鲁士的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注]，以及俾斯麦1871年达到顶点的统一计划提供了意识形态动力。与浪漫派保守的种族民族主义不同，“国家民族主义”拥有强烈的现代化冲动。它力图首先形成一个民族国家，不是通过召唤浪漫的“人民”，而是通过创造对帝国机制的集体性公民依附。希特勒魔鬼式的成就是将德意志“帝国”民族主义的（Reichsnational）和“人民”民族主义的（Volksnational）意识强行捏合到一起，形成德意志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种族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竞争来源由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作为1914年以前欧洲最强大的工人运动，它有强烈的国际主义和反民族主义意识的特征。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一直坚持——如果不算成功地——反对种族特殊主义，它的余脉仍在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延续。

一方面，工人支持的党派拒绝表达民族性的言论，认为它是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和反动的；另一方面，传统的德国保守主义未能在德

国工人中为宪法民族主义赢得支持。希特勒乘虚而入。德国左派和右派都没有能够在德国劳工阶层中为宪法、公民的民族主义赢得决定性支持，这一灾难性的失败为希特勒打开了道路，放弃它们，转向一种极其恶毒的种族民族主义。他是德国第一个将民族主义转化为流行大众运动的政客。他的仇恨政治指责战胜的协约国对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负有责任，指责犹太人的阴谋对大萧条负有责任，从而精明地将人民划入高贵的受害者之列。受到误导和挫败的人民转向希特勒，因为他的民族主义取悦他们，消除他们的不安，使他们相信其他人应为他们所受的苦难负责。民族主义提供给党的信徒一种政治麻醉剂，一种永远愤慨、欢欣、偶尔暴力的兴奋状态，使他们从正常的、沉闷的普通生活中逃离出来。

德国自由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主义都未能证明自己强大到足以阻止希特勒，但如果人们将它们排除到故事之外，德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会变成一次漫长、冷酷、毫无特征的通向希特勒的进军。而且，如果你从故事中排除德国自由派和社会民主派的传统，你就不能解释战后自由派、社会民主派意识的复兴。换句话说，你就不能解释45年来在联邦德国的民主的真正事实。这个故事的寓意是什么？德国历史不是其命运，未来不是过去的囚徒。只有民族主义者才会那样认为。

---

1.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1），原名弗里德利希·冯·哈登贝格（Friedrich von Hardenberg），诺瓦利斯为其笔名，德国诗人，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之一。
2. 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3.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德国哲学家。
4. 亚当·海因里希·穆勒（Adam Heinrich Müller，1779—1829），德国社会学家。
5. 约翰·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德国诗人、哲学家，浪漫主义先驱。
6. 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1863—1937），英国政治家，保守党人，1924—1928年担任外交大臣，因促成《洛迦诺公约》而获得1925年诺贝尔和平奖。后来奉行对德绥靖政策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是他的异母弟弟。

7. 霍亨索伦（Hohenzollern），欧洲王室家族，是普鲁士及德意志帝国的主要统治家族。
8. 施泰因—哈登贝格（Stein-Hardenberg）改革，1807年开始的普鲁士改革，涉及农业、工业、城市、行政、教育及军事等方面，由1807年担任首相的施泰因和1810年担任首相的哈登贝格所推动。改革帮助普鲁士走上现代化道路。

美杜莎餐馆和伏尔泰咖啡馆

莱比锡机场和法兰克福机场只有45分钟的飞行距离。两个城市的规模大体相当，两者都有巨大的国际贸易展会。他们互相之间犹如孪生兄弟，统一以来，法兰克福官员来到莱比锡，告诉他们如何管理城市。但即使他们是双胞胎，从他们的机场你是无法知道的。莱比锡的机场有两个登机口、三架飞机、一个酒吧、几个售票柜台、一个租车处，就这些。而在法兰克福机场，我在数到100以后忘记了登机口的数字，我没有能数清酒吧、餐厅、服装店、色情影院、报刊亭、书店、租车处的数量。它不像一个机场，而是像一个大理石和玻璃构成的市场，处于新欧洲的枢纽。巨大的飞机在出发大厅的窗户外升起，窥视着候机的旅客，犹如水族馆中的鲸鱼。你可以想象，当第一次从莱比锡来到这里、带着硬纸板箱子走下飞机时，法兰克福机场给辛德勒夫人、博尔纳先生或博恩克先生会造成何等的印象。空中小姐胳膊下夹着写字板，嗒嗒地走在大理石地板上；商人们背着西装袋匆匆经过，走向等待出租车的队列；在移动的人流中，你偶尔可以辨认出一小座静止的岛屿：一对紧紧拉着孩子的东德夫妻，他们盯牢孩子，迷茫而迟缓，无人注意。在他们周围，收银员敲击键盘、抽屉开开关关；摄像机和计算机、个人记事本和随身听在玻璃橱柜的转动平台上缓慢地旋转，诱人但是无法触及。

15年之后，是否还能分辨出东德人和西德人？是否人人都将晒得黑黑的，说同样的美式英语，穿同样皱巴巴的亚麻西服，看上去疲倦不堪，就像这些经历了一个星期的奔波、正奔向出租车站的德国商人？市场最终会将两个国家合成一个民族吗？也许会。但记忆是顽固的、难以调和的。15年后也许只有一个德国，但两个德国的记忆将在长得多的时间中存在。

法兰克福，我下榻宾馆的酒吧里有一台固定在墙上的电视机，我看到8点钟新闻。

字幕显示："三人在纵火袭击中丧生。"

"显然是来自右翼极端组织的暴力极端分子晚间杀死三人。犯罪嫌疑人放火焚烧了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摩恩市（Mölln）的两座房子，房子里住的主要是土耳其家庭。一名妇女和两个女孩死于大火中。

"在两个打给警察局的电话中，纵火犯以'嗨！希特勒'挂断电话。"

在屏幕上，我看到了茫然的消防员，他们黄色的外套被水浸湿了，眼睛被烟雾熏得通红，正撤离这座被毁坏的两层楼的砖房，带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亮的绿色棺材。

"死者中有一名10岁的女孩。母亲在摩恩已经居住了二十多年。事实上，她10岁大的孙女是在这里出生的。"

我听到科尔总理在电视上说："发生在这儿的事情只能证明其自身的野蛮，完全不能为任何人类的感性所理解。"他随后说的话有点奇怪："此刻，我也要对我们的土耳其同胞公民，包括男性和女性，表达特别的慰问，他们在我们之中已经居住了很多年。"

同胞公民。奇特的失误。每个人都知道，土耳其人可能在西德出生，一辈子在这里工作、纳税，但他们不能成为公民。

在法兰克福萨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区的美杜莎

（Medusa），土耳其乐师正在为琵琶、手鼓、竖琴、齐特琴挑选乐曲。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在跳舞，穿梭在桌子间，来往于这个位于街道之下、粉刷成白色迷宫一样的通道中，侍者们艰难地在沸腾的舞池中移动，托盘上放着啤酒、烤肉串和土耳其沙拉。

20多岁的胡赛因（Huseyn）和祖（Zu）都说一口完美的德语。还是孩子的时候，他们从土耳其来到这里。德国是他们所了解的一切。祖可以——像人们说的——“完美地冒充德国人”：她有俏皮的金发和淡色的皮肤，曾经为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工作过，说那种怪怪的美式英语，这是法兰克福的第二语言，这种英语事实上是在宣称：“我不只是德国人，还是欧洲人。”

胡赛因握着她的手，她轻抚他胡须之上的脸颊。我能感觉到他们不愿意讨论摩恩的纳粹袭击事件。他们宁愿把它抛开，这是又一个夜晚，让他们可以听齐特琴、跳舞，忘记外面大街上实际发生的事情。对于他们，实际问题不是愤怒或恐惧，尽管有很多这种东西。“当我听到科尔总理表达他的歉意时，仅此已足以令我爆发。”胡赛因咕哝着说。实际问题是他们现在归属哪里，他们是否可以归属任何地方。“我不知道去哪里，”胡赛因说，“我在这里长大，我讲德语。我爱土耳其，但那里不再是我的家园。”随后他又说：“但我始终想着回去。”他伸出手去，再次握住祖的手。

在德国，大街上他们可以在一起。由于父母不允许，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但是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叔叔有时候让他们使用他的住处过夜。胡赛因和祖羞涩地笑了。现在，如果在土耳其，祖玩着她的啤酒杯垫说：“我是不可能那样做的。对他不是问题，但对我是问题。”

即使胡赛因最终能在这里获得公民身份，他怀疑也不会有多大差异。“我应该拿护照怎么着呢？”他痛苦地说，“把它挂在我的脖子上吗？”一张护照会让人们不再叫他肮脏的土耳其人吗？一张护照会让德国工人在工厂的车间里跟他一起抽烟吗？他有一张土耳其人的面孔，一

张护照授予的正式权利不会改变德国人看到他的样子。将来，胡赛因也许会归属于德意志国家，但绝不会归属于德意志民族。

第二天早晨，法兰克福当地一所学校的操场上，下着雨。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跪在人行道上制作标语牌，牌子在雨中有点淋花了。标语牌和海报是孩子们写的，他们写的话包括“外国人是我的朋友”和“我们都是土耳其人”。大约有150名老师、父母和孩子，他们从操场出发，游行穿过社区。

我加入游行队伍，穿过郊区下雨的街道，与这些孩子们肩并肩，他们的面孔满怀希望和天真，带有高尚情感举着有雨痕的海报。我告诉自己，我们正在行动。我们不会把自己算到沉默的大多数里面去。我们不是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当然，问题并不是体面的德国人会不会站出来。在数周和数个月的时间里，数以百万人站出来游行。但这种天真的、荣耀的道德自恋形式到底意味什么？它说：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但我不对其最糟糕的行为负责。所以当我们游行时，我们将自己与摩恩、罗斯托克（Rostock）、索林根（Solingen），与一系列和那晚的火苗、火把、弹簧刀、尖叫和靴子的踩踏产生联系的城镇区别开来。

在人群中我遇到一个秃头的中年工程师，他和女儿手拉手走着。我告诉他我刚从莱比锡来。“刚从东部回来，是吗？我一个人在那里待了六个月。真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没有希望。没有人有体面的日间工作。我们不得不重新开始。他们绝望、不可救药，从不停止抱怨。”他战栗了。他说：“欢迎回家。”然后紧握住女儿的手。当然，他绝不会像如此随意地谈论他的德意志同胞一样谈论土耳其人。奇怪的人们，相互之间如此地不喜欢。

小小的游行队伍在街道上行进，沉默的旁观者从旁经过，脸上看不出他们对这些标语怎么想。我开始和一个名叫萨宾娜（Sabine）的年轻

女人交谈。她解释说她的孩子太小，现在还没有上学。那么，她为什么来参加呢？她有一张修长、黝黑的漂亮面孔，锐利的蓝眼睛，头发挽成褐色，金色的辫子垂在背后。说话的时候，她保持一种微妙的、悲痛的距离：“我不太确定，只不过是来了。只不过是没有坐在家里。”她将黑色长外套拉紧裹住肩头，打了个寒战：“现在这个社会有那么多的丑恶，那么多的仇恨。”然后，她声音里带有苦恼地说：“我没办法让我的孩子们远离这些。我想要，但是没办法。”我们沉默地走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她停下来，抹了抹头发上的雨，似乎终于找到解释自己为什么在这儿的话：“我害怕。在德国，我第一次感到害怕。”

法兰克福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于国外：南斯拉夫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希腊人、意大利人以及140个更小的民族。他们没有公民权利：不能投票或者得到公务职位，他们的地位——即使偶尔有人生于德国——一直是临时的。

在法兰克福市中心的伏尔泰咖啡馆（CaféVoltaire）的吧台，罗莎·伍尔夫（Rosa　Wolf）向我解释了这些事实。她为市政府的多元文化局工作，她不知道自己部门所做的工作能否阻止这个城市正在高涨的仇外潮流。而且，如果右翼赢得下届选举，他们可能把她的部门关闭。当地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一个政客已经写了一篇文章，将寻求庇护的人和毒品泛滥、骗取福利联系在一起。她公开要求控告他种族煽动。市长批评她破坏了作为公务人员的政治中立性。罗莎充满活力，不拘泥于教条而又坚定不移。

我们发现彼此拥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都是60年代的孩子，我们活的时间够长，足以让我们看到青年时期的偶像变成了博物馆的陈列物。伏尔泰咖啡馆曾经是法兰克福左翼反文化的中心，现在它为法兰克福出版商承办书籍首发式。从前它是策划反对美军基地的狂热游行的地方，

现在，我们身后墙上挂着罗莎·卢森堡[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印制画像，似乎是对失落幻象的暧昧、感伤的纪念。

“我们曾经想改变德国社会，”她悲伤地说，似乎知道这样的想法现在看上去有多么奇怪，“我们想要它变得不那么顺从。麻烦在于，我们成功了。”她以扭曲的细节将自己的困难和她孩子们的困难分开。从1968年过来的父母经常发现他们说过的话重新浮现，萦绕着他们。当然，在莱比锡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这个反抗顺从的事情。它只是战后德国历史的另一个部分，两个德国从未共同拥有过这一历史。

“我们公然谴责父母是法西斯。我们从家里搬出去。那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们想，不管如何，我们会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身份。”

她继续说，对顺从的反抗，是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是它导致70年代旧的青少年惩罚机制的崩溃。“所以现在，这些16岁的少年在摩恩、罗斯托克和索林根用燃烧弹袭击庇护者营地或移民之家，却得不到惩罚。他们只是嘲笑警察。”

现在，她悲哀地发现，对顺从的反抗是对德国过去的反抗，但不是真正地面对过去。“我们太乐观了。我们没有解决过去。”

我们都默默地沉思了一会儿，想着“解决”过去意味如何。弗洛伊德在哪里说过，认知和认知是不一样的。意思是：你可能在头脑中应对某件事情，而不是在你的内心、勇气中应对它。努力解决某事是治疗方法的全部：将知识从你的头脑中移动到躯体中，从意图转向行动。但没有人知道，与一个民族相应的疗法可以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一个民族如何能够努力排除一切、达到那种深刻的认知。

罗莎意识到的是重新统一标志着某种终结，而远不是一种开始，整个德国社会都还在努力就这个终结达成共识。

“每一个在战后成长的人都曾认为这种生活将会永远继续下去。你知道，那个清晰的、有组织的德国，那个相信每一样事情都可以被组织起来的德国。1989年以来，我们已经进入了真实的世界。我们经济的增长走到了终点。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我们不再感受到在我们的小花园中曾感觉到的安全。我们知道有种东西一劳永逸地结束了。”

随着某种东西的终结，过去重现，但并不像人们所预期和希望的那样。罗莎举起双手，做了个俏皮兴奋的手势。“所有这些德国人现在都说‘40年来我们不得不沉默，40年来我们不得不做出一副谦卑的样子。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说，我们是德国人’。然后他们说：‘而且，我们出生得太晚，没有任何东西要隐瞒。’”她笑了，笑他们、笑她自己曾经相信“反对顺从的反抗”将会令古老的德国永远噤声。

她突然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从不讨论民族。我们相信我们已经超越了民族。”她讽刺地指了指身后罗莎、卡尔和弗里德里希的画像。“我们曾经是国际主义者，记得吗？”

“你们也犯了一个错误，”这是指德国的邻居们，“你们禁止我们解决我们的过去、与过去妥协，像一个民族应该做的那样。”

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世界上其他地方从不允许德国人对他们应该感到自豪的东西自豪。”

“正是这样。”她说，惊讶地发现，在反对顺从的革命发生25年之后，在认为“民族”是一种对傻子和复仇主义者的归类25年后，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K先生的白马

关键的任务应当是恢复人的自信。我将这一族群界定为受伤的民族……我的感觉是，只有这个族群恢复其作为一个民族的天然自尊，才

会得到自在。当你拿走一个人的自尊时，他会深深地受到伤害，对于民族似乎亦然。

——伊丽莎白·诺艾尔—诺依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舆论研究者，德国，1992

“为什么我们是欧洲唯一不能为自己自豪的民族？”K先生痛苦地问我。这个问题在我们之间久久回荡，我已经无数次在法兰克福听到这个问题。我们是在法兰克福城外一个村子里，他的小平房在这里。他盯着我，仿佛我应该为他不被允许以德国人自豪而受到谴责。问题是，我还没说过一句话。

然后他站起来，轻快地问：“想看看我的马吗？”K先生热爱他的马，一匹白色的阿拉伯种马，他养在自己房子后面的一个小牧场，位于法兰克福以北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小村庄。他对马的热爱——浪漫、极端、纯真——正像是他对德国的爱。

他爬上他的战马光溜溜的背，告诉我他是如何读着卡尔·麦[注]关于讲德语的牛仔驰骋远方的通俗小说长大的。“我的马，”他说，“使我的梦想成真。”然后他疾驰而去。他想做一名牛仔，他想要这里变成讲德语的狂野西部。不幸的是，他已经是一个秃头的53岁的人、一个退休的监狱官员，这里是一片小小的泥泞空地，四周围着栅栏。他没有疾驰而去消失在落日之下，而是忧郁地回来跟我说话。

跟他这个年纪大多数的德国人一样，他自豪地告诉我，他属于第一代足够幸运的德国人，出生得够晚。哪里够晚？我问他。够晚，不会对任何东西有负罪感，他带着忧郁的轻笑回答。

他只记得1945年冬天燃烧在柏林的红云。俄国人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和母亲逃到法兰克福北部青山之中的这个村子。现在，在监狱里服务25年之后，他作为右翼共和党的候选人参加在黑塞举行的地方政府

选举。德国政治正在向右转，推动它转向的是像K先生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将会当选：他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能够感觉到风正转向他的方向。

“伊格纳季耶夫[注]，伊格纳季耶夫。”他沉吟地说。我们正在他村子里的一家餐馆一起喝啤酒。“那是什么样的名字？”我告诉他是什么样的名字。他继续说，无意冒犯，但斯拉夫人就是不知道如何工作。看看他们在俄罗斯造成的灾难。我反击说，是人的原因还是体制的原因呢？他回答，绝对是人的原因，如果他们拥有德国人的素质就好了。

“我们是干净的民族，一个自尊、独立的民族。”他说。他对这座郊区的木屋非常引以为豪，那是他和妻子亲手建造的。房子里的墙上挂有大量自然风景画（他说“来自我的祖先”），书柜里放着《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Encyclopedia*）[注]以及收集的席勒和歌德的作品，这是一个谦逊的布尔乔亚对某种德意志理念的纪念。

离K先生漂亮乡间别墅10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为避难者设立的帐篷城市。他开车去那里，我们站在围墙外面，看里面成排的帐篷、泥地里用木板铺成的走道，还有一对忧郁的非洲人在雨中相互给对方理发。K先生特别想让我知道，需要零花钱的德国女人来到这里做清洁工作。他说，你能想象吗？一个黑人把烟灰磕在地板上，而一个德国女人跪下来把它扫掉。不，不能再这样下去。

然后，他的温和又回来了，他的肩膀随着他奇特、阴郁的笑容而抖动。他说难民法是一种“德国自大狂的典型拼凑”。还有其他国家会梦想让自己成为全世界的福利官吗？

他极为欢迎相信德国生活方式正遭受攻击的人。他应该这样，因为他知道他的党不会输。避难的宪法权利已经被删除，共和党已经因为高调发声而获得信任，而其他党派只敢悄悄地说。

但K先生说，收紧避难程序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本。现实问题是，德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没有像是在家一样的感觉。法兰克福有30%的人口是外国人。你想我为什么要住在乡间呢。

多元文化主义是问题所在。如果我们“以此方式”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再有自己的文化。

但是你们国家里的土耳其人说德语，过德国式的生活。你们为什么不承认他们是公民呢？

“我们是德国人，他们是‘土耳其人’。”

对于K先生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而言，种族主义是过于简单的一个词。关于“他们”嗅闻的方式，或者“他们”烹饪的方式，一个种族主义者通常有某种幻觉。K先生似乎不会受任何恐惧症的折磨。种族本质主义（ethic essentialism）对于他的立场而言是一个更有想象力的词，并且可能更为准确。他相信，身为德国人界定了他可能认知、理解或同情的限度。K先生并不孤独。一整个星期里，我都遇到自由派德国人，他们不会被视作和K先生一类人一样死硬，但由于社会势利和政治信念的混杂原因，他们说着跟K先生一样的话。他们都觉得，伴随着避难危机，自由主义的德国意识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再这样下去，”他们都这样对我说，“我们最终会不知道我们是谁。”

K先生不会认可我说共和党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为暴力煽风点火，然后又极力谴责暴力。谴责电影和电视文化中的暴力，谴责我们的青年中道德价值的丧失。不要将它归责于我，或者是归责于我的历史。

为什么德国人要为这些袭击受到谴责？为什么你们不让我们与自己和平相处？K先生再次问我，似乎我是他的罪恶的来源或是他免罪的途径。

我的印象是，德国人喜欢他们自己、喜欢他们的民族是件好事，只要他们接受那个确实存在的德国，拥有1945年之后边界的德国，那个容纳数百万外国人的德国。K先生的问题不在于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是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却事实上憎恨他所居住的德国。

他想要一个德国人的德国，而现在这里已经有600万外国人。他想要的德国是遵守法律、干净、有序、女人留在家里、电视不向年轻人宣扬色情和暴力的德国。换而言之，它是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都从未存在过的德国。他继续说，它是一个安居乐业、平和自处的德国。［“你们英语怎么说的？”他搜寻着词汇，“啊，是的，安宁（serene）。”］

一个安宁的德国，是他在儿童时代从卡尔·麦的故事中听到的梦幻之地。在他的政治白日梦之中，他骑着他的白色骏马穿过德国纯净空阔的土地，那个德国即使曾经有过，现在也已不存在，并且，除非以其他民族的自由以及一些土耳其人的鲜血为代价，它无法变成现实。

---

1.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被列宁誉为“革命之鹰”。
2. 卡尔·麦（Karl May，1842—1912），德国通俗文学作家。
3. 叶礼庭的姓氏Ignatieff音译为伊格纳季耶夫。
4. 《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德国著名百科全书，前身为德国学者罗贝尔编的《妇女家庭百科词典》，1808年德国出版家布洛克豪斯将其版权买下，扩充为百科全书出版，其后持续更新版本，对后世影响巨大。

故乡

在法兰克福机场，每个晚上你都可以看到她们走下来自莫斯科的航班，迈出她们迷茫的第一步，进入这个应许之地[注]。健壮、冷漠的女人们穿着结实的冬靴，戴着花头巾，她们笑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两排黄色的牙齿；男人们戴羊皮帽，穿着冬衣，忙活他们的行李，看上去他们似乎需要一杯伏特加；脸色苍白的孩子们穿田径服和廉价的滑雪衫，不安地紧跟着妈妈。西德的商人们用肘推开他们，去往出租车站，这些家庭迈着梦游者一般不知所措的步伐，走进据说是自由的地方。

他们登上巴士，前往临时难民营，你听到他们窃窃私语，用的是俄语。但如果你靠近他们，觉得窘迫的人会陷入沉默，而机灵的人则大声告诉你："我是德国人。"[注]即使已经安全通过了护照检查，他们还是有些怀疑，你一定是个警察，会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是德国人但其实不是德国人而把他们送回飞机上去。

在众多汹涌通过欧洲各关口的移民人潮中，这些家庭是最令人困惑的。他们是从被摧毁的东方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回流的德意志族人，每年10万人。

德国是仅有的允许他们流失的族人回归的两个现代国家之一，另一个国家当然就是以色列。两个相信民族性在于血缘的民族，都慢慢发现，血缘纽带真的会变得薄弱。

"必须告诉他们要冲马桶。"在法兰克福郊区一个俄罗斯德意志人（Russian Germans）定居点，一个德国社会工作者这么告诉我。从未听说过室内厕所、淋浴或私人浴室的家庭们必须被温和地重新告知，传统

的北德意志新教徒就是干净和美德的同义词。

在定居点的餐厅，我看到一个交通警察耐心地告诉一群六七十岁的老人如何按照交通指示灯过马路。他们无动于衷地听着，仿佛还是在听党或者工厂的讲话。警察让他们站起来，练习把头转向右边，然后转向左边，然后再转到右边，以便在他们过马路的时候不会被他们富有“房东”的宝马车撞倒。

这样一个场景让你直面种族的神秘性。这些人看上去像俄罗斯人，他们的习惯和心智还是苏维埃式的。他们的祖先300年前离开德国，越过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斯拉夫边界地区，定居，殖民。异族婚姻淡化了与已消逝过去相联系的纽带。然而，如果你问他们，他们的“故乡”[注]在哪里，他们会环顾法兰克福旅馆的狭窄房间，骄傲地说：“这里。”对于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人而言，他们是回家来等死的。

“一直以来我的梦想是死在这里。”奥尔加·奥斯切斯基（Olga Oschetzki）说，她那双俄罗斯农民的大手交叠在面前的油毡桌布上。她说的德语有一种美丽的古典风味。这种德语被她的家族保存至今，就像一张古老的亚麻桌布。她很自豪从未丢下她的语言，即使斯大林在1937年枪毙了乌克兰日托米尔（Zhitomir）区所有的德语教师，并因为她与德国国防军合作，战后将她流放到西伯利亚。当我唐突地说，有人会认为她更像俄罗斯人而不是德国人，她的蓝眼睛中对我闪现出怒火。“我知道我是谁。”她说。

德意志人是那些少有的祖父母领着他们的子辈和孙辈回家的移民之一。祖父母还会说德语，但他们的孩子们已经不会说了。绝大多数德国人可能希望他们的俄罗斯兄弟留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但他们也知道，如果不让他们来，再过一代人，可能就没有德意志人能带回家了。

奥尔加和她的女儿曾梦想的故乡与她们正冒险探究的这个故乡毫不相干。她们对一切都感到惊奇，例如，商店里有20多种肥皂，车流速度

如此野蛮。最重要的是，他们惊讶于那些外国人。“我本以为我是来德国。”奥尔加的女儿说。“然而，是来了土耳其。”她皱了皱鼻子失望地说。她是用俄语说的，因为她不会说德语。

---

1. 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圣经》中上帝答应给予希伯来人的栖身之所。
2. 原文为德文，Ich Bin Deutsch。
3. 原文为德文，Heimat。

最后的思考

基于对德国种族民族主义历史的愧疚和补偿，德国宪法郑重承诺，对所有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给予庇护，只不过它发现无法依照自己的良心来信守承诺。问题不仅仅在于寻求庇护者的数量，还因为战后的自由派德国很大程度上将自己视为后民族主义的，甚至是反民族主义的国家，以致它发现自己无法清楚地定义与国际移民相关的民族利益。对于像罗莎·伍尔夫这样的德国自由派，难民危机是战后第一次让他们感觉要被迫放弃后民族主义国家的乌托邦，更加冷静地思考德国的民族利益。换句话说，即使是对自由派而言，某些民族主义的对话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不得不讨论配额、限制、遣返、对德国失业率的优先考虑。所有这些话题都非常自然，并不会因为其与右翼的关联而被视为耻辱。

然而时代对于德国右派仍然不利。德国城市中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使得把德国人视作一个单一种族的“人民”显得荒谬，而东部和西部德国人之间的差异，令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这种“人民”的身份中到底包括了什么。

抛开这些现实情况对德国身份幻想的暴力入侵，界定德国身份的法律工具仍然受到种族民族主义历史的限制。公民身份的标准仍然是基于“血统决定国籍”准则（jus sanguinis）的种族传承。由此导致在现实和种族幻想之间的矛盾，呈现出明显的错乱。对于绝大多数外部人士以及许多德国人来说，一个出生于德国、成长于德国的土耳其人不能成为德国公民，而一个来自西伯利亚、从未在这个国家居住过、没有语言竞争力的德意志族人，可以被授予公民身份，获得广泛的定居协助，这是荒谬的。

德国公民法的荒谬性，迫使保守的德国人在一个现代的多元文化世界中，面对用“人民”确定民族身份的不一致性。同时，自由派德国人发现，基于愧疚和补偿构建的一种后民族主义身份是不够的。似乎，双方都被现实的力量缓缓推动着，放弃各自的乌托邦，一边是一个德意志人的德国的乌托邦，另一边则是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德国的乌托邦。

同时，伴随着统一，德国最终从一个饥饿的民族转变为餍足的民族。它的边界安定了，它失去的族人正在归来。它现在的任务不是如一些自由派提出的从共同超越民族主义转到乏味的欧洲主义，而是从其种族民族主义的过去转向一个公民民族主义的潜在未来。换言之，这可能是永远埋葬德国“人民”理念的时刻。用现实的语言来说，这将意味着从依民族的认同转向依国家的认同，也即，从基于种族身份幻想的公民身份转向基于民主价值认同的公民身份。

这项事业的主要障碍不在少数种族自身，而是在那些梦想一个从未存在的德意志的保守派，以及那些认为爱国主义是傻瓜才相信的自由派。

结果是个僵局，一个政治和文化的虚空，那儿本应找到一个可信赖的德意志形象。在这个虚空中本应有一个民族，但现在只有一个国家，它缺乏做任何国家必须做的事情的意志，即保持对暴力手段的垄断。这个僵局每延续一天，这个国家的权威就弱化一天，而利奥、里希和他的朋友们就变得更强大。

我登上飞往伦敦的飞机，想着德国人的反讽之处，他们创造了种族民族主义的理念，实际上却一点都不喜欢他们自己。我想知道，如果德国人真正平心静气地对待自己的民族，会是怎样？爱它本来的样子，而非可能的样子？爱它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悲剧、所有的暴力？那样的民族主义会是怎样？那样的爱可能吗？

3　乌克兰



图13　1924年，施利希特尔同志在克里米亚演讲，庆祝第一个五年计划公布。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文字使用阿拉伯字母（见图片下方文字，上方为俄语），至今他们仍在争取在自己的聚居区使用双语的权利



图14　2014年3月，克里米亚宣布独立，继而宣布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米亚鞑靼人举行反抗游行，一位老人在游行中哭泣。1944年，斯大林强制驱逐所有生活在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将他们迁至中亚地区居住，苏联解体后他们才回归家乡



图15　一张明信片上显示的20世纪早期的“敖德萨阶梯”。19世纪时的敖德萨根本不是一个乌克兰人的城市，它曾是俄罗斯海军、犹太匪帮、希腊人、土耳其人、比萨拉比亚人以及罗马尼亚商人混杂的地方



图16　乌克兰独立后的首位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



图17　矿难发生后，一位乌克兰工人正在等待接送巴士。顿涅茨克，乌克兰煤炭与钢铁工业的心脏，也是矿难频发的悲剧中心



图18　2014年2月，乌克兰首都基辅，亲俄派反政府示威人群向警察投掷炸药，独立广场已成战场。乌克兰自独立以来，“民族/国族”认同问题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一直是影响国内政局的关键问题

酒瓶和香皂

从维也纳到基辅的航班上，我自己在研究一个小塑料瓶，是航空餐附带的奥地利佐餐酒的瓶子。考古学家说，你可以从最小的饰品推断整个文明的形态。我这个小酒瓶是资本主义的缩影：高效、世界化、无差别。

下面是匈牙利地毯式的平原，绵延起伏到喀尔巴阡山脉（the Carpathian），我们进入了乌克兰领空。我穿越这条边界线很多次了。我对那个资本主义的小瓶子突然发生的兴趣是一个信号：我不愿意离开身后的这个世界。

我要选择什么微不足道的象征，来代表那整个壮丽的、可怕的、梦想替代资本主义的失败尝试？

开始下降进入基辅的时候，我做出了决定，选择香皂：小小的、带有锯齿的粉红色皂条，在基辅宾馆房间的卫生间里等着我，我知道那儿必定是阴冷潮湿、恶臭难闻，用一盏40瓦的脏兮兮的灯泡照明。这种香皂似乎是用某种动物提取物制成，没有香味，也没有明显的清洁能力，同样的香皂生产了成千上万条，用于这个曾经庞大、现已崩溃的帝国，用于它的每一个宾馆，其中每一个冗长的、带有回响的走廊的每一个乏味的房间。一个文明最强烈的渴望都体现在那些小小的皂条上：要平等，要终结一个社会——有些人拥有雕花皂盒中的芬芳香皂而其他人根本没有香皂的社会；要取缔快乐，取缔慵懒地洗泡泡浴之可能性；最后，是令人困惑的低效率，这个坚硬平实的小香皂事实上根本没有清洁作用。

思考着香皂和塑料酒瓶，我走下飞机，加入穿西装、拿公文包、等待乌克兰签证的双排队伍行列。队伍中所有的人都是男性，每个人都是来出差的。他们是在东欧随处可见的后帝国时代新类型的人们，互相之间都讲一口奇怪的英语世界语，你会奇怪他们是否有自己本土的口音。在我前面的男人是一名俄罗斯移民(注)，定居在维也纳，为一家美国化学公司工作。哪家公司？道氏化学（Dow Chemical）。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名字，凝固汽油弹的制造商。我曾经坐在一所大学就业中心的台阶上，抗议道氏化学招聘像这样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的公司当销售代表。他卖什么？肥料。卖给谁？他笑了。在从前的帝国时代，他解释说，我们所有的生意都是通过莫斯科，我们只有一个买主。你跟他喝酒，跟他吃饭，最后讨价还价，得到你要的价格。现在，他又笑了，我们必须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做生意。有多得多的人需要供着。要贿赂多得多的人？我不知道。这儿你有什么小型的顾客吗？有，有些农民。一些集体农庄。他们拥有资产——我想起了在基辅南部看到的广阔平坦的黑土原野，但他们全都非常紧缺外汇。一个英国商人听到了我们的谈话，表示同意，他体格壮硕，带着七个箱子的足球装备，希望能在明晚回程航班之前卖掉。很多生意机会，前提是你要贿赂每一个遇到的人。

在整个东欧，这些人是日常奇迹的期望所在。他们是那些会提供芳香的、确实能清洁身体的香皂的人，他们是使电话能够工作、出售平底塑料小瓶酒的人。此外的每一样东西都尝试过了：带来恐惧和威胁的指令经济的兵工厂已经荒芜；社会民主太瑞典化，太遥远，不合实际。没有其他人可以依靠，除了这些带公文包的人们。



乌克兰及相邻地区示意图

每一个衣冠楚楚、发型整齐的男人穿过入境检查处，融入机场大厅里的人群，就像滴下的墨水消散在巨大的水箱中。在其后的三个星期里，我只在基辅最大的两个宾馆见过西方商人。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商人到达这里，然而这个规模相对于这个国家及其存在的问题，似乎让他们不带一丝痕迹就消失了。

我注意到，海关的申报单还是旧的苏联式表格。我申报携带了多少现金，“详细数目统统交代”，我是否携带武器、“艺术品”、书籍、药品。新的国家还没有来得及印新的表格，所以，在这同时，帝国官僚的迟钝沉闷继续折磨着人们。

越过别人的肩头偷窥，我发现甚至乌克兰人的护照也是旧的苏联式，只是在“国籍”一栏盖有一个粗糙的、写着“乌克兰”的印章。乌克兰人被告知他们将会拥有自己的护照和自己的货币。到那时，他们先使用

一种过渡性的不可兑换货币，叫做库蓬（kupon），它仍旧盯住俄罗斯卢布，并且像卢布一样，以每月大约20%的速度贬值。像东欧所有的国家一样，整个社会都疯狂地寻找可以兑换的硬通货用以避险，对抗他们自己货币的缓慢崩溃。在签证窗口，乌克兰官员尽可能快地签发签证表格，将商人们的50美元钞票塞进收银盒中。环顾我周围的一切，乌克兰独立的第一印象是萧条和衰退，破碎的玻璃窗格，灰蒙蒙的窗户，遍地都是烟蒂，低瓦数灯泡昏暗的灯光，警察穿着新的绿色制服，抽烟，摆弄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我问自己，我来这个倒霉的地方干什么？

这是在20世纪最大帝国的废墟上产生的15个国家中比较大的一个。我来这里，是为了探究拥有一个自己的国家实际有什么不同。例如，它会让普通人得到合适的香皂吗？乌克兰是20世纪欧洲创建的最大的新兴国家：拥有5200万人口，领土大小与法国等同。这个国家拥有60万人的军队，帝国兵工厂的遗产使它成为世界第三核大国；它宣称拥有以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为基地的黑海舰队的一部分，是海军力量第六大国；从顿涅茨克（Donetsk）盆地的煤和钢铁到黑土地的富饶农业，它是一个拥有巨大的自然财富的国家。

我确实有理由严肃思考乌克兰。但，说实话，我遇到了麻烦。乌克兰的独立让人想起的形象是农民的绣花衬衫、用鼻音发出的对种族手段的哭诉、戴斗篷和穿靴子的假哥萨克、卑鄙的反犹分子。

儿童时代在加拿大，我记得莫斯科大剧院在多伦多举行芭蕾演出时，流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在外面的雪地里示威。他们高呼口号：“解放被奴役的民族！”在1960年，他们看上去怪异而悲情，在雪地里呼喊，对只想来看芭蕾、让政治见鬼去的人们热情地演讲。他们看上去也狂热、非理性。难道他们没有看地图吗？他们怎么会认为乌克兰能得到解放呢？

然而这些狂热的宣传者，拒绝看地图、拒绝承认苏联的权力将永远持续的人们说对了，我们其他人错了。

报关的时候，我感觉像是在申报我到达时候的初步偏见。民族主义不就是一个取悦大众、狂热伪善情感的实践吗？在乌克兰尤其如此。几百年来，它是俄罗斯的一部分。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国家，但他们真的是一个民族吗？进入这个虚空之流的民族主义的情感主义，努力劝服乌克兰人，乌克兰民族一直存在，它已被压迫了几个世纪，最终它找到了自由，诸如此类。现实并非如此。一些乌克兰人——尤其是那些入了党的——确实走出了帝国。过去50年的大多数时候，党将这里的民族主义情感视为虚弱的、边缘化的并且容易压制的，它并没有错。开放时代，民族主义情感确实正在苏醒，在乌克兰西部，它开花结果，成为一个真正有广泛基础的民族运动。但在其他地方，在更加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东部，并没有高涨的独立要求。

紧随莫斯科1991年8月的未遂政变，当独立真的来临之时，它并没有代表多年来民族主义鼓动的最高潮（像波罗的海诸国那样）。它的发生是因为当地党的首脑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Leonid Kravchuk）看到，不用费一枪一弹，他就可以脱离帝国，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领袖。所以他仍旧主掌一套由前共产党人负责的组织机构。乌克兰也许根本不需要一个民族主义的故事，也许只是一个关于美洲豹[注]如何试图说服人民他的职位已经改变的故事。

我忧郁地做好准备，迎接我担心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居住在城市的知识分子用抒情笔调描写他们很久以前就抛在身后的农民之根；党的官员们回想起对苏联压制乌克兰事务的愤慨；狂热者们试图说服他们自己，独立将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一些老法西斯主义者告诉我，照我的名字——俄罗斯姓名对不对？——我不属于这儿。

但我确实属于这儿。我的俄罗斯祖父生命的前30年在乌克兰度过，他参加了敖德萨（Odessa）学会，在克里米亚（Crimea）度过假，后来在他父亲位于乌克兰中部的农场务农，是在一个叫作克罗波德尼斯塔（Kroupodernitsa）的小村子里。他成为地方自治组织（zemstvo）基辅

区议会的主席，后来，1905年的革命之后，他被任命为基辅区市民官。我的祖母认为，他们在基辅住宅区利普基（Lipki）一所菩提树荫下的大房子度过的岁月，是他们婚后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光。我的祖父说乌克兰语，并且直到流亡生活的最后都唱乌克兰歌曲，写给儿子信上的签名，不是用俄罗斯语的父亲，而是用乌克兰语的父亲，batko。

对我的祖父母而言，基辅不仅仅是一个俄罗斯城镇，它还是俄罗斯民族身份自身的诞生地。俄罗斯东正教开始于987年，当时基辅罗斯（Kievan Rus）的统治者皈依了基督教。现在，毋庸置疑，它是一个新的独立国家的首都。

严肃对待乌克兰给我带来的困难，远远超过我那世界主义的、对随处可见的民族主义的怀疑。在内心的什么地方，我也是乌克兰人所称的“大俄罗斯人”，存在一种旧俄罗斯人鄙视这些“小俄罗斯人”的痕迹。

---

1. 原文为法文，émigré。
2. 美洲豹，指克拉夫丘克。

美元区

克雷斯查提克（Kreschatik）是一条弧形的林荫大道，基辅人晚上在这里的树下漫步。在下面地铁站的中央广场，一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一个滑稽戏团在做即兴表演。十个醉鬼边乞讨边哭泣，三个老妇人在卖花，一个穿白色外套的女人邀请你在她的体重计上称重量，一个男人在报刊亭卖萨曼莎·福克斯(注)穿湿T恤的海报，另一个报摊在卖与从前被禁的反共游击队的历史相关的报纸。所有这些，从萨曼莎·福克斯到爵士乐队，跟独立前没什么两样。新鲜的是换外汇的人。穿皮夹克的年轻人在地铁广场里上下游荡，站在人行道上，衣服的翻领上别着仿制的小额美元纸币，或者只有个美元符号，有时候是卢布。独立后的乌克兰的另一个新特征是特警，配有左轮手枪、匕首和橡皮警棍。他们大摇大摆地上下走动，对在每一个角落里偷偷交易的换汇者视若无睹。

这就是硬通货，从总统到宾馆服务生几乎所有人都选择的金钱、都趋之若鹜的权势，是美元。

美元将社会分成两个区域：美元区、卢布或库蓬区。一个区是充足区域，有冒牌的金发女郎、食品和科技；另一个区是短缺区域，有的只是排长队、坏脾气和旧日子。美元区有硬通货商店、合资企业、宾馆酒吧、赌场和妓院。在美元区，如果你想打个电话回家，可以使用总部在达拉斯的运营商提供的美国卫星线路，即时连接，但每分钟要花费9到15美元；在库蓬区，要花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才能等到一次国际连线，通话的成本是每小时9到15美元。美元区不存在短缺。在克雷斯查提克大街上的阿波隆（Apollon）餐厅里，你身处美元区。这是一家瑞士和乌克兰的合资企业，几乎所有的东西，从冷面到啤酒，从桌布到厨房洗碗机，都是从瑞士流入进来的。除了面包和黄油外，餐馆从当地供应商那

里不买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乌克兰经理耸耸肩说：“我们有太多的问题。”你在这里吃不到一份俄罗斯菜，提供的是瑞士版的意大利面，与德国啤酒一起咽下。它是那些资本主义非人之地的小小前哨站之一，在灰色的东方自行生长。旧的党的特权区域——由国家安全部门担任警卫——现在被新的特权区域所取代，门口没有警察，但任何没有带信用卡或是装满美元的皮夹子的人都会被挡在门外。

在阿波隆，我遇到了克里斯蒂亚·弗里兰（Christia Freeland），她在基辅为英国《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写稿。她是一名乌克兰裔加拿大人，来自阿尔伯塔（Alberta）北部皮斯河（Peace River）畔的一个农场家庭。她是成千上万名第二代乌克兰裔加拿大人之一，受流亡父母的抚育成长，梦想着一个独立的乌克兰，现在她回来了，生活、工作在现实的独立之中。她说，加拿大籍乌克兰人普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乌克兰人，是真正保持信仰的，而现实中的乌克兰人则已经被共产主义体制的宿命论渗入骨髓。乌克兰裔加拿大人回到“家园”，期待一个热情、民族主义的、虔诚的人民，发现的却是冷漠、讽刺、清醒以及宿命论的苏联心灵。独立要求一种新的人类类型，然而，她说，从感情和刺激两方面的均等态势来看，这会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而且，独立对于经济毫无建树。通货膨胀火箭般攀升，生产直线下滑，真实的短缺到处都是。基辅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依靠结识乡下人来给他们供应土豆，或者是自己耕种糊口。政府不敢着手开展市场改革，理由很妙：市场自由最终也许会将他们赶走。民主更多在表面上而非实际中。总统通过发号施令来统治：从基辅食品供给到外贸政策的所有事务都由其决定。议会中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民主争论微弱无力。旧的精英依然掌权，机械地模仿民族主义的言辞，事实上死不放手，等待什么事情出现。我到这里还不到三个小时，而感觉上民族独立似乎已经成了一场灾难。

那么你会怎么做？我问她。她一口气说出一串清单：给农民土地，

激进的市场化改革，库蓬的可兑换性，然后，她不带感情地笑了："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什么，乌克兰人担心将会是已经在俄罗斯发生的：不断加剧的混乱。

没有人确切知道，如何将一个失败的指令性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市场社会。没有人轻易相信西方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的作用。我想起在离开伦敦之前，精明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注]告诉过我："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教给这些人，我们的课程完全不适用。自由市场的万能蛇油不管用。民主不是一定管用的。我们输出的东西并不必然起作用，他们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我们不是说东欧没有希望，只是那种资本主义的必胜信念——认为对我们管用的东西，也一定不可避免地对他们有用——将会发现自己的缺陷。不能用对阿波隆餐馆出口冻面团、洗碗机和餐具垫的方式，输出西方的自由市场社会。说我们住在同一个世界，可以用同一种方式解决遇到的所有问题，谬矣。也许不存在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行的、系统性的方案，但那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是这个世界的唯一选择。在我来此的第一个夜晚，我觉得他是对的。三个星期后，当我离开的时候，他似乎仍然是对的。

从阿波隆回来的路上，我在黑暗中沿着克雷斯查提克大街行走，经过弧形的四层楼公寓大厦，它是晚期斯大林风格，矗立在林荫大道的两边，取代了那些1943年的攻城战中被摧毁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粗鲁的信心，一种冷酷的、晚期斯大林主义的辉煌壮丽。每座建筑都仍然装饰有锤子和镰刀，或者伟大卫国战争战斗军团的花岗岩标准装饰。这些建筑物代表帝国的最高水准，是一种带有威胁性的建筑艺术，纯粹权力的具体体现。山墙，巨大的花岗岩呈现出它们被切割的模样，那是在宣告：看看我的作品如此强大、如此令人生畏。它们是在暗示：我们将永远在这里。实际上，帝国只持续了四十多年。

经过市政府所在地基辅苏维埃时，我注意到建筑物整个前立面的锤子镰刀和所有一切全都掉落在街上，躺在临时木栏后面的废墟当中，使

这个楼变成了一个没有前脸的建筑。

---

1. 萨曼莎·福克斯（Samantha Fox，1966—），英国摇滚女歌手。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俄裔英国人，当代著名左翼历史学家。

一种温和的民族主义

第二天，我返回基辅市政厅，会见乌克兰独立运动的沉默英雄之一——米科拉·霍贝尔（Mikola Horbal），他头脑清醒，已届中年，现在是基辅市议会的代表。

如果你是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你会因为这些天来人们的幻灭感而得到原谅。霍贝尔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关入监狱，因为他要求说自己的语言和在东仪天主教堂[注]（乌克兰西部奉行的天主教会）做礼拜的权利。现在，他有了自己的国家，管理国家的人就是当时关他入狱的人。

但米科拉·霍贝尔不这么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全日制的苏维埃教师和音乐家”。谁的音乐？他挖苦地说，“碰巧不是宣扬共产主义的”。克格勃对他的歌极为看重，判处他五年监禁，外加两年流放。他们送他去一个采石场，用风钻开凿石头，很快他的手指就付出了代价。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演奏过任何乐器。他的狱友们无法理解他，他们是冷静的物质主义者，他们问他：“你在基辅什么都有，甚至有套公寓，那么为什么你还要添乱呢？”

因为他成长在乌克兰西部一个虔诚的家族。因为否认说自己语言的权利对于他而言是一个良心问题，因为他希望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于他而言如此显然的事，对于别人却不是。“如果你不被允许说自己的语言，并且因此而受到迫害，那么你只得进监狱。”监狱塑造了他，现在这么说也许带有怀旧的事后之明。入狱之前，他从未质疑过帝国是一个各民族的大家庭的理念。他遇到了其他民族主义者，通过他们，他开始追溯乌克兰人在苏联时期的受难之路[注]：20世纪20年代

和30年代的大饥荒，摧毁了乌克兰农业的强制集体化，以及对乌克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清洗。很久以后，1990年，他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海外乌克兰人社区，回来之后，他确信不管是在苏维埃体制的牢房里，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温情、同化的自由中，乌克兰人将一直是乌克兰人。

他承认，我们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我们必须以自己的历史意识和独特性，建立一个民族国家。随后他修正了自己的说法。不是我们必须建立这个国家，它会自己建立。

霍贝尔的民族主义是最具普遍性的一种民族主义。当然，想要成为乌克兰人的俄罗斯人在这个新国家会受到欢迎。“对于我们，一个捍卫乌克兰利益的俄罗斯人比一个同样这样做的乌克兰人更为亲切，因为乌克兰人本就应该如此。”他并不恨囚禁他的俄罗斯人，因为他们也许是帝国最大的受害者。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族主义？霍贝尔否认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导致其他民族蒙受羞辱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沙文主义而已。”那么是一个爱国者？是的，爱国者。一个承认自己在看到乌克兰军队身穿军服、第一次行进在独立日阅兵式中时，为之深深触动的人。

但关押他的那些人仍旧掌握权力。“我不恨他们，仍旧掌权的人可以得到两个三明治，我只有一个，但他绝不能有三个。”是的，他说的时候带着迷人、平静的微笑：“我应该恨克拉夫丘克。”当霍贝尔入狱的时候，克拉夫丘克是党的意识形态主管，负责将像霍贝尔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定罪为思想上的法西斯分子。现在，克拉夫丘克在公开露面的时候穿上乌克兰农民的衬衫，民族主义论调成了他的母语。“我应当恨他，但我不恨。当我看到他在联合国出现、为乌克兰说话时，我为我的国家而自豪。”

---

1. 东仪天主教（Uniate），从东方古老教会中分离出来参加天主教会的教派，持守东方各派礼仪，主要分布于西亚、北非、东欧、苏联和巴尔干等地。

2. 受难之路（Via Dolorosa），基督教传说中位于耶路撒冷的耶稣受难之路，耶稣背着十字架，经过这里前往加略山（Calvary）受刑，路长约500米，共有14站。基督教有同名福音歌曲咏唱当时情景。

总统

去访问总统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在利普基林木茂盛的高地上——警卫让你在一个巨大、宽阔、铺着红色地毯的大理石楼梯下面等待。穿西装、头戴耳机的人监管着你。一切都是非常苏联化的，只有一点滑稽的、不太和谐的区别。在门口，有三个上了年纪的农妇，她们不怕穿西装的人的重兵把守，不肯退让，手里拿着文件，要求见总统，仿佛这是在中世纪，他不是一个现代有核国家的总统，而是旧时代穿着长靴长袍的好沙皇。

最后，我得到戴耳机的人的同意，走上铺着地毯的楼梯，前往总统办公室。这个地方的一切都将人带回到苏联式权力毫不掩饰的严肃气氛中，空旷的大理石走廊，长长的、消失在远处的红色地毯，向两边打开的加厚的门，连通总统办公室的安静的、华丽的房间，我将在这儿进行访谈。我还期待什么呢？是否有一种乌克兰式的权力呢？当然没有。只有苏联式的，就像对于继承了罗马帝国的高卢人（Gallic）和条顿人首领，他们可以仿效的权力典范是罗马人的胸甲、束棒和宽袍[注]。

总统是个体格结实、仪容完美无缺、头发花白的男人，将近60岁，彬彬有礼，放松，看不出紧张或不安，正是戈尔巴乔夫时代自信的苏维埃官员形象。他似乎有一种幽默感，似乎很享受权威和职位，似乎相信与外国记者打交道是件简单的事情。

他身上体现了乌克兰独立的暧昧性：出身于西部的乌克兰人，可以说流利的乌克兰语，70年代和80年代在党的等级体系内蹿升，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末期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然后，依靠良好的时机意识，运用就在几年前他抓捕的那些民族主义者的话语，宣布独立。

我请他解释，一个共产主义者如何变成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给我最迷人的微笑，那意思是说，我现在对你完全坦诚以待。“这不仅让你迷惑，也让国内外的人迷惑。但我的行为在历史上是例外吗？这有大量的例子存在：一个人生活在某种体制之下，与其互相配合，后来却转而领导反抗这个体制的叛乱。”

现在，他说他一直明白，乌克兰在苏维埃联邦结构中的正式自治是一种耻辱。他知道30年代苏维埃的集体化毁掉了乌克兰，而斯大林谋杀了乌克兰共产党之花。“我全都亲眼所见。”

我说，但许多独立的信徒都感到幻灭，那么多来自旧体制的人仍旧掌握权力。听到这里，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他不再彬彬有礼和放松了。“你被误导了。”在独立时，唯一能够了解“统治的艺术”——他是这么说的——的人，是350万共产党党员。我们将引入新人，但他们需要教育和培训。除此之外，他说，共产党人那么坏吗？有些人比所谓的民主反对派更加倾向于民主。

他向我保证，他不想要一个基于种族的乌克兰民族国家。他邀请德意志人在乌克兰定居，他要重申，1100万俄罗斯族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是有保障的。这点我相信他，原因很简单，任何其他政策都会引起内战。

但如果经济继续盘旋下行，难道不是不可避免会引起内战吗？对此他表示同意。“最重要的是避免经济危机恶化，其崩溃会引起其他领域的崩溃。”

---

1. 束棒（fasce），为古罗马执政官权力象征；宽袍（toga），为古罗马参议员席位象征。

雕像和洞穴

第二天早晨，我坐在一架苏式直升机上，俯瞰整个城市。在我下面，雄伟的第聂伯河（Dnieper River）呈现闪亮的绿色。由此往北90英里注是受到诅咒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仍旧向我下面的这条大河倾倒受过污染的水。没有什么比切尔诺贝利灾难更能加速乌克兰人对帝国的幻灭，在80年代，任何其他单个事件都不像它那样为民族主义事业赢得更多支持。

突然，另一个提醒我们苏维埃文化之恶的东西恰好在我们前方闪过，那是一个巨大的银色雕像，一个皱眉的女战士身穿金属长袍，一只有力的手将剑举在空中，另一只手握着盾牌，这是一个极为巨大的雕像，大小与自由女神像相当，用闪光的铝制成，看上去像因为战斗而满身大汗。

她是守卫基辅之门的俄罗斯母亲，面向西方，击退入侵者，是对伟大卫国战争和1943年从德国人手中夺回基辅时死亡战士的纪念碑。

这个巨大的铝制女神像不是在胜利之后马上建立的，而是在1980年，衰朽的勃列日涅夫政权试图制造爱国激情的一部分而建造的。对于这场战争的记忆超越了任何其他东西，将这个帝国团结在一起。阅兵式、分列式、演讲和苏联体制生活的各种节日，所有这一切都将战争记忆作为中心。苏联的新郎和新娘将他们的花环放在战争死难者的墓上。随着战争记忆的消退，巨大的铝制女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城市”竖立起来，目的是维持和操控大众的记忆。这种纪念碑传递的信息显而易见：党拯救了整个帝国，帝国的各民族牺牲自己，合而为一。

直升机带着我盘旋，我想着陆，然后爬到雕像顶上——就像自由女神一样——从她的眼睛中凝视世界。在她的头颅里面难道没有观察点吗？这不可能，神经紧张的神像看护人告诉我。观察塔已被迫关闭。她只不过是在1980年才正式对外开放，但建筑质量如此差劲，其结构用铁迅速锈蚀，她可能会倒塌。

她被用来象征帝国在战争时期的团结，但现在的乌克兰，战争更接近内战而不是爱国热情的一致喷涌。当德国人1941年6月涌过乌克兰的西部边界，他们得到几百万西部乌克兰人的欢迎，被视为解放者。对于他们而言，战争是一个逃离监狱的机会。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首先觉得德国人会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流亡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班德拉[注]和梅尼克[注]跟随进军的德国军队一起回来，狂热鼓吹他们对欧洲新秩序的信念，希望德国人会奖励他们一个附庸国。等到他们发现德国人不过将他们视为一个奴隶种族、只适合被征服时，已经太晚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发现他们被夹在德国占领者和红军之间，有时同时与双方作战。苏联人战争末期攻克乌克兰西部，最激烈的反抗部分来自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他们继续战斗到50年代早期。所有这些历史完全被这个雕像掩盖了。

直升机飞离母亲雕像，越过基辅修道院的金色圆顶。在苏联时期，基辅的天际线呈现两种宗教——战争死难者的崇拜以及穷人和被排斥者的古老信仰——相互竞争的景象。[注]基辅是所有俄罗斯东正教的发源地，因为正是在987年，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Kievan Prince Vladimir）迎娶了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的女儿，同时与其所有部从一起转信东正教。

在弗拉基米尔转信之前，僧侣们曾住在这些悬崖上的洞穴里[注]，他们的遗骸放在棺材里，放置在一个深深的地下通道网络的壁龛里，这儿已经成为东正教信徒的一个圣地。由于乌克兰独立，这些圣徒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位于外国土地上。更糟的是，一个乌克兰东正教堂正在寻求从

俄罗斯大牧首那里争夺对它们的专属管辖权。对于乌克兰人而言，修道院贡献了乌克兰民族意识最先开始之地；对于俄罗斯人而言，基辅罗斯则是俄罗斯民族历程的开始。因而，从俄罗斯人的观点来看，“失去”乌克兰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一个地区，而是失去它自己具有象征意义的起源。

我向下进入修道院下面的洞穴，里面黑暗阴冷，长期以来这里的门对旅游者是关闭的。在一个长长的木板台阶的底部，有一个天蓝色的小型门厅，天花板上角的一个圣像前面点了一盏小小的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我差点被石头地板上一堆我觉得是破布的东西绊倒。跨过去，我发现那是一对老夫妻，互相蜷缩在一起，穿着破旧的外套，一起躺在一张用来抵挡潮湿的硬纸板上。他们侧卧着，用手枕在头下面，因为两人都没有枕头。老妇人戴方头巾，老先生戴旧平顶帽，他们睡在一起，姿势像一个调羹。发现他们的时候，我环顾四周，看到还有几对老夫妻睡在地板上，另外两对坐在圣像下方几近黑暗的长椅上。离开门厅，继续往下走，我遇到更多这样沉默的老夫妻睡在台阶上，倚靠着栏杆，抱在一起抵抗刺骨的寒冷，他们几乎不动弹，就像死了一样。这些老人是朝圣者，教堂允许他们一夜夜睡在这里，在零下温度的寒冷中紧靠圣徒。

通往墓穴的最后一道门由一个瘦小的老妇人把守，她穿一件乌克兰式披肩，戴头巾，穿着厚厚的外套和拖鞋。她从一座巨大的荷兰式暖炉后面的床上爬起来，打开门，让我进去。她怀疑地看着我点燃蜡烛。我漫步穿过隧道的迷宫，阴影围绕着我。我迷失在死胡同里，遭遇锁闭的门，在一片潮湿的黑暗中，只有我的蜡烛和圣像灯的火苗照路。在通道的墙上挖掘有壁龛，放置着圣徒们铮亮的木质棺材或石棺。但木棺和石棺是打开的，在圣像灯的昏暗灯光下，他们的脸是被遮上的，但是我发现有几个圣徒，他们枯萎、褐色的手紧紧抓住葬衣。在这里，死者不归于尘土，地下的特殊环境保存了他们的手、带有长指甲的黑褐色的手指。老妇人突然出现在我后面，看着我，确保我不会伸出手去触摸。她的生命消耗在这里，在深深的地下，躺在炉子后面，警惕地看守圣徒。

这种对死者的崇拜，对本应化为尘土的尸体进行保存的喜爱，这种在信仰和死亡之间的联系，让我觉得恶心。两个民族、两种语言、两个历史从这个修道院的地下迷宫发源。但我只想出去。无论如何，我要尽快出去，我需要爬上那些台阶，跨过那些睡着的人们（如果需要）。我需要光明，需要空气。

---

1. 约145公里。——编者注
2. 斯捷潘·班德拉（Stepan Bandera，1909—1959），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二战”中依附纳粹德国，后因反对纳粹的政策被捕入狱，“二战”末期被释放出狱，之后组织反苏游击队。1959年被克格勃暗杀。
3. 安德烈·梅尼克（Andriy Melnyk，1890—1964），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二战”中依附纳粹德国，1944年在纳粹对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镇压中曾短暂入狱。战后逃亡西方，1964年逝世于卢森堡。
4. 指俄罗斯母亲雕像和基辅修道院两个不同建筑形象之间的交映。
5. 基辅修道院最早起源于修道士所挖的洞穴，在洞穴基础上修建修道院。修道士在狭窄的洞穴里修道，死后安葬在洞穴内，年深日久形成干尸，成为信徒朝拜的圣地。

家族墓地

基辅西南大约两小时路程的地方，罗斯河畔，在文尼察（Vinnitsa）区起伏绵延的甜菜田野中，有一个小村庄，我的曾祖父19世纪60年代在那里买了一块地产，那时他是俄罗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908年，他死于此地；1917年，在将要受到革命的波及之前，他的妻子也死了。他们都被埋在教堂的墓室中。1917年2月之后，我的家族再没有人回过这里。道路分岔出来已有几英里，我们的巴士挣扎在满是车辙的铺有鹅卵石的农场道路上，道路蜿蜒穿过平坦、千篇一律的甜菜地。黑暗降临了。我们穿过一个叫波格里比舍（Pogribisce）的镇子，经过一个巨大的甜菜工厂，它在黑夜里仍在运作，将羽毛一般的蒸汽排入寒夜的空气中。然后，随着车头灯在黑暗中将物体一一呈现，我开始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从童年时代，我一直在照片上看这个地方。在铁路线边上有一个长长的、低平的石头谷仓。这一定是祖父每天早晨到铁路边拾取从莫斯科—敖德萨快车上扔下的莫斯科报纸的地方。这一定就是那个教堂，它的圆顶和十字架点燃了灯光，浮现在河岸边的树丛上方，等待我的到来，看上去正与我父亲的英国保姆用布朗尼盒式相机拍下的照片上一样。

我们在教堂院门前停下。没有一丝声音。夜晚的乡村多么空旷。没有街灯，只有天空的黑色穹顶和几颗星星。我们身后有两间小小的砖砌农舍，窗户的灯光从幽暗的尖桩篱笆上方透出来，但我们不知道去找哪一间房子。最后，一个集体农场的卡车司机停下来，带上我们——我和我的翻译，然后把我们放在一座蓝白色的砖房前面，房子覆盖着藤蔓和植物，黑暗中矗立在一条肮脏的道路尽头。他重重地敲门，过了很久，牧师出现了，黑色的法衣围在肚子上，他用手指捻着胡子，嘟囔着时间

有多晚、陌生人多么粗鲁。他围着头巾的妻子来回奔跑，精力充沛，带我们在黑暗中顺着一条小道去哈塔（hata），即我们住的地方。她说，一个房间给女人，指我的翻译。这个是给男人的，意思是说我。她将已经顶着墙放置的床铺好。还有一炉好火，她说着，敲了敲一直延伸到屋子另一头的煤炉，上面热着一个荷兰锅。她点燃屋子角落圣像前面的灯，自己画了个十字，开始在厨房里忙碌，哒哒地进进出出，带来茶和装满土豆的汤锅，还有她装有腌西红柿、洋葱和黄瓜的广口瓶，几瓶伏特加和法国白兰地。牧师回来了，我请他为食物赐福，他用唱歌来赐福，他的妻子用高亢的颤音加入进来，两个人都不停地画十字。

我们一起在房子中央的搁板桌上用餐，上方有一个灯泡。牧师和他的妻子不停地偷偷交换眼神：这真的是伯爵的孙子吗？为什么他不说俄语？他是个信徒吗？

他们说，50年代他们刚来到这个教区的时候，教堂被用木板围了起来，集体农场的机械修理店设在教堂院子里。牧师的妻子说，当他们试图把机械修理店弄出教堂院子时，牧师被抓了起来。但我们还是在这里，他咀嚼着一块黑面包冷静地说。35年了，我们保留了所有的东西。我们保留了你们的墓地。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平静、不动声色地说，也许在问他们自己，为什么恰恰是我配得上这种无私的奉献。

独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借着伏特加和白兰地问。牧师和他妻子对望了一眼。在国家的默许授意下，一个乌克兰教堂正在要求接管乌克兰所有的俄罗斯东正教堂，并且要求用乌克兰语唱颂歌。牧师自己是在俄罗斯的神学院受的训练，然而他对信徒说乌克兰语，但仪式只能在斯拉夫教堂里举行。他准备承认的唯一的教会权威是从莫斯科和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传过来的古老权威，而不是那些基辅的暴发户。在全乌克兰境内，在教堂门口已经有争斗爆发，争斗双方是旧信仰的捍卫者和新的民族主义教会。他们的儿子是附近最大的城镇文尼察内的大教堂的唱诗班指挥。基辅来的新主教已经来过文尼察，要求移交大教堂。儿子准备

抗争。“会有人被杀死的。”牧师的妻子忧郁地说。

第二天早晨，我在井边把水打上来，洗漱、泡茶。村里的孩子经过，小书包背在背上，去山上的学校上学。女人穿着卧室里的拖鞋，裹得紧紧地抵抗寒冷，在她们的后花园里忙活，浇浇水，把卷心菜的头部剪下来，用嘘声把鹅赶开。一辆马车嘚嘚经过，两个农场工人坐在干草上，双腿在马车侧面晃荡。一个老妇人，弯腰驼背，沉重地倚靠着一根拐杖，慢慢走过。

有一种严重的与世隔绝的气氛。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衰老、贫穷令这个村子缺少生气，而是那么多的脸上都带有幸存者的不知所措和失败的气息。

集体农庄的领导后来告诉我，现在没人想要工作。我问，为什么你不把土地分给他们呢？我为什么要给他们？谁有资本？看看这些地。他伸出手臂，指着广阔的、毫无特色的甜菜地。他的暗示非常重要：如果农业是新乌克兰的支柱，现在谁来拯救它？农民们在哪里？小农户在哪里？集体农庄的领导带我下到河边靠近教堂的地方，去看集体农庄（kolkhoz）的面粉厂。前门上方显示它建于1886年，与教堂同一时间，在那里面我找到了曾祖父从莱比锡和德累斯顿进口的所有机器，仍旧在工作，只是用锤炼过的苏联的锡和铁取代了那些已经老化的部件。我看着头巾上落满面粉的女人把一袋袋谷物倒进古老的机器里，看着优质的白色面粉在下面堆成圆锥形。我擦掉一个铭牌上的面粉灰尘，上面写着：“莱比锡，1886”。集体农庄的领导说：“仍旧是这个地区最好的面粉厂。”

我无法摆脱那种感觉：这些人是一场巨大灾难的幸存者。从家族的相册以及英国保姆拍摄的照片上，我知道一些农民的名字，我祖父的那个时代，他们曾经住在这里。他们的名字用白色墨水题记在他们照片的下面：满是胡子的塞舍霍夫（Sessoueff），房子的管家，与他丰满的妻子和七个孩子在一起。鲁德尼茨基（Rudnitsky），看上去滑头滑脑的马

厩主管。革命的时候，他们的遭遇如何呢？在教堂墓地，我找到了塞舍霍夫的墓，埋在家族墓室的边上。他的孩子们呢？全都在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了。鲁德尼茨基呢？也被镇压了。为什么？牧师耸了耸肩。他们是富农（kulaks），富裕的农民、谷物囤积商、放贷人、国家的敌人，斯大林两次大屠杀的受害者。

沿着空荡、尘土飞扬的克罗波德尼斯塔小径走向那座大房子，经过一些铁皮屋顶的砖砌小农舍，经过其他还是用篱笆泥墙和茅草搭起的小房子——它们和保姆的照片里是一样的，我感觉到了悲哀像葬衣一样笼罩在这个地方的原因。1931年到1932年间，大约有300万乌克兰人死于饥饿。在那同一个年代的晚期，又有100万人在农业集体化和对知识分子、党的官员的清洗中被杀死。另外有200万—300万乌克兰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的父亲成长时的那种小农户和劳工的农民文化被消灭了。这是大恐慌来临的时候。恐慌此后从未离开，它仍旧保留在老妇人的眼睛里，当我挣扎在通往曾祖父房子的泥泞的小路上的时候，她们从厨房花园的尖桩篱笆上方盯着我看。

房子在一块高地上，可以俯瞰村子，是一座宽敞的两层楼宅邸，涂有白色灰泥，带有一个正式的前门廊，当家族来此避暑的时候，马车可以停靠这里。正花园早已不复存在，一侧被烧毁了，另一侧成了废墟，但从旧的家族照片上仍然还可以辨认出来。

老师们在台阶上欢迎我。一个穿农民服饰、戴乌克兰头饰——用紫色和粉色的塑料花制成——的女孩子向我行屈膝礼，送我一块圆形面包，上面点缀有糕点末和一束谷物做的糕点，还有一小碗石盐。这是我的祖母1902年作为我祖父的新娘来到这里的时候所受到的欢迎。他们经过的每一座农舍，每一个农民家庭都送给他们面包和盐。现在轮到我了，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翻译轻声告诉我，我应该拿一块面包，把它伸到盐里蘸一下，然后吃掉它。然而，我窘迫地鞠了一躬。

他们带领我穿过房子，我在加拿大流亡的、上了年纪的叔叔们还记

得里面的一个个房间、一条条走廊。我感觉我是梦游在他们的记忆里。我走过厚厚的木头地板，穿过长长的低矮走廊，孩子们在我身后喧闹。我听到学校的主任指着告诉我，是在那里，就是那里，在那些楼梯的下面，我的曾祖父死在那里，在1908年的一个早晨。他没有说他是怎么知道的。这座房子似乎继续着它的神话，一些不可靠的神话。校长想知道，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éde Balzac）真的在这里住过一个晚上吗？他领我进入一个长方形房间，房间尽头有一个立着的平台，那可能是家族演戏剧或者朗诵会所用的舞台。现在这里挂着伟大卫国战争时期的苏联先锋英雄画像。他们要求我做一个小演讲。我告诉孩子们，我是建造这座房子的人的曾孙。我送给他们我的家族相册中一些照片的复印件，他们看着照片，看着我，带着敬畏和怀疑。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革命之后这里发生了什么。我祖父的妹妹米卡（Mika）那时在村里经营一个诊所，她留了下来，后来悄悄去了基辅，进了一家女修道院。每个人都毫不迟疑地说，村里所有的孩子都是我的家族的教子，米卡姑祖母是如何照看他们的。确实是这样。同样确信的还有，这座房子一定被洗劫过。没有一根家具的脚、没有一张照片、没有一个茶壶、没有一个勺子留下，但有一个老人拿了一张褪色的照片过来，是我曾祖父在他最后的日子拍的，他穿着旧的将军大衣，倚靠着曾祖母的臂膀，病态、疲倦，他的胡子没有修饰，耷拉着，脚上穿着拖鞋，站在观赏花园里。到30年代，它成了许多家庭的住所，战后是做孤儿院，现在成了一所学校。在一个房间里，八九岁的孩子们在唱乌克兰爱国歌曲，是关于要推翻莫斯科压迫的哥萨克战士的悲伤、暴烈的歌曲：

锡奇[注]的火枪手前来参加血腥舞蹈战斗

来解放他们的乌克兰兄弟、摆脱莫斯科的锁链

我们挣脱莫斯科的锁链

在光荣的乌克兰，我们将纵情欢乐

在一个房间里，孩子们正在学习乌克兰语字母，另一个房间是个关于乌克兰人历史的民俗博物馆：一个木制纺车、一个木耙、一个黑铁俄式茶壶、必备的民族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注)的画像。粗糙的木地板上散布着香草。但几乎没什么东西留下来：历史遗迹如此贫乏。大饥荒和强制集体化将农民剥夺得近乎一无所有。

所以，我知道了，一个新的乌克兰正在我曾祖父的房子里被打造出来。孩子们学习舍甫琴科，就像从前学习普希金（Pushkin）；他们学习摆脱莫斯科的压迫，就像从前学习尤里·加加林(注)的苏联英雄成就一样。他们用手抚摸破旧的纺车，那是这些地方的农民文化留下的一切。

然后去教堂。钟声刚刚敲响，教区居民正在举行一个特殊的纪念仪式(注)，纪念我们的祖先。牧师的儿子带着唱诗班从文尼察过来。牧师的太太点燃了30支蜡烛的大烛台，将它升在空中。墙面是明亮的，有新完工的圣徒和神圣场景的画像。我站在唱诗班边上，后面是一大群老先生和老太太，不断地画着十字。

修道院底下的迷宫令人窒息。现在另外一种感觉又悄悄地攫取了我，不管喜不喜欢，感觉这是我的家族故事开始的地方，感觉这是我的墓地所在。我像一个隧道工人，经受住了窒息，又挖掘出我自己的至少一种归属。我可以对自己说：我的过去那半明半暗的轨迹确实有它的开始，而且我能够回归这个开始。唱诗班歌唱，牧师呼叫我父亲、母亲、祖父、祖母的名字，这些名字，其中有些是盎格鲁—撒克逊的，从祈祷者的缝隙中偷窥，唱诗班和他们的声音交相回应，充溢在我曾祖父建造的这个教堂里。

然后，牧师请我向他的教民们讲话。我讲了，翻译莱娜（Lena）帮我解释我是谁，感谢他们的光临。他们盯着一看再看，然后靠得更紧了。老妇人在哭泣。他们拿着我的手亲吻。他们透过残缺的牙齿解释自

己走了很多英里路来这里，他们记得，他们记得。米卡姑祖母，我祖父的妹妹，是怎样经营诊所的。唱诗班在我父亲的指挥下唱得多么好听。当你在桌边等待时，我的曾祖父是多么的严厉。他们是如何把蘑菇带到厨房门口，他们是如何采集草莓以及这些草莓是如何出现在食品储藏室的盆子里面。不可能记住这些故事，不可能让他们停下。每个人都一下子开始诉说、哭泣，老妇人抓住我的袖子。他们把一些纸片塞到我手里。我的祖父曾在你们的马厩里服务，他去了加拿大，我们认为他是去看你在那里的祖父，你知道吗？不，我不知道。千丝万缕的联系跨越70年建立起来，然后又破碎了。她们都在哭泣，抓着我，为了过去而绝望地哭泣，大恐慌开始之前她们还是围着头巾的年轻女孩。一个老妇人，几乎蜷成一团，歪倒在教堂后面的一条长凳上自己哭泣，她满是假牙的嘴成了一个哀恸的黑洞。

牧师将她们嘘散，带领我走出教堂，进入地下室，一个低矮、潮湿的石板空间，圣像沿着后墙摆开。在阴暗中，我看到对着远墙有成堆的木材。圣像灯一个接一个点燃，在它们的灯光中我分辨出三个花岗岩墓穴。中间是我曾祖父的，有他的军衔，边上刻着他以沙皇的名义签署条约的名字。一边是他女儿的墓，另一边是我祖父的妹妹，她1915年在照顾伤员时死于一列充当伤寒医院的火车。在她旁边，是我的曾祖母。牧师指出我曾祖母墓穴上是白色大理石，石头上有屠夫的刀留下的砍印。30年代，这里曾是屠宰场。我用手抚摸白色大理石上的黑色切痕。我们站着，唱《永恒纪念》[注]，纪念的赞美诗，牧师为墓穴赐福，然后他们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和一支蜡烛。

民族和墓穴。墓穴和民族。土地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你的祖先长眠之地。祖先必须得到纪念，因为如果没有过去的驻定，人类生命就是渺小而卑微的。土地值得为之牺牲，因为陌生人将会亵渎墓穴。墓穴被亵渎了，屠夫在大理石上面杀戮，一个人如果能力足够的话，将会奋力阻止。

回头来看，我将在地下室的时候视为我开始改变的一个时刻，某种对民族规划的敬意开始溜进我的情感中，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土地和墓穴至关重要，为什么民族在保护这二者中至关重要。

---

1. 锡奇（Sich），历史上哥萨克军事武装的中心营地，设于第聂伯河下游石滩地区。
2. 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1814—1861），乌克兰诗人，以诗歌号召乌克兰摆脱俄罗斯的统治，被视为乌克兰民族英雄。
3. 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1934—1968），苏联英雄，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
4. 即pannihida，东正教纪念仪式。
5. 《永恒纪念》（Viechnaya Pamyat），东正教纪念仪式结束时，唱诗班和悼念者共同合唱的歌曲。

利沃夫

与牧师以及牧师太太、儿子、唱诗班作别之后，我们启程前往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Lvov）。随着时间流逝，田野在发生变化，从平坦的黑土地平原，到起伏的、更为繁荣的喀尔巴阡山脚下的村庄。我把剩下的盐水鸭吃完，这是离开的时候集体农庄送给我的礼物，还有一块学校仪式上的祝福面包。我睡着了，然后在巴士行驶在哈布斯堡时期的鹅卵石路面的咔嗒咔嗒声中醒来。

俄国人管这里叫利沃夫。在哈布斯堡时期，它以伦贝格（Lemberg）而知名。对于19世纪挣扎于贫困之中的加利西亚犹太聚居区（Galician Stetl[注]）的犹太人，那就是他们的耶路撒冷。乌克兰人称其为利维夫（Liviv），它是欧洲各帝国的边界注定要相遇的地方之一。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国家由此诞生。现在，它正见证乌克兰痛苦而缓慢的诞生。

有轨电车穿行在弯弯曲曲的鹅卵石街道上，摩擦出刺耳的声音，令人想起维也纳。铜绿色的巴洛克式尖顶让人想起布拉格。但40瓦灯泡的昏暗光线照在面包店里疲倦不堪的人们脸上，他们只能在他们所在之处——苏维埃帝国的废墟中寻找食物。利沃夫像是哈布斯堡的庞贝，完整地保留在苏维埃火山的尘埃和灰烬之下。

利沃夫一直是乌克兰独立的摇篮，可能是因为它从前不是一座乌克兰人城市，而是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城市，因而作为少数民族的乌克兰人必须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使他们能够超出其他民族的竞争性喧嚣而为人们所听到。

这个城市一直是乌克兰最不俄罗斯化、最不苏联化的部分。直到1918年，奥匈帝国的双头鹰一直优雅地占据在市政建筑之上。1919年到1939年间，它被波兰人统治，你仍然可以看到波兰语的街道标志就在新的乌克兰语标志之上。1939年，希特勒和斯大林达成协定，将利沃夫移交给苏联人，但入侵的德国军队——在一些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人员的支持下——将他们驱逐出去。苏联军队1945年重新夺回城市，直到1956年，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的抵抗仍未最终停止。那些游击队的幸存者已头发斑白，他们现在在街上行走，戴着他们的旧军帽。

在更加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东部，苏联的统治可以依赖某些大众的支持。在乌克兰西部，苏联人是作为占领军进行统治。东仪天主教被封禁，他们的教堂被关闭，领导人被关入监狱。民族主义被界定为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者的家庭被驱逐出境，但正是西部乌克兰民族主义神话——通常是在流亡中发育的——现在试图让自己成为整个国家的官方民族主义。

当80年代末开放和改革来临的时候，受到压迫的民族主义力量带着仇恨归来。乌克兰西部受到学生示威、罢工和宗教游行的震动。令戈尔巴乔夫失去整个帝国的错误是他相信一种新的苏维埃人类将由此诞生。但他只会发现，有多么痛苦的、持久的、不可原谅的民族记忆存在于波罗的海、格鲁吉亚，以及这里，利沃夫。

就像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和民族回归在这里意味着回归欧洲。回归欧洲意味着将你的民族从苏维埃体制的泥泞壕沟中拉出来，就像拉一辆深陷的马车。

我们是欧洲人，在利沃夫主广场的民族宾馆，侍者告诉我。我们是欧洲人，一个曾经在西伯利亚待过六年的乌克兰国会议员在她小小的三居室公寓里告诉我，在她的钢琴上有一个哥萨克雕像，墙上挂有一幅乌克兰人受难的画像。做欧洲人，在这里意味着不做俄罗斯人。它意味着，做一个个体，承担责任，坚持自我，所有那些西部乌克兰人强烈相

信在俄罗斯人身上所缺乏的个性。

做欧洲人也意味着做天主教徒。在乌克兰西部，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宗教。1596年以来，乌克兰西部有一种完全属于自身的宗教——东仪天主教，它是一种波兰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的混合体。对我而言，仪式听上去像俄罗斯东正教，但我不敢对东仪天主教民族主义者这样说，他们最不愿承认的就是将任何事情都归因于俄罗斯的宗教传统。我问乌克兰国会议员，为什么她继续痛恨俄罗斯人，她耸耸肩，微笑着说，如果你爱什么——比如你的国家——你也必须痛恨它的敌人。

现在是东仪天主教信仰的光荣时刻。1992年8月，他们把领导人斯莱普主教（Cardinal Slipe）的遗体带回国，他在流亡中死于罗马。他们从俄罗斯东正教手里收回了圣乔治大教堂（St George’s Cathedral），巴洛克式小爱神和祭坛屏风的镀金重又焕发光彩。礼拜日，教堂挤满了各种年纪的秃头男人和戴头巾的女人，当他们与唱诗班一起合唱哈利路亚时，声音在700个头颅上方飘荡，犹如波涛温和地卷过苍穹。

站在毫不掩饰他们强烈感情的男人和女人们中间，民族主义事实上是什么变得清晰了：梦想整个民族可以像一个集合体，歌唱同一曲圣歌，聆听同一个福音，分享同样的感情，不仅彼此间互相联结，而且与他们脚下埋葬的死者联结在一起。

他们在每一个礼拜日做梦，礼拜一回到在商店外面排长队的辛酸现实中。应许之地远离这里。独立只有一年时间，要将苏联体制从人们身上搬走，将需要一代人的时间。一代人？与我交谈的一个电车司机耸肩大笑，两代人，或许三代人。那些为乌克兰的独立奋斗的人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可能无法活着见到应许之地了。

像马克思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无聊强制”在这里折磨人们。它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施加这种强制，奋力使其崩溃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刚刚意识到，这里的人们如此深情呼唤的独立的“精神”收益相对来

说容易得到。让电话运转、食物进入市场、正确地冲洗厕所等这些事务才是建设一个国家的困难之处。

在当下，每个人都知道独立的“精神”收益是什么。当我问我的电车司机朋友，他说的“精神上”的意思是什么，他笑了。“你可以在大街上亲吻女朋友，在公园里喝啤酒，在教堂里自己画十字。”

利沃夫最棒的摇滚乐团加杜金兄弟（Gadukin Brothers）在广场中心壮丽的奥匈帝国歌剧院前面举行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在前来听音乐会的年轻的人们脸上，你看到了自由，对于这种自由，你不可能用犬儒的态度对待。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有各种有趣的脸，戴老式的、装饰有蓝色和黄色[注]独立绶带的苏联军帽。一个女孩走过，武装手枪皮套里放了一把玩具手枪。在这里没有人模仿西方，他们只是做着他们自己独特的加利西亚和喀尔巴阡式的事情，而台上的加杜金兄弟正在诉说每个人脑子里想的事情。透过吉他和鼓点，你听到加杜金兄弟唱道：

古老的红色战车陷进了壕沟

列宁是那车手

现在的战车是蓝色和黄色

没有人知道它将去向何方

---

1. 原文为Stetl，应为Shtetl，意第绪语，指犹太人小村，尤指“二战”前东欧的犹太人聚居区。
2. 蓝色和黄色为乌克兰国旗颜色。

克里米亚

从利沃夫，我坐通宵火车前往敖德萨。像利沃夫一样，19世纪时的敖德萨根本不是一个乌克兰人的城市。乌克兰人绝大多数是农民，而像敖德萨这样的南方港口城镇属于俄罗斯海军、伊萨克·巴别尔注关于敖德萨的小说中的犹太匪帮和商人，以及希腊人、土耳其人、比萨拉比亚注人和主宰黑海地区酒类和谷物贸易的罗马尼亚商人。70年的苏联统治，加上德国人的占领和屠杀，令旧敖德萨的种族杂音归于沉寂。现在，乌克兰人将它全都占为己有。

我们在“敖德萨阶梯”（Odessa steps）注脚下的码头上度过了整个晚上，等待前往克里米亚的渡船。渡船事务长耸耸肩告诉我，没有油了。我们等待的时候，甲板上挤满了去度假的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俄罗斯人的家庭，从停泊的渡船船尾你可以看到那个“阶梯”，就像一个黑布卷从高处滚下来直到海边。

这就是爱森斯坦（Eisenstein）的《战舰波将金号》（*Battleship Potemkin*）中，婴儿车开始滚下来的地方。独立后，一位法国制片人在阶梯上放映这部电影，敖德萨人出来观看。他们痛恨这部电影，主要是因为其中刻画了被派去驱散人群的哥萨克。对于乌克兰人，哥萨克是英雄，在乌克兰每一个庆典场合都可以看到化妆的哥萨克，穿靴子、羊皮帽和披肩，腰带上挂着短剑。这是独立可以为你做的事情：一部乌克兰人曾经喜爱的伟大影片现在只不过是苏联宣传的一个低劣片段。

我在渡船上睡觉，满心期望醒来时再次见到敖德萨阶梯。但是，说也奇怪注，油找到了，渡船起航，第二天醒来时我看到的是克里米亚的悬崖和雅尔塔（Yalta）绵延在山脚台地上的别墅及花园。那天晚上，一

辆巴士带我们沿着克里米亚海岸道路行驶，经过福罗斯别墅（Villa of Foros），这是在1991年8月的政变中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的地方。这整个迷人的欧洲南部岬角——其悬崖伸入大海——曾经是莫斯科精英的后花园。再也不是了。谣言说福罗斯别墅现在由克拉夫丘克家族使用。

黑暗中，巴士带我们在一个路障前停下，这里距离塞瓦斯托波尔16公里。翻译、看守和俄罗斯军警静静地谈判。我们将是第一批被允许在塞瓦斯托波尔——黑海舰队基地——过夜的外国人。

第二天早晨，我们发现在港口有渡船准备带我们出去看看。当船长驾驶渡船“土星”号驶入因克曼（Inkerman）入口的顶端时，我第一次看到一幅骇人的景象：俄罗斯黑海舰队抛锚停泊。渡船靠得很近，船尾的波纹触及它们的锚链，巨大的灰色船体连成无边无尽的队列浮现在我的头顶，从我的头顶经过，有些高达五层楼。童年时代读过的《简氏世界舰船》（*Jane’s Fighting Ships*）的画页似乎飘扬在明亮的港口空气中：护卫舰、轻型巡洋舰、海军拖船、运兵舰、登陆艇、医务船、护卫舰、布雷舰、驱逐舰以及巡洋舰。有些舰船有200米长。它们的桅杆上密布有通信天线和卫星天线，甲板上满是导弹、防空炮、鱼雷和武装直升机。我试图计算总数，但数到60以后就弄乱了。它们开始驶入塞瓦斯托波尔港入口的许多分岔，一个小时之后，我还只看到了舰队的大约三分之一。

当我们给乌克兰朋友讲述当时情景时，一个乌克兰朋友轻蔑地嗤之以鼻：一个舰船的墓地。如果不是墓地，那就是养老院。一些老旧的舰船好像是一排坐在帆布椅上面对大海的怪人，但不是所有的舰艇都破旧衰朽。1.1万吨的巡洋舰“斯拉瓦”号刚满11年船龄，在早晨的阳光下亮出它锐利的牙齿，绷紧的锚链像拴住一只攻击犬的皮带。

黑海舰队也许是一份已经耗损的资产，但它仍是世界上第十二大海军力量，它的337艘舰船占俄罗斯舰队总数的三分之一。最致命的部分——核潜艇和航空母舰——在其他地方停泊，如摩尔曼斯克

（Murmansk）和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然而塞瓦斯托波尔的舰队仍然拥有让俄罗斯成为整个地中海盆地包括中东、北非、南欧不可忽视的大国的力量。任何试图勾销俄罗斯军事大国地位的人都应该去因克曼的渡船上转一转看看。

俄罗斯人的问题是塞瓦斯托波尔现在在外国。乌克兰对基地和部分舰船提出要求，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之间展开了艰难的谈判，分歧巨大，以至于只达成了一个将分割舰队推迟三年的协议。

对于任何一个有军事头脑的人来说，黑海舰队的状况是难以想象的。两个国家都想要将他们的旗子插上去，两位海军将军争相对其发号施令，一艘船甚至已经被停到了敖德萨，升起了乌克兰旗帜。舰队未来的指挥官、海军学院里的士官生毕业时被要求投票选择为哪一面国旗服务。80%的人选择为乌克兰服务，而到现在这个新的国家名下还只拥有一艘海岸警卫艇。这些庞大舰船，没有人确切知道一年后谁会对他们发号施令。

在舰队指挥官海军上将卡萨托诺夫（Admiral Kasatonov）的接待室里，他的下属们并不想把他们的非常形势看得过于严重。舰长和指挥官、中校和年轻的军官们都聚集在上将办公室外面的电视机前面，守着看墨西哥的流行肥皂剧《富人也流泪》（Even the rich shed tears）。

卡萨托诺夫上将不到60岁，愁容满面，他的手焦虑地爬梳着灰色的头发，用桌子上十几部电话和一个带鼠标的大型康柏电脑指挥他生锈的战争机器。他的座椅后面是一个男人的肖像：缔造了俄罗斯黑海权力的彼得大帝。这个讯息再清楚不过了：俄罗斯是俄罗斯和苏联帝国海军传统的唯一继承人。乌克兰人，当心点。

访谈的时候，他总是微笑着说些陈词滥调，他在莫斯科的上司已经告诉过他不要说任何火上浇油的话。他用最为柔和的方式安慰我，这两

个国家在黑海拥有同样的战略利益。他只是一个简单的军人，想把事情都留给政治家，他们必须制订出协议。但我继续问，作为一个基地现在位于外国土地上的庞大舰队的指挥官，他有何想法？“你说的外国是什么？”他马上插问，“只是因为政治准则的改变，它不意味着任何本质上的改变。”至少在这个帝国的头脑里，乌克兰已经独立的想法事实上还没有生根。

当天上午的剩余时间，当我登上上将的护卫舰之一“拉蒂尼”（Ladni）号时，有同样的感觉，帝国仍然还在并将持续下去。在舰长船舱中落满灰尘的架子上，我发现了最基本的导航辅助设备：《列宁选集》。舰长召集了四名水手给我进行访谈：一个乌克兰矿工的儿子，两个来自阿塞拜疆的战战兢兢的男孩，一个来自遥远中亚的塔吉克人。他们全都被排练好了，说舰队就像帝国，是一个各民族的欢乐大家庭。军官们被打发到一个炮塔后面、超出耳朵听力范围后，水手们变得更加坦率了。阿塞拜疆人轻声说，我们想为阿塞拜疆在里海的海军服务。至于塔吉克人，他只想尽可能快地回到中亚。

当我上岸以后，我看到征招来的水兵在码头边上把土豆铲进桶里，吃力地带着它们沿舷梯送到船上的厨房。他们的制服肮脏，面色灰黄，他们的晚餐内容不会比这些土豆好多少。身处两个国家经济不断下滑的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对舰队的争端像是两个满身泥泞的乞丐为了占有一些小土豆而打架。

一个乞丐帝国，让它的人民贫穷了70年，来维持在水中的这样一支舰队，目的是恐吓我们。现在报应来了，它几乎没法维持抛锚在这里的这笔正在生锈的庞大资产。俄罗斯人仍旧有实力恐吓我们，但那实力正逐渐沉入经济解体的波涛之下。要求人们牺牲以维持这个抛锚的舰队，这种想法令我感到寒心而愤怒。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塞瓦斯托波尔最为尖锐的记忆不是灰色船体的抛锚停泊，而是离开的那个刺骨寒冷的早晨，一个靠着我的宾馆围墙睡觉

的孤独的人。她60多岁，头发像这里受过教育的老妇人一样挽了个发髻，穿一件残破的羊毛外套和一件羊毛衫。她也许是一个舰长的未亡人，契诃夫显然可以用这个题目来写一篇关于她的短篇小说。她没有鞋子，脸因为露宿外面而开裂、发红。她背靠宾馆的围墙躺着，身边是水手们前一晚留下的破碎的啤酒瓶，筋疲力尽，无法挪动，流下完全绝望的泪水。

---

1. 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1894—1940），苏联作家，代表作《骑兵军》（Red Cavalry）。
2. 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旧地名，介于现乌克兰与罗马尼亚之间，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俄罗斯、罗马尼亚曾先后占领该地，“二战”后被纳入苏联版图。现大部归属摩尔多瓦共和国，南部沿海地区归属乌克兰。
3. 敖德萨通往海边的台阶，共192级。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的经典影片《战舰波将金号》中，“敖德萨阶梯大屠杀”是一个经典场景，该地因此而闻名。
4. 原文为拉丁文，mirabile dictu。

鞑靼人

克里米亚是乌克兰最具争议性的土地。如果俄罗斯人有任何与乌克兰人开战的可能，那就是因为这儿。在这个半岛上，俄罗斯人的数量超过乌克兰人。所有人都非常明白，克里米亚只不过是在1954年才由斯大林的继承人(注)割让给乌克兰的。在这里有俄罗斯分离主义者，他们在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的当地议会拥有自己的政党，想单方面宣告从乌克兰独立（UDI）(注)，寻求恢复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它就享受这样的地位。然而，尽管乌克兰人数量上不占多数，他们却占有支配地位，因为克里米亚所有电力和水的供应都来自乌克兰。在这里，一个俄罗斯分离主义共和国可能出生时即告夭折。

不那么容易夭折的，是这个半岛最古老居民的渴望，那就是鞑靼人，这个穆斯林民族是在克里米亚山区居住已有千年的原住民。1942年，德国军队向黑海进军，斯大林命令将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全部赶出来，把他们重新安置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他们是第一支在红场静坐抗议、要求公正和遣返的种族群体。现在，他们成千上万地返回克里米亚，在他们的古都巴奇色勒（Bachiseray）附近的山脚定居。

19世纪20年代，普希金来到这里，写了一首关于鞑靼可汗宫殿中喷泉的诗歌。每一个房间里都有流水溅落的声音。苏联的导游手册中当然提到了普希金，但没有一句提到被驱逐的民族。

在巴奇色勒贫瘠的山脚下，我们发现了一个鞑靼村庄，它位于一片废弃的甜菜地中间，稀疏散布着一些造到一半的轻型砖砌农舍，周围堆满了建筑材料。看到我们，一个穿浅蓝色家居服的女人招手叫我们进

去，我们照做了，她自豪地指着一个黑绿色的沥青纸小屋：这是我们造好这个房子之前的家，她解释说，然后叫我们把鞋子脱在外面。

现在有一家七口居住在这座未来会是三层楼的房子的第一层，房子里面将刷成令人舒适的白色，涂上灰泥，混凝土地板铺上油毡布，两个大电视机将出现在餐桌上。

我原本希望看到黑头发、黑皮肤的亚洲人，但他们大都没有可分辨得出的民族特征。有些男人是黑皮肤，有浓重的胡子，健壮结实，但其他人是淡色头发、浅色皮肤，典型的俄罗斯人外表，说流利的俄语。坐在门边的一个年轻女人有一张瘦削、苍白的脸，她说自己生于中亚，几乎不说鞑靼语，但她的父母过去说，而她现在说。

他们马上聊了起来。我们放弃了中亚的一切——房子、工作、花园，来到这里。现在看看，只有一座房子。还有种下的几排西红柿和玉米，褐色的表层土壤是从附近修路工地挖来的。在西红柿地里有一间棚屋。没有自来水，水要用卡车运过来，一个星期一次。但是有电，他们烧热水，磨咖啡，用干净的咖啡杯给我们喝深黑的土耳其咖啡，还伴有蜂蜜，是在新罗西斯克（Novorrosiysk）养蜜蜂的亲戚带来的。

父亲60多岁，头发花白，戴平顶帽，脸上灰白的胡子有四五天没刮，右太阳穴上有伤疤。他的妻子说，把他的衣服扒光，你会看到伤疤到处都是。他颇为尴尬。妻子笑了，露出她的金牙。她穿一件印花的家居服，齐踝的白色袜子。女人们是坚强的，男人们更忧伤、更绝望，有一个游离在谈话边缘，脸孔瘦削、苍白、憔悴的人落下了泪水，转头看向别处，像一个孤儿。

我告诉他，我是被迫流亡者的孩子。我们创造了新的生活。他们为什么要拒绝在中亚的新生活呢？父亲说："只有没有母亲的人才知道母亲是什么，只有没有土地的人才知道土地意味着什么。"

带孩子的年轻女人插话：“你可以去加拿大，开始新的生活，没有人在意你是俄罗斯人，但是如果你去中亚，他们辱骂和羞辱我们，只因我们是鞑靼人。”

一个年轻男人说：“我们被称为人民的敌人，我们有一半人在放逐中死亡；他们把妇女和孩子扔到乌兹别克斯坦，把男人带走，让他们去战场上送死。”

我问，你想要什么？要回你们的老房子吗？女人告诉我，不是，我知道我的房子在哪里，它在几公里远的一个村子里。现在一个乌克兰人住在那里，我不想赶他们走，像我曾经经历的那样。我只想要土地，让我能够造一个房子住下来，而他们说我们是非法占据。

政治上你们想要什么？我们要一个克里米亚鞑靼共和国。我们要直到1939年我们还拥有的东西：自治共和国的地位。我们不想把俄罗斯人或乌克兰人赶出去，但我们要自己的语言被承认为官方语言，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学校和社区，要让这整个克里米亚被承认是鞑靼人的故乡。我们真的不想要一个领土国家，我们要一个种族上的民族，他们中的一个人告诉我说。

穿家居服的女士拿出一张皱巴的、褐色的纸，从桌上递过来。那是她的出生证明，出自斯大林的时代，出自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时期。她要我注意，它是用两种语言写的：俄语和鞑靼语。她双臂抱胸，说：“那是我们想要的，我们从前拥有的。”

他们带我出去，参观这个村子。我们沿着一条长长的有车辙的路走，新的房子在路两边崛起，人群跟随着我们聚集，在深达腰部的地基里劳动的男人们放下铲子，凑过来聊天。我问其中一个人——他从正在挖的一条壕沟里爬出来——他是否会容忍他的民族再次被放逐。他说，我们是个小民族，大的民族总是会想怎么对我们就怎么对我们。但我不会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得先杀了我才行。

一个穿件褪色的黄军装夹克、戴军帽、叼着烟斗、留小胡子的年轻人，大约25岁，他说当他在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经常偷偷溜回这里，回巴奇色勒，那时这还是禁止的，他们会从我们现在站的地方挖一些土带回他们过去住的地方。“我们对着这些土壤祷告，也会为之哭泣。”

我问头发花白的老人，为什么这片特别的土地对他们意义如此重大，他说：“对于我们，这里是个神圣的地方。我的祖父、我的父亲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死去。如果我不推动我的孩子们回来，谁还会这样做？我们将失去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我们必须一砖一瓦地把我们的遗产和文化拼起来。相信我。否则，一切都将被摧毁。”

我陷入了沉默，看着一个戴头巾的老妇人嗑手掌里的葵花子，带白色围巾的老人擦着眼睛；泪水也从那个我问他这片土地意味着什么的老人脸上流淌下来，所有人都沉默了，盯着这块没有前途、多雨的山坡，它如此贫瘠，他们必须运来表层土壤来让东西生长。一块贫瘠的山坡，满是电线，到处是建筑沙土和砖块，地上很多洞，猫和孩子们到处乱跑。

一个穿红毛衣、牛仔裙的老妇人，头上围了块方巾，拥有健康的红肤色和金牙。她突然说：“我63岁，看看我，为什么我要放弃自己的房子、工作和所有的一切，两手空空来到这里，然后重新开始？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难道不是为了要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人民中，并且给予我的孩子们我自己从未拥有过的：一个在我自己土地上的家？”

在她身后的年轻女人听着，并且说她很感激老人们在最黑暗的时候保存着民族生机。“我们没有从政府那里拿到一分钱，我们没有从任何人手里拿到过钱。当我们的人民到来的时候，他们睡在我们的房子里，有时我们这里睡了25个人。我们不想等待什么，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

我从未碰到过像这样的一个相信土地拥有如此神圣重要性的民族。他们的纪律、尊严和凶猛像30或40年代的以色列先驱。对于他们，国家地位——人民（narod）——和个人尊严之间的联系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国家地位，人们会在巴士上蔑视你，人们会嘲笑你到底是什么人。身为一个民族是不够的。为了拥有尊严，你必须拥有一个国家。

我问他们如何得以幸存下来，他们说，我们一定是有某种本能。此外，我们没有与鞑靼人之外的人通婚。大的民族可以承受跨族婚姻，但我们必须有严格的规则。而且我们有强大的家族，尊重老人也是我们保持力量和传统连续性的方式。然而，从他们的脸庞来看，几百年来他们显然与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一直通婚。

我问他们，他们是否会在村子里建一座清真寺。他们全都回答说，当然会，还指给我看山上按计划准备建清真寺的地方。再一次，在穆斯林的中亚，他们拥有宗教自由，并且周围是宗教合作人士。没有区别。这是他们想要回来的土地。

对于他们，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多少与他们关系不大，罪责由苏联承担。他们并不关心乌克兰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更重要的是使克里米亚恢复自治的鞑靼共和国的地位。

我担心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也许会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诉求充耳不闻，就像70年代俄罗斯异见者对乌克兰自治主义者要求支持的态度一样。乌克兰能够接受一个国中之国吗？没有什么更难满足克里米亚鞑靼人。

---

1. 指赫鲁晓夫。
2. UDI，unilater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的缩写，即单方面宣告独立。

金刚

从克里米亚，我向东旅行到顿涅茨克，乌克兰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心脏。鞑靼人并不是新乌克兰内唯一想要自治的族群，顿涅茨克地区的许多挖矿工人和钢铁工人也要求自治，保护他们的语言和教育权利。

顿涅茨克是斯达汉诺夫（Stakhanov）的家乡，这位20世纪30年代的矿工在采煤生产面上的英雄般的、非人的生产业绩成为苏联人生产力的核心象征。在整个80年代，矿工仍是苏联劳动力中的贵族。但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他们与其他工人的薪水差异逐渐被侵蚀，他们发起了一波罢工浪潮，弱化了戈尔巴乔夫在工业劳工阶层中得到的支持。然后，在1991年8月，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处于另一个国家。他们再一次走上了街头，他们对生活水平下降的示威抗议一直是克拉夫丘克政府的持久挑战。

在基辅最高苏维埃前面的一次示威中，我曾遇到一群戴头盔、穿靴子和厚毡布夹克的矿工。我很快与一位体型巨大的矿工弗拉基米尔·科帕科夫（Vladimir Kolpakov）建立了联系，他来自顿涅茨克红星六号煤矿（Red Star Mine Number 6）。弗拉基米尔是个满脸胡子、膀大腰圆的巨人，他的同伴叫他“金刚”。他是示威者中最健谈的一个。我到达顿涅茨克后给他打了电话。他的妻子告诉我他下矿了，所以我去煤矿外面找他。

那是一个小煤矿，有百年历史，雇用了大约250人，他们站在更衣室外面抽上最后一口香烟，然后穿上工作服、钻进笼子，开始向下之旅，工作的地方是在最后一站。他们穿着被煤染黑的工作服，步履沉重地走向笼子，笼子上面有一幅现在已是多余的列宁画像。

井口由女性管理，她们紧紧地裹着围巾和羊毛夹克抵抗寒冷潮湿。她们有种奇特的时髦，这些粗壮的女性身体结实，妆化得很好，嘴里满是金牙。她们将运煤车从笼子里吊出来，砰的把门关上，有点轻快的野蛮，操作着陈旧的升降机和电话系统。我被告知“金刚”将会在他当班结束后上来。一位煤矿女人挽着我的胳膊，带我去升降机后面的茶室。这是个舒适的地方，装饰有50年代西方电影明星的画像，靠近大暖气管的边上有羊皮椅。在多丽丝·戴[注]和奥黛丽·赫本的画像下面，这些女士们喝着茶，对我开玩笑。它是个动人的地方——地狱般的，是的；不是左拉[注]式的，是的，但也有种尊严。我可以感觉到她们的同志友爱，她们分担危险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快乐。

“金刚”终于出现在升降机后面，咧嘴笑着，像个巨大而肮脏的浣熊，他的脸被煤染得黑黑的，头盔和工作服被矿井里不断淌下的水滴湿了。我问他下一个班我是否可以和他一起下去，他说：不可能，太危险了。

洗完澡，换好衣服，他看上去仍然像一个巨大的浣熊，煤的粉尘染黑了眼睛周围。他拿出烟，吐了几口痰，点上烟。我问他，你的肺怎么样？他耸耸肩，笑了。我们每年有体检。此外，他笑着说：“只要一天完了的时候来一支烟，你就不会觉得做过什么工作。”

我们回到他的公寓，是在矿工们自建的合作社区的八楼，有四个空荡荡的房间。他倒上伏特加，带我参观公寓，它比那些议会代表住的房子还要大得多。矿工确实是苏联劳工的精英。

但他们是在艰难时势中坠落的精英。通货膨胀正在吞噬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支票，食品——在这个帝国从前的粮仓——昂贵而且很难得到。“一盒火柴过去只要1个戈比[注]，”他愤怒地说，“而现在要1卢布加50戈比。”一条面包过去是22戈比，现在要花7卢布。领养老金的人们被任其自生自灭。

弗拉基米尔没有针对这些问题，而是突然开炮说，民族主义者——意思是乌克兰人——正致力于在议会通过法律，把标志牌从俄罗斯语换成乌克兰语，并且把电话里的报时语音改成乌克兰语。

我反击说，但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是俄罗斯对经济的控制导致乌克兰落后，如果国家能够摆脱莫斯科的约束，很快会变得繁荣。弗拉基米尔嗤之以鼻："没有俄罗斯，乌克兰如何存在？乌克兰没有天然气或石油，森林只剩下很少的一点。没有所有这些东西，乌克兰能够生存吗？糖全部是从俄罗斯来的。什么也没留下。我们旁边住着一个非常强大的邻居，我们始终是在一起的。"

像数百万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一样，他只是无法面对他生活在一个外国的惊愕之处，而且，他从前可以自由旅行的地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作，到彼尔姆(注)去看望父母——现在不能去了，因为他无法承担卢布和库蓬的兑换比率。民族主义者的议程并不是与他们毫无关联的，它正在积极威胁弗拉基米尔和妻子的生活。"一点一点，"他说，"他们正在抛弃俄罗斯语。"我们一直在顿涅茨克相处得很好，他说，不仅是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还有所有的民族，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每一个住在这里的人。

注意，他没有任何反对乌克兰人的意思。他的妻子是乌克兰人，他们都说乌克兰语。他们并不介意儿子每天在课堂上接受乌克兰语教育，在那里他磕磕碰碰地学习舍甫琴科的民族史诗。

如果你逼问他，他承认苏联的"整个结构"是"错误的"。"它早晚会分崩离析。莫斯科负责一切，当每个共和国都想离开的时候，它就到了紧要关头。"

如果是这样，独立难道没有什么收获吗？你可以自由地和像我这样的外国作家交谈，把他带回家里。你可以公开说自己想说的话，不用担心会被警察逮捕。是的，他的妻子害羞地说："我从未想过英国人会来

我家。”但弗拉基米尔仍然对此表示轻蔑。他曾到基辅参加那些示威游行。他不觉得它们有什么好处。“是的，我可以走在大街上，呼喊‘克拉夫丘克下台’，但没有任何实际的改变。”如果独立让许多乌克兰人感到更加自由，对于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情况并非如此。

在这一阶段的旅行中，我讨厌乌克兰。天在下雨，顿涅茨克的乌克兰宾馆的房间里没有暖气，有许多天没有热水，浴室令人恶心，房间里一盏灯泡放出微弱、模糊的黄色灯光。每样东西都带有柴油、湿布、煤炭、酒精、烟蒂、汗臭的味道。宾馆大堂里摆满了老虎机，湿漉漉的青少年在这里消磨下午的时间。前帝国许多南部地区的不同罪犯在大堂里交易，相互交换塑料袋，点算现金，叼着香烟。有很多语言，说得飞快，我没有听见一句俄语。一个健壮的男人带着一个大箱子跟保镖一起走进来，去找宾馆经理。然后是讨价还价，成卷的库蓬易手，健壮男人转身离开，大箱子留下。我看到宾馆收银员打开它：满满的肉色的避孕套。

在宾馆门口等待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小男孩，他的金发被雨打湿了，穿凉鞋的脚完全湿透。他去找大堂里每一个生意人，伸手乞讨。有几个人心不在焉地把硬币扔在他的手里。我看着他溜出大堂，消失在夜色中。

成为一个民族意味着要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可以到帝国任何一个部分的任何一个宾馆去。那种呆滞、懒惰、强迫性的苏联式存在仍旧继续。窗户从未擦过，大堂里的盆栽棕榈落满了灰尘，门口恼怒的老人把妓女推回大街上，楼梯上带有破洞的地毯，墙纸剥落，出纳室从未打开过，礼品店里的女孩子站在小橱柜——里面满是用漆木做的乌克兰纪念品——前面可以几个小时一动不动。

---

1. 多丽丝·戴（Doris Day，1924—），美国电影明星。

2. 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法国19世纪著名自然主义作家，其代表作之一《萌芽》（Germinal）描写了法国煤矿工人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的反抗。
3. 戈比，俄罗斯货币单位，1卢布=100戈比。
4. 彼尔姆（Perm），俄罗斯乌拉尔地区的重要工业城市。

束缚

基辅有一个纪念碑，一个巨大的钢铁拱门矗立着，象征苏联和乌克兰各民族永远的友谊。在乌克兰的最后一个上午，我去这个地方做了一次陌生访问。在拱门下面有两个巨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乌克兰人，并肩大步向前。雕像下面还有一个石雕人物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Bogdan Khmelnitsky），17世纪50年代的哥萨克武士国王，他将波兰人赶出西乌克兰，在第聂伯河两岸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哥萨克王国，只是最终自己臣服于莫斯科公国。赫梅利尼茨基象征着乌克兰传统的所有矛盾性，一方面奋起反抗波兰人的压迫，另一方面接受莫斯科的束缚。那种束缚仍然在乌克兰人民身上存在，但不是以大多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描述的方式存在，现在它是一种对苏联石油的依赖，对卢布区的依赖，对独联体（CIS）内叶利钦的诡计的依赖。他们背负着但没有说出来的束缚是苏联文明的全部分量，它的全部分量只有在其整体性上、在细节中才能衡量：不工作的电梯、用电线和铁丝绑在一起的公共汽车、到处可见的灰蒙蒙的窗户；所有官僚们随处可见的无情；工人们在一个工人国家永恒的耻辱：在我住过的一个宾馆，一个女人在宾馆楼梯下的厕所中递手纸给每一个进来的男人，以此谋生。

你离开乌克兰，相信所有关于民族性、关于回归欧洲的言辞离日常现实太过遥远，巨大的废石堆必须从乌克兰的过去中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慢慢恢复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且没人知道这种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因为看不到清晰可见的选择。每个还活着的人知道的只是苏联的生活方式。在其后面，存在的只是革命之前乌克兰农民的怀旧天堂，失去的世界现在微缩在宾馆的纪念品商店里，在他们的边界之外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可能世界。不可能，因为进口视频录像带、蓝色

牛仔裤、避孕套和硬通货餐馆很容易，但要进口西方的思维习惯，把它与乌克兰的生活方式调和，并以一种现时的视野融合它们，困难大得多。在民族主义者的独立信念中有一种毁灭性的天真。自由自身从不是道路的终点——只是开始。

4　魁北克



图19　魁北克“十月危机”，1970年



图20　1970年“十月危机”间的“魁北克解放阵线”



图21　克里族，加拿大的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之一。摄于190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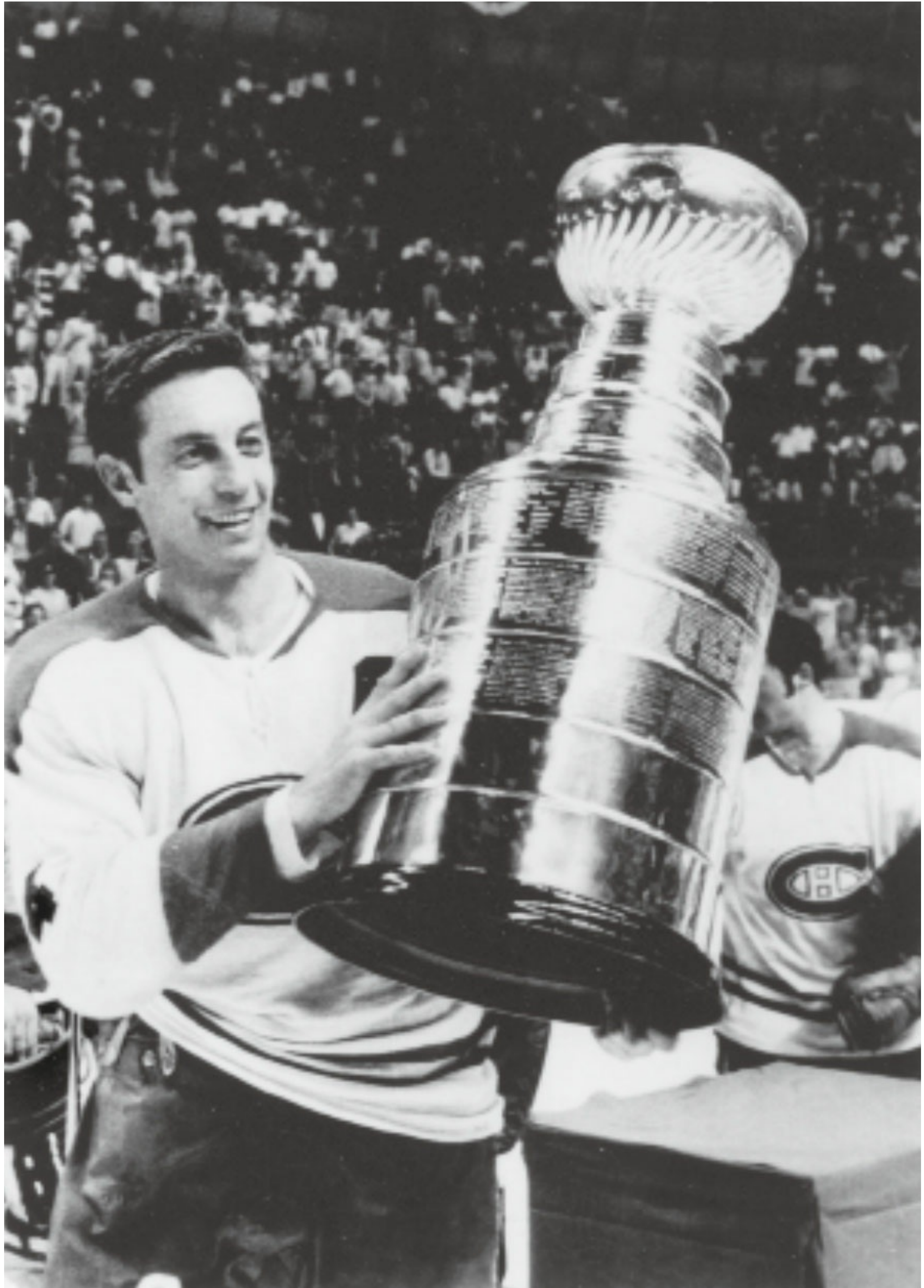


图22　让·贝利弗（Jean Beliveau）拿起“斯坦利”杯，摄于20世纪50年代。让·贝利弗，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效力于蒙特利尔加拿大人队，职业生涯横跨50—70年代，是法裔与英裔加拿大人共同的偶像，2014年过世



图23　1968年9月26日，魁北克圣伦纳德（St.Léonard）的一次关于使用语言的游行示威。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坚持其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恰恰是在失去了许多令其特殊的东西之时，法语正是其中之一。图中最前方的牌子上写着：魁北克，让我们把英语赶走



图24　魁北克党（Parti Québécois）的现任党魁宝琳·马华（Pauline Marois），2012年任魁北克省省长，魁北克独立再次成为热门话题。摄于2014年

法国佬

在墓地里有法国佬（Frenchies）躲在里面，我们很肯定。他们是严苛的天主教徒的孩子，拥有弹弓。我们全都知道他们在那儿，躲在墓碑后面，等着逮我们。墓地在山上，在我们居住的朱莉安娜大道（Juliana Road）上面，我知道我不应该一个人骑车上那儿去。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把孩子拉下车，把他们的车骑走。他们是坏孩子，这是常识。

有一次，我们朱莉安娜大道的英国裔孩子鼓起勇气进入墓地探险。我们按照军事袭击做计划，像沃尔夫将军（General Wolfe）注1759年在魁北克悄悄靠近法国人一样。我们武装了自己——我的衣兜里装满了卡车洒落在街上的锐石和沙砾——我们在通往墓地的悬崖底下成扇形散开，然后我们一个墓碑一个墓碑地前进，直到最顶上，就像我们在电视上的美国骑兵电影中看到印第安人所做的那样。他们比我们大，是无知的大男孩，除了法语什么也不会说，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他们的弹弓用的是真的钢珠。你知道他们的作为，因为在墓地道路的十字路口停车牌上有钢珠留下的整齐的圆形凹痕。

那时我8岁，我很兴奋朱莉安娜大道的大孩子们让我参加这次袭击。我清楚自己有多矮小，怎么样走在他们前面，隐藏在墓碑后面，像一个侦察兵一样行动。那就是我所做的。我是第一个到达墓地山顶的。那儿是如此地安静，隐藏在卡麦隆家、弗雷泽家、麦克唐纳家和罗伯森家的墓碑后面，我因为霜寒而蜷缩成弓形，秋天的枫叶在我的头顶沙沙作响。其他人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到山顶，所以我等待他们，蹲伏在一个墓碑后面，警惕着法国佬，据说他们准备从火葬场的另一边埋伏我们。我可以听到英国孩子们在我后面偷偷地接近，占据他们的位置，并且我知道他们会问我，下一步应该往哪里移动离法国佬更近。我知道我

将不得不说，那儿根本没有法国人，因为我感觉到整个环绕着我的墓地的寂静和空旷。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不会说他们不存在。好吧，他们在那儿，只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看到他们。我们从未看到过他们。



魁北克及周边地区示意图

1. 詹姆斯·沃尔夫（James Wolfe，1727—1759），18世纪英国将军，英法“七年战争”时期英军统帅，1759年奇袭法军驻守的魁北克城。

想象的共同体

你可能从未见过和你一起构成民族的陌生人。所以你想象，你们共同拥有什么东西，在这种共同的想象中，陌生人成为公民，也就是共享同样的权利、共享同一个居住地之图景的人们。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然而，这些想象从未真正重叠，从未真正共享。现在，当我回头审视我以为我们共同拥有的加拿大时，令我震惊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未用同样的方式想象过。伴我成长的神话相信加拿大是两个民族、两种语言、两个历史和两种传统之间的合作。我相信这一点，然而我成长过程中从未真正遇到过魁北克人，而我曾居住的渥太华就在魁北克的河对岸。当我去魁北克的时候，我去东方镇[注]，去讲英语的部分，去我的俄罗斯祖父母居住的房子。

我曾相信，不管你信不信，我所属于的加拿大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榜样。我们是一个双民族、双种族的联邦共同体，是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可以在单一国家的框架内共存的活生生的证明。在我的想象中，我将那个乏味但是复杂的发明——加拿大联邦主义——变成对整个无知世界的一盏道德明灯。打个比方，我不知道，于我而言是家庭罗曼司的东西，对于另一半却是场无爱婚姻。至于被称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的那些土著民族，他们根本没有在我的国家公式中出现过。

回头想想，要让我认为我们——魁北克人和我——确实互相有足够的了解才能组成任何种类的共同体，似乎有些离奇。童年时代的墓地回忆实际上更接近真相。然而，那确实是我的记忆，还是一种幻想？我最好现在坦白，我一直不记得现在我说的事。多年来，我觉得我真的与法国佬打过架。我相信我看到了那些粗鲁的法国大男孩们，他们从墓地高处呼啸而下，用一阵钢珠弹雨把我们赶回朱莉安娜大道。现在我相当肯

定：我们从未见过他们。对我而言他们是幻觉，正如我对他们一样，是他们保留的幻觉。

---

1. 东方镇（Eastern Townships），魁北克东南部旅游区，介于圣劳伦斯河和美国边界之间，以优美的村落风景著称。

民族主义和联邦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种信条，它认为：（1）世界上的人们区分成各个民族；（2）这些民族应当拥有自决权；（3）完全的自决权需要国家地位。

联邦主义不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只是在一国之内的各民族之间分享政治权力的一种特定方式。但它是民族主义的政治对立面。那些相信联邦主义的人坚持认为，要享受自决权，不同的民族不需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共享传统、地理或共同经济空间的民族可能同意共享一个国家，同时对于他们有关民族身份的基本要素保留相当大程度的自治。联邦主义是试图调和两种相互竞争的原则的政治：种族原则，依据是一个民族希望由他们自己统治；公民原则，依据是陌生人希望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平等的共同体，其基础不是种族身份而是公民身份。

世界上的联邦国家——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比利时、印度、苏联——试图使用联邦形式的政府，在种族原则和公民原则之间达成一种平衡。我是一个联邦主义的加拿大的孩子，正如萨尔曼·拉什迪(注)是1947年的午夜创造的印度的孩子。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在成长中都想象我们居住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它找到了一条“克服”种族和宗教部族主义的道路。“冷战”时期的神话——现代世界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取决于这些联邦主义试验的生存能力。

那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冷战”图景现在已不被认可。所有的联邦国家都遇到了麻烦：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的内战，印度的分离主义叛乱，斯里兰卡的种族战争，苏联联邦结构的崩溃，比利时的分裂，以及自1963年以来魁北克分离主义的崛起。

一切开始于1963年，一枚炸弹被放在蒙特利尔英语区韦斯特蒙（Westmount）的一个信箱里。对于我们那一代的每一个英国裔加拿大人而言，在画面粗糙的新闻纪录片中，那个信箱，和跑向信箱的警察——太迟了——以及随后爆炸的尘土飞扬，标志着某种加拿大理念开始走向终结。那是一种密封在林荫茂密的韦斯特蒙街自身的理念。在新闻纪录片中，你可以看到一条正常的、普通的加拿大街道：草坪、枫树在人行道上投下斑纹光线，还有那个信箱。那是我成长于斯的加拿大的图景：郊区，也许有点乏味，但不知痛苦与悲剧为何物。当那个信箱爆炸，当一个十年任期结束时新选举出来的加拿大政治家被绑架、谋杀，尸体被发现在一个轿车的后备厢里，我成长于其中的加拿大开始死亡。魁北克恐怖主义不再是典型的魁北克民族主义，犹如爱尔兰共和军（IRA）不是典型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但是，存在如此痛恨加拿大、宁愿为了摧毁它而去杀戮的魁北克人，这种想法让每一个英裔加拿大人从家庭罗曼司的欢快晕眩中清醒过来。

在一个开始争论自己能否生存，并且从那时起一直在讨论的加拿大，我到了政治上的成年年龄。一开始争论是单维度的：在魁北克和加拿大其他地方之间。很快，第二个维度被加入进来，西部省份的分离倾向浮出水面。第三个维度在70年代加入，出现了土著居民权利，他们对加拿大北部的辽阔区域提出了自决的要求。一维的谈判已经够复杂，当牵涉到三个维度时，必须由专业人士来接手了。关于民族主义未来的争论被政治精英、宪法研究专家接管，我们的民族生命在一种政治危机氛围中已经度过了30年。危机仍未得到解决。我们那一代的一些人已耗费了整个成年后的政治生命来探究这个国家是否能够生存、是否值得生存。在这个时刻，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肯定它能不能生存。

加拿大人以外的其他民族应当关注加拿大会否死去。如果联邦主义在我们的加拿大不起作用，它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起作用。加拿大拥有资源，可以缓和滋养了民族主义的经济仇恨。作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它有一种政治文化，民族主义者的诉求可以在争论中得到调和，

而不是被武力压制。联邦主义还没有失败：这个国家仍然在一起，但调和民族主义的代价是国家核心体制中延续30年的僵局。

争论的要点很简单，宪法谈判的无限复杂性让争论看上去复杂。600万说法语的北美人——魁北克人（les Québécois）——认为他们不仅是一个拥有自己的语言、历史和传统的种族，而且是一个民族（nation），也就是说，是一个拥有政治个性和自治权利的种族。他们这样的构想不仅是从60年代的寂静革命开始，而且可以上溯到1867年的加拿大联邦。“国民”（nation）这个词在他们的公共语言中一直占有显著地位。例如，与加拿大其他省份不同，魁北克的省议会被称为“国民议会”㊟。

加拿大联邦最根本的问题一直是讲法语的魁北克人将魁北克视为他们的民族，把加拿大视为他们的国家，而讲英语的加拿大人认同加拿大既是民族又是国家。然而，只要魁北克相信自己的生存需要加拿大的其他部分，这种不对称就不是致命的。但1960年以来，魁北克利用其在联邦体制内的权力想变成一个国中之国，发展自己的经济。魁北克从来不需要作为一个民族的加拿大，现在它甚至问自己是否需要一个作为国家的加拿大。

8岁的时候，我爬上了罗克利夫（Rockcliffe）的墓地山，搜寻一个注定消失在枫树中的敌人。现在，40岁了，我启程前往魁北克，不仅是来与魁北克人面对面，而且与形成了我的想象加拿大的错觉与幻象面对面。发现他们想象的加拿大并不是和我所想象的一样，我本不应惊讶，但我还是感到惊讶。令我尴尬的事实是，在加拿大居住的20年里，我从未去过魁北克的法语区。我去过蒙特利尔很多次，也经常去东方镇的英语社区，但我从未去过三河城（Trois-Rivières），从未去过魁北克北地，从未去过法兰西在北美现实存在的心脏地带。在所有意义上，这都不是一次回归，而是一次发现之旅。

1. 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7—），印裔英国作家，因小说《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被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悬赏追杀。
2. 原文为法语，L’Assemblée Nationale。

国家和民族

蒙特利尔以北1600公里，在一个花岗岩峭壁下，一个漆成鲜红色的大型悬臂式金属门开始缓缓地升起。四驱车进入一个长长的下降隧道，隧道是在岩石中开凿出来的。金属门关闭，将隧道与北冰洋的空气隔离。在安全检查站，警卫检查了车辆，挥手示意通过。1公里后，车子极慢地停在另一个小得多的门前面。

小门打开，你还没有准备好会看到什么，就步入了一个犹如城堡一般巨大的空间，只不过它是在地下，墙壁是从花岗岩中开掘出来的，天花板上的灯光延伸直到视野尽头。在一面墙上一眼可以看到有低矮的绿色仪表板。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巨大的涡轮正在转动。地板震动。空气中有一种有规律悸动的嗡嗡声。这儿一定有谁在负责，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控制室。你走过去的时候，发现有人在工作的迹象：被抛弃的高尔夫车和几个带轮子的移动工具箱，但你没有碰到一个人。在这个回响的洞穴空间里，你是孤独的。

它叫LG-2，拉格兰德2号（La Grande 2）[注]。世界上最大的地下电站，耗资28亿加拿大元。在地下有10个涡轮机，由拉格兰德河（La Grande River）的水力驱动。现在时间是7点15分。在蒙特利尔，上万个厨房的水壶打开了开关，十万个恒温器开始送热，从韦斯特蒙到乌特勒蒙（Outremont）的卧室里，女孩子们正在使用她们的吹风机。向导说，这是峰值负荷时间。河水在我们的脚下咆哮，涡轮机嗡嗡作响。这里的电力足以为一个200万人的城市提供热量和照明。

我问向导，她的感觉如何。“自豪。”她说，有一点脸红。为她的民族拥有可以阻断河流、建造涡轮机、从岩石上开辟出电站的知识而自

豪。为魁北克自豪。

LG-2在现代魁北克的打造中拥有神话般的地位。它代表了一种民族主义过往的幸福终结，那种诸如此类的过往。我们从前是个落后的社会，蒙特利尔的盎格鲁人掌管一切，牧师们负责。我们的家族太庞大了，我们贫穷，我们在农场里挣扎，再也不会了。我们的时代到了，我们自豪。

我们现在是自己房子的主人，LG-2证明了这一点。用便宜的电力，我们可以建设自己的经济。我们可以向美国人输出电力。我们可以付得起通往世界之路。

1962年，魁北克将其水电资源国有化，这是它试图成为加拿大联邦的国中之国的第一个重大经济步骤。水力在魁北克民族自尊构成中的重要性，正如阿斯旺大坝（Aswan Dam）对于纳赛尔的埃及，凯泽铝冶炼厂对于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的加纳。水力的国有化开启了该省一系列的经济解放。现在魁北克有一大群重要的经济机构，完全独立于加拿大人或美国人所有。还有另一家魁北克经济独立的重要机构，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Caisse de Dépôt et de Placement），它以魁北克的地方养老基金进行投资。现在它是北美第五大投资资本组合。另外，还有通过合作性的储蓄银行例如德信金融（Caisse Desjardins）聚集的投资资金，资产超过450亿加元，以及巨型私人企业，如生产雪地摩托车和公共交通系统的庞巴迪（Bombardier）。

从一个英国裔加拿大人的视角来看，讽刺之处在于，这些发展本应让魁北克人觉得他们不太需要加拿大，可事实上却让他们感到更加需要加拿大。因为魁北克的国家资本主义深深地遵循着加拿大的模式。考虑到国内市场规模小，而国家疆域广大，加拿大政府及其商业阶层一直致力于协同发展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公共企业——从铁路，到航空，到加拿大广播公司，到魁北克水利（Hydro-Quebec）——在加拿大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比在美国更为重要的角色。加拿大125年国家资本主义

的结果是一种实用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左的公共文化的出现，在魁北克和加拿大英语区都是如此。

魁北克的经济成熟没有令它发现任何与加拿大其他地区的共同之处，反而证实了一种感觉：它可以独自前行。随着魁北克的商业精英首先进入北美市场，随后进入全球市场，他们将加拿大市场以及他们与加拿大英语区商业阶层的文化和政治联系看成一种历史的残留，是他们做伐木工人和抽水工人之魁北克时代的遗迹。

在蒙特利尔，我去拜访克劳德·贝兰（Claude Béland），他是不仅管理着魁北克的经济，而且象征着其在独立倾向上日益增长之自信的人之一。从德信大厦（Complexe Desjardins）40层的一个办公室里，他管理着400亿加元的投资基金，是小储户、投资者在德信储蓄、贷款和信用公司（Desjardins savings，loan and credit company）的存款累积起来的。两代人以前，像克劳德·贝兰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一个魁北克人可能为在蒙特利尔的皮尔街（Peel street）管理加拿大市场的英加银行与安全署（English Canadian banking and security houses）担任高级会计师。但魁北克人从未在一座塔楼的最顶层拥有一间带转角的办公室，拥有可以看到冰封的圣劳伦斯河的风景，指尖操控着400亿元价值的投资基金。

他说，30年前，德信的借贷和投资全部都是在加拿大市场以内。现在，他们的生意有一半在海外。魁北克在国际金融的盛宴中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

看上去，克劳德·贝兰像一个北美的银行总裁：银发，穿完美得体的深蓝色西装，用流利的英语接听从芝加哥、纽约、洛杉矶和伦敦的分支银行总经理打来的电话。然而，有其他北美重要银行的总裁的母语是法语的吗？还有其他北美银行总裁是民族主义者的吗？

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是民族主义者。作为一个谨慎的会计师，他曾

认为，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主权独立是一个风险太大的选择。现在，他已改变了想法，为什么？

“好吧，你知道，因为国家是保护一个民族的身份的唯一方式。我所定义的身份是在一个人的价值观及其行动之间的调和。换而言之，你知道你是谁，而且你想保护它……让它得到承认。”

对我而言，一个银行总裁讨论“身份”这种形而上的主题似乎有些奇怪，所以我问他，国家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予身份，还是因为它完成了经济的解放？是哪一个，钱包还是灵魂？贝兰并不想做出选择。他说，独立与两个维度都有关。我们拥有太多同一层面的政府。魁北克像是一个公司，“拥有两个财务经理、两个市场总监、两个资源副总裁”。我们都只需要一个，而且我们想要的都是魁北克人。我问他，他是否担心过魁北克在未来连通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内的位置。在加拿大英语区，对于文化和经济生存的焦虑非常普遍。但在克劳德·贝兰的圈子中不是这样。“不，人们与我们做生意，不是因为我们的政治，而是因为我们是好的买家，以及我们生产好的产品。”

总裁的公关代表带我出去，沿着行政套房长长的、铺着宽幅地毯的走廊走下去，我发现自己迷惑于这样一个悖论：像贝兰这样的人作为参与者加入全球经济时，对于被称为魁北克的全球一个小小的角落的民族主权，他们没有失去兴趣，而是变得更有兴趣。我曾经认为，全球参与者不会再关心民族。我错了。换句话说，存在这样一种人，他们相信大陆自由贸易和资本市场全球化的到来强化而不是弱化了一个要求主权独立的魁北克。

加拿大英语区注视着魁北克自1960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以克劳德·贝兰这样的人为代表，他们说：“如果能够在加拿大内部做到所有这些事，为什么不留下呢？”加拿大已经是世界上最离散化的联邦。而魁北克注视着自身的转变，说：“为什么我们要留下？”

1. La Grande为法语，意为伟大的。

民族主义和落后的民俗学

在这儿，还有更进一步的悖论。从前，由于经济相对落后，加拿大英语区对魁北克经济的控制受到民族主义者的指责。人们也许期望随着经济落后得到克服，经济民族主义也会退潮，并非如此——至少魁北克的例子有其指导意义。这是一个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经济追赶上来的民族，他们不再感到被蒙特利尔的盎格鲁—加拿大精英所支配。如果你问他们，他们最后一次为讲法语感到羞耻是什么时候，他们得追溯到他们的父母那个时代，或者回到他们的童年时代，那时在希尔布鲁克大街（Sherbrooke street）或者T.伊顿（T.Eaton）百货公司的丽兹·卡尔顿（Ritz Carlton）酒吧，除非你说英语，否则他们不会为你提供服务。这些记忆不是个人化的：它们是来自糟糕的旧时代的神话。当个人的记忆消融成神话，人们也许会期望民族主义感情退潮。然而，情况恰恰相反。

以赛亚·伯林曾经将民族主义比喻成一个被弯曲的树枝，如果受到抑制，一旦松开，它会以双倍的力量迅速反弹回来。魁北克的树枝已经被松开很长时间了，但它的力量还远未释放完。这意味着什么？首先那种不满不会因为身处过去就停止变成现实。集体神话不需要个人记忆或经验来维持其力量。英国人在234年前征服魁北克，在亚伯拉罕平原（Plains of Abraham）[注]上，在魁北克城，在这些曾经战斗的地方，孩子们现在玩着雪橇，魁北克嘉年华的号角声声远传，山坡上到处都是喝啤酒的人群。征服已是久远的历史。没关系。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仍将其民族主义规划称为“la reconquête de la conquête”：征服的再征服。然而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正是在魁北克最终克服失败的时候，魁北克民族主义将民族的战败化成了一个神话。

这不是唯一的悖论。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坚持其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恰恰是在它失去了许多令其特殊的东西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在大跃进的前夕，魁北克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毕竟，落后也是一种形式的特殊。魁北克的小城镇以及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在教育和识字率上落后于加拿大整体水平，其公共文化是威权性的；人口统计上而言，它的家庭结构在北美是独一无二的，家庭通常有10个孩子。

魁北克的寂静革命意味着克服其落后的特殊性，它做到了。它曾拥有北美最高的人口出生率，而现在，魁北克已位居人口出生率最低之列；它曾拥有北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人口，而现在魁北克跻身受教育程度最高之列；它曾是北美最为虔诚的宗教社区，现在它是最不遵守教规的地区之一；它曾拥有一个威权政治文化，现在魁北克以其自由和公共辩论的开放性而自豪。

魁北克的特殊性过去像阿巴拉契亚人（Appalachians）或是美国南部的人，是一种与乡村的相对贫困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主义。现在，就像北美其他这样的地区一样，它为自己开启了一种大陆式的生活方式。星期五的晚上，魁北克人蜂拥上路，开着切诺基或温尼贝格房车（Winnebagos），戴着棒球帽，收音机调到当地的乡村或西部电台，前往乡村的小屋，对于外人，这种景象可能是在明尼苏达州或者美国任何其他的州，或者加拿大其他的省份。直到他们开口说话，原来是他们。

魁北克人关于其现代化、其融入北美社会的所有焦虑都集中在对语言的保护上。生存（La Survivance），最重要的，是语言的生存。魁北克民族主义政治的核心要求一直是魁北克成为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国家。民族主义者迷恋语言，一种要求所有的路牌包括停车（Stop）标志都使用法语的痴迷，而如果你明白，引导路牌常常是唯一可以表明你在魁北克而不是在明尼苏达州或佛蒙特州的标志，这种痴迷就可以理解了。

民族主义常常是对现代性的反动，一种对经济上受困或衰退的阶层和地区之落后的辩护，用以对抗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犹太主义等的火苗。直到60年代，魁北克的民族主义经常持这种论调。现在它不这样做了。就其自身而言，这令人惊奇。考虑到从那以后社会现代化的发生速度，人们原本预期，就现代性对魁北克社会之特殊性的作为，魁北克民族主义会感到遗憾。恰恰相反。民族主义者不断地强调他们是现代性、改革和世俗国家的肇因：攻击教堂在教育和道德生活方面的权力，促进妇女的权利和性自由，寻求在北美经济的核心给予魁北克一个安全的位置。在魁北克，身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意味着做一个进步的、现代的人，一个法兰西的北美人。

对照加拿大英语区和魁北克对美国的态度，相当令人惊奇。在大多数加拿大家庭中每晚有多达60个有线电视台实施电子轰炸的情况下，关于加拿大文化是否能够保留其特性，在加拿大英语区，几代人为此激烈争论。魁北克最大的有线电视公司威迪通（Videotron）将所有的美国肥皂剧送入魁北克的千家万户，但他们知道，最受欢迎的是那些在魁北克编剧、制作的节目，它们让80%的魁北克人晚上留在家里。只要他们能看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己想要的东西，魁北克人就相信他们的文化是安全的。

魁北克人认为他们的语言是一面看不见的盾牌，可以保护他们的文化完整性，避免北美标准的影响。法语让魁北克人对美国人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信，对此英裔加拿大人只能羡慕。然而同样是魁北克人，在涉及他们自己的非法语少数民族时，没有展现出同样的自信。他们始终担心自己不断降低的生育率以及不断增加的非法语移民浪潮会稀释法国人在北美的存在。他们试图控制移民政策以最大限度选择说法语的移民。他们立法限制人们送孩子上英语学校的权利。语言警察被派到东方镇那些讲双语的、安详的村子，把街头小店用微小的英语字体写的硬纸板拍下来。店主受到起诉，这令讲双语的英语母语者和法语母语者都大为愤怒。语言政治的小家子气，让魁北克人规划其生存和繁荣能力的文化自

信成了空谈。

---

1. 魁北克城西部平原，1759年英国军队在詹姆斯·沃尔夫指挥下偷越过法军防线，在亚伯拉罕平原与法军展开会战，并击溃法军，占领了魁北克城。

在两个小丑咖啡馆

一个北极之夜，在老蒙特利尔的两个小丑咖啡馆（Two Clowns Café），我和六个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碰面，谈论语言问题。就我而言，对这个碰面带有的期待，与我8岁爬上那个墓地山时的感觉一样。现在，如同当年，我要碰到“对方”。我知道这很荒谬。毕竟，我们难道不是拥有同样的护照吗？不是喝同样的啤酒——莫尔森（Molson）、拉巴特（Labatt）吗？我们的记忆难道不是充满了同样的英雄——莫里斯·理查德[注]、让·贝利佛[注]，这些50年代出自蒙特利尔的不朽的加拿大人吗？然而我们的政治设想是如此的不同，好像我们是在不同的国家。

在两个小丑咖啡馆里的这个群体中，有跟我一样年纪的妮可，她是魁北克教师工会（CEQ）的组织者。她的工会是独立派，她也是。妮可和我发现，我们有共同的体育英雄、共同的文学英雄（巴黎派作家），并且同样喜爱雪后寒冷明亮的冬日早晨。我们也分享共同的记忆：1970年的“十月危机”。对于我，那是加拿大政府打破魁北克激进民族主义之后盾的时刻。总理皮埃尔·特鲁多[注]下令逮捕了500多名魁北克知识分子和武装分子，随之而来的是一名魁北克政治家皮埃尔·拉波特（Pierre Laporte）遭到绑架并被谋杀。对于妮可，在那个时刻，她发现自己再也无法自称为加拿大人。因为她是被捕者中的一员，未经审判被捕，然后突然又被释放。“为什么？”她捻灭香烟愤怒地说，“不是因为我在地下室制造炸弹。我没有。而是因为我拥有某些朋友。”这是我们之间存在分歧的一个时刻，一个相互的良好意愿和对同样事物的喜好无法克服的时刻。对于我，特鲁多仍然是那个我要用全部生命去信仰的联邦主义理想的最优秀代表。对于妮可，他是个叛徒，是会毫不犹豫地粉碎他自己人民的民族主义的本地之子。

妮可用她直率的说服力和刺耳的笑声主导着谈话进程，此外还有几个年轻的研究生，他们刚刚取得法律和人类学博士学位，还有一个说话柔和的年轻金发女子，她是魁北克最古老的温和派民族主义社团让·巴蒂斯特（the SociétéJean Baptiste）的主席，他们和其他团体一起组织6月28日魁北克“国庆日”那天横贯蒙特利尔的大游行。

这是一场典型的蒙特利尔式的谈话，以惊人的速度在英语和法语之间切换。我问，如果他们所有的人都能说流利的双语，为什么魁北克必须是单一语言的？让·巴蒂斯特社团的主席说，因为“在北美我们有600万人，而你们有2.5亿人”。

而且，一个年轻的人类学女学生说：“移民们来到这里，他们全都想学英语，如果他们这样做，我们将失去蒙特利尔。”

“失去蒙特利尔？”

“是的！失去蒙特利尔。在一个法语国家中会形成一个说英语的孤岛，那是不可容忍的。”

“不可容忍。”他们都说。

“你们都担心生存。但感谢上帝，你们已经生存下来了。为什么你们还这么担心呢？”

来自让·巴蒂斯特社团的女子说：“是的，我们已经生存下来了，但是看看代价。我们本来到现在可以有1200万人，但有一半人都去了美国。”

“你想阻止他们吗？”

“当然不是。但关键是，我们被一种外部文明包围着，我们必须保护自己。”

我还是无法理解。语言完全得到保障，标识法禁止英语的公共使用。在加拿大所有的省份中，唯有魁北克对移民事务享有充分司法权，它获得了征募法语移民的权利。公立英语学校的董事会不允许接受父母说法语的学生（而私立英语学校里满是魁北克人的孩子，他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双语教育）。

一个人说："那个，其他地方允许公共资金资助的学校系统采用与主要民族语言不同的语言吗？"

"很好，"我回复道，"我不是说魁北克人不宽容。你们不是这样。我是在问，为什么你们感到如此不安全。为什么你们相信你们的语言需要一个自己的国家来保护它？"

"我们并不是不安全，"妮可恼怒地说，"我们只是想要待在我们自己的家里。"

"是的，坦白说，我们厌倦了在加拿大做少数民族。我们想要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做多数派。"

"哇喔，"我叫道，"这听上去太糟了。多数人的暴政吗？"

"那不是多数人的暴政，只是民主。"一个戴眼镜的法律学生说。

"就算你们正确，"我说，"假定你们需要一个国家保护你的语言。你能肯定它可行吗？"

"当然，我们是魁北克有限公司。"

"但如果你们错了，会怎么样呢？你们不用支付代价——你们都有学位。你知道谁会买单吗？三河城的纸浆工人。他们是为一个错误的民族主义实验买单的人。"

“多么邪恶的论点！”妮可大叫起来，带着夸张的愤怒，“道歉！道歉！”她笑着，但半带认真。

“回答问题。”

“亲爱的，我为工会工作。不要告诉我工人们会怎么样，再也不要离间我们，他们和我们一样想要独立。”

谈话就这样继续，空了的啤酒瓶堆在桌子上，酒吧变得越来越吵闹。这个群体的部分成员一语不发，似乎隐瞒着什么，令压力在他们的内心积聚。在酒吧乐队唱歌声音的间隙，一个年轻的人类学女学生非常平静地对我说：“看，我们只是想要一个他们像对成年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地方。我们只是想要像成年人那样被对待，而不是像孩子那样。”她险些落泪，在随后的沉默中，这让我明白，在她对这个我们要共享的共同体的想象中，她将它看作一个家庭，我和我说英语的同类是从不聆听的父母，而她的魁北克是那渴望在这个世界上获取作为成年人的一席之地的年轻女子。

对这样一个深沉的神话，你能说什么呢？它是一种情感，而众所周知，我们无法与情感争辩。但它们可能大量产生误解，就像我童年时代相信，墓地悬崖顶上藏着法国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会偷走我们的自行车。

在两个小丑的时间已经很晚，该走了。在外面北冰洋凛冽的空气中，我裹紧冬衣，整晚没有说过一句话的年轻人走过来，平静地轻声说：“奇怪我们还那么大声地讨论，不是吗？似乎我们魁北克人还在努力证明自己什么。”

---

1. 莫里斯·理查德（Maurice Richard，1921—2000），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
2. 让·贝利佛（Jean Béliveau，1931—2014），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
3. 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1919—2000），加拿大第15任总理，执政生涯长达

16年，出身于蒙特利尔法裔家庭，但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对魁北克独立。1970年“十月危机”期间以强硬政策应对魁北克恐怖主义。

两次谈话

丽兹·比索内蒂（Lise Bissonnette）与我同年，她泼辣而有条理，是一名报纸编辑、专栏作家，一个对魁北克主权独立复杂而微妙的支持者。我和她的谈话是在她所在报纸《义务报》（Le devoir）的新办公室。这份报纸是由爱德华国王时代魁北克伟大的民族主义英雄亨利·波拉萨[注]创办。

不，她说，她不想被称为民族主义者。“狭义的民族，你知道，民族这个词的种族含义，”她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对我而言是不相干的。”很奇怪，在任何地方，被外界视为民族主义者的人们几乎没人从内心认可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她说，这个词意味着把你自己封闭起来，而对于她，魁北克的文化应当向世界开放。

我问她，在魁北克的语境中，做一个民族主义者是否必然意味着对一个独立的魁北克国家主权的承诺。从魁北克民族主义在加拿大内部的大部分历史来看，它一直想从加拿大得到更多，而不是离开加拿大。所以我告诉她那个古老的笑话：“魁北克想要的是在一个统一的加拿大之内的独立的魁北克”，问她是否还是这样。“当然，”她说，“为什么不呢？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人们两者都想要。独立存在风险，所以魁北克人可能不爱加拿大，但他们喜欢加拿大，他们想保持联系，作为某种安慰。”她说，即使魁北克人给特鲁多投票，也不是说他们必定投票选择联邦主义和加拿大。他们是为他们自己人投票，“他们在玩部族政治”。特鲁多本人听到这话一定会很惊讶。他将魁北克民族主义视为当地精英玩的一种语言游戏，为的是从渥太华攫取最大利益，确保他们对地方政治的控制。他坚持认为，普通投票者看穿了这个游戏，他们投票给他的时候，是在投票给加拿大。

但是，我坚持问，如果你们在如此多的领域已经拥有专属司法权，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国家？那不是真的，她表示反对，加拿大的联邦主义“正一天天变得越来越集中化。联邦政府正在进入教育和人力资源培训领域，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加拿大英语区可不是这样认为的。政府拒绝了将联邦体制进一步分散的建议，是考虑到进一步的地方自治将让国家自身难以存在下去。再一次，什么是真实的或不真实的已不在讨论之列。关键是，我们对同一个共同体的想象根本就没有交会。

我问她，对于两个民族在一个国家中共同生活的联邦主义理念，为什么魁北克人投以如此之少的热情？她向前俯身在桌上，轻快、不屑地说：“首先，英裔加拿大人提出那种理念的时间很短。在60年代你不大能听到这种观点，那时人们还在努力反对法语可以在这个国家成为官方语言的简单思想。在我看来，双民族国家之梦是多伦多的文化体制对待这个国家的方式，它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但是，我坚持说，在一个被种族民族主义撕裂的世界中，让种族群体和平共存的联邦主义就无处言说了吗？她不想让步。那是一种英裔加拿大人的理念，她彬彬有礼但是态度坚决地说。加拿大已经失败，它说自己是双语、双文化的国家，但是去哈利法克斯或温哥华看看，你会发现不是这样。唯一接近这种理念的地方是蒙特利尔。她似乎在说，魁北克证明自己在多种族、多文化理念方面比加拿大自身做得更好。

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想看到魁北克在联合国拥有自己的大使馆和自己的席位。但她确实相信，魁北克历史的所有动力都在引导它从加拿大分离。

阿兰·迪比克（Alain Dubuc）是蒙特利尔最大的法语日报《新闻报》（*La Presse*）的主编。他将自己描述为一个“非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换言之，一个觉得自己的民族是魁北克，但国家仍然是加拿大的人。听着，他说：“我真的不关心加拿大，我没有很多精力倾注给这个国家。我所有的精力都投向魁北克。”

但如果你对加拿大的感情如此淡薄，我问，为什么你还想留在联邦里面？“因为，”他带着迷人的微笑说，“我们被绑在一起。我们是两个一起长大的有机体，产生了一些联系，这些联系很强。”自此以后，分离是沉重的、昂贵的、有风险的。

如果是这样——分离无疑将是昂贵的、创伤性的——为什么一些魁北克民族主义者仍然坚持要分离？你得记住，他说，我们的父母们真的遭受过苦难，“他们不是南非黑人，但他们贫穷，而且在魁北克他们拥有的生活机会没有说英语的人多。他们不得不向英语屈服。他们被迫在不想说英语的时候说英语。我们仍然拥有身为‘porteurs d’eau’(注)——伐木工人和抽水工人——的形象。它是我们民间传说的一部分，而我们的民族主义也是传说的一部分”。

但是，我认为那将意味着民族主义的议程只是抹去旧的记录。如果它只是解决旧问题，它与今日的魁北克有何相关呢？迪比克微笑着耸耸肩：“当然不是。我们如何适应经济的全球化？我们如何与成千上万从不同的文化来到这里的人们打交道？在一个独立的魁北克，这些问题仍是相同的。”

那么，在此意义上，魁北克分离主义的议程是无关的吗？迪比克点头说：“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拥有一个19世纪的国家观念，即拥有一个政府、一支军队、一面国旗、一个联合国席位，诸如此类的东西。国家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工具，如果你分离出去，并不必然说你将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拥有你自己的边境、边界、旗帜……”他轻蔑地挥了挥手，“那是在做梦。”

然而，如果情况是这样，为什么双语言、双民族的加拿大的理念从未在魁北克流行呢？迪比克微笑着说：“讽刺之处在于，加拿大唯一接近这个理念的地方，唯一你能找到说法语和说英语的人一起工作的地方，是蒙特利尔。”

我说，那么“魁北克是加拿大之梦——我的加拿大之梦——唯一真的在付诸实施的地方”。

“正是如此。”他带着讽刺的微笑说。

如果这两次谈话对于蒙特利尔的作家、记者和编辑们讨论的问题有任何指导的话，显然在魁北克不存在对联邦主义有激情的、令人信服的辩护。特鲁多和他那一代魁北克劳工领袖、作家和公务员曾为一个以加拿大为家的魁北克而奋斗，但似乎他们用双民族、双语言的国家理念说服的唯一民族是英裔加拿大人。而这种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的转变来得太晚了。因为到这个时候，魁北克舆论的浪潮已经无可挽回地偏离。我和这两个新闻记者的谈话似乎表明，特鲁多的一代在魁北克后继无人。

这并不意味着在魁北克没人捍卫加拿大。民意调查表明似乎有一种三派的分裂：选民的三分之一稳定地反对任何主权的变化，三分之一同意，还有三分之一有被任何一方说服的可能。但看上去很显然，如果加拿大拥有自己的捍卫者，他们是像迪比克这样清醒、非情绪化的反讽者，认为主权是一个过时的19世纪抽象概念，与现代的全球经济毫不相干。在其反面，是像丽兹·比索内蒂这样的人物，他们认为维系加拿大的努力是在无效地分散魁北克精英的注意力。应当将目光完全转向魁北克文化和经济的建设事业。因此，魁北克精英内部的基本争论是在民族主义观点的框架内设定的，例如在那些相信一个民族必须拥有国家的人和那些相信民族可以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获得想要的一切的人们之间。

英裔加拿大人仍旧苦恼和迷惑地在问，要求分离的加拿大法语区的不满到底是什么？但那也许是个错误的问题。魁北克的民族主义很久以前就不再是仇恨的民族主义。过去的记录已经被抹去。现在它是一种自我认同的话语。基本的驱动力不再是过去不公待遇的传说记忆，起作用

的驱动力是一种对权力和成就的感觉。它是一种对加拿大英语区敌意越来越少的民族主义，这只是因为对于绝大多数魁北克人，随着盎格鲁—加拿大人对经济的控制逐渐减弱，加拿大英语区整体上变得越来越与自己无关。正如阿兰·迪比克所言："我喜欢拜访那儿，但它仍然是外国。"

几乎可以说，只要还在围绕双方关系打造仇恨的话语，魁北克就会与加拿大绑在一起。联邦主义像某些既一致而又矛盾的婚姻，双方各自都对另一方不满，这是一致的。现在这些不满在消退，他们越来越没有理由"同床共枕"。

魁北克不再根据加拿大来界定自己。魁北克内部政治辩论的双方都想当然地认为，LG-2这样的地方已经给予魁北克经济的独立和内在的信心——一个民族需要成为一个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争论的双方都觉得，他们脚下那些魁北克涡轮机的电力既是现实的又是标志性的。留下的唯一问题是他们有无必要在发电站上空升起一面主权国家的旗帜。

---

1. 亨利·波拉萨（Henri Bourassa，1868—1952），法裔加拿大政治领袖，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思想之父。
2. 原文为法语。

部落和民族

自决权和民族体话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它会传染蔓延。魁北克发现了一个也将自己称为民族的人群。

离通往LG-2的大红门大约65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捕猎人的小屋，它位于一片巨大、平坦、白雪皑皑的松树森林中。炉子里生着火，我正在准备雪地装备，要和比利出去一天。

比利是一位克里族猎人，这些冰冻森林是他的王国。我们身处克里族领地之中，这是一片广阔的区域，拥有森林、河流、沼泽和湖泊，面积大体上与德国相当。比利的族人现在大约有11000人，5000年来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狩猎、捕鱼。跟许多土著民族一样，他们已经接受了欧洲人的词汇“民族”，用来描述他们自己，尽管这个词不是他们的本土语言，但看上去他们肯定是一个“民族”。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口头传说，一种以小木屋和设陷阱的路线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一种了解其环境的知识，详细到可以被称为科学。

比利将他的卡宾枪甩到背后，启动了雪地摩托，示意我进入他拉在后面的血迹斑斑的雪橇。然后我们出发了，在森林小路上飞驰，冷杉树枝拍打着我的护目镜，鹅毛般的雪在身后飞舞。比利时不时停下来检查驯鹿在雪地里的痕迹，而我跺着脚、摩擦自己的脸来抵抗严寒。

突然，驯鹿闯入我前方的视野，一对巨大的雄性驯鹿，体形跟马差不多，拥有蓬松、奶油色的皮毛，耳朵警惕地支棱着。它们靠得够近，比利可以一枪命中。但他反而停了下来，我们看着它们在齐腰深的雪里跃起跳下，努力营造一个覆盖树木的安全处所。几分钟后，它们消失

了，森林恢复了平静。

比利担忧驯鹿正在抛弃他的国家。他的陷阱也是空的，鱼钩不像从前那样带来鱼。他的村子移到了更高的地面，设陷阱的路线被输电线路和防火墙分成两半。在新的水库里，水银含量正在毒害鱼类。他的土地就在眼前改变。他的不幸，以及他的微型民族的不幸，在于他们正位于LG项目的路径上。魁北克水电（Hydro-Quebec）在比利的河流上修建了大坝，形成一个巨大的水库，淹没了他狩猎的土地。河流不再是他的，它属于从南方来的白人。

“属于”这个词以及与其相伴的财产的概念，对于克里族是陌生的，正如“民族”这个词一样。民族主义可能是西方关于自然的浪漫主义的一种形式，但在西方传统中，爱国主义与财产有关，隐含着对自然无止境的占有。而对于克里族，这是一个陌生、无礼的概念。比利不认为他拥有土地，他相信自己是土地的一部分，是众多依靠土地生存的生灵中的一员，他不仅依土地而活，且依它看到整个世界。在蒙特利尔以北1600公里的这儿，从比利的寒冷蓝天之下来看，西方民族主义不是一曲土地的狂想曲，而是一支占有与掠夺之歌。民族主义颂扬民族的土地，最好是征服它以用于人类目的。比利的要求则是做它的管家和仆人。

因为土地被拿走，克里族获得了大量从天而降的金钱作为补偿，有数以百万计的加元。现在他们拥有作为家的拖车，有四驱汽车、雪地摩托，每年还从政府那里得到有保障的收入。他们的村子拥有一个新的社区中心，有一个超市，在那里他们可以购买新鲜的苹果和西红柿。有一个新的冰球场，孩子们晚上可以去玩。但没有人忘记所失去的东西，即使是在冰上滑行的孩子们也穿着印有“奇萨西比[注]的前猎人”的冰球衫。

詹姆斯湾（James Bay）项目是可能独立的魁北克的动力站。魁北克说这个项目是现代化，是发展和进步。比利说它是一种侵略。两个民族的权利产生了冲突。一个是庞然大物，拥有数十亿元的资源去付诸实

施；另一个非常弱小，它这一方所拥有的全部只是一个理由：如果你为自己要求自决，怎么能够拒绝我们的自决？对于比利和克里族，大坝、电站、电力线路、水库也是一种标志，是对他们的掠夺的标志。克里族正在反击，像全世界的土著居民一样，他们诉诸自己的民族性和自决权的话语。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精明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让魁北克人作茧自缚的言辞。在提交给纽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的文件中，克里族大酋长马修·恭·甘（Matthew Coon Come）说出了他的民族的宣言：

自决是一种属于各民族的权利。它不属于国家。它是所有民族的权利。它是普遍的、不可分割的，也就是说，你要么拥有它，要么不拥有它。它不是一种可以由其他人授予民族的权利。请明白，你们也许会为实践这种权利而战斗，但不会为自决的权利而谈判，因为它已经是你所拥有的。

这种话语惊醒了魁北克，自决看上去意味着与自我治理有某种不同。魁北克很快承认了后者，但否定了前者。最近，魁北克土著事务部长说："土著人自我治理的唯一限制是保持魁北克领土的完整性。"他还说："在此意义上，在允许建立种族聚居区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在这些聚居区，魁北克的法律不再是优先考虑。"

克里人相信自决与他们所居住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性是相容的。自决不必是绝对的，它并不意味着正式的国家地位、国旗、联合国席位。无论如何，克里人很快指出，这些都是白人的发明。自决意味着终结对政府救济的长久依赖，意味着不再是对其土地破坏消极的旁观者。它不仅意味着在水电设施开发土地上进行狩猎和捕鱼的专属权利，不仅意味着在通往主要村庄的道路上设置检查站、限制酒类输入的权利，不仅意味着市政的自我治理。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停止进一步的水电开发。魁北克政府关注着拉格兰德河以北的大鲸河（Great Whale River）系统，以及拉格兰德河以南的诺特韦（Nottaway）河、布罗德贝克

（Broadback）河和鲁珀特（Rupert）河系统。如果两者都完成，整个克里族领地——它的河流、森林和营地——都将从头到脚被绑住，陷入由电力线路、道路、大坝和电站组成的严密的网络中。克里族将成为他们自己故土的幸存者。

而这些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地区开发的成本是个天文数字：120亿—150亿加元。每个消费者的电力账单中，已经有40%的部分用于支付魁北克水电现有项目的负债。魁北克说廉价的电力是它在北美经济中的核心竞争优势，它的电力费率在北美处于最低行列。但它们之所以便宜，只是因为北部开发项目的债务负担被剔除在计算等式之外。如果新的项目继续进行，债务负担将会恶化，而如果节能措施引起需求下降，债务负担将变成一场灾难。换言之，民族开发已经达到了一个承受极限，不仅是对克里人的环境而言，而且是对魁北克民族的承受能力而言。魁北克电力的未来需求是不确定的。美国东北部各州并没有等着与魁北克签署新的电力协议。在多个案例中，克里人能够劝说美国监管当局取消此类交易。

如果魁北克说，够了，适可而止吧，在魁北克北部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有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克里人的民族自决并不意味着国家地位：它意味着文化和经济的生存，进而意味着在一个经济大发展的空隙中，得以保留一种狩猎、设陷阱和捕鱼的经济。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展示了巨大的灵活性：枪、雪地摩托、民用电台全都毫不费劲地被吸收、纳入克里族猎人传统的生活方式中。但他们需要时间来调整，他们需要确保不会发生进一步的侵蚀。对于进一步的建设，不存在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论据。

如果魁北克真的继续在大鲸河开发，破坏克里族领地，它之所以这样做，将是因为民族自尊的话语压倒了经济上的良好意愿。民族主义在涉及经济问题时的弊病，是它所投资项目的象征意义之重要性使得政府无视现实。如果詹姆斯湾项目是埃及纳赛尔的阿斯旺大坝、独立后加纳

克瓦米·恩克鲁玛的水电和铝冶炼厂，其传递的信息是种警示。在后面这两个例子中，民族独立的宣言让他们的社会濒临破产边缘。民族主义的狂妄是否会令魁北克过高估计自己，仍有待观察。魁北克既不是加纳，也不是埃及，它是一个先进的发达社会，但风险仍然存在。当经济发展披上民族自尊之需要的外衣时，惩罚已等在后面。

---

1. 奇萨西比（Chisasibi），克里族村庄，位于詹姆斯湾以东，距拉格兰德河河口约10公里。

权利和生存

克里人和魁北克人都基于文化生存而提出他们的民族自决要求。这种生存和自决之间的联系在每个地方都是民族主义诉求的中心，但它值得怀疑和审视。

克里人作为个体的生存没有问题：他们的出生率、人均收入和教育水平都在增长。考虑到这些事实，他们当然能够作为把自己当作克里人的个体生存下去。他们是否能作为一个民族——清晰的、拥有根植于土地的生活方式的民族——生存下去，却不那么确定。你可能认为应当由下一代——那些穿前猎人的运动衫在冰面上滑行的少年——来决定是否仍然保留狩猎和捕鱼经济、延续他们的文化。如果是这样，那么就不是讨论生存本身，而是讨论选择何种生存方式的权利。旧有的生活方式必须得到保留，未来后代的选择自由才能得到保留。

为了保留这种选择，加拿大联邦政府开始将地方政府、警察和司法部门转交给原住民族。在北部的许多原住民社区，司法部门已经由原住民长者和南部来的地方法官共同管理。加拿大法律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但这些社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这是在加拿大南部比如意大利人或华人未能享有的。

因此，满足文化生存的要求，意味着加拿大原住民可能将享有比其他人群更多的自治权利。考虑到这些权利并不侵犯其他加拿大人的权利，也不会达到从加拿大国家分离的程度——他们不会分离，联邦主义从而可以在一个国家中容许个体享有权利的某种不对称。

但联邦主义是否可以包容一种情况，即符合一个民族之人民的族群

权利貌似侵犯了那些不属于这个民族的群体的权利？至少对于英裔加拿大人，这是魁北克语言管制法所代表的一种道德挑战，该法限制在指示牌上使用英语，并且限制获得英语教育的途径。

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确立法语的地位是魁北克人身份得以保存的前提。他们居住在一个有3亿人说英语的大陆上，他们的自然生育率正在降低，每天都有移民到来，这些人的第一语言不是法语，而他们学习新语言的第一偏好是英语。

这就是政治共同体已经完成的魁北克人和英裔观点之间的对峙僵局。魁北克民族主义者简单地否认基本自由受到标识法的限制，而说英语的社区简单地否认魁北克人的文化生存处于危机之中。

同样的僵局可以在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观察到。例如，在拉脱维亚共和国，俄罗斯族在首都里加（Riga）占据多数，这个事实被用来为一部新的公民法提供正当理由，该法将说拉脱维亚语的能力列为拉脱维亚公民身份的条件。出生和成长于拉脱维亚的俄罗斯族在新的共和国失去了公民身份，除非他们会说基本的拉脱维亚语。作为少数民族，他们失去了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高兴就可以说自己语言的权利，而这是为了多数派种族的文化生存。

这些不只是关于权利的争论，它们也是关于国家的真正目的的争论。自由派倾向于认为，国家不应带有目的：任何希望加强某种集体目标的国家必然践踏反对那个目标的个体的权利。由此看来，双语主义的联邦政策是一种经典的自由中立主义案例：保护两个语言群体的权利，同时不给任何一方特权。然而，对于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当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存处于危急之时，国家不能采取中立。在现代各民族的现实世界中，英语——作为全球的商业语言——将会把其他语言扫到一边。

许多加拿大自由主义者——以皮埃尔·特鲁多为首——认为，当一个国家保护集体权利时，不管他们是魁北克人还是原住民，结果不可避

免地会损害个体权利。根据这个观点，民族主义的基本罪恶是它一定会导致某种形式的多数人暴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特鲁多警告说，魁北克可能是一个打造种族国家的范例。只要它留在加拿大内部，其语言政策可以受到限制，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参考最高法院和加拿大《人权宪章》予以否决。如果魁北克取得主权独立，个人会失去这种申诉权利，通往多数种族暴政的道路可能会被打开。

毫无疑问，魁北克民族主义的核心诉求是基于所考虑的绝大多数魁北克人在自己的社会中是一个多数种族，而不是基于在联邦制的加拿大内是永远的、也许强有力的少数种族。但大多数魁北克人坚持他们的民族主义不是种族的而是基于平等公民身份的自由民族主义。我一直被问道，难道还有其他社会会资助与多数种族使用的语言不同的公立学校吗？还有其他社会拥有这样全套的、在魁北克《人权宪章》中所赋予的人权保护吗？

他们还补充说，还有其他民族，并不采取措施保护和发展自己文化多数派的语言吗？所有的民族都宣布何种语言作为官方语言，所有的民族都使用其多数人的语言管理学校体系。纯粹程序化国家的自由主义理念，那种对在国家的公立学校中教授何种语言和价值保持中立的理念，是一种空想。按照这个观点，为保护其文化遗产，魁北克只需像任何民族国家那样行事。当然，不管站在哪一点上，英裔加拿大人都会痛苦地叫喊：“但你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谁属于这个民族？

这是个寒冷的2月早晨，阿耶尔岩（Ayer’s Cliff）是魁北克南部距美国佛蒙特州边界大约半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农业社区。麦金农农场的田野一片白茫茫的荒芜，风吹起雪花，吹打着畜棚的门。门里面，20多岁的安格斯·麦金农（Angus McKinnon）和彼得·麦金农（Peter McKinnon）兄弟俩正在给100多头牛挤奶，而他们的父亲丹尼斯在一旁看着，絮叨着过往。过去这附近有很多英国人的家庭，他说。他回想着他们的名字：巴克莱家、托德家、布坎南家。但现在大多数的邻居都是法国人。农民协会过去开会时使用英语，阿耶尔岩镇议会以前也使用英语，但那是从前的日子，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丹尼斯·麦金农是那些能嗅出风向的农民之一，他把两个男孩子送去上法语小学。尽管他们以英语完成了高中的学业并在麦吉尔大学完成农业学课程，但他的儿子们仍然能说双语。安格斯说：“你必须得这样，这里所有的生意都是用法语完成。”

就是这样：在镇议会，在魁北克农民协会的会议上，在种子商店，在机器销售商那里，安格斯说法语。那绝对不是只会一个停止手势的双语能力。安格斯是货真价实的：一个能说流利英语的魁北克人。两代人以前，在这个崎岖乡村地带的农民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人。

这两个社区是热忱的，他们在镇议会里、在农民组织中一起工作，但他们保持着各自的社交。安格斯·麦金农的母亲在谢尔布鲁克（Sherbrooke）的交响乐团演奏小提琴。她原本来自贝尔法斯特，但她的法语很好，很好地融入了这个说法语的乐团中。但其他乐团成员从未邀请过她去家中做客。当安格斯在星期五的晚上开卡车想出去跳舞时，

他要开很远的路，去和说英语的农民跳舞。

自从第一届独立派政府1976年当选以来，有10万名说英语的人离开了魁北克。但安格斯不准备前往安大略，只为一个原因：魁北克的农业在加拿大的所有省份中得到的补贴是最好的，管理也是最好的，当然更比国界以南的地方优越得多，那些地方几乎没有价格维持措施，生产商必须以大量生产和微薄利润求得生存。另外，留下来还有文化的原因。麦金农家和其他类似的家族在这些崎岖的山谷里已待了185年。他们从新英格兰过来，因为他们不想成为新的共和国的一员，因为他们想保持对英国和英国王权体制的忠诚，也因为在这些地方有优质的土地。

魁北克的学校教科书中从未讲述过他们的故事。在魁北克的历史中，说英语的人物都是以殖民地精英的身份出现，他们居住在蒙特利尔的韦斯特蒙，经营铁路、百货商场和皮尔街上的大生意。故事里没有给东方镇的小农民多少空间，他们不符合主导阶层的形象。

麦金农家族不是易怒的人。首先，他们做得太好了。此外，他们想不起受到过任何明显的侮辱。魁北克的俚语把盎格鲁人称为têtecarrée——木头脑袋，但是他们在酒吧、弹子房里消磨的所有时间中，他们与周围的法裔农民一起打台球的时候，从不记得有听到过这个词。

但仍然有其他的事情带来伤害。他们觉得自己和法裔一样是魁北克的一部分，但历史教科书、政治、语言法规全都在传递他们并不真正属于魁北克的信息。

“去年夏天他们派了语言警察到这里来。”安格斯告诉我，我们正在他农庄附近科蒂库克（Coaticook）的一家希腊烧烤吃午餐。独立派政党魁北克人党（Parti Québécois，PQ）雇用了一些大学生围着镇子四处拍摄只写有英语的标示牌。后来他们回到魁北克城，报告说商人们破坏语言法规。

安格斯一边向穿过屋子来吃午餐的一对法裔夫妇挥手致意，一边说，有趣的是，“这里的每个人都气疯了，不只是英裔。每个人都想：我们在这里是一个社区，外人来这里干什么？想离间我们吗？”他啜了一口咖啡：“我跟你说，要是我们抓住那些学生，我们会把他们撵出镇子。”

并不是安格斯·麦金农的权利被学生们溜进镇子、给标示牌拍照片的鬼祟行径侵犯了。用权利的言辞不能真正地描述问题。问题在于认同。说英语的魁北克人是被多数人承认属于魁北克社会，还是不被承认？

魁北克的少数派种族不只有本土生的说英语的人，也有移民社区，他们都被“纯法裔魁北克人”(注)或“旧魁北克人”(注)这样的词大大地激怒，一些人用它们区分那些原来说法语居民的后代和那些稍晚到来的英国人、爱尔兰人或其他人的后代。无论何种情况，这种区分都是欺骗性的。例如，有热忱的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叫作奥布莱恩（O’Brien）或奥尼尔（O’Neil）(注)。几百年来魁北克的法裔、英裔和土著之间的异族通婚，让那种认为某些魁北克人与其他人相比是更为纯正的法兰西人的想法成为笑谈。一些热忱的民族主义者承认这种区别是虚幻的。我和圣让·巴蒂斯特社团的主席交谈的时候，她承认，当她按照母亲一方称自己是“旧魁北克人”时，她的父亲事实上却是西班牙人。

在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主义者认为各民族拥有独立的、“纯粹”的种族身份的神话，遭遇到了普通人跨种族繁衍之欲望的顽强反抗。面对种族纯粹的神话和种族融合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者不得不选择如何界定民族成员的资格。魁北克民族是包括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是只有那些生来讲法语的人呢？

所有的民族主义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克罗地亚是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还是所有那些——可能包括塞尔维亚人——选择把克罗地亚作为家

园的人们的民族？德意志是德意志人的民族，还是包括土耳其人、南斯拉夫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罗马尼亚人和波兰人等选择德国作为他们的家园的人的民族？

魁北克民族主义领袖近期的宣言引起了猜疑：他们对民族的定义是种族性的。魁北克人党领袖雅克·帕里佐（Jacques Parizeau）说，有或没有少数民族人口的合作，魁北克的独立都能成功。这可能是一种对事实的说明，但似乎暗含对少数民族意见和权利的一点漠视。

不过，总而言之，现代魁北克民族主义者在努力将他们的民族概念与带来南斯拉夫灾难的种族理念分开。因此，在其要求主权的争论中，魁北克的一个教师工会CEQ（Centrale d’Education du Québec）拒绝了魁北克是“法裔加拿大人的民族国家”的理念。他们提出，魁北克国家应当是每一个选择在这里居住的人的民族国家，“不管他们的种族起源如何”。他们坚持，一个民族国家不必是一个种族国家。

即使它真的成为一个种族国家，安格斯·麦金农沉吟着说，我们也绝不会走南斯拉夫的路。为什么？“因为有通向安大略的高速公路，”安格斯笑着说，“我们总是可以取道这条公路离开。南斯拉夫的穷人无法离开，不过我们可以。但我不想离开，这里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

1. 原文为法语，Québécois pur laine，字面意思为纯羊毛魁北克人，指祖先是纯粹的法兰西定居者的魁北克人。
2. 原文为法语，Québécois de souche，字面意思为旧库存的魁北克人，指祖先可以追溯到新法兰西政权时期的魁北克人。
3. 奥布莱恩、奥尼尔均为爱尔兰后裔姓氏。

加拿大的冰球之夜

丹尼斯·卢梭（Dennis　Rousseau）不到30岁，为三河城的一家造纸厂瓦亚加马克（Wayagamack）工作，工厂位于圣劳伦斯河的北岸。他的妻子是名记账员，在镇上工作。他们和还在襁褓中的女儿居住在一栋两居室的小屋里，那是在一条郊区的街道上，到造纸厂只需要走几分钟的路。现在外面是零下15度，雪花在路灯映照下飘落。丹尼斯家的前院有一个巨大的用雪堆出来的城堡，街上的孩子有一半在用雪球攻击城堡，另一半在守卫城堡。夜空中，雪球从我周围嗖嗖飞过，在雪堡上炸开，飞溅在丹尼斯的门前。他把我拉进去，笑着关上门。

丹尼斯穿一件冰球衫和一条牛仔裤，稀疏的金发垂到肩头。他的魁北克法语说得很快，口音非常重，有时重到以我的法语都难以理解。他道歉说自己不讲英语，然后指着3岁的女儿——她正推着一个大大的塑料火车头穿过起居室——说道："她准备去接受英语的洗礼。"他们在三河市第一年就开始了英语洗礼课程。"我们不想被隔绝。"他说。

我在寻找能够从工人的角度告诉我一些关于独立之经济状况的人，蒙特利尔的工会组织者给了我丹尼斯的名字。另外，三河城是魁北克的心脏地带，一个单一语言的城镇，过去曾是制浆和造纸业之都。这个地区曾经有过12家造纸厂，每天24小时运转，为整个大陆的电话簿和报纸生产纸张，但盛况不再。由于经济衰退，需求下降了，而且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可以用更少的成本生产纸张。只有6家造纸厂剩下，而丹尼斯的工厂里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劳动力。

"在我的工厂里，有很多人被解雇了，超过200人。在贝尔格、克鲁格，情况一样，最糟糕的是PFCP，它过去曾经有1000名工人，现在倒

闭了。三河城的失业率是17%，太糟糕了。我随时可能失去工作。当我去溜冰场和那些小伙子玩冰球时，永远不知道谁会在那儿。”

我曾经认为，现在不是进行民族主义试验的时候，但丹尼斯不那么看：“政府应当做点什么。我们需要就业政策，但魁北克没有这个权力，就业是联邦的事情。我们要做的是把手放在撬棍上。”

丹尼斯不是魁北克党人的好斗分子，但他代表一种现象：他代表魁北克民族主义的信条从蒙特利尔知识分子的咖啡馆扩展到工业核心地带。三年的衰退已经吊诡地将他转变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们拥有商人，我们拥有技能，我们可以让这个地方工作起来，我确定。”他认为，加拿大政府只关心加拿大英语区。

为什么？我说你们不是与安大略的工人们取得了共识吗？他们像你们一样处于艰难时刻。丹尼斯不置可否：“安大略不能给我们需要的权力，他们说我们已经拥有太多了。”

丹尼斯是一个乐观、直率的人，面对陌生人有些羞怯，但拥有的信念不管我如何争辩也无法改变。我告诉他加拿大政府一直在投入资金对抗魁北克的失业，但他对此无动于衷。一个独立的魁北克要维持一个破败陈旧的造纸厂运转，可能也会碰到同样多的困扰，但这没关系。他知道他所知道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魁北克不可能比渥太华更能令他的生活变得糟糕。

我不禁想，对于丹尼斯，民族主义可能只是一趟逃离恶劣经济现实的欢迎航班。一个现实情况是，他的造纸厂过去由魁北克公司所有。他们未能投入必需的资金，把它出售给美国人。美国人现在投资进来，但可能太晚了，无法与他们自己在南方的低成本工厂竞争。换言之，在大陆性的市场中，面临竞争的经济，魁北克所有权或者魁北克独立主权能够做什么？

不过，再一次，如果他按我的方式思考，他会放弃。民族主义给他希望，在三河城，你需要所有能够获得的希望。当然，吊诡的是，那是一种如此带有加拿大风格的希望。我们加拿大人相信政府。社会民主干预主义深入我的骨髓，也同样深入丹尼斯的骨髓。悲哀的是，这种共同的信仰正在引导我们走向不同的国家。

尽管丹尼斯给人感觉很强势，但他所说的东西很少或者说没有冒犯英裔加拿大人。他曾经去过尼亚加拉瀑布，尽管在让自己被人理解时曾碰到过麻烦，但他喜欢“下那儿”。丹尼斯去过我的家乡多伦多吗？他摇了摇头，咧嘴笑了。在假日里，他和妻子宁愿南下，去新泽西州和马萨诸塞州的东海岸，或者更南到佛罗里达州，在那些地方，冬天有很多魁北克人，人数很多，以至于他们发行了一份只面向他们自己的报纸。这是在整个访问魁北克过程中我观察到的模式的一部分。当你问人们富余时间他们会去哪里的时候，他们都说美国，从不说加拿大。

喝了几杯啤酒之后，丹尼斯要下到赛场，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打冰球比赛。冰球场是我在加拿大的童年时代去过的那些地方之一，一个巨大、阴郁的拱形场所，刺骨的寒冷，中央有一个微微闪光的白色冰菱，没有玻璃防止冰球飞上我就座的那硬邦邦、漆成灰色的露天看台。

不只冰球赛场是这样。就像圣多明各[注]的许多沙地是世界上很多最优秀的棒球游击手成长的地方，或像北伦敦的小球场是阿森纳的球员们学会弧线球入网的地方。三河城是全世界冰球玩得最好的地方之一，全国冰球联盟[注]正是从这样的赛场上发掘天才。

像所有加拿大人一样，我和丹尼斯拥有共同的冰球爱好。在电视出现之前，我听着收音机里的NHL比赛长大。我和他的脑子里同样都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加拿大国家队员的名字：乔弗里翁[注]、贝利佛、理查德。我也曾在像这样的赛场上打球。

我坐在看台上，观看瓦亚加马克的小伙子们比赛。丹尼斯打得不

错：个小，速度快，技术熟练，很努力，在赛场上来回猛冲，从其他人的冰球杆下把冰球截下来，必要的时候撞击对方。他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当他回到板凳上时，他把头盔从脸上推到后面，喝了一口可乐，大叫："加油孩子们！加油孩子们！注意那家伙加速！可恶！"

我坐在那儿看着他——他倚靠挡墙，准备参加一次集中攻势——希望自己还有一双能滑冰的腿。到最后，我奇怪的是，自己为什么会从一幕加拿大的场景中——那是他的场景，也正是我自己的场景——感受到如此强烈的距离感。我们共享这些东西，可是并非如此。尽管我能说双语，但我们中间有语言分隔，他的魁北克法语不是我的法语。我们玩同样的比赛，坐在同样的赛场里，而我们无法完全契合。可能是阶层的原因？但似乎更多是语言、从前的仇恨和苦难历史的问题——现实的和新出现的——比我们的任何理解都更加健壮、更充满活力。

三河城冰球场的这一幕场景让我们思考，居住在同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人们到底应该共享些什么。为了共同的归属感，认为人们应当共享同样的仪式、同样的冰球场明亮灯光下的冰冷夜晚，这是不是有些太感性呢？毕竟，即使各民族共享的东西比我和丹尼斯之间的共享更少，民族国家的凝聚仍可实现。我和丹尼斯之间的距离，其核心可以归结于此。我们不是一个民族——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因为我是英国人而他是法国人，他生于魁北克，而我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同一个民族，所以我们不能爱同一个国家。我告诉自己这也无妨。共同拥有对同一个民族国家的热爱，也许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也许这么多加拿大人的生活所拥有的温和、宽容和良好品质，事实上依赖于这种共同热爱的缺位。然而在星期二的夜晚，一个人坐在三河城的冰球场上，观看一个年轻人脸上洋溢着狂野的笑容、全身心地滑行，我突然希望，我们真的确实热爱同一个民族，而不仅仅是一起居住在同一个国家。

---

1. 圣多明各（Sante Domingo），加勒比岛国多米尼加共和国首都。
2. 全国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y League，NHL），北美地区的冰球职业联赛，包括加

拿大和美国的职业球队，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冰球联赛。

3. 伯尔尼·乔弗里翁（Bernie Geoffrion，1931—2006），加拿大著名冰球运动员。

5　库尔德斯坦



图25　土耳其萨武尔地区一个村庄的库尔德儿童



图26　一位库尔德“烈士”的葬礼，目前，生活在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的游击组织身处抗击ISIS的前线，经常与之交火，并承受其带来的自杀式袭击





图27、图28　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Party，PKK）的女战士。作为游击队，库尔德工人党至今仍活跃在伊拉克与土耳其边境



图29　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h Mustafa Barzani），库尔德民主党前任领导人，现任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的父亲，为寻求库尔德人的自治，与伊朗和伊拉克政府对抗。摄于1964年



图30　阿卜杜拉·奥贾兰，库尔德工人党领袖、主要创始人。1999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关押至今

边界

民族的神秘性似乎总是存在，仿佛是民族自身图景的基本特征。然而，民族的边界让这神秘性暴露无遗。在那里，人们意识到，将世界区分成各个民族，事实上是多么不自然、随意甚至荒谬。界墙将村子一分为二，铁丝网可能将同一条街道的两侧分成不同的国家，检查站可能将家族的一半与另一半隔开，地图上的边线可能将同一个族群分成两个不同的民族，边界哨所之间相连的邪恶直线可能与山川和河谷那完全非民族的轮廓线相违背。

现在，我正接近的这条边界尤其随意武断。我的身后，是土耳其东南部的草原；我的前面，是伊拉克陡峭的绿色山地；在中间，是一座长长的跨越底格里斯河（Tigris）支流的两车道混凝土桥梁。我将背包上肩，在5月下午行将消逝的光线下，开始向伊拉克山地行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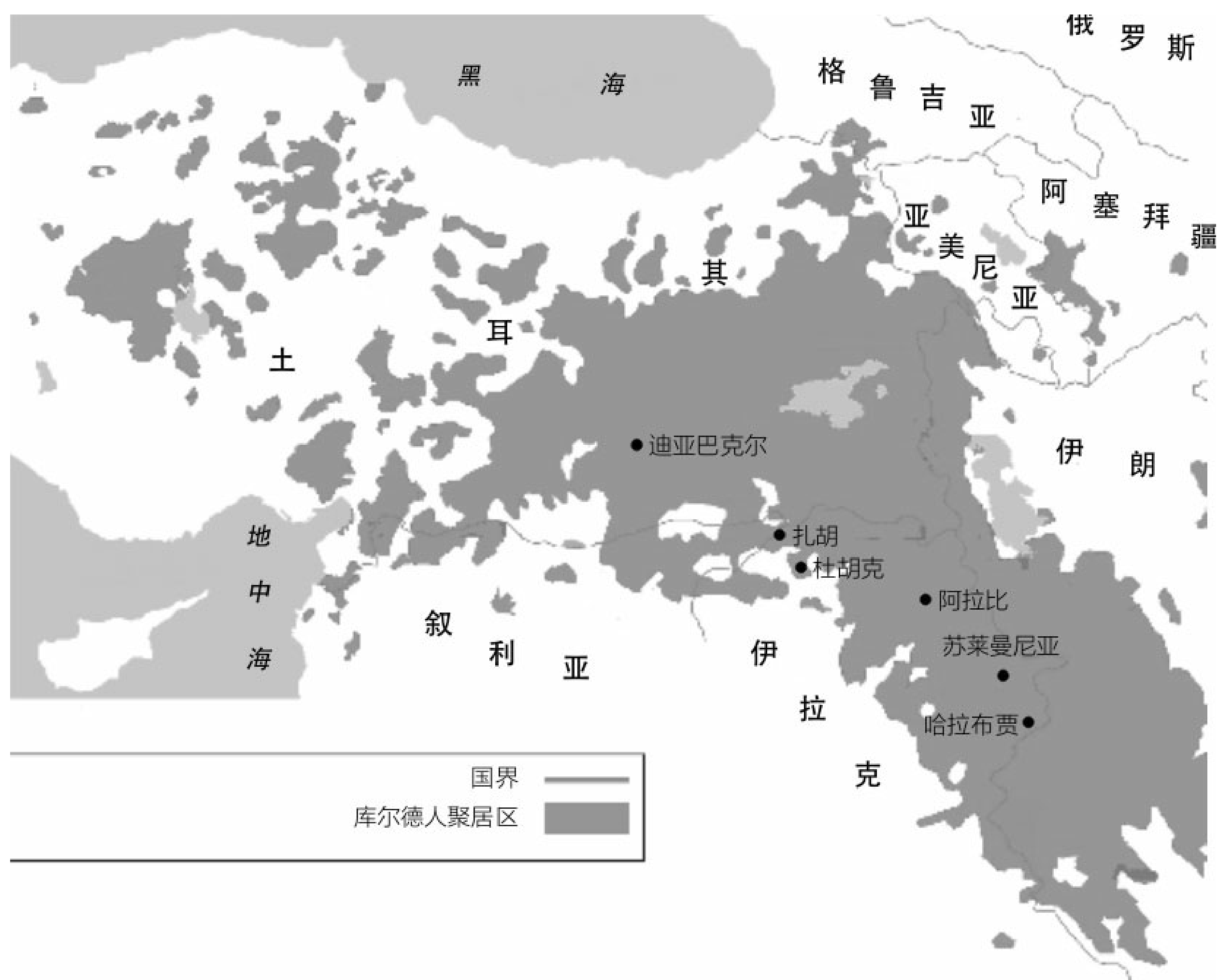
是色佛尔[注]还是洛桑[注]的哪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决定，这边是土耳其，而那边是伊拉克？同一个民族——库尔德人——居住在这两边，900万人住在这条边界的土耳其一方，300万人住在伊拉克那一方。然而直到两年前，界桩完全忽视了这些人的存在，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条边界将他们的家园一分为二。我来到这里，是因为现在事情终于有了变化。在这座桥的尽头有一张手写的指示牌，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写着：“欢迎来到库尔德斯坦”。

但这个库尔德斯坦拥有什么？库尔德人声称拥有的土地跨越五个民族国家：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亚美尼亚。在库尔德流亡团体位于伦敦的阴郁办公室里，我曾见过这幅库尔德斯坦的梦想地图，从西部的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延伸到东北部亚美尼亚的阿勒山脉（Mount

Ararat），到伊拉克的基尔库克（Kirkuk）油田和伊朗环绕克尔曼沙赫（Kirmanshah）的群山。这是一个从古代的米底人（Medes）传承下来的山地部落民族的土地，他们在此定居并宣称它为自己所有已超过4000年，只是他们的要求被在其废墟上兴起的土耳其帝国和现代国家所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斯曼帝国倒下，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凡尔赛短暂地居于主导地位，承诺给予库尔德人一个国家。然而，在1920年许诺给他们这个家园的《色佛尔条约》与1923年批准土耳其边界的《洛桑条约》之间，他们的要求被抛弃了。衣冠楚楚的绅士们忽略了这个梦想，为他们画下的边界线仿佛一张罗网。

库尔德人的不幸在于，他们的家园位于现代世界最具攻击性和扩张性的四种民族主义的交汇之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从而，库尔德人为家园进行的奋斗遭到比他们更为恶毒的民族主义的扭曲和变形。

凯末尔·阿塔图克[注]于1923年建立土耳其国家，库尔德人始终被认为对其统一构成威胁。在阿塔图克集中化的、世俗化的民族主义引导下，土耳其人开始强制性同化库尔德人，拒绝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教育自己的孩子，甚至称自己为库尔德人的权利。直到10年前，土耳其官方仍将库尔德人称为“山地土耳其人”。“凯末尔主义”将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语言融合在一起：现代土耳其的目标是终结奥斯曼帝国的落后遗产。因此，库尔德人不仅被妖魔化为另类的少数民族，注定要与一般土耳其人融合，而且是一个落后、野蛮的民族，注定要服从土耳其国家的现代化活力。



库尔德斯坦及周边区域示意图

类似地，对于伊朗国王的现代化民族主义，不用说，伊朗库尔德人是一个阻碍其现代独裁之路的落后部族。更糟的是，他们是逊尼派穆斯林，而大多数伊朗人是什叶派。国王1979年倒台后，伊朗库尔德人希望他们实施自治的机会有所提升，结果却发现阿亚图拉们(注)的宗教极端主义革命甚至比国王对他们更充满敌意。不仅因为他们顽强的山地叛乱阻碍了宗教极端主义所设想的威权控制，他们也被认为是宗教叛徒，是通往什叶派普世主义之路上的逊尼派障碍。即使现在，伊朗仍用火箭弹攻击库尔德斯坦领地内的库尔德人村庄，派遣装载炸弹的幻影战机在领地中的库尔德人村庄上空呼啸而过。

至少在理论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Ba’athist）民族主义与土耳其的民族主义相比没有那么冷酷集权，更少被种族的褊狭所左右。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在宪法上被界定为少数民族，保留有用库尔德语教育孩子的权利。不断更替的复兴党政权给予他们名义上的自治，但这只是库尔德部族和民族领导人坚持反抗的结果，其中最有名的领导人是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Mulla Mustafa Barzani）。

当萨达姆·侯赛因在20世纪70年代上台时，新的石油财富加上西方和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使他迅速转向民族主义极权统治。萨达姆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使两种需求合法化：让伊拉克现代化，以及使他自己成为中东最有权势、最令人恐惧的领导人。穆拉·穆斯塔法于1961年开始带领库尔德人反抗，他的儿子们断断续续地延续反叛，这是对萨达姆独裁统治和强行现代化最为有力的对抗。萨达姆从未能够成功地煽动阿拉伯人对库尔德人树立长期、普遍的种族仇恨。相反，他与库尔德人作战，仅仅因为他们是对其特有的独裁形式最顽固的挑战。

这四种民族主义困扰着库尔德人自身创造共同民族身份的努力。许多土耳其库尔德人只说土耳其语，只认识罗马字母。这令他们与伊拉克库尔德人区分开来，大多数伊拉克库尔德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使用阿拉伯字母。伊拉克和土耳其政府都熟练地利用库尔德人之间的差异。正如在所有的民族主义斗争中，总是有人抵抗，有人合作。在库尔德语中，那些合作者被轻蔑地称为“小驴”（jash）。萨达姆将他们编成民兵部队，与民族主义的“自由斗士”（peshmerga）作战。库尔德人自己承认这一点，在所有关于共同家园的对话中，他们相互之间的争斗事实上比并肩战斗更为常见。除了被他们的邻居们种下的分歧，库尔德人也有他们自己内在的分歧：部落和家族的封地、不同的方言——北部的科曼伊（Kurmanji）语、西部的伊拉克语、南部和东部的索拉尼（Sorani）语。民族主义运动一点点清除了部族、地区和语言上困扰库尔德人的分歧，试图创造一种统一性使建立国家最终得以可能。然而统一的目的和前景仍然扑朔迷离，像其他没有国家的民族如巴勒斯坦人一样，库尔德

人的问题仍然在于：民族主义能够构建一个民族吗？

在国家缺席的情况下，面对这些分歧，库尔德人能否成功地作为一个民族生存？我怀疑，他们的秘密可能恰恰藏在他们的传统主义中。这可能改变人们通常对他们的看法，即他们的部族主义是政治分歧和缺陷的来源。确实是这样，但部族主义也是一种潜意识的凝聚力来源，即使对于城市库尔德人也是如此。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在过去的两代人时间里完成了从部族到一种集体归属的民族主义形式的转变，但他们的民族意识仍然是由部族纽带所造就。他们特有的落后，他们顽固地坚持部族忠诚，保护他们免于被同化和整合。

我到达桥尽头的混凝土小屋，递上我的护照，在小屋的屋顶上我看到有一幅崭新的丙烯画，画像上是马苏德（Massoud），穆拉·穆斯塔法的儿子，继承他领导库尔德民主党（Kurdish Democratic Party）。它取代了过去挂在那儿的萨达姆肖像，在1991年3月的库尔德人暴动中，萨达姆的肖像第一时间被射落下来。

在“欢迎来到库尔德斯坦”的牌子下面，并没有真正的边界哨所，只有几个拿着自动武器的褐色脸庞小伙子微笑着说：“尼好，先森。”[注]一架喷气式飞机在头顶呼啸而过，在蓝天下飞得那么高，根本看不到，小伙子们抬眼瞅了瞅，笑了。他们把护照还给我，告诉我说：“美国人。”

这些飞机从土耳其因切里克（Incirlik）的基地起飞，在伊拉克上空的禁飞区巡逻，它们将库尔德人和萨达姆·侯赛因分隔开。没有人知道它们会飞多久，它们能保护库尔德人多久。无国家的民族的命运被密封在其他民族的首都。

边界的指示牌可以写上“欢迎来到库尔德斯坦”，但这个边界自身实际上将梦想中的家园分成两半。在总共2500万库尔德人中，只有280万人在这里，绝大多数是本地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库尔德斯坦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片领地。它没有自己的国旗。它甚至不被允许称呼自己为库

尔德斯坦。技术上而言，它仍然是伊拉克的一部分，货币仍然是伊拉克第纳尔（Denarius）。它建立于1991年的春天，即伊拉克的直升机炮火将库尔德人赶入山口之后。联合部队把伊拉克军队赶回南部，联军的飞机在北纬36度建立了禁飞区，在这里库尔德人获得了避难权，他们从伊朗和土耳其的难民营里返回，重建他们的家园。

但即使它不是一个国家，它的行为依然像是一个国家。它举行选举，拥有议会、一支警察力量和公民治理的基本雏形。自从萨达姆将其与伊拉克其他地区隔离开之后，库尔德斯坦依靠国际援助车队和隆隆穿过大桥的土耳其卡车维持生存。但伊拉克库尔德人无疑相信，从这个核心地带开始，这片领地有一天会成长为一个国家。

在国际法中，库尔德斯坦是“太阳之下的某种新事”——联合国第一次尝试保护一种少数民族，对抗其名义统治者的种族屠杀意图。直到库尔德斯坦，国际社会才开始进行这种挑战民族国家领土完整性和主权的“干预”。随着库尔德人聚居区的建立，它认同了一种理念：人道主义干预的责任超越主权国家的不可侵犯和完整原则。如果库尔德斯坦收到成效，其他认为自己可以虐待本国的少数民族而不会受到惩罚的民族就会看到，类似的领地将从他们的领土上分割出去。库尔德斯坦完全是乔治·布什“世界新秩序”的遗产。对于“冷战”后的世界而言，它仍然是唯一在人权和国家权利之间取得新的平衡的地方。

既然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无国家民族拥有了一小片可以说是自己拥有的地方，我想知道，它将对他们产生什么作用。无国家的民族有一种让民族的安全性凸显出来的方式，而拥有国家的民族觉得这种安全性理所应当。找出民族国家对于一个民族所具有的意义、它对民族性格所起作用的最佳方式，是花时间到一个从未拥有过自己国家的民族中去。

我乘坐的出租车在陡峭的道路上挣扎前进，经过扎胡（Zakho），

前往杜胡克（Dahuk），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库尔德斯坦。在满是岩石、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上，有一些帐篷，部分帐篷带有美国军方标志，有些带有联合国难民事务署（UNHCR）的标志，帐篷里面的煤油灯下，我看到整齐地码成金字塔形的万宝路香烟、火星巧克力棒、土耳其巧克力、成捆的香皂、整包的人造黄油、饼干、整袋的糖和面粉。在其他帐篷外面，我看到一排排堆得整整齐齐的塑料汽油罐，淡红色的汽油满到了罐口，由手和脸被车轴油和引擎油染黑了的小伙子看守着。萨达姆封锁了库尔德斯坦的边界，这个一穷二白的经济体要维持运转，只能依靠翻过山口从伊朗运来食用油和肥皂的精明赶骡人、从这条路上呼啸而过的土耳其卡车，以及这些在路边出售走私罐装汽油的满身油污的小伙子们。小伙子们都光着脚，在夜色中看上去很冷。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并没有贫穷和绝望的气氛，而是有些奇妙和神秘：颧骨和褐色皮肤映照在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帐篷的外形像是一张弯弓，篷幔卷起来以便显露出里面的走私财货。小伙子们站在篷幔边上，他们的脸庞映照在煤油灯下，他们的眼睛召唤我进去。

---

1. 色佛尔（Sèvres），法国西部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920年在此签署《色佛尔条约》，主要内容是削弱战败后的奥斯曼帝国，其中承诺建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但由于条约对土耳其过于苛刻，遭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抗，协议最终未获得实际执行，并于1923年被《洛桑条约》取代。
2. 洛桑（Lausanne），瑞士城市。1923年，协约国与土耳其在此重新签署和约，其中未提及库尔德人的自治问题。
3. 凯末尔·阿塔图克（Kemal Atatürk，1881—1938），又译基马尔·阿塔图克，土耳其国民运动之父，现代土耳其国家的缔造者。
4. 阿亚图拉（Ayatollah），伊斯兰教什叶派对较高等级的宗教学者的称号。
5. 原文为Allo，Mistair，作者有意模仿库尔德人说英语Hello Mr.的语调。

自由斗士

在杜胡克一个阴冷的宾馆，我度过了第一个夜晚。一辆白色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停在了宾馆外面。我很高兴看到它。像我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发现一样，四驱车是“后冷战”世界的战争地区的偏爱。它成了军阀们的战车选择，他们统治着派系、帮派、游击部队、部落的检查站和指挥所，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人为民族的骨头而争斗不休。

在这里，这辆陆地巡洋舰是由马苏德·巴尔扎尼的组织库尔德民主党慷慨提供。库尔德民主党在杜胡克控制着库尔德斯坦的西北部，而贾拉尔·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掌握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Patriotic Union of Kurdistan，PUK）牢牢控制着讲索拉尼语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他们结成联盟，共享权力，但两者之间的鸿沟很宽，历史上长期互相背叛。

库尔德民主党不仅提供陆地巡洋舰——当然是收费的——还提供安全保护。

贝杰特（Behjet）和塔哈（Taha）是我的“自由斗士”，我的战士，我在旅途中的安全护卫。他们戴“杰马戴恩”（jemadane）——一种男战士戴的黑白头巾包裹的头饰，穿束身很紧的褐色军用短外套，用色彩鲜艳的布条扎成漂亮腰带，这叫“舒蒂克”（shuttik），打了四个紧紧的、向上翘着相互缠绕的绳结，束在侧边。他们的裤子叫作“沙尔瓦”（shalvar），像气球一样夸张地蓬松鼓起，底下穿一双织工精细、被称作“克拉什”（klash）的白色棉拖鞋。两个人都留有浓密的黑胡子，有一张警觉、庄严的山地部落人的面孔。贝杰特是资深驾驶员，他的舒蒂克里塞有一个装着手枪的破皮盒子，而塔哈则在肩后背着一把卡拉什

尼科夫。贝杰特的右膝僵硬——战争留下的创伤——走路的时候明显一瘸一拐。他开车的时候，把腿直接绑在油门上。我告诉他，他就是我的牧羊人，而我是他的羊，他庄重地笑了笑。在库尔德斯坦，牧羊人几乎与“自由斗士”一样高贵，而现在他身兼两者。

他们都是党员，自成年以来，他们的全部生命都在为巴尔扎尼战斗。我很快注意到，当贝杰特带我去其他的党派那里，例如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的电视台，他会变得很不自在。这些地方对他犹如外星人的地盘，而那些持枪守在门口的人们也用同样的怀疑眼神看他。我跟贝杰特开玩笑，说他一旦不在自己的党内，就拉长了脸，他笑着说：“不，不，所有的库尔德人都是兄弟。”但他的脸告诉我的是另一种意思。

贝杰特和塔哈都有枪，而视野所及，我在街上见到的每一个男人也都有枪。破旧的手枪藏在腰带里，西装内兜里隐约可见手枪皮套，卡拉什尼科夫在肩上背着、在餐馆桌上放着、大摇大摆地挂在椅背上、放置在汽车的前座上；汽车手套箱里放着弹夹；晨光中，一辆满载农场工人前往田野的拖拉机上，枪管一支支挺立；赤脚附身的祈祷者身边，放着枪支。再一次，像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一样，我身处一个权力来自枪杆子的世界。而且不仅仅是权力，它也是威望和雄性的荣耀之所在。

贝杰特和塔哈都不炫耀他们的武器，而我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检查站已经习惯于那种刻意带有性意味的表演。也许这与他们身为穆斯林有关。在我们一起行走的整个旅程中，每到日落时分，他们退到路旁一个安静的角落，脱下鞋子，低声地念诵祷告词。他们滴酒不沾，这一定也对他们那种有尊严而又随意、去性意味的武器处理方式有作用。与此相比，欧洲人在检查站的那种枪炮文化打破了一种基本的禁忌。绝大多数欧洲人自从1945年以来生活在暴力手段被垄断的国家之内，这种垄断正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所在。当巴尔干各国瓦解之时，这种垄断随之崩溃。军队的枪械库被洗劫一空，猎枪从阁楼上取下来，军火商人一拥而入。对于某些欧洲年轻男性，国家垄断的崩溃所引起的混乱提供了一

个机会，让他们进入一个为所欲为的色情天堂，因此出现了检查站那种半性意味、半色情的枪炮文化。对于年轻的男人，手里掌握致命的权力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色情魅力：用它截停救助车队，恐吓一队队难民，威胁新闻记者，让无辜的平民双手护头躺倒在壕沟里，在自己的枪口下瑟瑟发抖。

与此相比，在库尔德斯坦从未有过国家，因而从未有过对暴力的垄断。曾经统治这里的帝国和民族从未让“自由斗士”解除武装：相反，他们利用“自由斗士”充当民兵和雇佣兵。男孩子们一旦到了青春期就被分发武器。携带枪支，是一个男孩不再是男孩而是必须像男人一样行事的标志。“自由斗士”这个词不仅意味着“战士”，也意味着“面对死亡的人”。因此，这种枪炮文化中的特殊意义强调责任、节制和悲剧意味的职责。因此，基于这些原因，我信任我带枪的“自由斗士”。我可以肯定不会有疯狂的表演。他们的武器在前座上，放在我的身边有两个星期的时间，而我过了一天，就不再想到它们。

然而，如果到处都是枪，谁是发号施令的人呢？在一个没有民族国家的地方，不存在清晰的指挥链条，没有明显的权威条线。

贝杰特和塔哈属于党的武装人员。但那些我们经过时指挥交通、身着蓝色和白色制服、臀部挂枪的治安警察呢？那些穿军用制服、打白色绑腿、戴红色贝雷帽的机灵小伙子们呢？这是些旧的萨达姆式的制服，我可以看出来，是以帝国时代的英式旧军服为模板。谁给他们下命令呢？在驾车快速通过杜胡克一个热闹的街道市场时，在许多擦皮鞋的男孩子以及装满了黄瓜、西红柿和白洋葱的木桶中间，我看到党的枪、警察的枪和军队的枪。

没有人确切知道谁负责。一些警察和军队属于旧萨达姆时代，是当地最古老的发号施令阶层。其中有些人一定是“小驴”，即与旧体制合作的人。当然，其中最坏的是那些虐待拷打或收受贿赂的人，他们在1991年3月的暴动中要么逃走了，要么被打死。最诚实的人留了下来，在拥

挤的市场中维持交通秩序。

随后，来了新的库尔德人军队：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杜胡克省政府总部附近操练，16岁左右的笨手笨脚的孩子，穿着不合身的军用工作服、肮脏的白色彪马（Puma）训练鞋，第一次学习队列、射击和搏斗。但他们似乎是一支新的力量；新国家的主要战斗力量仍然是“自由斗士”，那些身着传统装束的党的民兵战士。

贝杰特和塔哈驾车带我去党的总部，跟党的首脑们喝例行甜茶，接受他们的正式祝福，然后开始我们的旅程。通常，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如果没有经过这种喝茶的仪式，就没有一件事能够开始或结束。

但今天没有喝茶仪式，因为党的总部处于混乱状态。今天是杜胡克地区七个党主任职位举行选举的日子，大人物们在小学校的台阶上来来去去、上上下下。你可以辨别出他们是大人物，因为他们没有穿“自由斗士”通常穿的淡棕色或灰绿色的卡其裤，他们的沙尔瓦是用轻质、透气的亚麻做的，束腰外衣上沿着缝边向下有许多条纹和紫色的束带。他们进入房子的时候，一种恭敬的氛围在他们周围扩展开来，人们窃窃私语，某某人曾在1991年的起义中负责杜胡克的军事防卫，而另一个矮小、忙忙乱乱、上身粗壮的男人，头上戴一顶华丽的红色杰马戴恩，胳膊下夹着一堆乱哄哄的纸，据说他曾是俯瞰城市的山上高地的指挥官。

权贵们在小学的前门廊来回踱步，等待里面的选举计票结果，他们把玩忘忧珠，低声地讨论，后面是一幅真人大小的穆拉·穆斯塔法肖像，他穿着舒蒂克，手握匕首。

里面，计票正在一个蓝色的大教室进行，光线透过窗户，与香烟烟雾交织在一起，脚下的石砖地上是杂乱的烟蒂，上百名站在屋子后面监督计票的“自由斗士”发出嗡嗡的低语和传言。其中有些人在香烟盒纸上写下结果，摇了摇头，注视着屋子前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桌子边上，一个男人拣起一张选票，喊出被投票人的名字，围着屋子有八块黑板，其

中一块黑板的计票员在提到的名字下面画了个标记。监票人围在唱票人的周围，确保他只念出选票上有的名字。这是一次公开计票，一种有引导的公共仪式，让每个人都可以看到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一切都以难以置信的速度优雅进行，名字被喊出来，计票人咕哝着他刚听到的名字，他的粉笔“嚓嚓”地画出一个标记，然后下一个名字稳稳地、平静地读出来，而后面庞大的人群紧张地看着粉笔画的标记在名字旁边累积起来。有一些候选人是女性，但屋子里没有一个女人。库尔德人的民主像库尔德人的战争一样，是男人的事务。

在接下来两周的时间里，我参观在埃尔比勒[注]的库尔德议会，从参观者通道注视那些议员，他们大约有100多人，其中有8位女性，有些人穿传统的库尔德服装，有人穿正式西装，而一些宗教领导人身着华丽的长袍和头巾。我可以看到，相比萨达姆一年召开一次、用来向外国参观者显示对待“他的”库尔德人多么好的“恐吓马戏团”[注]，这是一个真正的议会，一个有真正辩论的场所。但新生的库尔德民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是在一个小镇的教室里统计选票，人们在后面抽烟、交头接耳、在香烟盒上乱写。我难以解读的是古代和现代之间、部族和党之间、民主选举的平等和人们对领袖的谦恭与尊敬之间的关系。

其后的一个晚上，对于这些问题，我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当时我坐在一座房子的黑暗阳台上，与该镇的党首穆耶丁·拉希姆（Muhyeddin Rahim）一起远眺苏莱曼尼亚[注]。他是个又瘦又黑的精明男子，卷发浓密，很聪明。在他位于华盛顿郊区的房子地下室里，他曾担任库尔德人事业驻美国的代表长达15年，地下室的绰号是“库尔德事业的五角大楼”。我们一起喝苏格兰威士忌，把瓶子放在桌子下面，以便不冒犯在阳台的阴影下站岗的自由战士。穆耶丁用他沙哑的声音向我吐露秘密：“穆拉·穆斯塔法自己非正式地跟我说过，‘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但是要负责任。不要丧失尊严。不要把自己扔进垃圾堆。’”穆耶丁用一种难以模仿的库尔德式美国俚语说话。他喜欢“非正式地”谈话，把新闻记者称作“你们这些家伙”。他本可以成为一名华盛顿说客，但他没有。他

头上戴杰马戴恩，有一种令人欢快的调调，整个晚上都有持长枪的人来到桌前，谦恭地屈膝行礼，在他耳边轻声低语，或交给他一个紧急电话，或是把杯盘清理干净，为他换上眼镜，为他点烟，烟抽完的时候拿包新的万宝路给他。

我问他，他头脑中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他不假思索地说："外界支持。"他担心西方良知的变化无常、我们道德关注范围的游移不定。如果我们不对库尔德斯坦保持关注，萨达姆将会把它夺回去。穆耶丁透过烟雾看着我："无意冒犯，但我们没办法相信每一个人。"

我问他，你的人民过得怎么样呢？"很糟糕，在苏莱曼尼亚大约有100万人，"他继续说，"我们有什么呢？一家无法运转的烟草工厂，因为我们的原材料短缺。一家水泥厂，因为没法进口燃油来驱动机器，不能运转。所以每个人都失业了，我不知道我们能支撑多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来我的办公室，我会告诉你它是什么样子。"

我跟着去了。他从红色丰田车上一下来，请愿者就团团围上来。一个哭泣的老妇人奋力将一卷包得紧紧的纸塞到他的手里，那上面详细记录着某些不公正的事情，某些他们认为他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个双腿被炸掉的农夫拄着拐杖一瘸一拐——他开着拖拉机撞上了萨达姆的地雷，他拉开裤子，向我们展示他的假肢；有一个老妇人带着个老头子，他们的孩子被带走枪毙以后，老头子就发了疯。当穆耶丁缓慢地挤过人群走向办公室的时候，乞丐们开始拉他的衣服，低声说："给我一磅糖，给我一磅面粉……"这是一幅中世纪的场景，由中世纪的信仰所驱使，那就是：如果你能够跟好国王说上话，你所有的烦恼都会消失。但它们并没有消失。穆耶丁是个军阀、党的领导人，不是创造奇迹的好国王。

当他们在一年前把他从华盛顿的地下室里提拔上来，让他回到这儿，做自己家乡的领导人时，他自己也很震惊。他当了军阀，但他觉得

这个词太“好莱坞”化。

我问他，谁是这座房子从前的主人。“一个朋友的朋友，”他狡猾地看着我，“他现在在巴格达。”

穆耶丁凝视着苏莱曼尼亚的夜晚：“15年前，我离开这里的时候，这整个山脚下都没有房子。我回来了，几乎不认识这个地方了。”在华盛顿郊区的时候，一定有过某些时刻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了解故乡，那他正在为之开创未来的故乡。我问他，回家是不是很艰难。“不，”他开心地说，“你们才有那种问题，我没有。”

而且他说：“我们是一个现代政党，我们不是部落。”他不喜欢部落这个词，这词给他一种谦卑感。当现代的库尔德政党开始建立的时候，部落酋长阿迦[注]的权力非常大。面对他们，人们处于奴役状态。而现在，这块土地的权力掌握在政党的手中。

他又接了一个秘密电话，跟一个助手交换意见，然后悄悄啜了一口威士忌。我问他：“你或者党的领导人马苏德·巴尔扎尼会不会成为又一个部落酋长？”不，不——他摇手说。你误会了。巴尔扎尼家族的土地财产在哪里？他们的巨额财富在哪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塔拉巴尼家族——巴尔扎尼家族最大的竞争对手——的事情，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跟塔拉巴尼不一样，巴尔扎尼的权力不是来自部落的关系，而是来自他的表率作用。他终生为自己的人民奋战。那是他获得尊重的原因。

“看，”穆耶丁向实行宵禁的苏莱曼尼亚街上挥手致意，“那儿出来的是巴尔扎尼的一个兄弟。他没有为自己的人民做任何事情。我不必给予他尊敬。所以，这种部落之类的说法已经够了。”

他令我意识到，我困扰在一个虚构的发展幻想之中，即认为民族必须经过各个阶段：首先是部落阶段，然后是民族阶段；首先是“落后

的”“原始的”和“传统的”，然后是现代的、“非个人的”。库尔德人颠覆了这个幻想。没有固定的阶段，没有之前和之后，在古代和现代、部落和民族之间没有固定的界线。他们的身份不断切换，融合于个体的生活中。在华盛顿郊区，休息的时候，穆耶丁会穿上旧训练鞋、T恤、斜纹棉布长裤，手里拿一罐啤酒，在房子周围晃悠；在跟国家部门打交道的时候，他会穿正式的西装；回到苏莱曼尼亚，他穿沙尔瓦、舒蒂克和杰马戴恩。他对这两种“制服”应付自如：传统服装体现他热爱自己的民族，现代服装体现他透彻地明白如何才能让事情办成。他两者兼具，因为库尔德斯坦的存在，他可以两者都是。

到了该走的时候。他问我下一站要去哪里，我说哈拉布贾[注]。他朝身后打了个响指，对一个俯身下来的人低声下了命令，然后说：“安排好了。”第二天，我走进酒店大堂的时候，才明白他的意思是什么。在车道上等着我的，是他自己的装甲吉普车，车顶上架着一挺机关枪，有半打晒得黝黑、微笑着的自由战士，带着战斗的疲劳，做我的护卫。我过了一阵子才意识到，保护我只是他们的部分目的。通向哈拉布贾的道路不是特别危险，这种护卫的真正原因是一种军阀人类学的礼仪和展示。护卫的目的是表示对我的尊敬，同时展示那个在阳台上坐在我身边抽万宝路、啜饮苏格兰威士忌的男人的权力、影响和威信。

---

1. 埃尔比勒（Arbil），伊拉克北部城市，库尔德斯坦首府。
2. 恐吓马戏团（cowed circus），指萨达姆统治时期，在萨达姆控制下的库尔德自治区议会。
3. 苏莱曼尼亚（Sulaymaniyah），伊拉克东北部城市，苏莱曼尼亚省省会。
4. 阿迦（agha），库尔德人对部落首领及地位较高的人的尊称。
5. 哈拉布贾（Halabja），库尔德斯坦东北部城市，居民一般讲库尔德语索拉尼方言。1988年，伊拉克政府军曾在这里实施化学武器攻击。

恐惧共和国

我和我们的护卫贝杰特、塔哈开始旅程，沿着令人晕眩的山路，穿过山口，下降到绿草萋萋的山谷，经过成群低矮、平顶、双卧室的土砖房子，它们立在山脚下，背靠峭壁寻求支撑。从杜胡克到巴尔赞（Barzan），一个又一个在萨达姆统治下被烧毁或炸毁的村子又恢复了生机。成堆的空心砖堆在路旁，到处可以听到鹤嘴锄挖掘、搅拌水泥和铁铲砰砰作响的声音。戴头巾的牧羊人带着他们的牛羊回到山地牧场。沼泽正在被改造成稻田，大平原上种上了小麦。每一个地方都有西方帮助的痕迹，花钱请来荷兰、瑞士和德国的机构重建被萨达姆毁坏的村庄，新的诊所开始营业，开始着手清洁水的供应，户外厕所修建起来，水泵将水流净化，传染病的传播得到控制。一座家园正在恢复生机，每个地方的人们见到我都很高兴。赤脚的小男孩在路边卖杏仁，当他们见到我的白人面孔时，叫道："尼好先森。"女孩子们穿紫色的"吉拉"（kira），弯腰背着沉重的木材，她们在羊肠小道上停下来，羞怯地朝陆地巡洋舰挥手致意。百利桥[注]横跨奔腾的褐色河流，桥边担任警卫的"自由斗士"行礼致敬。

两年前，这种张开手臂欢迎外来人的情况也许是不可想象的。萨达姆的特工会隔离任何外国访问者，讯问他交谈的每一个人。两年前，我也许会遇到躲避的目光、冰冷的脸、转过去的背影。也可能，在最为传统的山谷村子里，我会遇到那种对所有来访的外来人的猜疑。随着库尔德斯坦的到来，所有都改变了。外国援助工人告诉我，他们从未有过这样受欢迎的工作环境。原因显而易见：没有我们，没有空运的援助，没有时有时无但不会中断的国际关注，就不会有家园，不会有库尔德斯坦。我们——外面的世界——已经帮助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国家。每个人

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向白人面孔挥手致意。

我停下来更近距离地观察刚刚播种的稻田，戴头巾的人们从泥水中抽身出来，走近我，与我握手。“尼好先森，”其中一个人对我说，“你们什么时候为我们割开萨达姆的喉咙？”

问得好。萨达姆仍旧威胁着库尔德人的梦想。似乎是为了提醒库尔德人他还在，只隔着群山。他命令切断从摩苏尔[注]送来的电力供应，让杜胡克陷入黑暗之中。他废除了25第纳尔面值纸币的流通，似乎是为了提醒库尔德人，他仍然掌握着经济命脉。由于绝大多数库尔德人持有的金钱主要是25第纳尔的纸币，这个措施令他们的储蓄瞬间化为乌有。

他那风格怪异的木屋和行宫似乎盘踞在每一座山顶上，他的监狱和兵营似乎占领了每一个山谷。这些建筑物实践的是恐吓式建筑艺术，大理石立面、纪念碑式平台和花园，全都在告诉库尔德人：你们什么都不是，我才是一切。但库尔德人报了仇。行宫被洗劫、焚烧、夷为平地。人们占据了兵营和监狱，在里面拉起了晾衣绳。在埃尔比勒，有一个家庭甚至搬进萨达姆靠近议会的行刑中心。一个女人在库尔德人从前被射杀的房间里架起了炉子烤馕饼，山羊在房间里漫步，孩子们在被毁坏的窗户和炮眼上堆砌石头和砖块以抵抗风雨。

萨达姆仍旧引发恐惧，令气氛变得紧张。苏莱曼尼亚的警察主管给我看一个装满了塑料炸弹的橱柜，它们都是萨达姆的特工人员安置在国际援助车队的卡车上，或者留在小学门口无人注意的汽车上的。最近，他派部队穿过边界，到埃尔比勒的三个村庄抢夺庄稼收成。在所有这些伎俩中，萨达姆的策略很简单：一小口一小口地咬，当西方转过身去，确定我们没有注视他的时候，猛然来一大口。

在埃尔比勒一个新库尔德电视台，一个当地演员用几乎一模一样的橡皮面具完美地模仿大独裁者的电视演说。他在电视荧屏上砰砰地敲着桌子，摇晃手指，把古老的恐吓和威胁的手势变成无害的滑稽幽默。但

当我请他摘下面具、让我拍张照片时，他腼腆地拒绝了，因为担心会有人记住他，如果萨达姆卷土重来，会给他带来麻烦。当我和埃尔比勒的安全首脑交谈的时候，他把我带到镇子外面一片将要成熟的麦田中间。在镇里，会有人群聚过来，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也许有人正在偷听。

伊拉克军队到埃尔比勒只需25分钟，他们集结在一个低矮、被烧过的小山上的防御工事后面，山坡斜斜向下直到科勒克（Kelek）的河边。萨达姆有时关闭边界，有时开放边界。今天是开放的。透过望远镜，我可以看到伊拉克边境守卫，有1公里远，在热气弥漫中昂首阔步，正在检查一群站在平板卡车后面的库尔德工人。然后我看到卡车小心翼翼地开过水泥桥，停在库尔德检查站。在那儿它被用障碍物固定住，检查底盘是否有爆炸装置——经常藏在减震器上。工人们下车，接受证件检查。伊拉克特工经常混在这些运输车上，库尔德人尽全力将他们剔除出去。但边界的检查程序似乎有很多漏洞，并不让人放心。他们需要金属探测器、检查室——任何一个正常国家都有的全套设备——但他们甚至没法找到一根合适的、横挡在桥身上的金属障碍物，所以人们在饮料销售商、卖花生的小贩和蹲在路边等公共汽车的老妇人身边经过，悄悄潜入，无人注意。

当地的“自由斗士”与贝杰特协商，他不情愿地允许他的“羊”跨过河流，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更近距离地观察伊拉克的防卫哨所。我们留下陆地巡洋舰，因为它们可能会招来火力，步行穿过桥梁，到达正处于伊拉克炮火之下的一个村子。当地的自由战士带领我们穿过后面的小巷，告诉我们把头低下，躲在墙后面。经过电话沟通，他们带我上到一个楼梯，1991年这里被火箭炮袭击，现在变成了一堆摇摇欲坠的碎石和废铁的废墟。通过小心翼翼地架在一座防护墙上的望远镜，我看到伊拉克士兵在观察我们，他们在防空壕之间来回走动，肩上扛着武器，手里拿着望远镜。他们指着我的望远镜，我躲开了视线。当我跨过河回来的时候，感觉到伊拉克人在他们的视野里追踪着我，在明亮得刺眼的蓝天下，我听到看不见的美国飞机远远传来的轰鸣，它飞得如此高，超出了

视力范围。

---

1. 百利桥（Bailey bridges），英国军队在“二战”中发明的一种预制的桁架结构桥梁，不需要重型机械迅速搭建以满足军事需要。
2. 摩苏尔（Mosul），伊拉克第三大城市，毗邻库尔德斯坦。

大屠杀

巴尔赞一定曾经是一个美丽的村庄，它从山谷底部大河边的台地上升起，向上穿过山脚的隐蔽缝隙，穿过冲积平原，到达后面环抱的群山。田野里成堆的石头，散布在低矮的台地上，由此你可以想见它曾经是多么的宽广。曾经支撑门楣和屋顶的钢筋从这些石堆中穿刺而出，它们都是巴尔扎尼部落传统家园的残余。

1975年穆拉·穆斯塔法的反抗失败后，萨达姆进行了迅速而残忍的报复。在整个村庄，一座座房子被付之一炬，人们被遣送到埃尔比勒附近的库斯特佩（Kushtepe）和迪亚纳（Diyana）的集中营。在那里，萨达姆的警察严密地看管他们。

然后，1983年7月，当巴尔扎尼一度与伊朗人结盟、在库尔德山地提供情报和侦察支持、对抗萨达姆军队的时候，萨达姆严厉打击巴尔扎尼部落。他的部队包围了库斯特佩和迪亚纳的集中营，强迫每一个男人戴上红色头巾——巴尔扎尼部族成员的标志。所有年龄在12岁到80岁的男性被装上卡车，送往巴格达，此后再也没有见到或听到过他们的消息。他们的女人被留下来，必须自己谋生，她们从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1991年3月的起义期间，巴尔扎尼的寡妇们逃到伊朗。从那以后到现在，她们终于回到了自己出生的村庄。瑞士慈善组织卡里塔斯（Caritas）正在帮助她们建设新家，她们第一次拥有自来水、混凝土地面和波纹钢屋顶，但什么都不能抚平那种不知道她们的男人到底怎么样了的伤痛。

巴尔扎尼寡妇们灰白的长发飞散开来，不加修饰地披在她们黑色的丧服上。她们赤脚盘腿坐在她们空荡荡的房子门口，带着幸存下来的女

孩子，等待她们的男人归来。她们痛苦地解释，房子是空的，储藏玉米和油罐的储藏室也是空的，因为没有男人供养她们。她们依靠外国人的施舍幸存下来。一个女人没法生活。

她们用一种深陷于悲痛之中的呆滞的单调声音说，伊拉克士兵是晚上来的，他们把男人从床上带走，把孩子从小床上带走。他们还把瘸子和盲人都带走，所有巴尔扎尼的男人。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带到了哪里。有些人说有万人坑，但还没有发现任何确定的证据。恶魔之手已经将她们的男人从地球表面抹去了。她们的脸上是条条泪痕，任泪水流淌而不去擦拭。巴尔扎尼的寡妇们说，她们无法控制这种伤痛，因为它没有尽头。最糟糕的是，没有什么能抵抗那种带有希望的痛苦，她们相信有一天，当抬起双眼时，在穿过群山、蜿蜒通向村里的尘土飞扬的羊肠小道上，会看到一列终于归来的幸存者。

民族主义试图将死亡神圣化，以救赎个人的牺牲，并将其与定数和命运联系起来。在战斗中，孤独而恐惧的持枪男孩死于十字路口，他死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孤独而恐惧的男孩。在民族主义的救赎语言中，他成为烈士之想象共同体的一员。在所有的库尔德公路沿线，牺牲的“自由斗士”的画像在柱基上俯视着人们，那儿曾经挂着萨达姆的画像。这些图片都是民族主义的库尔德民间艺术。在一幅画像中，一位战士站在高山雪地中；另一幅画像则是在湖边，有一只鸽鸟在空中翱翔，仿佛希望的气息。这些画像描绘他们穿着制服，枪背在肩上，从死亡所在的安全之处凝视着现在，或是焦虑地回头张望，似乎希望确定他们的牺牲不是毫无意义的。

从巴尔赞往东的道路沿着群山下行，经过苏莱曼尼亚，进入一片广大的种植小麦的山谷平地。我们经过晒得黝黑、正在为他们的牲口割草的人们，还有一群群蹲在路边的村民，他们身边是巨大的草捆，等待搭乘路过的卡车；后来，我们见到他们全都难以置信地拥挤在平板车上，兴高采烈地从我们身边挥着手呼啸而过，只有戴面纱的老妇人忧郁地坐

在草捆上。我们驶过稻田，男人和女人都赤脚在田里耕作，衣服卷到膝盖上面，而皮肤像头发一样呈褐色的孩子们在路边卖蓝色小包装的葵花子。

在其最基本的层面，民族主义也许是对一个人所热爱的某一片土地拥有政治主权的渴望。在最开始，必须对这片土地本身有一种强烈的依恋和一种别无他求、此地最美的感觉，世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相比。库尔德人说，群山是他们唯一的朋友，唯一从不背叛的那个朋友。但也是群山将他们维系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将他们与其他人分隔，给予他们习性和家园，在他们中间一天天创造渴望：有一天这里将真正属于他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正如那晚在苏莱曼尼亚，当我起来准备走的时候，穆耶丁在他的门廊说：“看，所有一切归根于此。”他紧紧地握住拳头，举起来靠近他自己脸庞：“我们想要一样东西，即使它很渺小，但没有人可以把它从我们这里夺走。”

道路转向南，向东，穿过沙里佐[注]富饶的平原，通向伊朗边界。在离边界只有5公里远的地方，在三面光秃秃的圆顶山丘的环绕之中，现在被5月的热浪晒成褐色的，就是哈拉布贾镇。

1988年3月16日，正是库尔德人的新年之际，库尔德“自由斗士”从伊拉克军队手中夺下这个城镇还不到48小时，伊拉克飞机猛扑这个城镇，扔下了成罐的芥子毒气、神经毒气和氰化物。几个小时之中，有5000人死亡。

伊朗摄影师在袭击后的几个小时拍下了影片。孩子们衣服的颜色仍然鲜艳，枯萎的草和叶子还是绿色的，一些人的脸上颜色如常，父亲们躺在门口，他们的手臂围绕着孩子们，母亲们脸朝下倒在河里，她们想要洗掉喉咙里的灼热。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次针对人类的化学攻击。攻击结束后，伊拉克军队进入哈拉布贾，放火烧毁了整个镇子。

我停在郊外一堆很特别的强化钢筋和倒塌的屋顶旁边，在那底下很

快出来两个兴高采烈的小孩和一位警觉的母亲，她正将洗好的衣物挂到一个悬空的屋顶和一个阳台之间形成的角上。走进去，在左边大约有75米长的碎石废墟，看不到一块完好无损的混凝土砖，而往右边走到主街上，是试图放火焚烧店铺的各种痕迹：倒塌的屋顶下面断折的柱子，其他的柱子都不见了，只留下裸露的钢筋支撑着屋顶；后墙上有巨大的炮弹壳大小的洞；街上是成堆的碎石，屋顶坠落其间。但在每一个地方，不管如何，都有一些家庭在废墟中维系生存。走上坑坑洼洼的街道，经过茶叶店和饲料店，我遇到一个男人在一个小图书馆里画画，其中一幅画的是一个穿红色连衣裙的女人，拿着水罐站在一条小溪边，旁边是一棵高高的、正在开花的树。房子在山脚下拔地而起，从山的轮廓我可以分辨出，这是已经消失的哈拉布贾的一幅图景。在另一条小巷，我发现了几个鞋匠，他们面无表情地转动白色的纱锭，用来缝制"克拉什"完美的白色上半部分。在制鞋匠的隔壁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管道商人，水龙头、接头、垫片一列列摆得整整齐齐；在他边上是一个木匠，在木屑堆中的一个座位上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哈拉布贾的市场里满是堆着黄豆和草莓的手推车。我看着他们，想知道他们的皮肤和细胞是否还保留有化学物质的任何记忆或痕迹。

我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引人注目的老师，她在回家的路上，中午从她的小学回家吃午饭。我们并肩走过废墟，她说，是的，他就是死在这里；而那儿，在那堆东西下面，发现了她的尸体；还有那个地下室曾经是个茶室——她指着一堆废墟中间的黑洞——"自由斗士"在那里发现了50具尸体。"其中一个是我的妹妹。"

下午继续上课的时候，她带我去她的小学。在袭击中有多少孩子死去？她没有回答，而是走到黑板前，写下一个数字：198。

班上的孩子们从粗木板搭成的课桌上看着她：7岁大的孩子，辫子用头绳扎起来，有黑色的眼睛，双手捂脸咯咯地笑，热辣辣的阳光斜斜地从带栅栏的窗户透进来，照亮了她们的脸。我问，关于哈拉布贾，你

教给她们什么呢？他们知道，他们知道，她说。

她拍了拍手，孩子们一窝蜂地涌出教室，在操场上和其他班级一起列队，高唱库尔德爱国歌曲，用他们最大的声音欢迎外国访问者，幼小而充满朝气的声音回荡在阳光下。他们围住我，靠近我，满满一操场。

最后，我驱车驶入镇后的群山，想要将哈拉布贾的尘土从我的肺里排除出去。我取道山脚下的一条路，然后发现自己与受难者的巨大墓地迎面相遇。他们被埋进巨大的、毫无个性的混凝土沉箱之中，俯瞰现在沉寂于热浪中的城市。我想起了巴尔扎尼在门口哭泣的寡妇们。贝杰特和塔哈脱下他们的鞋子，因为现在是日落时分，他们跪下，念诵祈祷词。他们祈祷的低语在我身后的空气中升腾，我坐下，看着下面萧条的城市。

“大屠杀”是个被一再滥用的词，有时被用来指向任何一种愤怒、任何一种暴力，甚至被用于没有死亡、只有羞辱和虐待发生的事件。但它确实是具有某种意义的词：计划灭绝一个民族，不需要其他理由，只因他们身为这个民族。在没有大屠杀的经历之前，一个民族可能不相信他们属于这个民族。在大屠杀之前，他们可能相信，是否属于一个民族或相信自己属于一个民族，是一件个人事务；大屠杀之后，这成了他们的宿命。

大屠杀和民族主义的历史相互缠结。是大屠杀让犹太人相信，甚至让非犹太世界相信，他们是一个除非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否则不会得到安全的民族。犹太人如此，库尔德人也如此。看看哈拉布贾，坐在那些无名墓地边上，就会明白，化学袭击将他们永远标记、成为一体，正如它毫无疑问、毫不含糊地揭示出，他们的邻居能够感觉什么、做什么。

所有库尔德领导人都告诉你，他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穆耶丁那天晚上在阳台上说，这样一个目标对于我们太过庞大、太不可行、太不现实，它是一种只会带来疯狂和狂热的渴望。我们必须满足于

在现有国家中的自治地位。我们必须咽下我们的渴望，与凡尔赛之后像一张罗网一样从天而降于这片土地的民族国家秩序和平相处。

但是在看完哈拉布贾之后，你会清晰地意识到一件事情：自治绝不会有作用。它是通向终点的一个临时车站，但绝不会是道路的尽头。对于哈拉布贾所发生的一切，对于一个已经了解大屠杀的民族，只有一件事情有用：建立一个自己的民族国家。

---

1. 沙里佐（Shahrizor），库尔德斯坦东南部平原地带，介于苏莱曼尼亚和达尔班迪汗（Darbandikhan）之间。

游击队员

拉尼亚（Raniya）在下雨。我坐在宾馆的回廊下，雨水重重地敲打着白铁皮屋顶。戴黑色面纱的女人攥住自己的裙子，在瓢泼大雨中奔走寻找藏身之处。水从排水管奔涌而出，携带着大量污秽、垃圾和市场里的残留物。俄式茶壶冒着蒸汽，空气中有木炭在火盆中燃烧的刺鼻味道。宾馆厨师正在从一个羊羔——挂在我桌子旁边的一个钩子上——身上切割肉条。贝杰特和塔哈坐在我旁边，拉长了脸。他们在跟他们的“羊”生气。我准备离开他们的保护一天一夜，去访问山里面的一支游击队。我将投向另一个年轻男孩的保护，他名叫哈桑（Hassan），他开了一辆陆地巡洋舰过来，会带我穿过山口，去游击队的营地。我不仅仅是从一个军阀的保护之下转到另一个军阀的保护之下。从贝杰特的立场来看，我是要去访问敌人。因为我是要去访问库尔德工人党（PKK），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游击组织，他们利用库尔德领地的山地作为掩护，袭击越过边界的土耳其军队。贝杰特的库尔德民主党反对这些袭击，担心土耳其会以关闭边界、危及令这片领地得以生存的主要生命线来进行报复。1992年秋天，库尔德民主党的自由战士开展反对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的战争，阻止它们使用领地作为基地。然而现在，他们之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停火状态。得益于停火，我可以去访问我所知道——也存在争议——的最后一个经典马克思主义式的民族解放运动。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次访问是多么的冒失。我没有充分考虑到天气状况，现在它进行报复了。桥梁不见了——被冲走了——我们很快就在刚刚犁过的田地里迂回跋涉，寻找河流中低平、有石头的浅水处能让我们过河的地方。我们扎进了河里，轮胎的上沿被淹没，挣扎着过了河。

哈桑18岁，嘴唇上方刚刚冒出第一抹胡子的细细胡茬。他说一口浓

重的索拉尼方言，山地味儿如此重，我的翻译都没法听清他在说什么。但不管路如何崎岖艰难，他都笑得很欢快，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是一个真正的四驱车高手。四个小时的时间，他使出浑身解数，让这辆老爷车沿着泥泞、遍布车辙的狭窄道路前进，这条路不适合车子，更适合那些不断超越我们、驮着走私包裹的骡子。哈桑毫不慌乱地操纵车子沿着螺旋形的弯道往上爬，穿过冲刷着路面的瀑布，车轮加速、小心谨慎地穿过将道路冲垮了的泥石流和滑坡的岩石。我们经过被山洪袭击过的村庄，咆哮的黑褐色急流从山上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村民们徒劳地想用波纹铁管将水从他们的屋顶上导流下来。孩子们和牲口挤在门洞里，我们经过时，他们向哈桑挥手。四个小时后，哈桑停在一片营地，帐篷是用树枝和白色塑料板搭成的。走私贩子，他说，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巨大、温暖、干燥的帐篷，我们脱下鞋，经过一溜正在吃手抓米饭、满怀疑虑的人们，爬进我们的地方，有可口的热薄荷茶款待我们，我们喝着茶，听到雨水重重地敲打白塑料板的声音。这些走私者经营骡队，翻越陡峭的山口进入伊朗，那些山口在群山之上，离这里大约只有1公里远。在帐篷的一角，我看到成堆的伊朗人造黄油、食用油和糖。如果说这儿有伊朗海洛因，我并没有看到。哈桑低声告诉我，走私者和游击队相互合作。什么意思？我只能假设，走私者给游击队一部分利润，用钱或者其他什么，而游击队保护他们。

离走私者1公里远的地方，我们到达了游击队自己的营地，它设在一个巨大的半圆形盆地中，一条汹涌的河流在谷底肆虐，流向山脊侧面，可以保护营地免遭空袭。山坡上到处点缀着暗褐色、被雨水浸透的帐篷，有一座典型的库尔德式土屋，平顶上伸出一根无线电天线，盆地中央是一座两层楼的库尔德式房子，房前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在玩耍。这座房子的楼上就是游击队指挥官的营房，我将睡在那里。楼下睡着有四口人的库尔德家庭，还有他们的山羊、绵羊和鸡。

我注视山坡，发现到处都是女人：她们排成队列，身穿战斗服，扛着长枪，沿羊肠小道向高处跑去；其他人从羊肠小道下来，然后一个一

个消失在看上去是在山坡上开掘的巨大军用帐篷里；其他女战士头发盘在贝雷帽下面，在山顶上的堡垒里放哨。面露焦虑、说法语的“联络官”在我身边解释说：“我们正在举行妇女大会。”

他领我顺着羊肠小道去军用帐篷。帐篷里面，条形荧光灯挂在帐篷顶上——营地里一定有个发电机，但他们是怎么把它弄上来的呢？在朴素的白光下，大约有100位女性整齐地坐在粗糙的长凳上，分组围绕着一个主席台。红、黄、绿色——库尔德人的颜色——的旗帜挂在帐篷顶上，上面写着“阿波万岁，库尔德工人党万岁（Long Live Apo，Long Live the PKK）”。一个女人站在角上，正在发表平静但显然是批评性的长篇演讲，其他女人静静听着，其中有些人在做笔记。令人震惊的是她们都如此年轻：绝大多数只有十几岁，最年长的不到30岁，不苟言笑、热忱、年轻的面庞，有些人戴着无框眼镜，她们的头发盘在贝雷帽下面，或者扎成马尾辫。所有人都穿肥大、毫无体形可言的制服，是男人们穿剩下来的。卡拉什尼科夫倚在膝盖边上，或者放在长凳的角上，整体上带有热忱、青春专注的紧张气氛。

我的联络官悄声说，这是一个自我批评的议程。他和我是帐篷里仅有的男性。他说，最近的一些游击袭击由于战略战术的失误而失败了，生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那就是妇女们正在讨论的议题。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一个站起来，进行简短发言，她们的头低着，声音谦恭而清醒，不讲究修辞，有控制，但从我听来，其中充满了悲伤甚至是痛苦的语调，那是信仰正受到剧烈审视的真正信徒的语调。

集会休息15分钟，女孩子们成双结对分开，卷起香烟上上下下漫步，胳膊挽着胳膊，低声轻语，抽着烟。我跟上她们，得以和一个叫米兰的女战士交谈。她比大多数人都要年长，大约25岁，褐色的头发刚刚好掖在那种猎鹿人式的军便帽下面，我记得在关于俄国内战中的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过这种帽子。她穿着战士的肥大裤子，一双彪马的训练鞋，她在军装夹克右胸的位置用红色的

线整齐地绣着“阿波万岁”。阿波是阿波·奥贾兰[注]，她所在党的领导人。我问，你见过他吗？当然见过，她说，因为开心和窘迫而脸红了。她曾作为游击战士，在奥贾兰位于黎巴嫩贝卡谷地（Bekaa Valley）的营地受过训练。“在那里我学会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军事战略和库尔德语。”

库尔德语？我极为惊讶。米兰微笑，沿着在山坡上挖掘出来、用粗糙的石头铺就的练兵场，沉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距离。她解释说：“你知道吗，我出生于澳大利亚，在墨尔本的郊区，真的。直到17岁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库尔德人。”她这样说了之后，我才注意到她的口音当中的澳大利亚味道。她再次道歉：“请原谅我的英语，我已经有四年没有说英语了。”

澳大利亚的郊区女孩是如何成为库尔德斯坦山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游击队员的呢？一定是有某种对确定性的渴望在这里发挥作用，它强大到足以将一种生活连根拔起。

“一开始，我问父母，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名字，米兰。他们告诉我这是库尔德语，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而他们不告诉我。幸运的是，党在墨尔本有联络人。”

我渐渐开始明白了：一个澳大利亚少女，生活在一个无根的、无过去的文化中，她突然发现自己拥有那种最为痛苦的民族归属，属于一个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

墨尔本不是一个做事业的地方。跟党走是一个墨尔本女孩可以做的最为激进的事情，那就是她这样做的原因。她突然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她很年轻：党的那种极端主义，加诸她身上的召唤所具有的激进本质，是如此不可抗拒，令她立即服从了。

找到库尔德工人党没几个月，她就已经将家庭抛在身后，生活在贝

卡的兵营里了。当党认为她已经准备好的时候，当她终于会说她称为自己民族的语言的时候，他们鼓动她穿过边界，在山里的关口度过冬天，进行训练，准备行动。对于她内心所发生的化学反应，她只是说，当在这里、在群山之中的时候，她感觉到——此时她停顿了一下，望向山顶，寻找词汇——“贴近生命”。更多的沉默之后，她说：“在这里我活着。”

但我指着伊朗那边——越过我们脚下的河流只有1公里远的地方——说：“在那里也有很多的死亡。”伊朗人的炮兵阵地俯瞰着这个营地。她说：“但那就是为什么，生命在这里宝贵。那正是原因所在。我可能随时失去生命。”

凭着自己身上郊区人的那种笨拙，我坚持说：“但你们如何应对这里呢？生活如此艰难。”她停下来，用脚尖踢开一块山里的石头。“是的，”她说，“这个冬天，我们的脚上只有这个。”我低头看着她的白色彪马训练鞋。我的联络官已经指给我看过一个蹒跚而行的年轻人，他的所有脚趾都被冻掉了。“有时候这儿的雪有两尺深，我常常生病，我的身体没有准备好。”她自责地说，似乎希望她可以抛弃澳大利亚所受的舒适教育，以及完全生活在电冰箱与阳光沙滩之中时悄悄占据内心的软弱。“很快，我就准备好去战斗了。”如果她的领导人下令，这个温和、脸颊柔美的女孩可以杀了我，也会杀了我。

我想听到令她转变的教化的动力是什么，所以我问她，是什么将库尔德工人党与其他库尔德党派在斗争中区别开来。“他们是部落式政党，与库尔德社会传统的封建和家族性质相妥协。我们是唯一的大众的政党。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社会的部族的、封建的、家长式性质。”

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年轻的女人加入吗？“女权主义是我们党的核心。我们想改变库尔德斯坦的女性状况。首先，我们要在党自身之内改变。然后我们要从外部改变，为了所有的库尔德女性。”她确实在用柔和、热情的句子说着这样的话，那些话似乎来自她体外，来自党的权威

核心，来自所有那些在贝卡的密闭帐篷中度过的许多个小时、在粗糙打造的长凳上热情地写下的句子。

“他有听你说过话吗？”我突然问她，意思是指阿波，那个名字被她用红线挚爱地绣在自己胸前的领导人、大人物。“哦，是的，是的，他鼓励女性自己思考，大声地说出来，让她们的声音都被听到。”这话不是用一种强迫式或机械式的方式说出来的，而是带有一种热情的轻信。

但阿波说了很多东西，而他的思想之路是崎岖多变、不一致的。他在1984年开始武装斗争，进行袭击，不只是对准土耳其平民目标，也针对所谓的库尔德人合作者。然后，当甚至他的支持者都认为这些策略太过恐怖的时候，他摒弃了这些策略，命令他的游击队攻击军事目标而不是平民目标。一开始他对库尔德领地的创立充满敌意，然后他改变了想法，转而支持。有时他与伊拉克的库尔德团体和平相处，有时开战。人们不禁想知道，在米兰的头脑中，阿波的思想之路是否仍然运转流畅，抑或会有些小小的磕碰和疑问，深深地藏在她说话时流利地吐出的机械式咒语之中？但对她的内心投以疑问也许是浪费时间。阿波把他们从疑问中解脱出来，从追问自身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是这一点驱使她跟从阿波、绣上他的名字，而且像营地里的男男女女一样，在每一个帐篷的角落里犹如崇拜偶像般摆上他微笑的照片。米兰的事业完全在于放弃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分别。她如此紧密地拥抱一种归属，在像我这样的外部人看来，那些共享这种归属的人们看上去像是思想的奴隶。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似乎终于得到了自由。那是当米兰微笑着跟我握手、奔回军用帐篷的时候，她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是，在这里她是真的快乐。

我很快发现，她并不是这里唯一从流亡或海外放逐中返回的人。我自己的“联络官”，一个更加温和、说话柔和、谦逊的年轻人，枪背在背上会局促不安的人，原来是出生于德国的库尔德外籍工人聚居区。他曾在西班牙和法国担任党的代表，从未在库尔德斯坦内部生活过。他的副联络官，一个喜欢说大话、更加开朗的人，原来是来自多特蒙德。后

来，在光秃秃的矮墙砌成的宿舍里，我们坐在地上喝茶的时候，他们憧憬地谈论起海外流亡世界，以及在高高的群山之上他们感到多么的孤独。每个夜晚，他们拿出小小的索尼短波收音机，收听来自欧洲的遥远声音，尤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土耳其语电台。从米兰身上，我已经感受到一种事业是如何变成一种完全满足性的归属形式。

从这些男人身上，从他们有些害羞地问出的问题——我有没有去过多特蒙德，我有没有去过法兰克福的这家或那家库尔德餐馆——我感觉到，在这些高高的库尔德山坡上，民族归属成为一种崇高选择的监狱。

我们在一起喝了许多杯茶，随后在马毛垫上方吊着的酒精灯下，我问男人们，在革命中有没有可能坠入爱河。我明白，我触碰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这里是游击队营地，受军事纪律管束：这儿没有爱情的位置。婚姻和孩子是不可能的。“只要库尔德斯坦没有自由，我们就没有恋爱和结婚的自由。”我那说法语的联络官说道，脸上有一种忧郁的神情。（当我回去把这个言论告诉贝杰特的时候，他叹息着，摇了摇头。他已经对库尔德工人党的政治正确习以为常，没空多管。“一个男人告诉你，除非库尔德斯坦获得自由，他不会结婚，那只是因为他不想结婚。”）

他们突然站起来，告诉我是时候带我去见营地的指挥官了。我现在知道，他不是别人，正是阿波的弟弟奥斯曼（Osman）。我们沿着像蛇一样东弯西拐的羊肠小道，在黑暗中向下走。雨云已经消散，群山环绕的天空中星光闪闪。

领导人斜倚在一个马毛靠垫上，在他哥哥的画像下面吃晚餐。他在摆弄米饭，把米饭和馕泡在一起，无聊地用手把多余的米饭轻轻地弹回盘子里。他的腰带上有一把银色的大左轮手枪，在黑色皮夹克下面刚好能看见。跟他哥哥一样，他是个结实健壮的人，并不喜欢外国媒体。我坐下来之后，他对我咆哮说：“你们都叫我们恐怖分子。”他半皱眉头，半露微笑，重复说：“我们为库尔德斯坦战斗，而你们叫我们恐怖分

子。”这种交锋是一个游戏，它必须持续下去，直到领导人满意地解决了由谁来主导谈话这事。

我回答说：“我长途跋涉爬到山上，不是为了访问恐怖分子。”他咕哝了几声，把目光移开。他的人徘徊在门口，等着他发信号把盘子收走。他摇了摇手指，他们冲进来，把盘子打扫干净，领导人则擦掉他厚厚的黑胡子上的米饭。

我问他，奥贾兰家族为什么会加入“斗争”。他回答说，我们是穷人，土耳其人把我们看成垃圾，这就是原因。我的哥哥在学校里很聪明，他总是取得最好的成绩，他认识到我们必须斗争。“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里。”他说话的时候向下看，单调、呆板地回复，这个不写字的弟弟突然谈起他聪明的大哥想出的那些东西。他说了很多，但我不再倾听，我看着他，这个懒惰、安逸的匪帮之王，然后对自己说，在他的动机里，有多少是民族主义，有多少是纯粹的匪徒性呢？看上去，显然对于他而言，结果的重要性远远低于手段。结果——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库尔德斯坦——最好留给他的哥哥，留给真正的信徒。他显然对手段更有兴趣。是枪炮，是AK-47为他说话，也只有枪炮和AK-47能跟他对话。

第二天早晨，枪炮开始说话了。我被带到下一个峡谷，沿着一条小道，穿过哨所和瞭望台，到另一个训练营，去看一场活生生的实弹训练。奥贾兰不在那里。指挥官是个幽默有趣的老狐狸，灰色头发，盘腿坐在美式军用帐篷的中间，手下的军官簇拥着，正在吃一盘炒薄荷叶加番茄。他命令一支部队攻击下面的一个堡垒，然后邀请我和他一起盘腿坐下来观看表演。在我身后的斜坡上，有数百名游击队员列队，沉默地看着我们。

当攻击开始的时候，我发现他的士兵非常年轻。下面的一块岩石后面，一枚火箭弹用肩扛发射轰击在对面山崖的玄武岩上，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只激起一片石屑。当机枪向在炮火下的方形堡垒上飘扬的白色旗

帜开火时，我试图保持注意力。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攻击组成员开始悄悄推进，躲在岩石后面手脚并用匍匐前进，手里拿着卡拉什尼科夫或手枪。子弹或轻或重地击打在他们周围的泥土里，跳弹呜呜飞过，更多的炸弹爆炸后发出的轰鸣，在这个封闭的山谷空间里回响。攻击组的首领一会儿就到了堡垒的底部，我看到他高高地扔出一颗手榴弹，看到它在空中停顿、爆炸，散发出灰白色、不太真实的烟雾，好像电影中一样。攻击组首领抓住白色的旗帜，点燃草捆，扔进堡垒，宣布占领了它，我身后山上的游击队员们爆发出掌声和欢呼："领袖阿波！领袖阿波！"

后来，指挥官在阅兵场上将他们解散，他们围成半个圈跳舞，手挽着手高唱战争歌曲，穿着彪马的脚有节奏地在泥土中踏步，尘土飞扬，环绕着他们肥大的灰色裤子。我觉得自己有一种一切似曾相识的感觉。它不是越南丛林中南越民族解放阵线营地里的画面吗？不是跟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玻利维亚的群山之中一样吗？

爬到库尔德斯坦最高、最遥远的山峰，我得以发现一种现在几乎已经被遗忘的20世纪民族主义的遗产：僵硬地根据几句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进行所谓民族解放战争的游击队，我从米兰那里听到的机械话语，在这种集体舞蹈中的狂热，以及最重要的，在全能领袖面前放弃自我。我曾经认为，"冷战"的终结已经标志着所有这一切的终结。但事实证明，它仍在库尔德斯坦的群山之中活得好好的。通过其反封建、反部族的意识形态和女性主义，它试图进行现代化。

我离开营地，准备启程前往土耳其，然后回家。此时有两个想法浮上心头。第一，对于一个自由的库尔德斯坦应当是什么样子，在这些游击队员的观点和穆耶丁的观点之间，几乎没有可以妥协或者调和的空间。当民族主义的观点之间存在如此程度的矛盾时，通常会导致战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团结库尔德人方面，被证明并不比部族主义更为有效。事实上，在这库尔德的高山之上往下看，民族

主义像是部族主义的一种形式，人们只能预测，库尔德人抗争中由于意义和方向分歧所导致的部族战争，在未来很长时间以内仍将继续。

第二个想法：既然库尔德工人党是一种土耳其人的运动，完全针对土耳其人在土耳其南部对库尔德人家园的占领，那么这种特定的游击队运动受到的最大影响来自它们的对手土耳其军队的作风和残暴性。我知道自己之前在哪里见过奥贾兰弟弟腰带上的武器，那是一支土耳其军用左轮手枪。同样的装备，同样的残忍。民族主义运动和与他们作战的国家安全部队经常是处在同样的暴力文化中。敌人之间的相互模仿有时比兄弟还要接近。当我从库尔德人山顶上下来、与贝杰特和塔哈告别、再次穿过边界进入土耳其的时候，这就是我想要验证的假设。

---

1. 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Öcalan，1948—），昵称阿波，库尔德工人党领袖、主要创始人。1978年奥贾兰创立库尔德工人党，1984年库尔德工人党开始进行暴力活动，被西方国家视为恐怖组织。1999年被土耳其政府逮捕，关押至今。

和雪貂一起

费雷特（Feret）拥有一张热情、令人难忘的年轻面孔。他戴审讯者的面罩，肩头的手枪皮套上有一个“38”字样。他24岁，隶属于土耳其特种部队。我问他特种部队做什么的。他笑着说，告诉我是违反规定的。但今天他带我进入土耳其军方正在与“恐怖分子”——他用来指代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交战的山谷。他说美式英语：“恐怖分子绝对不可能赢。绝不可能。”

他出去安排护卫：一辆装甲车和两辆满载土耳其士兵的路虎，我告诉我的库尔德人司机，有一种小啮齿类动物，有尖利的门牙，伦敦东区的黑帮因为把这种动物放进敌人的裤子中而闻名。我的库尔德司机淡淡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对年轻的雪貂(注)来说，土耳其东南部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像北爱尔兰一样，整个地区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营地：直升机在头顶盘旋，F-16在扫射或者侦察，从库尔德村庄上空呼啸而过，在库尔德市镇中，每一个小餐馆里都有个拿对讲机的人。我已经被跟踪了许多天，他们藏在宾馆内庭院的柱子后面。当我坐车出去的时候，他们躲在一辆白色的小雷诺车里面紧跟，带着摄像机，记录下我看到了什么，跟谁说了话。

这儿所进行的反暴事业前景光明灿烂，对于聪明的少年，职业道路上不存在障碍：公民自由被永久性地搁置，你可以随意逮捕任何库尔德人麻烦制造者，你的上级中没有人关心你是如何从牢房里那些血淋淋的嫌犯身上得到情报的。当地确实有一些来自一家被称为《议程》（*Gundem*）的土耳其语报纸的新闻记者报道过所谓的人权虐待。但什么能阻止你把枪口也对准他们呢？报道肮脏战争的记者已经有11人被枪

杀。多一个几乎不会引起注意。

另一方面，外国记者需要特别对待。你知道，他们全都是伪君子，尤其是英国人。他们应当知道，与恐怖分子作战是件肮脏的事情，但他们来到这儿，告诉土耳其人要对库尔德人友善。他们遭到爱尔兰共和军的索求，要从大不列颠撕走一大块，但他们却来到土耳其，告诉我们要赋予库尔德人以“自治”。停止压迫？停止抓人？这足以让任何好雪貂感到恶心。

但现代的安全文化完全取决于良好的公共关系。所以雪貂说话小心翼翼。“你们想要一场好戏？我们就给你们好戏。”他说。毕竟，伊斯坦布尔想举办奥运会，土耳其想要被接纳。伊拉克和土耳其边境的安全主管不是说他要“人道的程序，像你们在欧洲所拥有的那种”吗？众所周知，欧洲的程序当然是人道的。在反暴力的事业中，那是一种良好的形式，告诉外国人你可以变得多么文明和人道。甚至雪貂也就此发表了一些评论。当我们沿着山路一路摇晃颠簸上行，经过部队的营地、兵营、机场和观察哨所，经过蒙着脸的库尔德村妇的时候，他承认他希望政府多花一点钱在道路上，少花一点在安保上。雪貂当然是正确的：我从未去过在雪貂上花这么多钱的国家。

车队最终抵达了他们认为安全的、可以让我去看的村庄。这里有大约100座贫穷的、单层平顶土砖房子，散布在一座参差耸立的悬崖之下。我发现在悬崖顶上有土耳其的望远镜一闪而过。在悬崖下面的村庄里，女人们将成串的羊粪摊在屋顶上晾干，充当生火的燃料。孩子、绵羊、鸡，都在房子之间盘绕而肮脏的小路上横冲直撞。

我看到了村子的警卫，土耳其军方为他们提供装备，出钱给他们，为村子提供保护。有人说警卫曾恐吓自己的同胞，在邻村犯下暴行，还将其栽赃给“恐怖分子”。雪貂知道我听过这些故事，所以我还没有发问之前，就给我看一沓厚厚的展示最近暴行的照片。那么多的鲜血成池，那么多在母亲身边死不瞑目的孩子，那么多脖颈被刺穿的老人，我甚至

不愿去问那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恐怖分子们”干的，还是雪貂们干的？谁也记不起来了，谁也不会关心。关键在于，恐吓生效了。恐吓是权力的制造物。恐怖分子说，让他们害怕你，人们就不会与警察合作；警察说，让他们害怕你，他们就不会与恐怖分子合作。于是不断继续，而这就是暴力不断升级的逻辑。

村里的孩子们围着陌生的外国人，一个穿光滑丝质套装、肩上扛着机枪的库尔德人，挥舞拳头，把孩子们赶走。小男孩们在他身后发出怪声，像是被殴打的狗和牛。他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他是当地的村民警卫队队长。

他指着我身后的山顶说，这儿一直都不安全。在那座山上，有一个村子，全都是“他们”。村民警卫队晚上在路上不间断地埋伏警戒。学校的老师都被袭击吓跑了，所有孩子都不上学。他又一次向四面乱抓，用手掌抓住附近的一个男孩。穿破烂的乡下人服装的库尔德男人们聚在一起，他们耷拉着头，什么也没说。雪貂就在边上，从他审视的眼镜后面监视着。一个土耳其军方的摄影师正在拍摄每一个跟我说话的人。

我逃离开去，和村里的杂货商一起走上村里的一条小道，他是个红色脸庞的老人，穿库尔德传统的宽松裤子。我们一边走，他偷偷地跟我低声说话。他在恐怖分子和土耳其军队之间左右为难。“如果我们和军队合作，恐怖分子会杀了我们。如果我们和恐怖分子合作，”他对着正靠近我们的雪貂做了个手势，“他会杀了我们。”

车队护送我离开的时候，雪貂用一种友善、好奇的声音问：“他说了什么？”我说：“他说军队干得很棒。”接下来的回家之路，我们穿过南部土耳其的监狱营，雪貂和我都沉默无语。

雪貂正在做的是阿塔图克的工作，共同努力维持现代土耳其国家的完整。当事关国家统一的时候，你不能妥协。不值得付出的东西毫无价值。拉起帽兜，遮住脸，把子弹推上膛，在夜里去打破库尔德人的门，

把他们从床上拉出来，把子弹射入他们的大脑。肮脏战争是雪貂们的天堂，但同时也是阿波·奥贾兰和他弟弟的天堂。民族主义给双方的残忍都提供了借口：一方以自由抗争的名义杀死合作者，另一方以民族国家安全的名义杀死同情者。

怎样才能打破这种循环？采用足够的恐怖，我们总是能制止恐怖主义。但你能制止一个民族相信这里是他们的家园吗？你能制止人民拥有自己国家的想法吗？这里的库尔德人知道在隔壁有一小片领地，在那里库尔德人可以成为库尔德人，他们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微笑、歌唱，用自己的语言开玩笑。你可以走近外国人，和他交谈。在你可以宣称自己所有的地方，没有什么需要害怕。

在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的这个边境地区，我终于了解了拥有自己地方的民族和没有自己地方的民族之间人性的差异。在这边，人们的内心和思想是开放的；在另一边，人们的心脏随着恐惧而跳动。在这边，他们呼喊“尼好先森”表示敬意；在另一边，他们对于外国人的接触退缩不前，担心惹上麻烦。无国可归是一种意识的状态，它是无家可归的近亲。这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的理解：只有当拥有自己的地方之时，一个民族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类、完整的自己。

人们对它的渴望太过强烈，恐怖无法阻止。我在军营跟雪貂告别，再次回到山口，摆脱我的盯梢尾巴，最后在薄暮中踏上一条山路。我的路被一大群绵羊挡住了。一个牧羊人穿过石头丛生的牧场走向我。他是个被太阳晒黑的老人，穿两块缝在一起、粗糙而未经处理的兽皮，像是一位先知勇士的盔甲。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大步走近我，用牧羊鞭把羊推到边上。我问他这是哪里，因为我已经在这些高山道路上迷失了方向。他似乎很惊讶，好像我从未知晓世间事物一般。他指着环绕我们周围、沐浴在银光之中被烧过的光秃秃群山，然后用一种既温和又坚定的声音说：“这里是库尔德斯坦。”

1. 雪貂英文为ferret，与费雷特近似，作者用以指代费雷特及其所属的特种部队。

6　北爱尔兰



图31　1996年曼彻斯特汽车炸弹爆炸案现场，该事件由爱尔兰共和军策划实施



图32　血色星期五（Bloody Friday），1972年7月在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发生的一系列爆炸，由爱尔兰共和军实施，造成一百多人死伤



图33　1970年，贝尔法斯特香基尔道，忠诚派在一处建筑物的墙壁上涂鸦“决不投降”



图34　1972年1月30日，北爱尔兰伦敦德里“血色星期天”，英国士兵朝北爱天主教抗议者开枪，射杀二十余人，随后爱尔兰共和军宣称“将杀死尽可能多的英国士兵”



图35　鲍比·山德斯的纪念壁画，贝尔法斯特福斯路（Falls Road）。山德斯是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1981年在狱中领导共和军囚犯绝食而死



图36　阿尔斯特奥兰治党人一年一度的奥兰治游行

镜子，镜子

肉食店和彩票店的百叶窗拉了下来，人群沉默地聚集在人行道上。远处，从香基尔道注拥挤的街道上，传来了风笛的乐声和脚步声。一辆平板卡车首先出现，载有花圈，用精心挑选的红色、白色和蓝色的花朵拼成阿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 Force）的首字母；然后是载有鲜花覆盖的棺材的灵车，有一群沉默的军人紧随其后；他们大概有两百多人，穿大垫肩、双排扣的套装西服，白色衬衣，黑色领结。他们扭头扫视周围的人群的时候，墨镜闪闪发光。当他们看见摄像机的时候，一队人马拨开人群，靠过去传话：“现在不要拍摄，别自作聪明。”

香基尔人正在向赫比·麦卡勒姆致以最后的敬意。在新教徒的一次游行中，他一直用一把手枪和一枚手榴弹为游行提供保护。警察试图改变游行路线，让他们远离天主教聚居的阿多恩（Ardoyne）。在忠诚派注和警察之间，混战爆发了。有些人说手榴弹是扔向天主教徒的，其他人说是扔给警察的，但最终承受爆炸的全部力量的人，是29岁的布莱恩·“赫比”·麦卡勒姆（Brian‘Herbie’McCallum），两个孩子的父亲，朋友眼中的民兵英雄，敌人眼中的新教徒恐怖分子。

坟墓边上，在来复枪对空中射击致敬之前，赫比·麦卡勒姆的一位指挥官发表了演讲，他说：

支持妥协；在面对背叛时保持沉默，不为所动；任我们的人民、文化和历史耻辱地遭受诋毁；屈服于不过是实用主义者的荒谬想法——怯懦。志愿者布莱恩·“赫比”·麦卡勒姆和许许多多阿尔斯特志愿者做出了最终的牺牲，证明这个民族将得以捍卫。



北爱尔兰地区示意图

同一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正驾车在安特里姆道注上，想着这条路看上去多么像北伦敦我自己家所在的那条街道。路的两边同样排列着砖砌房子，凸窗下面坐落有修剪整齐的方形树篱和玫瑰花丛。一切都是熟悉的英国式的，但在路中间燃烧的这个巴士是怎么回事？在距离它30英尺注远的地方，我跳下了车，我前面有一个消防员正在向火跑去，这时一记爆炸将他抛在地上。我再次抬头的时候，这个消防员挣扎着想站起来，巴士燃烧得更为猛烈了。

我驾车闯入了一场贝尔法斯特注的巴士劫持事件。我到来之前一分

钟，一个持枪的男子拦在路上，命令司机和乘客下车，然后扔了一颗汽油弹进去。持枪男子有可能正在看着，等着袭击警察。灰色的装甲路虎车已经封锁了这个路段，穿防弹衣的警官在墙后面占好了位置。这条道路是通向香基尔的，从这一事实来判断，持枪男子是一名忠诚派。

孩子们很快聚集起来，围着消防水龙头泼水玩，而母亲们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穿着围裙，观看巴士被烧成一个骨架。一位女子靠近过来，说："你可别认为这里一直都是这样子，这是一个伟大的小城市，不要产生错误的想法。"

我不想有什么错误的想法，但在接下来三个小时的行程中，我又遇到了两起袭击事件，厢式送货车在住宅区街道中间任意燃烧，警察的狙击手在郊区花园里防卫。晚上，除了英国城市通常有的声音之外，我可以听到自动武器开火时砰砰啪啪的声音。

赫比·麦克勒姆葬礼两天之后，贝尔法斯特发生了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忠诚派暴动。40辆巴士和小轿车被劫持、烧毁；有28起针对警察的枪击事件，9起燃烧弹袭击；当消防车到达多尼盖尔街（Donegal Road）地区准备扑灭燃烧轿车的时候，消防车自己也被劫持，消防队员被赶下来，车子被纵火焚烧。警察调动拉斯库尔、伍德威尔、香基尔、海菲尔德的警力，而老虎湾地区也遭到袭击。警方相信暴动是为了展示力量，是由那200名戴墨镜跟随赫比·麦卡勒姆的棺材行走在香基尔的沉默年轻人所策划。

阿尔斯特是个结束我的旅程的好地方，因为它似乎重复着那么多我在旅程中已经见过的东西：民兵组织，犹如在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和库尔德斯坦；种族狂热，犹如在克罗地亚；雄性暴力崇拜，犹如德国的光头党；民族国家安全，犹如土耳其。直升机不断地在头顶盘旋，路虎和装甲运兵车蹲守在每一个主要路口，戴头盔的男人在他们的枪口瞄准器中

注视着你。

像绝大多数外来者一样，我曾把这些问题视作向部族过往的一种倒退。现在，在1993年，北爱尔兰看上去有可以预见的潜在未来。在欧洲，没有其他地方像贝尔法斯特那样承载着如此深重的种族分歧。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来的和平墙原本是防止同一街道的人们相互扔燃烧弹和谋杀，现在像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一样成了永久设施，有些地方高达20英尺，将劳工阶级的贝尔法斯特一分为二。

种族分隔确实减少了死亡统计数字。在70年代中期，每年有250—450人死亡。现在这个数字在100以下。同时，社区的分离正在加剧。60%的人口现在居住在新教徒或天主教徒比例超过90%的地区。

分离以微分子模式加剧：一个轮胎被划破了，一个孩子被殴打了，一个信箱里被倒进了汽油，是这一方或是另一方干的，于是又一个家庭决定选择统计数字显示安全的地方。贝尔法斯特喜欢谈论“种族清洗”，但微分子式的小打小闹无法和波斯尼亚的屠杀相提并论。如果萨拉热窝有一天看上去像是贝尔法斯特，它会觉得自己幸运至极。

跟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一样，在北爱尔兰，种族、宗教和政治被如此彻底地熔铸在身份之中，个人如果想要挣脱它们的掌握，会被视为一种挑衅。在这边，一生从未去过教堂的人们生活在新教徒的标签之下；在另一边，从不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尔兰，但恰巧是天主教徒的人们，被彻底地烙上了“民族主义者”的标签。

这些标签将每一个人陷于分裂之中，一种不可再简化的种族身份的分裂。然而，北爱尔兰的一切不是一场种族战争，不比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或乌克兰—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更具种族性。在所有这三个例子中，民族之间本质接近，说同样的或者相近的语言，共享同样的生活方式，在宗教上有差异但似乎没有人真正地实践这种差异，他们被一个简单的事实区分开来：一方曾经统治过另一方。是对过去被统治的记忆，或是

对未来被统治的恐惧，而不是差异自身，将冲突变成一个无法打破的政治暴力之无底旋涡。

在阿尔斯特，我试图了解，当英国性（Britishness）被放置在一场肮脏战争的讯问台上时，它呈现何种样貌，令人感觉如何。在英国本土，英国性是一个休闲益智的游戏、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在阿尔斯特，它可能攸关生死性命。我想，忠诚主义（Loyalism）可以充当一面镜子，让我看到如果事关其民族的生死，英国性会是什么样子。我选择在7月访问，是因为忠诚主义的盛大节日——巡游季——即将开始。但在赫比·麦卡勒姆的葬礼之后，我已经不确定忠诚主义的镜子揭示的是什么。现在，新教徒民兵组织在北爱尔兰杀的人比爱尔兰共和军杀的还多。他们的受害者范围从无辜的天主教徒到英国士兵和警察成员。这是一种与英国作战的英国性，一种向王冠和阿玛利特(注)长枪宣誓效忠的英国性。

英国是这个纷乱世界中一个安静的岛屿，这种幻觉在贝尔法斯特的街头一天也无法存活。事实上，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自由民主国家，大不列颠因政治暴力导致的死亡都要多得多。自从1969年以来，发生了3000起政治谋杀，超过5万人受重伤。在大不列颠，按人均计算，在政治谋杀中死亡的人数超过印度、尼日利亚、以色列、斯里兰卡或阿根廷，而所有这些国家都被英国人认为比自己更为暴力。

这种暴力的程度和集中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秘之处。正是依其本性，民族主义将民族之间的斗争定义成为荣誉、身份和灵魂而进行的斗争。当赌注被拔得如此之高的时候，冲突很快就缩减成一种零和游戏。一方的胜利必定意味着完全击败另一方。当赌注看上去涉及自身生存时，结果就是暴力。北爱尔兰就是这样的情况。两个民族国家都对这片区域提出主权。90万新教徒或新教徒的后裔希望留在英国。60万天主教

徒或天主教徒的后裔大都——但不是全部——希望成为爱尔兰人。既然要满足一方的愿望只能以牺牲另一方为代价，结果是无止境的冲突就不会令人惊讶了。

比暴力的程度更令人惊讶的是英国本土继续花钱买单的意愿。一个相对贫穷的自由民主政体一年花费30亿英镑、部署2万名士兵来支持当地的警察力量作战，这可以起到遏制作用，但无法取胜。

如果不是因为英国国家的领土统一及其权力的合法性都与之生死攸关的话，如此的投入是不可想象的。人们可能期望这样的事业会激发最深沉的民族主义情感，然而，支撑英国（在北爱）之存在的似乎是令人厌倦的跨党派共识：恐怖必须被视作是不可以做交易的，部队不能撤回以免发生内战。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北爱尔兰事业是捍卫联合王国，那么阿尔斯特已经不被看作不列颠本土的一部分。帝国的代理领事——北爱尔兰事务大臣——管理一切事物，从与都柏林谈判到分配国民住宅。货币是英镑，但北爱尔兰的银行票据在英国本土不是可交易的合法清偿方式，英国的各政党不会为这里的选票竞争。经历了25年威斯敏斯特[注]的直接统治之后，当地的民主几乎消除殆尽。阿尔斯特明白，它已经处于半分离状态。

忠诚派痛苦地注意到当阿根廷入侵福克兰群岛[注]的“英国主权领土”时喷薄而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对阿尔斯特的冷漠之间的一种奇特差异。如果可能的话，英国本土会放弃阿尔斯特。民意调查对于下述选择的支持度极高：对将英国的主权移交给北爱尔兰施加限制，或是与爱尔兰共享主权。

甚至英国对阿尔斯特的承诺也受到条款的阻碍。自从1985年的《英爱协议》之后，英国只承诺，只有当大多数民众还愿意，它才会留在北爱尔兰。因此，这个地区只是联合王国的一部分，拥有受保护的分离权

利。英国政府越来越将自己塑造成“中立的”、在一个希望留在英国的群体和另一个希望成为爱尔兰人的群体之间的和平维持者形象，忠诚派对此极为愤慨。

如果我们所讨论的北爱尔兰事业是捍卫联合王国，那么它是一个几乎没有打动英国人之内心的事业。然而这是矛盾的，英国的民族主义一直具有公民多样性：一种对国家机制——王室、议会、法治、联合王国自身——的依附，而非对一个民族的依附。然而像加拿大、印度、比利时和其他多种族国家所发现的，对国家的依附可能会比对构成国家之民族的依附要弱。毕竟，联合王国是宪法的创造物，谁会对宪法的创造物产生强烈的感情呢？

种族民族主义将其自身附着于对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捍卫，这些在经历重新勾画的联合之后仍可以存活下来。英国可以割让北爱尔兰，在本土很少有人会感到羞辱刺痛或受懊悔折磨。他们是否应该这样做是另一个问题。但就英国而言，这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已经失去了曾经勇于捍卫阿尔斯特的民族主义冲动吗，还是从未将阿尔斯特人放在第一位呢？

英格兰人总是拿他们自己的宽容温和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幻觉做比较，用来作为他们自己身份的试金石。居住在岛上，对其他容易激动的民族实行帝国权威统治，以拥有最古老而且连续存在至今的民族国家而自豪，这些让英格兰人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认为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狂热免疫。一种反讽的、自我贬抑的民族性格仍旧重视其官僚阶层的情绪控制，这种性格要求自己将民族主义激情的烈酒拒之门外。

休·塞顿·沃特森（Hugh Seton Watson）是一位伟大的研究东欧民族主义的英国历史学家，他确信在他自己的土地上不存在民族主义这样的野兽。他相信，一个从未被其他人征服过、侵略过或统治过的民族，不

可能是民族主义的。“英格兰民族主义从未存在过，因为既不存在当作一种信条的需要，也没有为独立而斗争的需要。”苏格兰的民族主义是有可能的，威尔士的民族主义也是可能的，但英格兰的民族主义绝无可能。

1707年之后，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王室结合，一种英国民族身份被塑造出来，让英国人得以发展他们独特的双重归属：对他们原来的民族，以及对他们的民族国家和帝国。作为一个起始就是多种族、多民族的国家而言，英国可能是第一个将爱国主义指向帝国而不是指向构成帝国之民族的国家。在其帝国的全盛期，英国的公民民族主义的核心形象是不列颠尼亚[注]，大海的统治者。

帝国主义是这种一直存在的英国民族主义的形式和体现，而英国的殖民地民族从未对其主人这种不可救药的自尊有过多怀疑。然而，主人自己相信，他们的爱国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这种将民族主义视为病态、只会感染外国人的观点，为数百年来的大英帝国统治提供了基本准则。法律中的种族因素越少，意味着将种族解放出来，更少受部族狂热的影响，并且教给他们英格兰种族的公民脾性。即使事实证明殖民主义远未能消灭对种族的忠诚，而且实际上有助于使种族团结起来形成民族意识，英国人仍然确信，他们自己是一个超越于其他民族的部族情感的民族。用那句著名的话来说，他们不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注]获得了帝国吗？他们不是以一种发派的方式将帝国拱手相让、从而证明自己没有被民族主义的野心控制吗？200年来，帝国主义可能一直是英国性的表面面目，但按照它自己的想法，帝国主义是一种不偏不倚的独特形式，一种勤勉而生、自愿放弃的“负担”。

随着英国适应了一个新的、优雅教养相对衰减的后帝国主义时代，它可以找到各种理由，因为不受庸俗的民族自尊诱惑而褒奖自己。对于精心打造一种后帝国主义的民族身份，美国人尖锐刺耳的爱国主义自信是个完美的陪衬，这种民族身份将任何形式的英国民族自尊都看作喜剧

表演。

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冷战”也有效地压制了民族的自我界定。由于一致认为有必要展现统一战线以对抗苏联的威胁，西欧国家正常的民族自我肯定和相互竞争被搁置了50年。

同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相对繁荣侵蚀了英国的地方主义，开始弱化英国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和不可救药的独特性的信心。新到来的黑人和亚洲人口，仅其存在本身已开始暴露出集体归属的象征是多么的白人化、帝国化。古老的民族礼制开始面对新的观众上演，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和场景两者都必须改变。甚至君主政体也不再是英国自己的：它变成了整个星球的童话般的家族罗曼司。

在去殖民化、移民和优雅的经济衰减之外，出现了一种新式的民族认同，它欣赏和赞美英国，准确地说是因为它本质上是后民族主义的，因为它加诸个体之上的要求是温和的、灵活的，足以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做自己的英国人。

我1978年从加拿大来到英国。我更喜欢人们认为在衰退的英国，它相对摆脱了那些民族的地方主义——将他们自己视为世界中心的地方主义。它不像美国那样妄自尊大，不像德国那样自我满足，不像法国那样自我封闭。它处在艰难之中，这让它成为一个有趣的居住之地。

我既不喜欢也不相信外界认为它国势日衰的论调。它最触动我的，是一种被压抑的帝国怀旧之情。一切被看作衰落和腐烂的标志——失去帝国，来自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新到人口，惨痛的经济重建——似乎是康复而不是腐烂的迹象。像欧洲任何国家一样，战后英国被迫急剧改变，这种变化没有导致分崩离析，没有废弃其自由民主政体的功能。

但随着在这里住的时间日久，我慢慢认识到，在英国，一个多元文

化、多种族、后民族的世界主义的空间比我想象的要狭窄。那些为这种世界主义身份代言的人，仍僵持在与其他观念的人们的斗争中，那些人们想象英国是自己的，寻求避免欧洲入侵的安全保障，按照君主政体和议会主权界定自身。这是关于英国在欧洲之地位的三十年战争的核心原因，只有傻子才会认为历史站在世界主义这边。

英国抗拒欧洲的程度让我怀疑，我被英国人将自己刻画为超越欧洲大陆低级民族主义情感的形象所蒙骗了。这只不过是又一个英国式的矫揉造作。事实上，英国是所有民族中民族主义最强烈的。现代民族主义确实是英格兰人的发明创造。

“民族”这个概念获得其现代意义正是在英格兰的新教革命期间。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下的都铎王朝以“英格兰民族”为名领导了一场民族主义革命，反抗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堂。同时，都铎王朝开始征服天主教的爱尔兰。正是从其民族体的一开始，英格兰性（Englishness）被自相矛盾地定义为与欧洲大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爱尔兰陷入难解难分之斗争的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民族的信条。从16世纪50年代的玛丽迫害[注]到1588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注]，再到查尔斯·斯图亚特[注]在内战中被处死，英格兰民族通过反抗海外天主教入侵者和国内的天主教暴君来界定自己。

在英格兰身份的形成过程中，转折点之一是在1685年，天主教徒国王詹姆斯二世（James II）登上王座，开始挑战议会的权威，迫害新教信仰。1688年，全国起义，呼吁传位给荷兰统治者、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他到达英格兰，赶走了詹姆斯，建立议会主权，树立了新教的至高地位。

詹姆斯退回其在爱尔兰的天主教领地，开始重新征服爱尔兰，作为进攻英国的前哨。同时，他的盟友和庇护者，法兰西的路易十四（Louis XIV）入侵新教的荷兰。新教欧洲的命运悬于一线。除了信仰

新教的北部，整个爱尔兰很快被詹姆斯控制。1689年，詹姆斯二世党人（the Jacobite）的军队围困伦敦德里（Londonderry），该城坚守了105天，为奥兰治的威廉登陆并进而重新征服爱尔兰赢得时间。1690年6月，奥兰治的威廉亲自在卡里克弗格斯（Carrickfergus）登陆。在1690年7月12日的伯恩（Boyne）之战中，他决定性地击败了天主教护卫者。

奥兰治的威廉的胜利，与光荣革命、开辟议会主权的帝国盛世、宗教宽容和立宪君主制一起成为英国神话。在阿尔斯特，威廉的胜利成为种族优越性的奠基神话。对于阿尔斯特人，伯恩之战正如塞尔维亚人的科索沃之战：这是一个弱小民族与不共戴天的仇敌作战、为整个欧洲捍卫了基督教世界的时刻（尽管新教徒在伯恩取胜，而塞尔维亚人失去了科索沃，但两种文化都将他们自己视为其信仰的英勇无畏、受到误解的捍卫者）。阿尔斯特人得到的回报，如其所见，是他们对天主教爱尔兰人的永久优势地位，他们现在永远将爱尔兰天主教徒视为反对英国王室的潜在叛乱者。

至少从1688年到1912年，阿尔斯特新教徒相信他们的奠基神话也是英国整个国家的奠基神话：击败詹姆斯国王，确立新教徒在爱尔兰的优势地位和英国的立宪君主制。然而并非如此。爱尔兰被证明是英国国家——以及民族——建构中的最大的失败。新教主义在英国认同中的核心地位使它不可能成功地将天主教的爱尔兰吸收、融入联合王国。1912年，当英国承认爱尔兰自治时，阿尔斯特人在爱德华·卡尔森爵士（Sir Edward Carson）率领下，愤怒地起来反抗，他们认为，作为王室最忠诚的追随者，得到的回报却是对英国性自身最基本要素即其新教核心的背叛。

英国没有将阿尔斯特看作自己的基本组成部分，很大程度上是英国认识到他们的民族建构在爱尔兰遭遇了最大失败。这些麻烦强化了英国人意识中的一种认定：毕竟，阿尔斯特是充满矛盾的、顽固的他者，即爱尔兰人。

自从1920年爱尔兰独立之后，天主教的爱尔兰不再是英国界定其自身是谁的一面镜子，爱尔兰和英国不再是兄弟式的敌人。新教曾经是将英国与爱尔兰以及天主教欧洲区分开来的试金石，现在，在一个只有15%的人口将自己当作教堂常客的世俗化国家中，它成了一个苟延残喘的自我界定要素。在信仰新教的阿尔斯特，情况不是这样，那里65%的人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他们在英国人当中独一无二，仍然与几百年来定义英国性的“他者”直面相对。毫不奇怪，在不列颠群岛，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最强烈的英国民族主义；毫不奇怪，一次阿尔斯特之旅就是穿越历史各时代层级的旅行，在此历史时期，英国本土与它曾经拥有的英国性分离了。

---

1. 香基尔道（Shankill Road），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的一条主要道路，居民主要是亲英国政府的劳工阶层。
2. 忠诚派（Loyalist），或译亲英派、保王党，指北爱尔兰忠诚于英国政府和王室的新教徒群体。
3. 安特里姆道（Antrim Road），贝尔法斯特主要街道之一，因历史上北爱各武装组织多次在这条道路上发动袭击而闻名于世。
4. 不到10米。——编者注
5. 贝尔法斯特（Belfast），北爱尔兰首府、政治文化中心，是北爱最大工业城市及最大海港。
6. 阿玛利特（Armalite），美国军火制造商，所生产的AR长枪在北爱冲突各方均得到广泛使用。
7. 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英国议会所在地。
8. 福克兰群岛（the Falklands），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西班牙语：Islas Malvinas）。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在此爆发战争，英国最终取胜，胜利激发了英国国内的爱国主义情绪，并帮助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保守党赢得1983年大选。
9. 不列颠尼亚（Britannia）女神，英国的象征和化身，其形象通常是身披盔甲，手持三叉戟和盾。
10. “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in a fit of absence of mind），为英国历史学家约翰·罗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其1883年的著作《英格兰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中的著名论述：我们似乎是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征服了半个世界。
11. 玛丽迫害（Marian persecution），玛丽一世（英格兰女王，1553—1558年在位）是虔

诚的天主教徒，而其父亲亨利八世信奉新教，她登基之后试图复辟天主教，残酷迫害新教徒，约有300多人被烧死。

12. 无敌舰队（Spanish Armada），1588年，西班牙派出无敌舰队，意图征服英国，在格瑞弗兰海战中被英国击败，西班牙国势由此转衰，英格兰崛起为海上第一强国。

13. 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即英国国王查理一世。

汤米·多伊尔

它古老而美丽，它的色彩令人愉悦

经历了德里（Derry）、奥格里姆、恩尼斯基林和伯恩，它已然陈旧

在那流逝的昔日时光，我年轻的父亲曾身披它

所以12号那天，我总是披着它，我父亲披过的肩带

汤米·多伊尔（Tommy Doyle）披着他的奥兰治党人（Orangeman）肩带，在战争纪念碑（the Cenotaph）前面来回踱步，等待索姆[注]纪念仪式开始。汤米告诉我，贝尔法斯特战争纪念碑正是大战之后帝国建立的第一个纪念碑。它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的阴影之下，市政厅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建筑物，是在贝尔法斯特还是大英帝国的亚麻和造船之都的时候建立的。纪念碑旁边是一尊达弗林和阿瓦侯爵的雕像，他曾担任加拿大总督、印度总督，附带还有两个低着头的雕像，一个是包头巾的锡克人，另一个是加拿大毛皮猎人，用以纪念一个阿尔斯特人的骄傲，所以铭文写着纪念“一个伟大的爱尔兰人”。

汤米，一个整洁的74岁老人，有明亮的蓝色眼睛。他属于后隔离、后帝国时代，在那时没有阿尔斯特人会认为自己是爱尔兰人。汤米是著名的忠诚主义人士：爱尔兰副总会长、贝尔法斯特区第二分会会长，虔诚的教徒，禁酒主义者。他终生的工作都是在柜台后面当一名五金批发商，但不是他的工作而是奥兰治主义构成了他的生活。在汤米的身体里面并没有狂热的基因。他按照教义要求的去做，即憎恨天主教教义的罪恶，而不是憎恨被天主教罪人所迷惑的穷人。

1977年的一个早晨，汤米的信箱中收到了一个“小小的棕色包裹”，一开始他以为可能是个邮件炸弹。他小心翼翼地划开封印，检查里面是不是有看上去可疑的电线，一封来自女王陛下的漂亮信件滑了出来，与之一起的还有一枚闪亮的银禧纪念勋章(注)。在隆重的场合他会佩戴勋章，把它别在他的奥兰治肩带上。

汤米还打着爱德华·卡尔森爵士领结，上面印着“决不投降”。爱德华·卡尔森勋爵领导了1912年反对爱尔兰自治的运动，帮助动员和武装当时的准军事组织阿尔斯特志愿军，用来保卫阿尔斯特、反对自治。战争(注)爆发之后，这支部队志愿保卫帝国，他们作为第36阿尔斯特师前往索姆河赴死。1916年7月，在两天的战斗中，有5500名阿尔斯特师的士兵死伤。正如加里波利(注)属于澳大利亚人，维米岭(注)属于加拿大人，索姆河是属于阿尔斯特人的。但加里波利和维米岭的浴血牺牲完成了两个年轻殖民地主权的民族解放，而索姆河的神话让阿尔斯特人陷入它最初的神话——被背叛的忠诚主义——之中停滞不前。索姆河之战四年后，归来的阿尔斯特志愿军发现他们的奉献换来的是分离和爱尔兰自由国家的出现。

阿尔斯特忠诚主义惨痛的矛盾纠结全都凝缩在阿尔斯特志愿军的故事之中。一支民兵组织因爱尔兰自治而站出来与英国人战斗，他们曾在索姆河为捍卫帝国而战斗、牺牲，却因分离而失去爱尔兰。20世纪60年代，阿尔斯特的军事传统复兴了，他们承继旧有的名称，再一次与英国的背叛抗争。

汤米余生剩下的事业是在法国建立一个纪念碑，纪念1916年7月死去的阿尔斯特奥兰治党人。他已经让人设计好了纪念碑，由全世界的各奥兰治分会（Orange Lodges）掏钱，很快他就会前往法国北部的蒂耶普瓦勒森林（Thiepval Wood），在那儿的一片田野上看到自己的梦想实现。他成长于贝尔法斯特大街上的劳工阶层中间，在那里，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房子里有儿子或丈夫再也不曾归来的记忆。他眼中含泪，叙

说16岁的少年死在战场上，他们的出生证书伪造了年龄，让他们有服役的资格。看上去，他真的记挂着那失去的一代人，在本来阳光灿烂的天气中，如果还有什么苦痛的话，那就是怀疑英国记住他们的执着程度不到他的一半。

但是当听见管乐队沿着大道走来时，他又变得开朗了；他看到同胞们从市里的住处向纪念碑前进，戴着他们的圆顶礼帽，哔叽西服上装饰有白色的袖口，有些人带着卷好的雨伞，其他人佩剑，还有一些人“披挂着”颜色——联合杰克[注]旗的颜色和阿尔斯特旗的颜色，在圣帕特里克十字架的中间是血红的手[注]。花圈放好了，《最后的岗位》（Last Post）已经奏响，彩色旗帜放低了，一百个上了年纪、满面忧愁的男人用颤抖的声音唱起阿尔斯特的赞美诗：“上帝是吾千年保障。”

奥兰治乐队走远之后，汤米带我去奥兰治中心总会，山墙上的字显示，它建于1883年，字的上方就是两面联合杰克旗，还有奥兰治的威廉骑在一匹跃起的马上的雕像。正面墙上覆盖着钢丝网，溅落有白色的油漆，这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一辆经过的小汽车上扔出的油漆炸弹造成的。总会是一个褪色的英式堡垒，像个坟墓一样黑暗，因为窗户都被用钢化防弹百叶窗密封了。汤米审视着褪色的、从顶部剥落的织锦墙纸，历届和现任总会长那落满灰尘的肖像，大约制于1953年、褪色的伊丽莎白女王铜版像，以及纪念“被阿尔斯特的敌人”杀死的奥兰治党人的黄铜牌匾，他承认：“我们需要在这儿花些钱。”汤米带我去内部的密室，一间会议室，在那儿，每周一的晚上，他坐在长桌一端的雕花木头椅子上，主持总会的会议。

当我们谈到忠诚派自身的时候，汤米的话语开始变得像一个梦游者，他从无意识的内心深处拽出完美组织的句子。他说，他是忠诚的，“忠诚于奥兰治的威廉三世国王在1690年7月的伯恩之战击败詹姆斯国王的天主教军队时所建立和确认的宗教和公民权利”。我评论说，这似乎并不是英国人所忠诚的对象，他悲哀地耸耸肩，承认可能确实如

此。“他们也不支持照片顶端的女王。”

对于汤米而言，身为英国人的意义，从根本上意味着做一个新教徒。两者不可区分，在这两者和南方的“神权政治”（theocratic）国家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奥兰治主义是他的生命，因为他的两种忠诚——对王室的忠诚和对宗教的忠诚——都统一在奥兰治的信条之中，是它让汤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他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正在做上帝的工作。但它也意味着他是一个无法改变和学习的人，他就是他自己。“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们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说，“如果他们把圣帕特里克十字从联合杰克旗上拿下来，旗帜上不会剩下什么，不是吗？”

我问汤米，当天晚上他是否参加奥兰治舞会（Orange Ball）。汤米脸红了，说他要回家。汤米是一个真正的奥兰治传统的绝对戒酒者，但他承认戒酒是一个已经过时的理念。但是，你仍然会坚持自己的信仰。他明天要去教堂，没有时间饮酒作乐。“不是我应该做的事。”他说，眨了眨眼，挥手告别。

到了楼上的舞厅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汤米会离开。他不会喜欢在用联合杰克旗装饰的舞台上演奏的乡村和西部音乐。他不会喜欢从泵里流出来的啤酒，或是男人女人在一起亲密跳舞的方式。他不会喜欢一个醉酒的人试图把我赶走时所使用的语言。“你他妈的在这儿干什么？出去，滚出去！”酒吧服务生把他从我身边拉开，而其他一些中年妇女甚至把我往舞厅地上摁，这个地方有一种塞尔维亚式的狂热和仇恨的气氛。汤米可能会跟我一样，因为随着时间流逝开始笼罩在整个场景里酒醉的绝望感到尴尬，这些上帝钟爱的奥兰治男人和女人们是如何开始咒骂、如何在狂饮中摇摆，最后在一个男人——他除了一顶“决不投降”的棒球帽和印有联合杰克旗的汗衫和内裤之外什么都没穿——带领下，每个人唱着《肩带》（*The Sash*），挥舞联合杰克旗，环绕着舞厅跳康茄舞。

那一周的晚些时候，我参加了纪念威廉在伯恩之战胜利的奥兰治仪式。几百名中年奥兰治党人和他们的妻子，加上一些游行的鼓乐队，挤进长老会中心教堂，聆听布道，布道者称之为“新教徒自由的伟大宪章”，那是圣保罗写给加拉太人的使徒书：“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

在阿尔斯特新教教义中有许多关于自由的论述，但宣讲至上之观点的仪式更像是冗长、枯燥的受罪。阿尔斯特人对于忠诚和背叛的迷恋根植于新教徒反抗肉体的精神之中。路德和加尔文，以及两个世纪的地狱之火的布道，让阿尔斯特人处在一种被压制的愤怒状态中，愤怒是针对他们自己冲动的不可抑制的背叛。在新教徒崇拜仪式中，所有这些都被压制在并不轻松的控制之下，然而它仍然寻找各种可以爆发出来的途径，甚至是在奥兰治的奉献仪式上。最终，捐款金额被收集在一起统计，结果发现不足去年的总数。在我去过的任何一个教堂，这不过是件默默为之遗憾的事。在贝尔法斯特不是这样。这个令人失望的结果被公开宣布，计算到最后一个便士，得出的赤字结果是126.35英镑。“这是个侮辱，”奥兰治党人的主持人大发雷霆，“是对奥兰治主义及其传统的侮辱。”再一次，肉体得胜。再一次，在奥兰治日历上最神圣的一天，人们发现，对良知的需要排在上帝之前。在压抑的沉默中，会堂为之一空。

---

1. 索姆（Somme），法国北部省份，因境内的索姆河得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索姆河战役发生于此。
2.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25周年纪念勋章。
3.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4. 加里波利（Gallipoli）半岛，位于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在此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想开辟南方战线进攻奥匈帝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军队组成澳新军团参战。澳新军团后来被澳大利亚人视为民族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和国家象征，设立澳新军团日作为纪念，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5. 维米岭（Vimy Ridge），位于法国阿拉斯（Arras）以北。维米岭战役发生于1917年，为加拿大军队第一次独立作战并取得胜利。该战役在加拿大人心目中具有重大意

义，被视为加拿大民族形成中的重要事件。

6. 联合杰克（the Union Jack），即英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国旗，英文俗称联合杰克，由英格兰圣乔治十字、苏格兰圣安德鲁十字以及爱尔兰圣帕特里克十字组合而成。

7. 指1953—1972年北爱尔兰旗帜，其图案为带红手和王冠的红十字旗，俗称红手旗（红手为阿尔斯特纹章标志）。1972年北爱尔兰议会被取消后，红手旗不再做官方使用。

兰博格鼓

在北爱尔兰有两场战争：一场战争在贝尔法斯特和伦敦德里的天主教和新教徒劳工阶层之间；另一场是在靠近爱尔兰共和国边境地区的爱尔兰共和军（IRA）和新教徒农民、市民之间。随着新教徒农民和他们的家庭被枪杀、被击穿膝盖、被轿车和货车炸弹驱赶出这片土地，在边境地区谈论“种族清洗”的话题更多、更随意。我驱车前往阿玛（Armagh）郡绿意盎然的原野，此前一天，军方发现一辆载有2000磅农业肥料的货车，有两枚定时炸弹准备引爆，目标是马基特希尔，一个非常美丽的农业村庄，那里之前曾经被一枚炸弹摧毁过一次。

我前往贝尔法斯特以南一小时路程的马基特希尔，去看看边境战争，拜访一位我曾听说过的人：迪克·斯蒂利特（Dick Sterritt），一位制作兰博格鼓（Lamberg drum）的人。迪克是个身材魁梧的男子，不到30岁，声音柔和轻快。他说，兰博格鼓是“阿尔斯特人的心跳”，巨大的鼓面——3英尺1英寸[注]宽——发出的雷鸣般声音是新教徒300年来行进的声音。迪克将于7月12日在波特当（Portadown）举行的奥兰治游行中与他的兰博格鼓一起行进，就像从出生以来，他和父亲欧尼一起做过的那样。

迪克一整年都在制作和修补鼓，加入了全郡各奥兰治会的制鼓竞争行列。迪克带我去附近的斯加瓦村参加一个由奥兰治会赞助的竞争。在奥兰治会的停车场，竞争者和旁观者围成一个圆圈，鼓手和他们的鼓依次展示，就像是获奖的公牛站在裁判面前。三个拿记分册的老人弯腰聆听鼓声，倾听每个鼓中制作者称之为“心脏”的悦耳回响音质。在任何其他制鼓传统中——比如说加勒比——重点是鼓声，奖励会给予最为丰富、最具创造性的节拍。兰博格鼓不是这样，节奏像阿尔斯特传统自身

一样是不变的：一记突然的高调声音迸发，持续达数分钟，而鼓手的脸因为用力而胀得发紫。尽管努力尝试，但我无法分辨出哪一面鼓拥有更多的心脏，竞争者们也无法分辨。当结果宣布的时候，对于选择决定的反应，更多是宽厚的困惑。比竞争更重要的事情似乎是消耗掉许多杯布什米尔斯[注]威士忌，以及，不用说，以全体在场的人起立、高唱《女王》（*The Queen*）而结束。一切都结束后，迪克悄声对我说："我们在爱尔兰共和国敲鼓不安全，现在还是这样吗？"

像其他所有的阿尔斯特传统一样，鼓来自威廉国王。它们是定音鼓，在马鞍的两边各平放一个演奏，自从伯恩之战以后，它们一直是阿尔斯特人的守卫者。迪克喜欢讲关于清晨战斗的故事，当时新教徒还在伯恩河的一边沉睡，詹姆斯的军队已经进军，想要打他们措手不及。"那儿有一只鹪鹩，一只小鸟，它开始敲鼓，击鼓的男孩于是醒了，敲响了警报。"这是件奇怪的事情，他说着眨了眨眼，所以天主教徒现在喜欢射杀那些小鸟。

迪克所有的鼓都经过精心绘制和装饰：除了"北方雄鸡"——鼓身上有一只打鸣的公鸡——之外，还有一面大约有80年历史的鼓，被称为"奥兰治征服者"，上面有威廉国王戴假发的画像，边上是一面新鼓，煞费苦心地画着一个年轻男子，有浅桃红色的脸和红色的头发。他是迪克的亲戚、北爱尔兰皇家骑警队（RUC）的一名预备巡警，1991年，当他离开阿玛的军营时，死于在他的路虎车下引爆的一枚地雷。

"我得到消息，去看望我的姨妈，大卫的母亲。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卫再也不能和你一起在7月12日的时候行进在马基特希尔的大街上了。我对她说：'艾薇姨妈，我会在7月12日的时候永远与大卫在一起，因为我要把他放在我的鼓上。'"每一年，迪克带着他鼓上的大卫一起行进。

迪克的父亲欧尼是位退休的建筑商，他忧郁地听着。"事情在

于，”他用低沉的阿玛口音说，“他们出卖了我们的利益，不应该有外国势力告诉我们怎么管理这里的事务。”他不仅是指都柏林，也指威斯敏斯特。“英国人永远不理解如何统治我们，”迪克说，“他们不相信我们归属相同。”

对于欧尼·斯蒂利特，英国本土是一个遥远的伤心之地。“他们过去在电影院里唱《天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他沉吟说，“不要以为他们在本土也会那样做。”他叹了口气：“一切都悄悄溜走了，真的是这样。”迪克听着，沉思着。“他们似乎没有一个故事要讲述，没有一支歌要唱，”迪克说，“他们似乎不知道他们是谁。”

欧尼给我看斯蒂利特的家谱，它追溯到17世纪。迪克想让我知道，他们是“黑嘴人”。迪克解释说，在安妮女王时代，像长老会这样持不同意见的宗派被封禁，只能在田野里、躲在黑莓树丛后面教育他们的孩子，所以在黑莓季节，孩子们的嘴唇和面颊都被黑莓果实染成了黑色。迪克说：“那是我们的名称，它始终与我们相随。”他仍然对把已建立的爱尔兰圣公会教堂（Anglican Church of Ireland）作为他的黑嘴祖先所在之地抱有怀疑。“只有一张薄纸将他们与罗马教堂分开。”他阴郁地说。迪克完全了解，有许多时候“黑嘴人”感到与天主教——也在宗教禁令下艰难生存——的亲密关系比跟当地的新教徒地主高斯福德爵士[注]更为亲近。异见传统对于圣公会体制的政治和宗教形式都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为阿尔斯特人不稳定的忠诚主义又增加了一种压力。在阿尔斯特人对英国本土体制的憎恨中，有一种被压制的民主冲动，被压制是因为忠诚主义从未能转化成一种自己的民族主义，从未将阿尔斯特人民的事业与本土体制的事业分离出来。

迪克带我出去，开着他的红色雷诺4型货车兜风，他称这辆车为山羊马车，因为他使用它在乡间搜寻大到足以给他37英寸[注]鼓皮的山羊。他的有些羊来自周围的天主教徒，但他肯定是先打电话给他们，这样他们可以打电话给天主教村子里的监视站。这样他的山羊马车就不会

被"强盗"抓住。在强盗之乡就是这样。"在这儿你不会想在夜晚外出。"他说，看着起伏的田野，弗里赛奶牛在门口咀嚼反刍食物。有些篱笆门是临时派[注]设置的炸弹陷阱，小树林中将会布满英国士兵。英国对这个郡的控制似乎在他们之间摇摆不定。每一条小巷都有战斗的记忆。迪克经过一所房子，想起他的一个朋友，一位业余战士，他在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遭到绑架，受折磨，被枪杀，然后被扔在他家门前的路上。军方担心尸体是个炸弹陷阱，只好用一辆路虎把他拖出村子，他的家人只能看着。"这让你想要知道，"他温和地说，"是什么样的人会像那样杀死一个人，明知道他的家人会看到他的样子。"

在从他位于马基特希尔主街的酒吧回家的路上，他自己曾经被几个戴头套的当地天主教男孩挑衅。"现在，在你自己的家乡不可能发生那样的事情了。"一位邻居告诉他哪些天主教徒要为此负责，到第二年，他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找了出来。"只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就够了。"

但天主教徒只不过是迪克的问题之一。他曾与一些奥兰治党人和一个乐队坐车前往伦敦德里，一些男孩子上车，要求他购买一张为被关押的忠诚派民兵募捐的彩票。迪克拒绝了，说如果他们在监狱里，是他们罪有应得。那天晚上下车之后，那些男孩子就在一些巡警的眼皮底下攻击、殴打他，巡警将他从厮打中拉出来，并且问他是否要控告他们。在愤怒之下，迪克说他会控告，但这个事情未能提交审判，因为他接到电话，说他不应该继续追究。迪克承认："如果你愿意，可以把它称为威胁。"

他没有时间参加当地的民兵组织。他指出一些飘扬着UVF[注]旗帜的房子，这些蓝色旗帜表明这家人支持独立的阿尔斯特，一个与英国和爱尔兰共和国都没有关系的阿尔斯特。这让迪克认为是疯狂政治。他摇了摇头："他们脑子里缺根筋。"而且，他说道："如果英国人不在这里，农民们去哪里要补助？"

他说，尽管有这些麻烦，但这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国，他不会住到其他地方去。我们往邻近“自由国度”的边界开去，由冬青和紫红灌木圈起来的牧场陡峭、起伏，里面有弗里塞奶牛和赫里福牛。白色的小屋围在玫瑰花丛之中；联合杰克旗在爱尔兰教堂（Church of Ireland）的尖塔上飘扬，而阿尔斯特的红手旗在反对派礼拜堂和奥兰治堂的钟塔上方飘舞。然后，伴随着道路中间的一个减速带和一个转弯，迅速一个闪避，穿过一条小溪，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块牌子，写着“欢迎来到爱尔兰共和国莫纳亨郡”。没有边境检查站，郁郁苍苍的风景没有任何断裂，没有任何东西告诉你这是地球上最具争议性的边境之一。

迪克每年穿过边境很多次，参加赛马会。他热爱喝酒、漂亮的赛马和好听的故事，在边境以南他从未遇过任何麻烦。有时候，如果他的天主教朋友、来自马基特希尔的基兰手头宽裕的话，迪克会带他一起，但这不常见。在腰带下面挂上一对音箱的时候，迪克喜欢唱歌，他唱的绝大多数是反叛歌曲，关于逃出奥马监狱的歌，关于头发上系着黑色丝带的女孩的歌，关于夜莺之催眠曲的歌。他会把芬尼党人(注)和忠诚派的歌、南方的和北方的歌混在一起，一首接另一首，直到你没法分辨哪个是哪个，或者直到在他当地酒吧中的男孩子们开始尖叫，半带严肃、半开玩笑地，说他应该扔下那些反叛歌曲，给他们演唱一曲完整的《肩带》，那样才会真正让他们开心。

我来到这里，在一个强盗之乡寻找英国性是什么模样，而我发现（当然，是我未曾预料到的）：一个像迪克·斯蒂利特这样的男人，用他对酒、歌和故事的热爱，平静地告诉我抗拒——他并没有说战斗，但是抗拒到底——明显地表现出他已经“是”的人：一个爱尔兰人。

---

1. 约0.94米。——编者注
2. 布什米尔斯（Bushmill’s），北爱尔兰威士忌酒品牌。
3. 高斯福德（Gosford），马基特希尔当地世袭贵族家族。
4. 约0.94米。——编者注

5. 临时派（Provies），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Provisional Irish Republican Army）的绰号。1969年，爱尔兰共和军分裂为正式派（Official）和临时派，正式派于1972年之后放弃武装斗争，支持以政治行动争取爱尔兰统一。临时派则继续坚持以爆炸、暗杀等暴力活动为斗争形式。

6. 阿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 Force）的缩写。

7. 芬尼党人（the Fenian），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爱尔兰独立运动组织。

拉斯库尔男孩

回到贝尔法斯特，马蒂、希兰、迪基、保罗和马德正在将拉斯库尔房子（Rathcoole Estate）的基石刷成红、白、蓝色。绝大多数新教的房子在一年的这个时候都会粉刷基石，为12日做准备。粉刷基石像是贴上一张比利国王[注]或是用阿玛利特长枪和蒙面头套全副武装的忠诚派民兵的壁画。它标示出领地范围。“他们在那边也做同样的事。”迪基说，指着远处的天主教建筑。只有在天主教徒那边才有爱尔兰的三色旗和引自绝食英雄鲍比·山德斯[注]的文字。

直到几年前，拉斯库尔还是欧洲最大的公共住宅区，从前是混居的。鲍比·山德斯本人生长于此。但此景不再。拉斯库尔现在属于死硬派新教徒劳工阶层。在白色蕾丝窗帘后面的塔式大楼里，在那些半独立平房干净的起居室里，是经常令人困惑的贝尔法斯特式混合：文雅、遵纪守法的人们混合着准军事组织暴徒，他们守护着当地的孩子，防范时而发生的枪击膝盖的报复。马德，一个14岁、忧郁地粉刷基石的孩子，因为偷车和驾车围着戴蒙德兜风而遭到过报复，那里是妓女、干洗店和青年俱乐部聚集之地。

戴蒙德现在并非鼎盛期：在赫比·麦卡勒姆葬礼之后的骚乱期间，妓院被捣毁了，青年俱乐部也被捣毁，路面上汽车被点燃的地方还有火烧过的痕迹。男孩子们不会说谁应该负责，但对于他们是否参与，所有人都抱有某种含含糊糊的态度：他们不说自己在那儿，也不说自己不在那儿。

他们无法确切说出，对于做个英国人，他们到底喜欢什么，但他们满怀真正的爱国激情，把联合杰克旗的颜色粉刷到基石上。“是足

球。”保罗大胆地说。马蒂说：“是的，流浪者队，太棒了。”新教徒的贝尔法斯特崇拜格拉斯哥流浪者队，而流浪者队的头巾在忠诚派的标志中，地位仅次于联合杰克旗。拉斯库尔的男孩中几乎没人去过英国本土，但他们听说，在本土，没有人会想过要把房子的基石刷成红白蓝色。“他们没必要，是不是？”保罗说，“他们不会反抗我们所反抗的东西，是不是这样？”

对于本土的房子的基石不刷颜色，马蒂的观点是因为“所有不同的种族和一切，在那儿是混合居住的”。在这儿，他说：“只有我们和天主教徒们（Taigs[注]）。所以我们必须显示我们的色彩，是不是这样？”

马蒂、保罗、希兰、迪基和马德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很多要说的——至少我在那儿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当他们穿上白教堂区[注]新教徒男孩军乐队的紫色制服时，一种变化在他们身上悄然发生。他们从身后的袋子里抽出黑檀木长笛，每个人都谙熟至少100种曲调，以及十几种小军鼓节奏。他们一整年都在青年俱乐部的体育馆里练习，在7月的游行季节，他们几乎每个夜晚都会出去，在拉斯库尔和附近地区游行和演奏。乐队不仅仅是他们的俱乐部，音乐就是他们的演讲词。他们也许不能滔滔不绝地告诉你英国性或者新教主义意味着什么，但是当长着青春痘的大男孩敲响大低音鼓，希兰用他的小军鼓指挥他们开始行进，而马蒂、保罗、迪基和马德在长笛上奏出曲调时，他们在雷鸣般地宣称自己是谁。

我在雨中跟随他们前往奥兰治会，交通近乎停滞，路上推着婴儿车的夫妇驻足向他们鼓掌，军队卫兵谨守岗位，保护他们免遭沿路房子里天主教男孩子们的攻击。鼓声不容任何置疑，难怪天主教徒们称军乐队的音乐是挑衅。但它自有一种暴烈之美，而男孩子们会告诉你，当你行进在市中心、声音回响在城市的高墙峡谷之上，获得的感觉无与伦比。

---

1. 比利国王（King Billy），即奥兰治的威廉三世，Billy为其小名。

2. 鲍比·山德斯（Bobby Sands，1954—1981），爱尔兰共和军临时派成员，1981年在狱中领导共和军囚犯绝食而死。

3. Taigs，北爱尔兰新教徒和忠诚派对天主教徒的蔑称。

4. 白教堂区（Whiteabbey），贝尔法斯特的一个教区。

迪街篝火

午夜钟声敲响，7月11日进入12日的那一刻，迪街（Dee Street），像这座城市里所有的新教徒街道一样，在篝火上点燃教皇和爱尔兰的三色旗。在过去的17年里，L女士亲自缝制“迪街教皇”，她用一个玩具的头颅，喷上绿色、白色和金色的漆，用一个主教的法帽做皇冠。教皇总是穿着红色的袜子，事实上伊恩·佩斯利牧师大人[注]因为将教皇阁下称为老红袜而著称。

在L女士干净完美的客厅里，侧边柜上摆满了她的家族在信鸽比赛中赢得的奖杯，L女士也用她在疯狂大甩卖中购买的上好丝线绣爱尔兰共和国的三色旗。她的儿子身材细长，14岁，穿一件贝壳装，带头为篝火做收集工作。他相当确定今年迪街的篝火将是全城最大的。

迪街是一条狭长的两车道街道，两上两下，建于19世纪，是在哈兰德与沃尔夫造船厂（Harland&Wolff）的黄色吊车阴影之下，为船厂工人修建的。在通往迪街各条道的光秃秃墙上，有喷上去的标语：“阿尔斯特说不！”“迪街说不！”“育空街（Yukon Street）说不！”（当地的一个孩子为我喷涂一幅街上的画，他画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对话泡泡框中也写着“不”。）

迪街上所有的客厅都开着门，日日夜夜，孩子们在其中穿梭进出，从一座房子到另一座房子。失业率很高，有很多20多岁、重度文身的人在客厅里晃悠、喝酒、监视陌生人。在街道尽头、面对篝火的墙上，有一幅画着三个新教徒民兵的壁画，他们戴蒙面头套，持自动武器。

我在迪街上遇到的几乎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一个男人

告诉我，他是“新来的”，最后承认他在同一座房子里生活了25年。只不过跟在这里出生的妻子相比，他是一个新来者。

迪街有它自己的狂野男人。有莫里斯，手臂上上下下都是刺青，每个耳垂上都有一个心形的刺青，他想保护我，换取报酬。然后是留山羊胡子的雷诺士，窄小眯缝的眼睛，剃光了头。迪街的人会告诉你，他“买不起一片三明治”。他和他的女朋友麦蒂有过一个孩子，街上的妈妈们帮助他们生下孩子，但麦蒂还在医院的时候，社会福利机构就来把孩子带走了。雷诺士发现以后，邻居们看到他在迪街上大发雷霆，眼中满是杀气，手里拿着一罐汽油，叫喊着要把“社会”彻底烧掉。

迪街提供的归属带有一种复仇—同情感，对自己人是温馨和欢迎，对敌人是像石头一样绝不屈服。我花了很多天的时间让他们相信，我没有任何恶意。我告诉他们，我只是来和男孩子们谈谈篝火，但L女士半信半疑。忠诚派像塞尔维亚人一样，对于他们遭受的误解念念不忘。

为篝火进行的收集工作开始于3月。迪街的男孩子们，年龄范围从7岁到23岁，冲洗街道、停车场和工厂，用超市的推车拖拉他们的战利品。到7月初的时候，收集物极为庞大，他们必须整晚露营，防止被邻近街道的篝火男孩们偷走。到7月10日，迪街的篝火堆令人惊异地达到60英尺[注]高，堆满电缆卷、盘子和旧沙发、箱子、桶、铁路枕木和汽车轮胎。

跟拉斯库尔男孩一样，对于英国本土发生的事情，迪街男孩们只有最模糊的概念。戴一顶芝加哥熊队的皮质馅饼帽和流浪者队的围巾的斯图尔特说自己听到过“盖伊·福克斯之夜”[注]，但他不能告诉你是什么时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篝火节，他们有他们的，差不多。”斯图尔特对英国本土的最美好记忆是一场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流浪者队的比赛，阿尔斯特的颂歌《我们，我们，我们是比利的孩子！》响彻球场。但英国其他地方，至少从一些访问来看，似乎对他是陌生的。在他去的每个地

方，“他们都管我叫爱尔兰佬，好像我是爱尔兰人，必须对他们所有的爆炸案负责”。

此外，英国人的房子好像都冷冰冰的、不友好，他说，拍拍一个邻居的罗威纳犬，它走过来，在篝火堆边的垃圾中间嗅来嗅去。“没有孩子在外面玩，像在迪街上一样。好像一切归于寂静。”说实话，斯图尔特承认，“在贝尔法斯特，离开三条街远我就会得思乡症”。迪街是他所熟知的一切。他自己有两个孩子。在他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不管如何，就是不行。如果他工作，社会可能断绝他的“给养”——贝尔法斯特给失业者的福利。

我问他，天主教徒住在哪里，他指着身后的道路沿线，大约400码[注]远。我问，如果你们去那里，会怎么样？其他男孩中有一个人迅速回答：“杀了你，肯定的。”如果他们来到这里，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被狠狠教训的，”斯图尔特说。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正好经过，他们就会那样对你。“他们中有几个可能会开始教训你。所以你也必须一样。如果他们来这儿，会被狠狠揍一顿的，不是杀了他们，别介意，只不过是要让他记住。”话说得没有任何恶意。事实上，斯图尔特说这话的时候似乎有一点窘迫，好像是想说明如果你住在一个混居区域，事情会完全不同。但在迪街上不是这样。

那些男人呢？我说，指着那些民兵壁画。许多篝火男孩不太自在地扭头看向其他地方，一个男孩是英国士兵的儿子，他迅速说，他们是非法的，你不能谈论他们。但斯图尔特用一根棍子戳着地面，说他们在那儿是为了惩罚“流氓和小偷”。在迪街的范围之内，惩罚应当保留在家族内部，警察——或者他们称为“皮勒”（peeler）[注]——应当置身事外。比如说你偷了一辆车，或者“做掉”房子，然后你会得到应有的东西。那是什么？敲掉膝盖。那么你害怕他们吗？斯图尔特狡黠地看着我说：“你不会认为我说不怕吧，你会吗？”

7月11日的晚上，我回来看教皇和三色旗被插在篝火堆的最上面，看迪街的男孩子们来来往往游行，雷诺士在最前面，犹如疯子一样挥舞着阿尔斯特旗，而L女士的孩子阿历克斯用一个只有一面鼓皮的残破小军鼓击打节奏。但话传到L女士那里，说我一直和男孩子们谈论天主教徒和武装民兵，她把我叫到她的起居室。“他们只是孩子，”她说。“他们什么都说，但他们不一定是那个意思。”她要我明白，当我扬长而去的时候，她还得住在这里，这并不容易。“看，我购物是在马路上搞大甩卖的时候，跟天主教徒一起。”如果他们知道斯图尔特放话说要狠狠地“教训”他们，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至于武装民兵，她说：“我认为你应该远离政治。”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不回到L女士的“良好印象”，我在篝火边没法一直待下去。我尽全力让她放松，她听我说完，在起居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的脸憔悴而瘦削。最后她原谅了我，传话过来说放过我了。午夜钟声敲响的时候，迪街男孩们的汽油弹飞落在篝火堆上，随着人群一阵长长的欢呼，篝火堆的火苗升腾起来。雷诺士挥舞红手旗，莫里斯正一次喝下两罐麦克尤恩[注]啤酒，火苗中升腾的热气迫使庞大的人群像旋涡一样往后退；两个男人兴高采烈地咒骂我是为“那些他妈的ITN[注]里的柴火共和派”工作。当教皇着火、共和国的三色旗倒下来掉进火苗里时，人群发出低沉、来自肺腑的呼喊。L女士最后出现，被她的孩子们包围着，恬静地沉醉，忘却了一切，缓缓地围绕着篝火堆，与每一个想和她跳舞的人转着圈，轻轻地对自己唱着：

它古老而美丽，它的色彩令人愉悦

它经历德里、奥格里姆、恩尼斯基林和伯恩而变得陈旧

---

1. 伊恩·佩斯利牧师（the Reverend Ian Paisley，1926—2014），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政治家，自由长老教会牧师。

2. 约18米。——编者注

3. “盖伊·福克斯之夜”（Guy Fawkes Night），1605年，天主教徒盖伊·福克斯因不满国王詹姆斯一世的新教政策，偷偷将火药运入议会大厦，准备在11月5日爆炸，事败，盖伊被捕处死。后来英国民众将11月5日视为篝火节，每年此时点燃篝火庆祝胜利。

4. 约360米。——编者注

5. “皮勒”（peeler），俚语，指爱尔兰或者英国最低级的警察。

6. 麦克尤恩（McEwan），苏格兰啤酒品牌。

7. ITN（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独立电视新闻，英国一家为商业电视台进行新闻采访和新闻制作的公司。

原野

为什么每年的奥兰治游行时的天气总是安详温和，阿尔斯特人解释说："上帝是个新教徒。"就是这样。7月12日的早晨，黎明清朗明亮。乐队和数千名会友聚集在中央总会前面，汤米·多伊尔神采焕发，一边啜饮着一杯茶，一边向老朋友们致意。12日这天，在整个北爱尔兰，有8.5万名奥兰治党人参加游行。迪克和欧尼·斯蒂利特将在波特当游行。实际上，游行是个错误的用词。"漫步"是奥兰治人喜欢用的词，表明它代表一种恰当的礼仪和优雅的品味。但天主教徒看到的不是"漫步"。雷鸣般的乐队，整齐的步伐，还有来自比利男孩的歌声中、讲述他们是如何"在芬尼亚党人的血泊中昂首挺肩"的歌词，足以让绝大多数天主教徒们在游行这天闭门不出。

奥兰治党人会怀旧地告诉你天主教徒们从前来观看游行的日子。像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一样，双方都对一个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失落天堂深感兴趣，那时种族之间相互包容，每一方都乐于尊重另一方的仪式。对于忠诚派，相信这一点比承认事实更容易，因为奥兰治主义一直处于激烈反对天主教的边缘，而恐惧上帝、遵守法律的新教主义始终热爱它自己鼓声中的挑衅和暴力性。

他们的游行或漫步向另一方传递了一个信息，即我们在这里，阵容强大，注意点，留在屋子里。但他们的游行也是向自己传递信息，重申信仰，慰藉信仰。因为忠诚主义的长期生存一直深受怀疑，1991年的人口调查数据表明情况不容乐观。20年前，天主教徒占人口的34.7%，今天这个数字是41.4%并且正在迅速增长。有谣传说在贝尔法斯特的学龄儿童中，天主教徒占到总数的50%。从统计上看，新教主义呈现的状况是成年人口的衰减，最优质、最聪明的人口缓慢但是稳定地外流到英国

本土。这些数字对信徒的困扰如此强烈，以至于在7月12日的小册子上，全爱尔兰总会长警告他的奥兰治党人同胞，不要把信仰“寄托在有意误导的人口统计数字”上，就像他秘密警告他们，特务和破坏分子可能潜伏在游行中，披着奥兰治的肩带。

所以，当他们游行到里斯本路（Lisburn Road）、往艾登德里原野[注]前进的时候，他们高举着旗帜，曼彻斯特的常胜公爵[注]、克伦威尔的铁甲军[注]、拉恩[注]的新教徒男孩和巴里加利（Ballygally）的管乐队、来自卡里克弗格斯的崛起的索姆河之子[注]，你数着每一个40岁以下的奥兰治人，你想知道，这种秩序还会生存多长时间。

但他们确实制造出壮丽的场景。在贝尔法斯特边缘被称为原野的养牛牧场上，巨大的橡树散落在向下倾斜的牧场斜坡两翼，管和鼓乐队、手风琴乐队、风笛乐队在树下川流不息。斜坡底部树立了一个小小的平台，用来容纳重要人物，放了几排听演讲的椅子，但在成千上万游行进入原野的人们中间，可能只有100多人愿意听讲。其他人散乱在草地上，用联合杰克旗和阿尔斯特的红手旗盖住脸，抵挡太阳，鼓堆在一起，制服、绑腿、袜子、靴子，一团混乱，炸薯条的包装袋中间堆着啤酒罐和香烟盒。甚至警察也把防弹背心脱下来，头冲着他们路虎的保险杠，在草地上休息。演讲没完没了，古老的宗教指责从讲台上传出来：“罗马天主教是真正宗教的堕落，爱尔兰天主教是所有宗教中最堕落的。”我听到一位尊敬的绅士大声叫喊。另一位演讲者咆哮着：“阿尔斯特新教徒将让阿尔斯特再次强大，恢复英国过去这些年来已经严重衰退的荣光。”似乎还是没有人在听。当老年人的咆哮变得软弱无力的时候，年轻的乐队成员们已陷入了熟睡之中。

---

1. 艾登德里原野（Edenderry Field），贝尔法斯特郊区一处广阔田野。1972年以来，贝尔法斯特每年的奥兰治游行均以这里为终点。
2. 曼彻斯特的常胜公爵（the Duke of Manchester’s Invincibles），奥兰治分会名称。
3. 克伦威尔的铁甲军（Cromwell’s Ironsides），奥兰治分会名称。

4. 拉恩（Larne），北爱尔兰安特里姆郡（Antrim）市镇。
5. 崛起的索姆河之子（the Rising Sons of Somme），管乐队名称。以上均为奥兰治游行中的旗帜展现的分会名称或乐队名称。

船货崇拜

越水而来的伟大国王，从他的白色船只上登陆。在一场伟大的战役中，他从部落敌人手中解救了土著人，成功地保住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而在离开的时候，他授予他们权力，永久主宰这个岛屿。完成这些神奇的谋划之后，他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以后，土著人崇仰他的名字，绘制他的图像，用他的脸庞装饰他们的鼓面，随身携带他的肖像。他们长久地保留关于他的神圣记忆，即使他所有的踪迹都已从他曾到过的这片土地传统中消失不见。

根据《人类学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Anthropology*），船货崇拜（cargo cult）是一种土著人的千禧年行为(注)，他们相信，千禧年来临的时候，将会有装载欧洲贸易物品或船货的巨大船只到来。这些货物是由先祖的灵魂带来，分派给那些遵从偶像之教导的土著人。一些船货崇拜领袖呼吁驱逐所有外来人，殖民元素是救赎的前提条件，而其他人坚持摒弃传统的生活方式，采用欧洲人的习俗。

按照在南太平洋研究此类崇拜的人类学家的观点，关键特征在于“船货崇拜是在白人失去监管和引导对他们物品的欲望的能力之处发生的行为。当局利用并且部分创造出对于白人物品的欲望，作为激励乡民们进行发展之规划的一部分，但当那些欲望转而针对他们自己时，他们被吓坏了”。人类学家将船货崇拜定义为一种“不受控制的模仿”的结果，土著居民照搬白人的仪式和行为，只是为了颠覆他们，将他们转变成为一种崇拜物，从而实际上将他们从欧洲的源头释放出来。

英国船货崇拜是世界上最顽固、最坚韧的。它在我青年时代的加拿大，在蒙特利尔丽兹宾馆的沙龙里，在多伦多的皇家约克宾馆，在不列

颠哥伦比亚维多利亚的女皇宾馆，但也在新加坡的莱福士宾馆、香港的曼德琳宾馆。从斯里兰卡的茶叶种植园到印度的山中避暑地，不间断地供应茶和黄瓜三明治，一个已经消亡的帝国的仪式漂浮在他们如鬼魅般的后世生活中。仪式所暗含的忠诚主义在这里只不过是怀旧或哀悼，但也存在反叛性的对英国性的船货崇拜，例如在白人至上的罗德西亚，伊恩·史密斯[注]在1965年宣布单方面从英国独立之后的实践。这是一种以反叛来对抗英国自身的英国性。

肩带、篝火、燃烧的教皇和三色旗，兰博格鼓，游行的乐队，红手旗，歌声：在我所有的旅程中，从未遇到过一个如此强烈仪式化的民族主义形式。在某一个层面上，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这里英国性被仪式化，因为它对抗的是其对立面和强硬对手：爱尔兰共和主义。

由于敌人是“民族主义者”，忠诚派不仅禁止使用这个词，也避免让自己披上这层面纱。然而，也许这就是忠诚派的本质所在：一种不敢冠以其名的民族主义。按照这种解读，忠诚主义事实上是对自己忠诚，但由于它不敢大声说出来，它在一种展示完全属于自己的身份的归属仪式中，将它沉默无言地表达出来。

红手概括了所有这种模糊性。你可以在每个地方看到它，在旗帜上，在武装民兵的壁画上，在每个糖果店卖的糖果包装纸上。根据凯尔特人的传说，两个苏格兰国王游泳到阿尔斯特。谁先碰触到阿尔斯特的土地，谁就赢得比赛，赢得统治这个地区的权利。当游泳者越来越接近终点时，落后的那个国王砍下自己的左手，然后用自己的右手把它扔到岸上，从而赢得了胜利。

这是一个残酷然而恰当的象征，尤其是这种将该地区作为一个血淋淋的奖品奉献给一个牺牲性对抗的方式。它是一个既值得尊重又有反叛性的标志，既出现在该地区的官方纹章上，又出现在尊崇忠诚派暴徒的武装民兵壁画中。它的凯尔特起源以及在英国本土的不为人知，令红手

只不过展示了忠诚主义是如何紧张地在认同与拒绝、忠诚与反叛之间寻求平衡。阿尔斯特人崇拜17世纪的新教神殿（shrines），而英国本土不再承认那是属于自己的。它阐述了一种相信自己的母亲已经背叛了的英国性。它无法发展成为民族主义叛乱，因为那样会让其共和派敌人开心，它也无法退缩到满足和顺从状态，因为那样过于相信母亲。

然而它还是种特定的英国性，首先在于其曾经做过主人的帝国记忆，因此它无法考虑更不用说承认成为其他民族之外的少数派。它的特殊英国性还在于它屡受伤害的自决权遭到拒绝、背叛，在于它未能将民主意识所受的伤害转变成一种真正的民主的民族主义。英国本土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整体上，英国的民族意识继续希望民族是具体体现在王室体制而不是体现在民众身上。英国人将自己视作臣民（subjects），而非公民，并普遍承认英国历史上的公民成就——法治、议会主权、国家稳定——倾向于在一种婴儿般理想化的君主政体中表现自己。可以争论的一点是，相比一种臣民的民族，一种公民的民族也许会被证明是对这些成就更为坚定和勇敢的捍卫者。

船货崇拜是对它们起源的讽刺漫画，然而漫画揭示了事实，就像游乐场的镜子。如果阿尔斯特人不能决定它所忠诚的对象——它自己的人民还是王冠——这可能是因为英国整体上对同一个问题还没有答案。

在阿尔斯特忠诚主义的船货崇拜中，英国民族主义的种族和公民成分正开始分离。忠诚主义是一种种族民族主义，它矛盾地使用英国性的公民符号——王冠和国旗——来标识种族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内容被清空了：例如，忠诚派的武装军事主义只是太想分清楚，忠诚派社区的哪一部分将法治视为英国公民身份的核心。最终，王冠和国旗的意义退化成与贫穷白人少年身上的刺青一般，它们只不过是种族暴力的标志。

在英国，同样的分离很容易发生，而且事实上已经在发生。像国旗和王冠这样的身份符号，从前曾代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治和公民外衣，

被幻灭、不公和压迫耗损成了纯粹的白人性的标志。如果一个社会不再能教育他们的孩子，英国性是与公正而不是种族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其标志就会出现在仇恨的标牌上。

正如在加拿大、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其他地方所见，英国不是民族身份的公民和种族成分正在分离的唯一国家。绝大多数多民族、多种族的民族国家都发现，他们的人民经常更忠诚于组成他们的种族单位，而不是将国家凝聚在一起的联盟和法律。

成功地将民族和种族张力约束在世界上的现代多种族社会中的，是一个强大到足以令其权威得到尊重的国家。即使在北爱尔兰，这仍然千真万确。尽管英国的机构在双方的社区中没有得到同等的尊重，英国国家仍然成功地控制着局势。拯救这个地区、避免它成为波斯尼亚的，无非是谨守本职的英国军队、警察和依据证据断案的法庭。

在这里可以获得一个更大的道德认识。对于种族民族主义，唯一可靠的解毒剂被证明是公民民族主义，因为确保种族群体肩并肩和平生活在一起的，只有共同的对国家的忠诚，足够强大，足够公平，足够平等，来要求他们服从。

---

1. 千禧年行为（millenarian movement）是某些宗教、政治、社会团体因持有“世界将面临巨大转变，转变后万物将面目全非”的“启示录”式信仰观点而做出的一些仪式性行为，大洋洲不少土著部落的“船货崇拜”即是其中一种。——编者注

2. 伊恩·史密斯（Ian Smith，1919—2007），前罗德西亚及津巴布韦政治家，1964—1979年任罗德西亚总理，1965年发表《单方面独立宣言》，脱离英国，以维持白人的少数派统治，1979年结束白人统治。1980年津巴布韦成立，罗伯特·穆加贝当选总理，开始漫长的独裁统治，史密斯担任津巴布韦国会议员，至1987年被穆加贝免职，退居南非，2007年逝世于南非开普敦。

饥饿和餍足

我在旅程开始的地方结束我的旅程，思考着论点和结果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的良好意图和民族主义暴力之间的关系。理性主义者倾向于相信，民族的所作所为肇始于他们说想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民族主义者说暴力因自我防卫和寻求自决而成为正当，理性主义者断定，这是暴力之所以发生的原因。

我不再那么确定了。在我看来，似乎经常是暴力首先发生，民族主义者的理由随后才出现。比如说，武科瓦尔被双方无情毁灭是对此的完美例证，令我印象深刻。在那种情况下，对民族主义言辞的最佳理解，是它为已发生的事情开脱，而不是解释所发生事情之缘由。

在我去过的每个地方，民族主义最为暴力之处，是在以对抗最为接近自己的人们来区分自己族群的地方。对冲突的理性解释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至少对于外部人士来说，阿尔斯特人听上去、看上去和爱尔兰人接近，正如塞尔维亚人看上去、听上去和克罗地亚人近似一样，然而正是这种相似性推动他们自己互相看成极端对立方。自从该隐和亚伯[注]之后，我们已经知道，兄弟之间的仇恨比陌生人之间的仇恨更为暴烈。我们老生常谈地说这是因为仇恨是一种由爱转而对抗自身的形式，或者说我们对亲近之人有最深的仇恨，或者说暴力是对我们无法承受之亲密的最终拒绝。这些都不对。存在不是任何民族主义理论、任何微小差异自恋理论能够解决的难题。去过新世界秩序的那些被废弃的土地，尤其是那些竖立着无数木头十字架的原野墓地之后，你会因道德解释的缺失而陷入震惊与沉默。

在文章《与过去妥协意味什么》中，西奥多·阿多诺说："民族主义

再也无法完全相信自己。"在我去过的每一个地方，民族主义言辞有一种令人困惑的虚假和伪善，似乎嘴边挂着民族主义口号的人们，在内心某个地方明白他们自己的话语的非真实性。那些上一刻告诉你所有克罗地亚人都是乌斯塔沙野兽的塞尔维亚人，下一刻就回忆起自己与他们和平生活时的快乐日子。在这种分裂的意识中，有一个抽象性的幻想层面和一个直接经验的层面，两者决不允许互相面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道德语言系统的主要作用是确保这种划分，并且以此来弱化这种意识。但它从未完全发挥作用。正是那些以未经思考的热情接受这种概括的人，经常也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他们，以他们的经验，这些概括实际上是错误的。然而即使绝大多数人听到这种内心的声音，似乎很少有人能按照它行事。民族主义话语的权威就在于，绝大多数人对他们自己经验的证据进行积极审查。

民族主义是一种演说形式，它的喊叫不仅是让自己被人听到，也是由此相信自己。它几乎就是粗糙的历史虚构、暴力的道德夸张、对敌人的滑稽讽刺，与演讲者自己了解它是彻头彻尾谎言的程度，两者之间的商。但这种伪善也许是一种语言的功能性要求，它承担着要坚持如此大体量谎言的重负。例如，民族主义者对于一个种族纯粹国家的幻象，承担的任务是说服普通的人们对负面的社会学现实顽固地视而不见，比如说，绝大多数社会都不是，也从未达到种族的纯粹。民族主义领导人热情地鼓吹共同社会的同胞感情，但必须克服对于他的每一个听众都简明易见的证据，即没有一个现代社会是合乎某单一民族的意愿。诸如此类的幻想确实抓住了很大一部分人，但只是证明这些人内心深处多么渴望逃离顽固的生活现实。

因此，此种解读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幻想和逃避的语言。在许多情况下——塞尔维亚是恶名昭彰的例证——民族主义政治是从社会落后现实的全面、集体的逃离。与直面现实——欧洲外围一个贫穷的、原始的、三流经济体——相比，聆听关于塞尔维亚的英雄般悲剧命运的演讲、幻想最终击败其历史敌人，绝对是更有吸引力的。

所有社会的政治体制——先进的和落后的、发达的与不发达的——都受到幻想之诱惑的伤害，唯一可靠的解毒剂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灾难的冷水浴。即使如此，除非他们拥有一个能让自己去除幻想的政治体制，否则各个社会难以从民族主义幻想中醒悟过来。拥有足够的民主传统的社会已经证明他们自己对幻想政治是脆弱的，但一个民主体制至少可以提供惩罚，对与谎言如影随形的幻想家的惩罚。然而同时，人们不能将民主作为对民族主义的一个可以依赖的解毒剂。像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民族主义煽动家在选举中能够获胜，让人们断定，即使在像塞尔维亚这样的表面性的民主政体中，那些将人们从现实中抽离、转移出来的人通常比说真话的人拥有更为长久的政治寿命。

这些主题——幻想、伪善和虚假——让我们多少更为深入地理解民族主义观点和民族主义暴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考察民族主义语言是如何重写、重建现实世界，将其转变成一个高尚事业、悲剧性献身和残酷必要性的幻觉王国开始。然而还有进一步的要素可以加入这幅图景中。

正如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绝大多数民族主义的暴力是由一小部分年龄在18岁到25岁的年轻男性所犯下的。其中部分人有心理病态，但绝大数人完全是心智健全的。直到我在新世界秩序的检查站度过那么多的日子之后，直到我遭遇那些沉醉于他们屁股上的枪的力量的年轻男子，我才开始理解，在手中掌握生杀予夺的权力带来何等深度的快感。认为每个人都痛恨和害怕暴力，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派错误。我遇到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他们热爱废墟，热爱毁灭，热爱来自他们枪杆子的权势。

也许自由派还没有理解男人憎恨的力量，那是在几百年来欧洲逐渐走向和平中累积起来的。我们的文明的历史，是国家将暴力手段收归己用的历史。但这一成就是不可消减的年轻雄性内心始终憎恨的。自由派们没有预料到男人们对和平与家庭生活的厌恶，以及现代国家在没收武

器时年轻男人的愤怒。民族主义叛乱背后的隐形原理之一，是它们发掘出这种深植于男性之中的对现代国家自身斯文和秩序的憎恨。因为看上去很显然，国家秩序是父亲的秩序，而民族主义是儿子的叛乱。除非我们在解释民族主义存在的可能性时留出某种空间，证明儿子针对父亲的报复是合理的、合法的，否则还有什么让我们来解释民族主义暴力令人惊愕的无端性和兽性，以及它对于不管是军事逻辑还是合法的正当防卫之边界的持续不断的逾越？

我的旅程也让我重新思考归属的本质。任何放逐者必定都有渴望更为完全的民族归属的时候。但我去的那些地方，归属是如此强劲、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对它因恐惧而畏缩。这种恐惧的理性核心在于，在暴力和归属之间有一种深层的联系。你对归属于自己群体的纽带感觉愈强烈，你对外人的感觉就愈带有敌意、愈加暴力。你无法拥有强烈却不带暴力的归属感，因为这种强度的归属掩盖了个人良知：如果民族给予人民一个理由来牺牲他们自己，它也给予他们一个理由去杀戮。

在我的整个旅行中，我一直想起《罗密欧和朱丽叶》（*Romeo and Juliet*）中的场景，朱丽叶穿着睡衣在阳台上自言自语，没有察觉到罗密欧站在阴影中听着。她努力去理解，一个凯普莱特[注]家的人，爱上一个蒙特鸠[注]家的人，对于她意味着什么。突然，她呼喊道：

只是你的姓氏成为我的仇敌；

你就是不姓蒙特鸠，你还是你自己。

蒙特鸠是什么？不是手，不是脚，

不是臂，不是脸，也不是人身上

任何其他一部分。啊！换另外一个姓吧：

姓算得什么？注

在波斯尼亚前线，在忠诚派与共和派贝尔法斯特的房子里，在所有部族帮派（我们时代的蒙特鸠和凯普莱特）正在执行种族忠诚法律的地方，都仍旧有朱丽叶和罗密欧在呼喊："啊！让我不做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天主教徒或新教徒。让我只做我自己。"

只做你自己是种族民族主义不会允许的。当人们——因为恐惧或者欣喜——首先将自己视作爱国者，其次才是个人，他们已经走上了摒弃伦理的道路。

而每一个地方，在贝尔法斯特、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利沃夫、魁北克和库尔德斯坦，我遇到常常同为自豪的爱国者的男人和女人们，但他们顽强地抗拒走上那条道路。他们的第一忠诚保留给他们自己。他们的第一事业不是民族，而是保卫他们的权利，选择自己的归属之边界的权利。

但这些人是四面被困的少数群体。这个世界不是由怀疑论者和讽刺家在管理，而是由持枪者和笃信者管理，而他们将要传递给下一个世纪的新世界，看上去已经是一个超出我想象的、更加暴力的、令人绝望的世界。如果在"冷战"终结的时候我曾经认为新的世界将由哲学家和诗人统治，那是因为我曾愚蠢地相信，我所居住的国家并不稳定的文明和秩序必定是所有民族的理性渴望。现在我不确定了。我作为一个自由派开始这一旅程，结束的时候我仍是自由派，但我禁不住想，自由派的文明——法治而非人治、以辩论代替武力、以妥协代替暴力——是与人类本性深深对抗的，只有经过与人类本性进行最为坚忍的斗争才能达致和延续。自由派的美德——宽容、妥协、理性——仍像以前一样有价值，但它们难以灌输给那些因恐惧而疯狂、因复仇而疯狂的人们。无论何时，说教总是听起来空洞。我们必须准备好用武力来捍卫它们，餍足的、世界主义的民族未能这样做，已经让饥饿的民族蔑视我们、厌恶我们。

在饥饿的和餍足的民族之间，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理解障碍。我此生中一直居住在餍足的民族国家，在这里没有严重的边界争端，不再被外国人或压迫者统治，做我们自己房子的主人。餍足的民族有资本去做世界主义者，餍足的民族可以承担向饥饿民族的激情屈尊俯就的奢侈。但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库尔德人和克里人那里，我遇到了饥饿的民族，除非获得自决权（不管是在自己的民族国家，还是在其他民族的国家里），他们的生存仍岌岌可危。

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出在民族主义本身。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有一个家，每一个这样的饥饿民族都必须得到抚慰。错的是某一种类的民族，那种民族主义者想要创建的家园，那种他们用于追寻其目标的手段。不管我去哪里，在那些仍旧相信一个民族应当是一个所有人的家园，相信种族、肤色、宗教和信仰不应当是归属的障碍的人们，和那些相信民族只应是他们自己家园的人们之间，斗争正在持续。这是在公民的民族和种族的民族之间的战斗。我知道自己站在哪一方。我也知道，现在，哪一方正侥幸走向胜利。

---

1. 该隐和亚伯（Cain and Abel），《圣经》记载，该隐和亚伯为人类始祖亚当与夏娃之子，该隐因为嫉妒而杀害亲生兄弟亚伯。
2. 凯普莱特（Capulet），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朱丽叶的姓氏。
3. 蒙特鸠（Montague），罗密欧的姓氏。
4. 译文来自梁实秋先生所译《罗密欧与朱丽叶》。

延伸阅读

民族与民族主义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Verso,1983.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Blackwell,1983.

LIAH GREENF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Harvard,1992.

ERIC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870,Cambridge,1990.

ELIE KEDOURIE,Nationalism,Hutchinson,1960.

ANTHONY D.SMITH,National Identity,Penguin,1991.

德国

ROGERS BRUBAKER,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Harvard,1992.

GORDON CRAIG,The Germans,Penguin,1982.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The Great Migration’,Granta,42,1992.

MICHAEL HUGHES,Nationalism and Society,Edward Arnold,1988.

ANNE MCELVOY,The Saddled Cow,Faber,1992.

PETER PULZER,The Rise of Political Anti-Semitism in Germany and Austria,Halban,1988.

PETER SCHNEIDER,The German Comedy,Tauris,1992.

乌克兰

JOHN ARMSTRONG,Ukrainian Nationalism,Columbia,1980.

BOGDAN KRAVCHENKO,Social Change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Ukraine,Oxford,1985.

IVAN L.RUDNYTSKY,The Role of Ukraine in Modern History,Harvard,1987.

OREST SUBTELNY,Ukraine:A History,Toronto,1988.

南斯拉夫

SLAVENKA DRAKULIĆ,Balkan Express,Hutchinson,1993.

PAUL GARDE,Vie et Mort de la Yougoslavie,Fayard,1992.

MISHA GLENNY,The Fall of Yugoslavia,Penguin,1992.

BRANKA MAGAS,The Destruction of Yugoslavia,Verso,1993.

JACQUES RUPNIK,ed.,De SarajevoàSarajevo,Editions Complexe,1993.

MARK THOMPSON,A Paper House:The Ending of Yugoslavia,Hutchinson/Radius,1992.

库尔德斯坦

JOHN BULLOCH AND HARVEY MORRIS,No Friends but the Mountains,Viking,1992.

PHILIP G.KREYENBROEK AND STEFAN SPERL,The Kurds,Routledge,1992.

SHERI LAIZER,Into Kurdistan,Zed,1991.

KANAN MAKIYA,Cruelty and Silence,Cape,1993.

魁北克

WILLIAM DODGE,Boundaries ofIdentity,Lester Publishing,1992.

RON GRAHAM,The French Quarter,Macfarlane,Walter and Ross,1992.

MORDECAI RICHLER,O Canada O Quebec,Viking,1992.

PETER RUSSELL,Constitutional Odyssey,Toronto,1992.

CHARLES TAYLOR,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Recognition,Princeton,1992.

PIERRE TRUDEAU,Federalism and the French Canadians,Macmillan,1968.

北爱尔兰

ARTHUR AUGHEY,Under Siege,Hurst,1989.

JONATHAN BARDON,A History of Ulster,Black Staff,1992.

GEOFFREY BEATTIE,We are the People,Heinemann,1992.

LINDA COLLEY,Britons,Yale,1992.

ROY FOSTER,Modern Ireland,Penguin,1988.

TONY PARKER,May the Lord in His Mercy be Kind to Belfast,Cape,1993.

致谢

我必须为一个欺骗请求读者原谅。本书所写，似乎我是在独自旅行。事实上，不管何时，陪伴我的人从未少于五个，制作与本书相伴的BBC电视纪录片。没有他们的陪伴，我可以肯定本书绝无可能产生。

我感谢阿兰·叶托柏制作本电视系列片，感谢他的继任者迈克尔·杰克逊的全程支持。Primedia公司的帕特·费恩斯和BBC威尔士频道的杰兰特·特尔芬·戴维斯最早提出本系列片的构想，BBC威尔士频道的菲尔·乔治全程带领团队，迈克尔·卓别林为本项目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我对他们表示感谢。卡迪夫工作室的特莎·休斯、瓦尔·特纳和玛丽安·威廉姆斯安排旅程，提供基本后勤支持。一路上，三位杰出的摄影师布莱恩·麦克戴蒙、安德鲁·卡彻里和亚采克·佩特里茨基设计画面。杰夫·诺斯、鲍勃·琼斯、托尼·米林和帕特里克·博兰德负责录音。伊恩·摩斯、劳伦斯·加德纳、拉尔夫·麦克唐纳和麦克·卡尔林担任摄影助理。科林·托马斯和蒂姆·兰伯特分别是三部电视片的导演和制作人，对于电视片的最终成型，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亚于我。本书中的许多思想源自他们的头脑。

在所有这些旅程中，我对我的翻译、研究人员和修理师倚赖甚重：在乌克兰是丽娜·波梅兰采夫，在德国是艾菲·帕里斯，在北爱尔兰是玛丽·卡尔森，在克罗地亚是阿兰·比瑞麦克和马克·汤普森，他们关于南斯拉夫崩溃的优秀书籍影响了我对这个地区的整体观点，在塞尔维亚是拉扎尔·斯托贾诺维奇和苏珊娜·约万诺维奇。

部分文字以不同形式首先发表于《新共和》（*New Republic*）、《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Books*）和《观察家》（*The Observer*）。

最后，我感谢BBC图书的玛莎·考特和苏珊妮·韦伯、查托公司的乔纳森·伯恩汉姆通过一系列出版期限——我们都认为是不可能的——促成本书。

我必须要把我的感谢送给每一个参与的人，与你们一起分工合作的那种快乐无与伦比。